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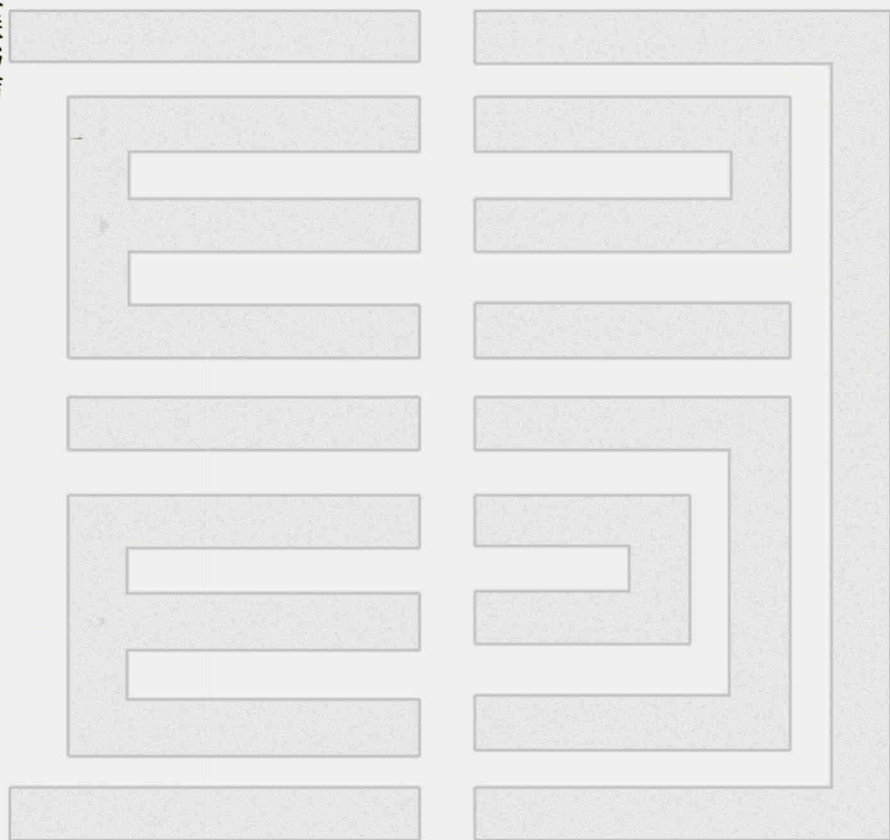
# 松漠之间

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

林梅村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松漠之间

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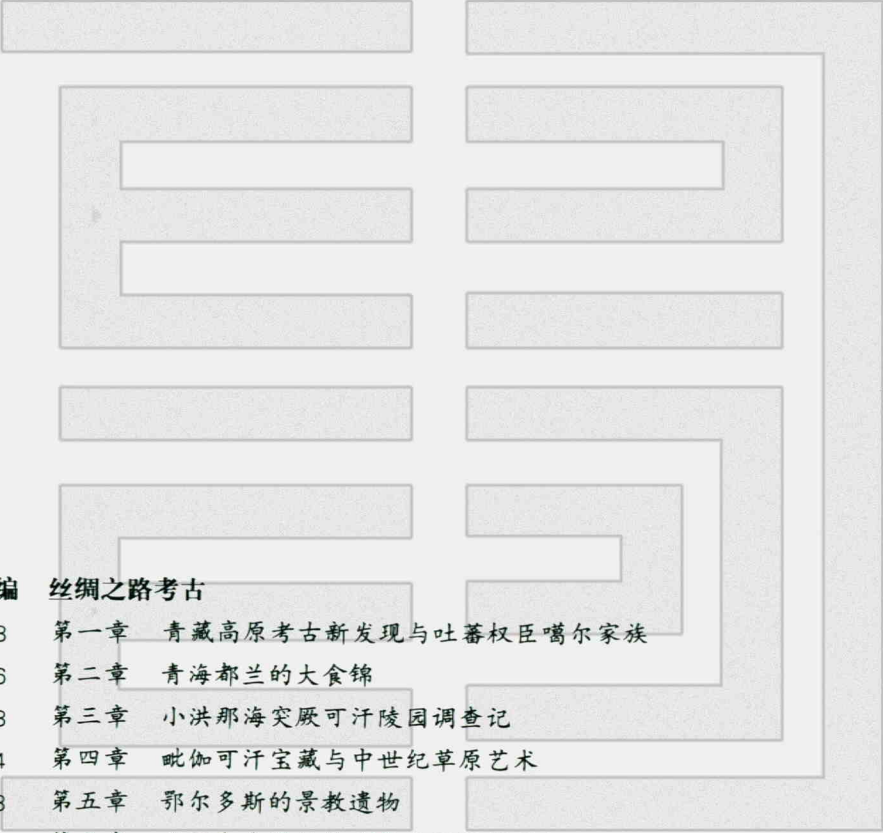
林梅村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78588

# 目录

008	彩版目录	
017	缩略语表	
上编	西域语言与艺术	
022	第一章 世界文明珍宝展随想	
032	第二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日合拍大型电视专题片《新丝绸之路》随想	
046	第三章 汉晋艺术之犍陀罗文化因素	
074	第四章 汉代边塞遗址及其汉简的发现	
090	第五章 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	
110	第六章 尼雅出土佉卢文《温室洗浴众僧经》残卷	
137	第七章 且末所出鄯善王安归伽纪年文书考 ——兼论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流行之外道	
150	第八章 勒柯克收集品的五件犍陀罗语文书	
166	第九章 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土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	



**下编 丝绸之路考古**

- 188 第一章 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
- 196 第二章 青海都兰的大食锦
- 208 第三章 小洪那海突厥可汗陵园调查记
- 224 第四章 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
- 238 第五章 鄂尔多斯的景教遗物
- 246 第六章 从额尔古纳松林到成吉思汗的崛起
- 279 第七章 《元经世大典图》考
- 305 第八章 蒙古山水地图——在日本新发现的一幅中世纪“丝绸之路地图”
- 325 第九章 郑和忌日及身后事
- 345 主题索引

# Contents

008 Content of Colour Plates

017 Abbreviation

## Part One

022 1-1 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Cultural Treasures Exhibition in Beijing, 2006

032 1-2 Reflections on the Documentary of New Silk Roads Made by CCTV and NHK

046 1-3 The Gandharan Elements of Chinese Arts during the Han-Jin Dynasties

074 1-4 Discoveries of the Han Documents and the Beacon Towers of Great Wall during the Han Empire

090 1-5 The Han Documents from Niya Site and the First Prevale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ern Regions

110 1-6 The Kharoṣṭhi Fragments of the Jentāka-snātra-gaṇottama-sūtra from Niya

137 1-7 A Wooden Tablet with the Date of Shanshan King Angoka from Qiemo, Xinjiang

150 1-8 Five Gāndhāri Docu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 Coq Collection

166 1-9 Some Notes on the Yuhong Tomb Newly Found in Taiyuan

## Part Two

- 188 2-1 The Supiya Peopley and the Tibentan Tombs Newly Found in  
Qinghai
- 196 2-2 On the Arabic Textile Fragments from Dulan, Qinghai
- 208 2-3 A Survey of the Turkic Cemetery in Little Khonakhai
- 224 2-4 Treasure of Bilge Khagan and the Steppe Art of Middle Ages
- 238 2-5 On the Nestorianist Antiques from Ordos
- 246 2-6 From Erguna Mountain Forests to Chingis Khan's Rising
- 279 2-7 A Survey of Jingshidadiantu Map Compiled in the Yuan  
Dynasty
- 305 2-8 Mongolian Landscape Map: A Middle Age Map of Silk Roads  
Newly Discovered in Japan
- 325 2-9 The Deathday of Zheng He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 345 Index

## 彩版目录

1. 起辇谷 (林梅村摄影)
2. 《元经世大典图》(据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 战国—元代》,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年, 图版179)。
3. 北京国家图书馆柏林寺分馆藏《非幻庵香火圣像记》(马健摄影)。
4. 日本九州岛原市本妙寺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据杉山正明:《东西方地图所示蒙古时代的世界形象》, 2004年5月14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讲座演说稿)。
5.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朝皇后御容绛丝》(After James C.Y. Watt and Anne 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8, p.140, figure 69)。
6. 青海都兰吐蕃大墓出土伊斯兰织锦 (据张文彬主编:《中国文物精华》,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年, 图版128)。
7. 居延汉代烽燧 (林梅村摄影)。
8. 内蒙古考古队居延发掘 (林梅村摄影)。
9. 小洪那海粟特碑铭 (林梅村摄影)。
10. 《洪武京城图志》之碧峰寺图 (据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 明代》,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年, 图版159)。
11. 毗伽可汗的海东青王冠 (据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编:《毗伽可汗宝藏说明》)。
12. 仇英《归汾图》与《蒙古山水地图》卷首 (林梅村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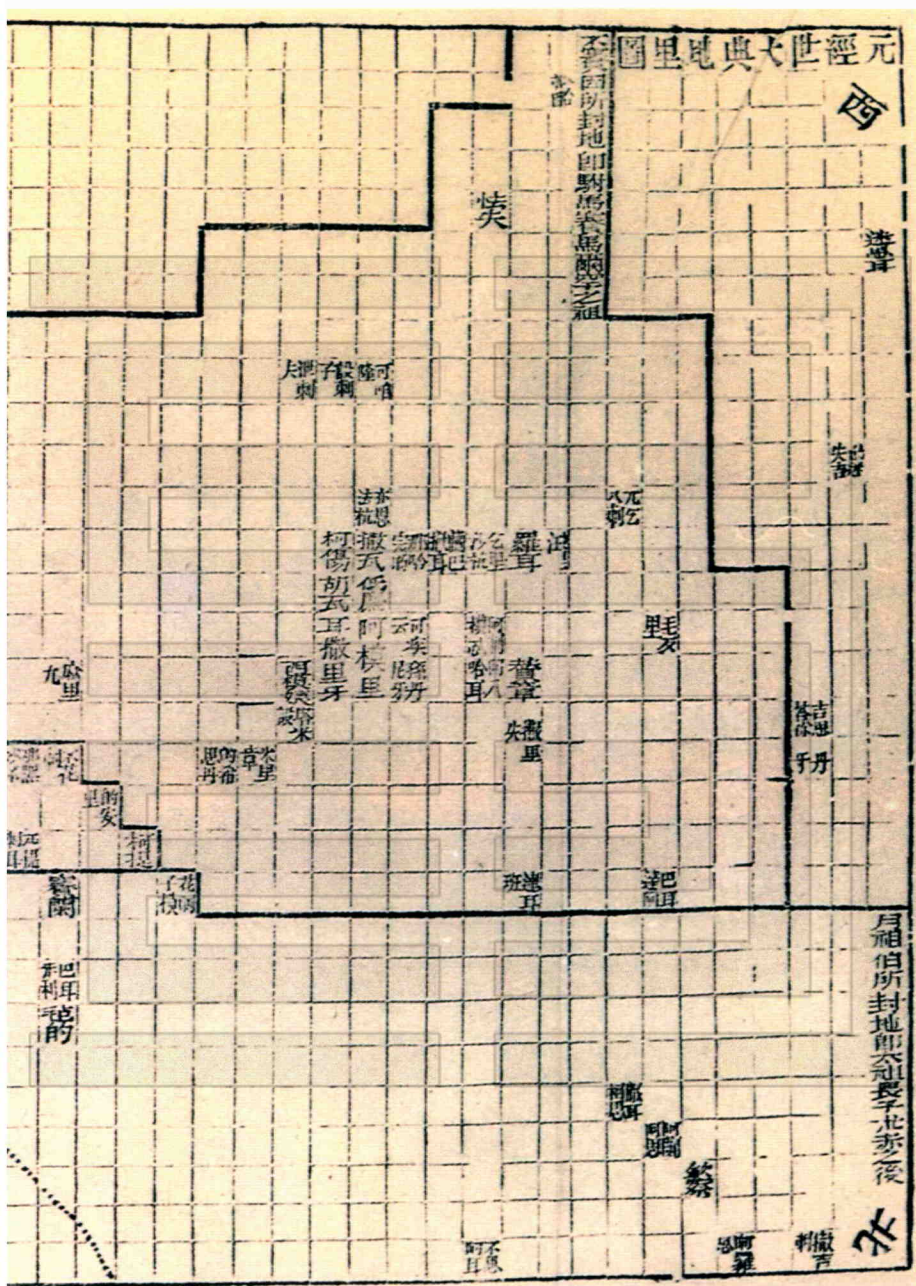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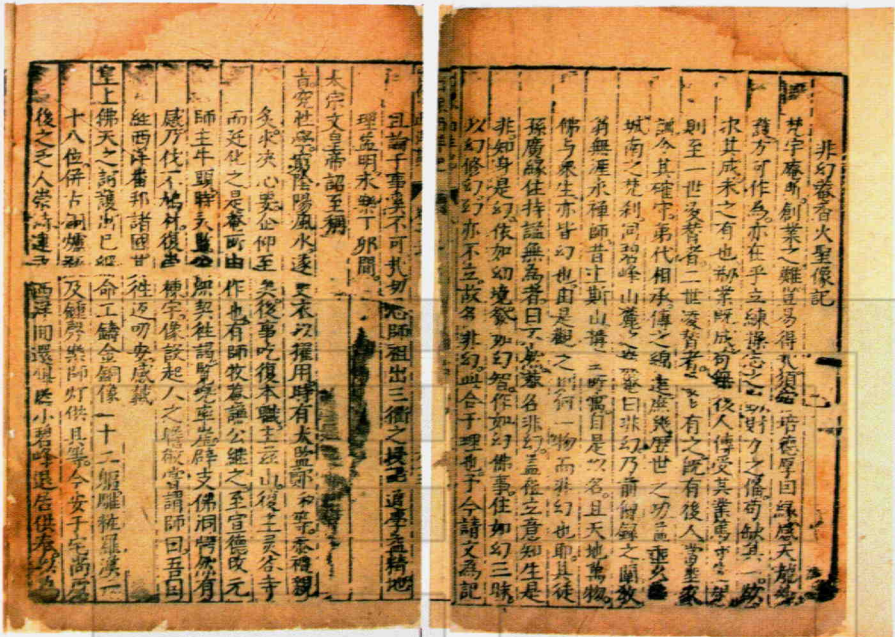
1. 起琴谷 (林梅村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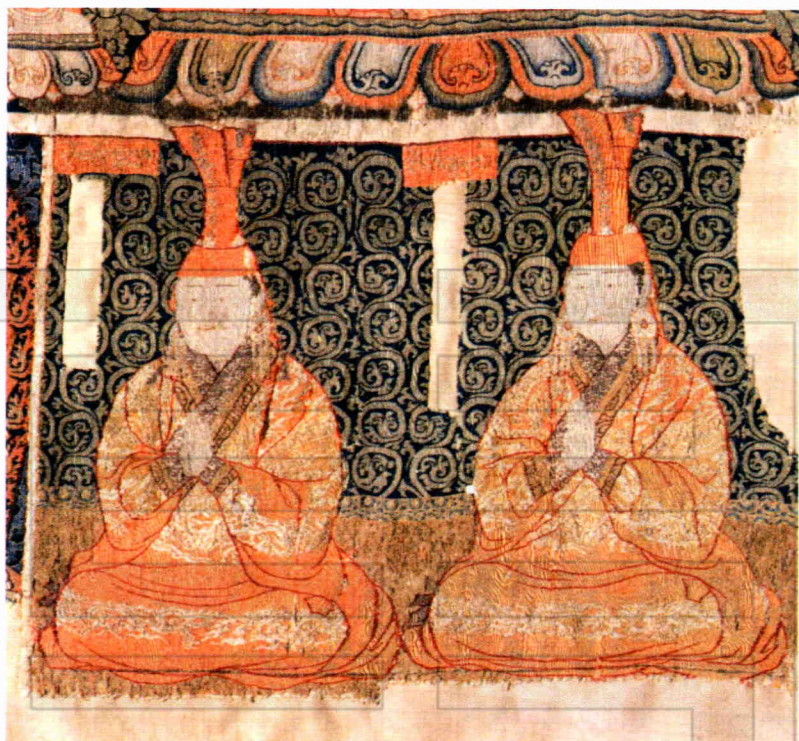


3. 北京国家图书馆柏林寺分馆藏《非幻庵香火聖像記》(马健摄影)。



4. 日本九州岛原市本妙寺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据杉山正明:《东西方地图所示蒙古时代的世界形象》, 2004年5月14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讲座演说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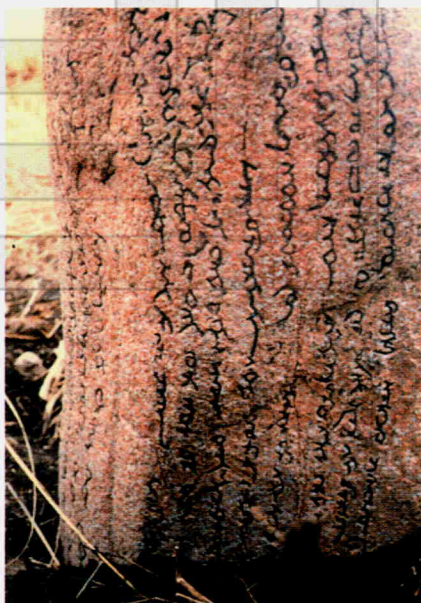
5.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朝皇后御容绉丝》(After James C.Y. Watt and Anne 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8, p.140, figure 69)。



6. 青海都兰吐蕃大墓出土伊斯兰织锦(据张文彬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版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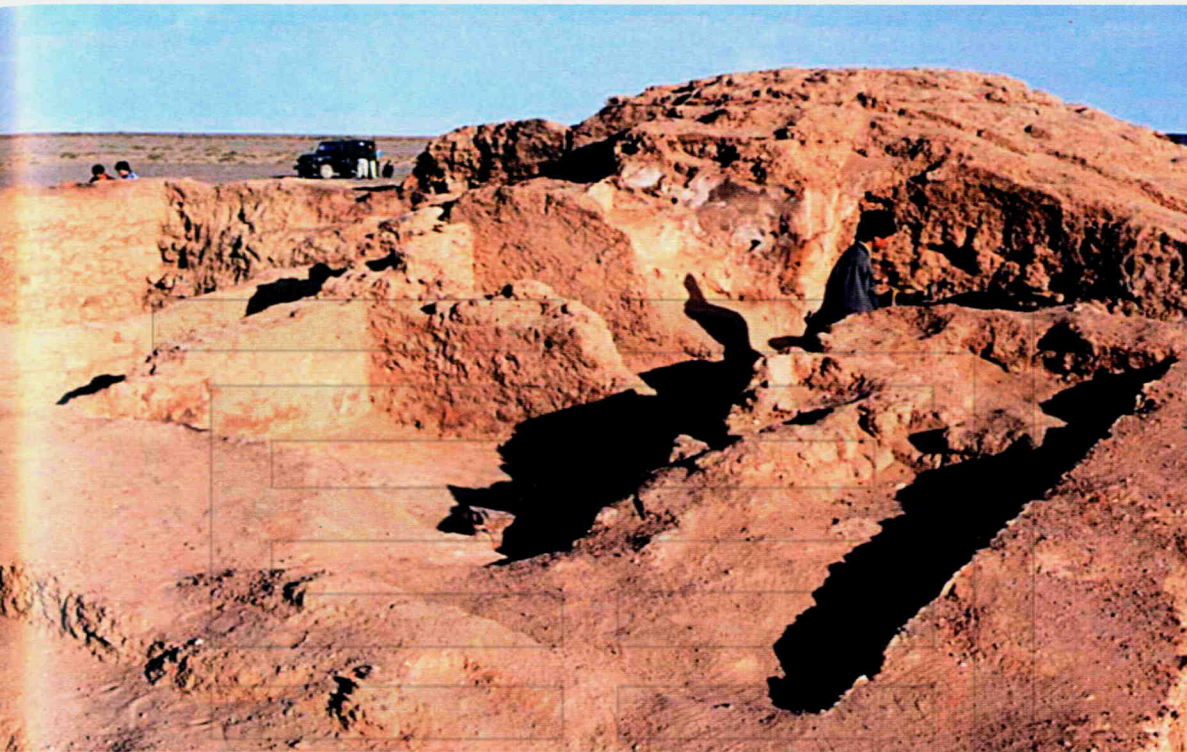


7. 居延汉代烽燧 (林梅村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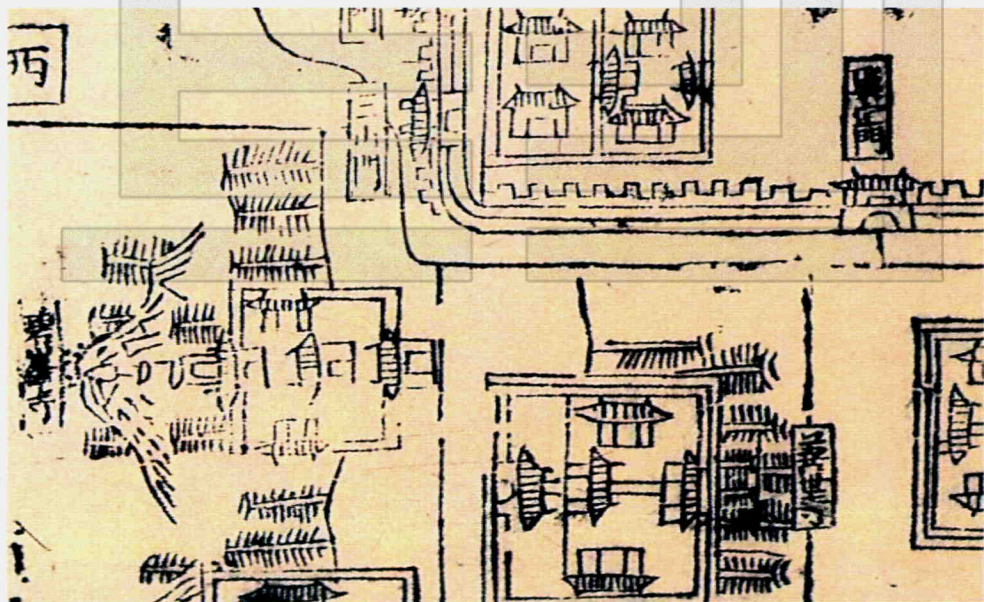


9. 小洪那海粟特碑铭 (林梅村摄影)。





8. 内蒙古考古队居延发掘（林梅村摄影）。



10. 《洪武京城图志》之碧峰寺图（据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图版159）。





11. 毗伽可汗的海东青王冠（据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编：《毗伽可汗宝藏说明》）。



12. 仇英《归汾图》与《蒙古山水地图》卷首（林梅村摄影）。

## 缩略语表

AA	<i>Artibus Asiae</i> , Paris.
AI	<i>Acta Iranica</i> , Tehran-Liege.
AM, n.s.	<i>Asia Major</i> , new series, London.
AO	<i>Acta Orientalia</i> , Copenhagen.
APAW	<i>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i> , Phil-Hist. Klasse, Berlin.
BAIPAA	<i>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Persian Art and Archaeology</i> .
BMFEA	<i>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i> , Stockholm.
BFEO	<i>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Orient</i> , Paris.
BSO(A)S	<i>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i> , London.
CAJ	<i>Central Asiatic Journal</i> , The Hague and Wiesbaden.
EW	<i>East and West</i> , Rome

IIJ	<i>Indo-Iranian Journal</i> ,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JA	<i>Journal Asiatique</i> , Paris.
JAOS	<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i> , New Haven/ Ann Arbor.
JIES	<i>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i> , Washington D.C.
JRAS	<i>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i> , London.
KI.I-III	A.M. Boyer, E.J. Rapson and E. Senart (eds.), <i>Kharoṣṭ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i> , part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0-1927; E.J. Rapson and P. S. Noble, <i>Kharoṣṭ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i> , part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9.
LKD	T. Burrow, <i>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NC	<i>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i> , London.



SAS	<i>South Asian Studies</i> , Leiden.
SED.	M. Monier-Williams, <i>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SII	<i>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i> .
SPAW	<i>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i> , Berlin.
TKD.	T. Burrow, <i>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 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i>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0.
TP	<i>T'ong Pao</i> , Leiden/ Paris.
UAJ	<i>Ural-Altäische Jahrbücher</i> , Wiesbaden.

《梵和大辞典》 荻原云来等编：《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东京，《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编纂刊行会，1940年版。

《翻译名义大集》 榊亮三郎编：《梵藏和四译对校翻译名义大集》，京都，1916年京都大学文科藏版。

《大正藏》 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正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 - 1935年。

上编

西域语言与艺术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正在与现代化的西方进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京城十里长街刚刚落成的首都博物馆，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个具有现代理念的博物馆，不仅追求场馆设施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追求一种现代化博物馆的最新办展方式。2006年春季，这家新生的博物馆将向京城百姓馈赠一份厚礼，与具有250年历史的大英博物馆联手举办《世界文明珍宝展——大英博物馆之250年藏品》。

大英博物馆始建于1753年，最初是由英国一名酷爱自然科学标本的汉斯·斯隆医生（Dr. Hans Sloane, 1660 - 1773）收藏品基础上发展而来。这家博物馆全名“国立历史、考古、艺术及民俗学图书馆和博物馆”，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插图1）。它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名列世界五大顶级博物馆。

1759年1月15日，大英博物馆在伦敦市区附近正式落成，并对公众开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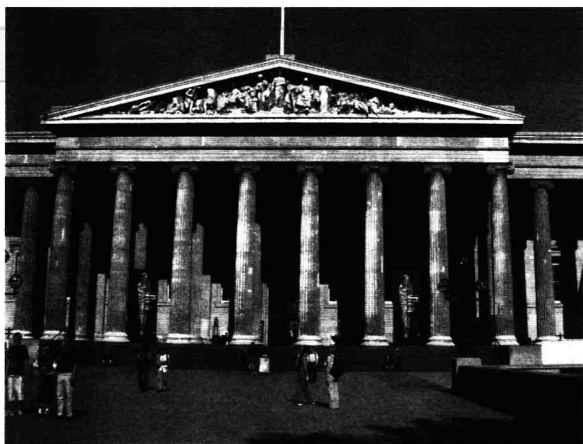


插图1  
大英博物馆

长达250年的漫长历程中，大英博物馆逐渐构筑起自己庞大的收藏体系。今天，大英博物馆藏品已突破600万件，几乎网罗了世界各地所有著名古迹。这些珍贵收藏目前分成十个分馆进行展览：古代近东馆、钱币和奖章馆、埃及馆、民族馆、希腊—罗马馆、日本馆、中世纪与近代欧洲馆、东方馆、史前及早期欧洲馆、版画和素描馆和西亚馆。据统计，大英博物馆东方分馆大约有5万件中国藏品，其中包括东晋画家顾恺之《女史箴图》摹本、精美的商周青铜器、与人等高的辽三彩罗汉以及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爵士（Sir Mark A. Stein, 1862 - 1943）带往英伦的大批敦煌和新疆文物。同时，大英博物馆的东方馆还为英国造就了一大批著名中国考古学家。例如：伦敦大学艺术史系的韦陀（R. Whitefield）教授、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罗森（J. Rawson）教授。他们在执掌教鞭之前，大都长期担任过东方馆馆长。

文字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这个标尺，剑桥大学丹尼尔（G. Daniel）教授在1968年提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起源的文明发祥地有六个，也即所谓“六大文明”。其中，旧大陆有四大文明，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印度；而新大陆只有两大文明，包括墨西哥和秘鲁。<sup>[1]</sup>《世界文明珍宝展》基本上按照这个原则把展品分为十三个部分。

人类起源于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大峡谷（Olduvai Gorge）。1959年7月17日，英国考古学家李基（Louis Leakey, 1903 - 1972）夫妇在奥杜威发掘出一具史前人类头骨，被命名为“东非人”（插图2）。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发现的重要科学价值逐渐为世人瞩目。<sup>[2]</sup>据考古学研究和分子生物学（DNA）分析，奥杜威

插图2  
人类的原始故乡——奥杜威大峡谷及出土古人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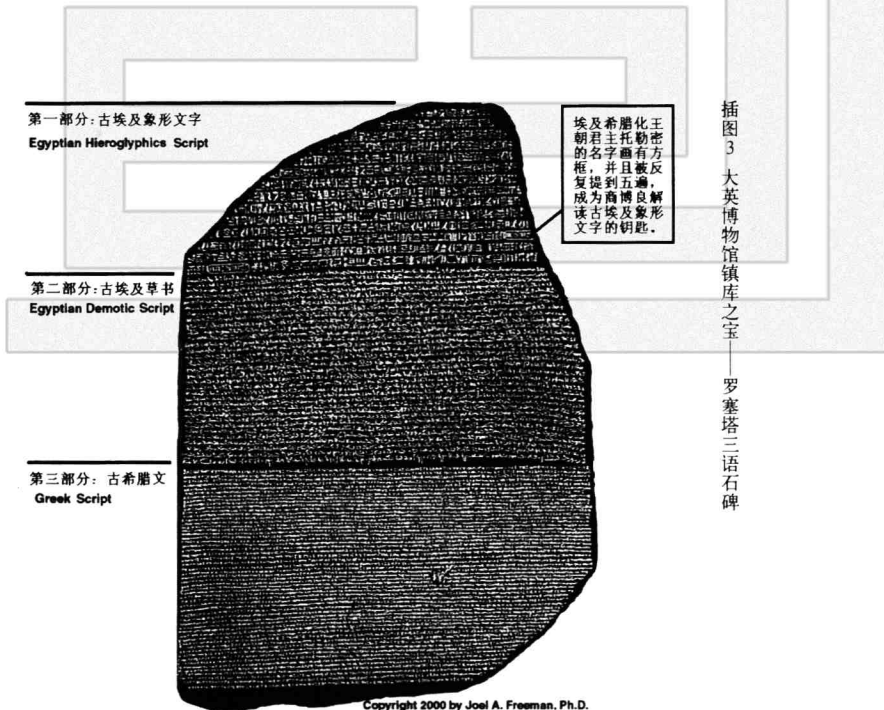


发现的东非人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这些“亚当”和“夏娃”的遗骸，因而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宝中之宝”。值得注意的是，大英博物馆珍藏的奥杜威古人类遗址出土的两件石核（展品编号 P&E201 和 P&E202），亦将随其它文物首次在北京亮相，构成《世界文明珍宝展》第一部分“史前时期”（Prehistory）。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古文明的两大策源地，构成《世界文明珍宝展》第二部分“古代埃及”（Ancient Egypt）和第三部分“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古代埃及指公元前4000年开始到公元前332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而结束的埃及文明史，巍峨耸立的金字塔、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大塔、埃及法老的木乃伊，成为埃及古代文明的象征。古埃及木乃伊及其艺术品是大英博物馆最负盛名的收藏，其数量仅次于埃及本土的博物馆，并拥有大量精品，诸如著名的罗赛塔三语石碑、亚尼死亡之书、拉美西斯二世胸像等，皆为古代埃及文化艺术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1798年8月，拿破仑手下一名驻埃及的法国军官，在朱利安要塞的罗赛塔发现了一块黑色石碑。碑文分别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文草书和古希腊文刻写，这三种文字的排列方式说明三者内容完全相同。英军击败驻守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法



军后，罗塞塔石碑以及拿破仑在埃及掠夺的大批古物全部落入英国人手中，并作为战利品运到伦敦，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库之宝”。幸亏法国人把这块石碑做了一个石膏复制品运回巴黎，并由法国著名埃及学家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 1790 – 1832）成功地进行了解读。在罗塞塔三语碑铭第一部分，埃及希腊化王朝君主托勒密的名字全画有方框，而且被反复提到五遍，成为商博良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把钥匙（插图3）。这件具有埃及文明里程碑性质的文物仿真模型（展品编号AES32），将随大英博物馆珍藏的古埃及木乃伊、古玻璃、精美的木板画以及各种黄金、宝石艺术品一起，首次在首都博物馆亮相。

美索不达米亚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因发源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而得名，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美索不达米亚又分南北两部分，南方叫“巴比伦”，北方叫“亚述”；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伊拉克、叙利亚一带。两河流域最古老的居民是苏美尔人。至少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苏美人就开发了这片土地，两河流域最初的文明就是他们创造的。接踵而来的是，讲塞姆语系语言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迦勒底人，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苏美尔人的文化成就，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许多重要篇章。在两河流域历史舞台上，尤其以巴比伦人成就最大，所以两河流域文明又称“巴比伦文明”。

人类许多重要发明，都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例如：玻璃就是苏美尔人最先发明的，后来制造技术又传授给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和埃及人（展品编号AES16、AES17和AES18）。春秋末战国初，西方玻璃传入中国（插图4）。

插图4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西方玻璃珠



70年代，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因发现重达10吨的青铜艺术品而轰动世界。殊不知，这座战国初年古墓中还同时发现一批蜻蜓眼玻璃珠（即镶嵌小玻璃珠的玻璃项链）。这批颇具异国情调的玻璃珠，与日本考古队在伊朗北方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波斯古墓出土玻璃珠几乎完全相同。据我们研究，先秦史上素负盛名的“随侯之珠”，很可能是随国工匠根据西方玻璃工艺生产的一种蜻蜓眼玻璃珠。这个证据生动地说明：中国文明有着独立的起源，但是中国文明的发展，却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历史进程。

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欧洲文明之源和欧洲文化的摇篮，英国诗人雪莱在诗中吟道：“我们都是希腊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这样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世界文明珍宝展》第三部分“古代希腊”（Ancient Greece）和第四部分“古代罗马”（Ancient Rome）将展示这部分内容。

由于北方蛮族南下，彻底毁灭了早期希腊的克里特和迈锡尼文化，希腊人不得不重新创造自己的文明。希腊文明主要表现在希腊神话、建筑以及雕刻上。希腊艺术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荷马时期（公元前12—8世纪），因《荷马史诗》是这一时期唯一的文字史料而得名；古风时期（公元前750年—6世纪末），因这个时期的雕刻艺术呈古朴稚拙的风格而得名；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下半期—前334年），指希波战争结束至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东侵，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34—30年），指罗马灭亡埃及托勒密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23—30年）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埃及总督托勒密在埃及建立的新王国，下层百姓是埃及土著居民，而上层统治者却是希腊人。美国电影《埃及艳后》的女主人公克丽奥佩脱拉（Cleopatra）就是托勒密王国的末代女王。这位埃及艳后并非埃及土著，而是统治埃及的希腊人。

关于希腊文明的兴衰，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这样写道：“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是艺术与科学的旗手，如同以色列是正义的旗手一样。现在，世界上离不开艺术与科学。伟大的希腊人是那样热衷于艺术与科学，反倒使品行成了普通的家常事。辉煌的希腊因不注重品行而在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类需要品行、沉静、人格……不仅如此，它也成功地向世人启示，即使在知识受到高度尊重，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的今天，支配世界的不是希腊，而是犹太；不是希腊人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犹太人非凡的正

义。”<sup>[3]</sup> 这位19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的评述，发人深省，至今仍有深刻教育意义。

罗马人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化，这两个文化共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希腊—罗马馆是大英博物馆展品的另一个亮点，来自雅典帕特农神庙命运三女神雕像群、帕特农神庙建筑遗迹，皆为这家博物馆最令人神往的艺术珍品。欧洲早期历史可以分为史前、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拜占庭（或称东罗马）四个阶段，加上英国本土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构成《世界文明珍宝展》第五部分“早期欧洲”（Early Europe）。欧洲文明是由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经中世纪基督教文明，而到近代工业文明逐步发展演变而成的。

整个中世纪，欧洲都处于“黑暗时代”，而中东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明则是当时先进科学文化的代表。阿拉伯人不仅传承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而且大量吸收中国、印度等东方优秀文化。我们使用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是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学会，再教给欧洲人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也是通过伊斯兰世界传入欧洲的。活字印刷改变了中世纪只有僧侣才能受高等教育的局面，不仅促成了欧洲文艺复兴，而且孕育了现代文明的产生。因此，伊斯兰文化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为世人所公认。《世界文明珍宝展》第六部分“伊斯兰”（Islam）将向中国观众展示伊斯兰文化辉煌过去。

大英博物馆的东方文物收藏也十分精彩，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伊朗和东南亚等地艺术品。世界六大古文明之一印度文明，包括在《世界文明珍宝展》第七部分“南亚和东亚”（South and East Asia）部分。佛教是古代印度对人类宗

插图 5  
大英博物馆藏键陀罗立佛像，约公元1世纪





教文化的一大贡献。佛教兴起之初，禁止偶像崇拜，印度小乘佛教徒崇拜佛塔、佛舍利、佛足迹等，并且用一些象征符号来表示佛陀经历的重要事件。例如：用莲花表示释迦“诞生”，用菩提树表示释迦“觉悟成道”；用法轮表示佛的“初次说法”，用塔来表示佛的“涅槃”。

佛像最初产生于古代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与当地信仰佛教的希腊侨民密切相关。犍陀罗地处印度与伊朗交界地带的印度河上游西岸。尽管犍陀罗占地面积并不很大，但是作为佛教造像发源地，在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遗留的佛教遗迹却令世人瞩目。犍陀罗艺术主要表现佛传故事，佛陀的形象首先出现在佛传浮雕中。佛像的出现意义重大。这就使得千百万读不懂佛经的人，可以通过礼拜佛像来信仰佛教。随着佛教向四方传播，犍陀罗艺术对周边地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佛教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大英博物馆送展的犍陀罗文物皆为艺术精品，包括立佛石雕（展品编号 Asia 27，插图 5）、石雕佛头（展品编号 Asia 12）、佛陀说法浮雕（展品编号 Asia 35）等。对于具有佛教文化传统的中国公众来说，这些珍贵的佛教文物，无疑显得更为亲切。

《世界文明珍宝展》第七部分的另一个重头戏，是日本和朝鲜文物。中国文化对东亚文明来说，如同希腊文化对欧洲文明一样，可谓东亚文化之源。这次参展的一件 12 世纪李朝瓷器（展品编号 Asia34），就是朝鲜艺术家模仿北宋磁州窑瓷器烧造的；另一件 12 世纪李朝釉下彩铜红釉瓷器（展品编号 Asia38），则基于唐代长沙窑开创的瓷器烧造技术。作为世界六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物本来应该放在这个部分进行展览。大概由于投鼠忌器，大英博物馆送展的文物中没有不法之徒盗卖海外或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1902 年，日本近代美术之父冈仓天心（1862 - 1913）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对古老的东方文明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当今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文化，正走向歧途，走入忽视人生理想、为了物质而束缚精神的歧途；而亚洲文明是用精神去战胜物质的、真正文明的、人类文化的理想境界。因此，目前亚洲的衰落不只是亚洲的悲哀，而是反映了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世界文化的悲哀。在亚洲，存在着一种贯穿于各种文明之间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就是追求终极普遍性的、宗教性的“爱”，以及由这种“爱”孕育出的亚洲式的“和平”。他还认为：“亚洲是一体的。虽然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具有孔子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文明与具有佛陀的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相隔开，但是那道雪山的屏障，却一刻也没能

阻隔亚洲民族那种追求‘终极普遍性’之爱的扩展。正是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通的思想遗产，使他们创造出了世界所有重要的宗教。……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它们都分别一一述说着古代亚洲的和平。”近代西方文化崇尚武力，以强凌弱，拼命追求物欲的“恶俗”，“烧灼”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使得“生命和艺术的咽喉在旱天里干渴难忍地渴望雨露”。尽管西方人创造了物质的昌盛，但这丝毫无益于人类生活的根本福祉；虽然西方人为从中世纪迷信中解脱出来而感到自豪，但是他们又同时陷入新的拜金主义迷途之中。<sup>[4]</sup>一百年前，冈仓天心如何深刻地洞察西方文化的弊端，至今值得我们每一个追求人生理想、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深刻反思。

《世界文明珍宝展》的第八和第九部分是非洲 (Africa) 和大洋洲 (Oceania) 文物。这两个洲的文物在世界其它博物馆中绝无仅有，充分展示了大英博物馆作为世界五大博物馆龙头老大的实力。在世界六大古文明当中，有两大文明在美洲，而《世界文明珍宝展》第十部分正是美洲 (America) 文物，主要以中美洲印第安人土著文化——玛雅文明 (Maya Civilization) 和南美洲秘鲁土著文化——印加文明 (Incan Civilization) 为代表。大英博物馆珍藏的美洲文物，将首次在京城向中国公众展示玛雅和印加文明的魅力。

欧洲历史的发展，后来又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晚期中世纪几个阶段。《世界文明珍宝展》的第十一部分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欧洲”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urope)，这部分展品将演示欧洲人如何摆脱“黑暗时代”走向文艺复

插图6 米开朗基罗之作《大卫》雕像，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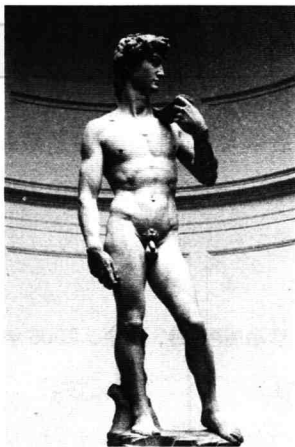


插图7 大英博物馆新购买的金铜佛像



兴的天路历程。1450年以前，整个欧洲统共不过3万册书，而且大多数是宗教书籍，所以当时欧洲绝大多数人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印刷术的西传使文化教育得以普及，彻底改变了中世纪欧洲只有僧侣才能受高等教育的局面，从而激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最终导致现代文明的产生。<sup>[5]</sup>

文艺复兴首先发生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意大利，名义上是为了恢复古典文学艺术，而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借此名义来发展科学技术，要求在思想上摆脱封建主义束缚，要求关心人、尊重人、一切以人为本，给人以个性自由和人身自由，强烈反对以神为中心的封建教义，反对人一出生就有罪的“原罪说”，认为人是伟大的，人应享受人生的快乐，人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大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艺术大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哲学家培根、文学家莎士比亚、诗人但丁等，都是这个时代出类拔萃之辈，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神曲》、生机勃勃的《大卫》雕像（插图6），以及《蒙娜丽莎》永远的微笑。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是欧洲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群星争艳、人才济济的辉煌时代，被恩格斯誉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以及“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我们国家当前实行的“以人为本”治国方略，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个人认为，《世界文明珍宝展》第十一部分是本次展览最精彩的部分，这些看似平凡的藏品，实际上意义深刻，它们将启迪每一个中国人去积极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开创一个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文学艺术上“百花齐放”的伟大时代。

收藏是一个现代化博物馆生命之所在。250年来，大英博物馆一刻没有停止扩大自己的收藏，近年它又与英国其它博物馆联合，以85万英镑的天价，收购了一尊公元7世纪的金铜佛像（插图7）。《世界文明珍宝展》最后一个部分是“现代收藏”（Modern Collecting），将向中国公众展示大英博物馆的最新藏品，征集时间截止到2004年12月。这部分展品将告诉我们：一个现代化博物馆应该如何不断拓展自己的藏品。

（收入首都博物馆编：《世界文化珍品展图录》，北京，2006年，第1-10页）

## 注释：

[1] G.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8.

[2] 奥杜威出土古人类化石和地形图照片，根据古人类学网站 ([http:// www.mnh.si.edu/anthro/humanorigins/humanorigins\\_start.html](http://www.mnh.si.edu/anthro/humanorigins/humanorigins_start.html))。

[3] 引自亚瑟·亨·史密斯（汉名“明恩浦”）著，乐爱国、张华玉译：《中国人

的性格》，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4] 钱婉约：《东洋的理想：向世界诉说东方》，《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6日，网络版 ([www.booktide.com](http://www.booktide.com) 2002-09-06)。

[5] 钱存训著，刘祖慰译：《纸和印刷》，编入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

## 第二章

#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中日合拍大型电视专题片《新丝绸之路》随想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正逐渐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沉寂了数百年的丝绸古路，如今正在重新焕发青春。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在我的《丝绸之路与中国古代文明》一书日文版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和时代都在发生巨变，而中国，现在已成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泱泱大国。“探险家”们踏查过的亚洲内陆各地、帕米尔高原的东西南北，自沙皇俄国和满清政府相互对峙的18世纪后半期以来，大约经过二百年，业已物换星移，演变成“开放空间”（Open Space）。贯通欧亚大陆和所谓“丝绸之路”地域的通道，如今正开启大门。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sup>[1]</sup>

中央电视台（CCTV）与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NHK）联合摄制组，精心制作的十一集大型电视专题片——《新丝绸之路》，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中国文明与欧、亚、非三大洲的古代文明很早就发生接触，并相互影响，相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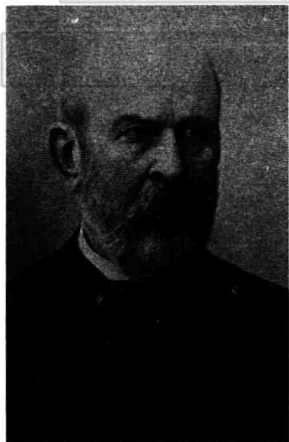


插图 1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交流，但是这些古文明之间的交往路线一直没有概括性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插图1）在他的名著《中国》一书，首次提出“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一名。他对丝绸之路的经典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sup>[2]</sup>这个说法很快在东西方众多学者当中达成共识。英国人称之为“Silk Roads”；法国人称“La Route de la Soie”；日本人称“絹の道”或音译为“シルクロード”，凡此皆为“丝绸之路”一词的异译。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考古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从时间上，考古新发现把东西方丝绸贸易的开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从空间上，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互引证，说明张骞通西域不久，古罗马首都——罗马城就出现了中国丝绸。研究者一般把罗马视为丝绸之路的终点，而把中国汉唐古都——长安和洛阳当作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有学者认为，这条路可以向西伸展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向东延伸至日本古都——奈良。因为威尼斯是马可波罗的故乡，而奈良正仓院珍藏的染织遗宝，超过十万件，如果加上法隆寺保存下来的丝织物，据说可以囊括中世纪的各类丝绸。

上帝总是十分公平地向他的子民分配各种资源，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地上，沙丘纵横，寸草不生，而地下却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水资源。这座人迹罕至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如今石油井架林立，油管纵横，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能源生产基地之一。直径近1米的输油管道，从新疆轮台一直铺设到了兰州。巴基斯坦政府最近还承诺，要开通一条连接新疆与世界石油著名产地——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管线。

世界上最好的苹果，不是日本生产的富士苹果，而是天山南麓阿克苏果园的苹果。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葡萄——法国波尔图葡萄相媲美。喀什、和田、巴楚等沙漠绿洲生产的棉花，绝不亚于闻名遐迩的埃及长绒棉……

展示中国西部山川新面貌，再现汉唐帝国昔日的辉煌与梦想，正是大型电视专题片《新丝绸之路》刻意追求的主题。

除了沙漠之路这条主干线外，丝绸之路还有许多重要分支路线，它们是：1. 草原之路；2. 海上交通；3. 唐蕃古道；4. 中印缅路；5. 交趾道。在某些时期，有些分路线的重要性不亚于沙漠之路。例如：最早的丝绸贸易是从草原之路开始的，而唐代以后，东方与西方的交往逐渐改走海路，并在公元15—16世纪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最终取代了传统的陆路交通。《新丝绸之路》基本上按照丝绸之路不同

路线，把这部大型电视专题片分为十一集：第一集《生与死的楼兰》；第二集《吐鲁番的记忆》；第三集《草原石头祭》；第四集《一个人的龟兹》；第五集《和田寻宝记》；第六集《敦煌生命》；第七集《青海之路》；第八集《探访黑水城》；第九集《十字路口上的喀什》；第十集《永远的长安》；最后是剪接前十集精彩镜头和拍摄花絮的《续集》。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唐代诗人王昌龄《从军行》提到的楼兰古国，至唐代已消失了500多年。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 Hedin）在罗布泊西岸重新发现楼兰城。此后，楼兰成了世界最著名的考古圣地之一。《新丝绸之路》第一集《生与死的楼兰》，讲述的是距今4000年前楼兰人祖先的故事，它以新疆东部孔雀河一条支流发现的古楼兰人墓地为切入点，演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楼兰人祖先的来龙去脉。

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伯格曼（Folke Bergman）在新疆孔雀河一条支流发现小河墓地（插图2），并把这里出土的几具人骨带回欧洲。经德国人类学家鉴定，楼兰人属于原始欧洲人种。换言之，欧洲人种（高加索人种）向东方最远分布到楼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与欧洲人种（白色人种）的分界，就在楼兰与敦煌之间。

楼兰美女在丝绸之路上极负盛名，西域三十六国的王公贵族，皆以楼兰公主为妻。人类学研究表明，所谓“楼兰美女”实际上是一些欧亚混血儿，因此，我们的摄制组特意挑选了一位欧洲名模扮演“小河公主”，在罗布泊乘舟荡桨，生动再现



插图2  
小河五号墓地的生殖崇拜木雕

了昔日楼兰古国生机勃勃的景象。

时值小河墓地发现百年之际，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队重访小河墓地，并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小河墓地的中心，是一尊3—4米高的大型木雕男性生殖器，表明人的生产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小河墓地内上千口牛皮木棺，则说明这里是墓主人最后的归宿之地。楼兰人的生与死，在我们的摄影师镜头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新丝绸之路》第二集《吐鲁番的记忆》把人们的视线转向天山南麓的吐鲁番盆地。明代小说家吴承恩《西游记》讲述的唐僧西天取经，受阻于火焰山，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就发生在吐鲁番。这个坐落在火焰山脚下的沙漠绿洲，汉代称“车师前王国”，十六国至唐代称“高昌王国”。唐开成五年（840），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从蒙古高原西迁中亚，其中一支在吐鲁番建立回鹘王国。从此，吐鲁番开始了突厥化的历史进程。

吐鲁番地处东西交通孔道，不仅是多民族聚居地，而且有许多来自中亚、西亚的外国侨民在当地侨居。随着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展，西亚火祆教、印度佛教、叙利亚景教、波斯摩尼教、中东伊斯兰教相继传入此地。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峪沟千佛洞发现了一个中世纪图书馆，所藏古文书的种类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据说包括17种文字书写的24种语言的各种宗教文书。东西方不同宗教文化在此地交织荟萃，吐鲁番俨然成了东方的耶路撒冷。

千百年来，风沙的摧残、宗教极端分子的破坏、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吐鲁番最大的石窟寺——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可谓饱经沧桑。寺内精美绝伦的壁画在20世纪初被五马分尸，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诸如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韩国首尔国立博物馆（原汉城国立博物馆）、大连旅顺博物馆……更为不幸的是，固定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墙壁上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大型壁画，竟然在二战中毁于苏军对柏林的轰炸。

借助于计算机数码技术(Maya和3D Max)，日本龙谷大学古典籍虚拟现实感研究中心，把流散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收集起来，为中日联合摄制组成功地复原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四窟的壁画。由于壁画遭到严重破坏，目前只能进行一些局部复原。尽管如此，这些利用现代数码技术复原出来的画面，仍然气势如虹。相信每一位观众看到这样的画面，他们的心灵都会产生强烈的震撼。



《新丝绸之路》第三集《草原石头祭》，讲述的是欧亚草原民族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特殊贡献。辽阔的欧亚草原是古代游牧人的家园。在以往的研究中，东西方史家常将这片草原描绘成“蛮荒”之地。在欧亚草原繁衍生息的游牧人，在西方被称作 Barbarian（蛮族），在东方则称“夷狄”。孔子甚至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种传统观念甚至影响到现代学者，许多教科书或史学著作中，畜牧或游牧经济往往被定义为人类发展史的低级阶段，而农业文明才被视为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殊不知，人类许多重要发明归功于游牧人。例如：爱琴海的希腊人、伊朗高原的波斯人、黄河流域的农夫，都不穿裤子，波斯王宫浮雕上不同民族的使者只有斯基泰使者穿裤子，显然，裤子是游牧人根据骑马的需要而发明的。家马，也是欧亚草原游牧人最先驯化成功的，这些马背上的游牧人相继建立了斯基泰、匈奴、突厥、蒙古等草原帝国。他们通过战争和贸易活动，对西亚两河流域古文明、中亚绿洲文明以及黄河流域农业文明产生重大影响。

在中国内地，游牧人与农耕民族的分界大致在长城地带；在新疆，农牧分界则以天山为线。张骞通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在此之前，天山以北草原地带一直是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主要交通路线。遍布欧亚草原的大石冢、岩画、鹿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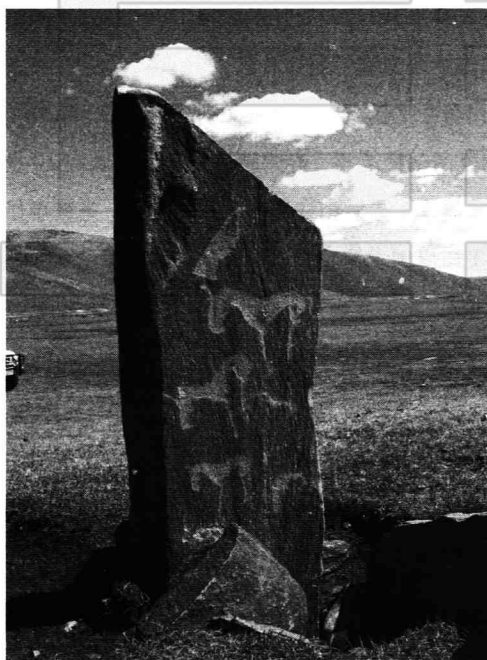


插图 3 游牧人在天山北麓草原所立大型地标——鹿石

(插图3)，皆为中亚古代游牧人不甘磨灭的历史见证。

《新丝绸之路》第四集《一个人的龟兹》，讲述的是塔里木盆地北缘龟兹古国的故事。龟兹在今天新疆的库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龟兹成了西域佛教一个重要传播中心。中国佛教史上一代名僧鸠摩罗什，就是龟兹人。前秦建元九年（373），苻坚仰慕罗什的盛名，派大将军吕光伐龟兹，迎请罗什至凉州（今甘肃武威）。此后，罗什在凉州传教凡十七年。至后秦时，姚兴复派兵讨伐凉州，礼聘罗什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并召集大德沙门跟从罗什学习和翻译佛经。这位龟兹高僧在长安城组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译场。大约九十八部各种西域语言的佛经，在他主持下翻译成汉文，其中五十二部保存至今，并收入《大藏经》。本片将以鸠摩罗什法师为中心，讲述龟兹古国与中国内地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

《新丝绸之路》第五集《和田寻宝记》，将讲述于阗王国的沧海桑田，以及于阗人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和田在今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缘，古称“于阗”。早在公元前13世纪，昆仑山出产的和田玉就开始输入黄河流域，而和田玉的使用后来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中国历代王朝的传国玉玺，皆以和田玉为原料。

在宗教方面，中国僧人到西方求法，最初不在印度本土而在于阗。许多于阗僧

插图4  
和田北部沙漠丹丹乌里克佛教遗址出土壁画



人到中原弘布佛法，汉语“和尚”一词就来自于阩语。唐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书不慎落入和田河，所以他带回的梵文经典实际上是在和田重新收集的。由此可见，中国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深受于阩佛教的影响。

在美术方面，唐朝大画师尉迟乙僧，就是一位于阩人，他的绘画技法不仅影响了有唐一代的中国画风（插图4），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海东日本美术亦有重要影响。

在音乐舞蹈方面，早在公元前2世纪，于阩乐舞传入汉代长安宫廷，为古老的中国乐舞注入了新的活力。唐代还有三位于阩艺术家显示了非凡的音乐才能，他们是唐初尉迟敬德、唐代宗朝的尉迟青以及唐文宗时代的尉迟璋。他们都为中国宫廷音乐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于阩文明的重新发现，归功于19世纪末以来西方考察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系列探险活动。他们上演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于阩古物和古代手稿争夺战，在和田沙漠古城内发掘出数以万计的精美文物。这些文物再现了于阩王国昔日的辉煌以及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新丝绸之路》第六集《敦煌生命》，讲述的是丝绸之路重镇敦煌的故事。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世界。英国的斯坦因（M.A. Stein）、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美国的华尔纳（L. Warner）、俄国的奥登堡（S.F. Odenburg）、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Otani Expedition），接踵而来，导致大批敦煌文书和艺术品流散世界各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令国人伤心的一页。与此同时，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使敦煌研究走向世界，造就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学术大师，而敦煌研究则成了当今世界人文科学研究的一门显学。

牛津大学教授贡布里希（E. H. Gombrich）以一本《艺术的故事》，极为成功地教会了成千上万的人，如何去欣赏前人的绘画。关于丝绸之路美术和敦煌壁画，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论地理，欧洲跟中国遥相睽隔，然而艺术史家和文明史家知道，这地域的悬隔未尝阻碍东西方之间所建立的必不可少的相互接触，跟今天的常情相比，古人大概比我们要坚毅，要大胆。商人、工匠、民间歌手或木偶戏班在某天决定动身起程，就会加入商旅队伍，漫游丝绸之路，穿过草原和沙漠，骑马甚或步行走上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寻求着工作和赢利的机会……我相信到处流动的工匠也把一些绘画方法带到亚洲，我们在敦煌和其它地方发现了他们的作品。他们从希腊和罗马绘画中学会了一些表示光线和大气的办法，并把那些技

巧纳入了自己的技术范围之中。……早在汉代，就有一些装饰艺术母题从欧洲传入中国，特别是葡萄叶纹及葡萄饰，还有莲花纹。这些花卉漩涡纹已被中国工匠改造后用在了银器和陶器上。<sup>[3]</sup>

正如这位英国艺术史家所言，敦煌莫高窟艺术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宝藏，而且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敦煌莫高窟在198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前，敦煌研究院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最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对这个古老的佛教石窟进行文物保护。我们的摄影师将在本片展示敦煌壁画艺术的魅力，讲解敦煌科技人员如何对莫高窟采取的现代化文物保护措施。

《新丝绸之路》第七集《青海之路》，将讲述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现代藏族由吐蕃、象雄、苏毗和吐谷浑四大部族相互融合而成。青海是吐谷浑人的故乡，公元7世纪被吐蕃帝国兼并。吐蕃人强盛之时，一度统治西域乃至中亚。吐蕃人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继续让吐谷浑王公贵族实施统治，并与吐谷浑王互为婚娅。

80年代初，吐蕃统治时期的吐谷浑王陵在青海都兰发现，并在其中一座大墓中发现吐蕃赞蒙（皇后）与吐谷浑王通信的简牍，今称血渭一号大墓。血渭一号大墓位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南约10公里的热水乡，属唐代早期吐蕃墓葬，也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吐蕃墓葬。这座大墓坐北向南，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从正面看像一个“金”字，因此有“东方金字塔”之称。墓堆下有三层用泥石混合夯成的石砌围墙。墓冢从上而下，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层排列整齐横穿冢丘的穿木，共有九层之多，千篇一律，采用粗细相同的柏木。从大墓中发掘出波斯织锦、粟特系统镀金银器、波斯、拜占庭织锦以及阿拉伯世界出产的大食锦等珍贵文物，生动再现了唐蕃古道国际贸易的盛况。

传世的唐代宫廷画师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中，生动描绘了禄东赞觐见唐太宗，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请婚的盛大场面。禄东赞是苏毗人，藏名“噶尔东赞”。苏毗人的原始故乡，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的襄曲河流域，藏文史籍称此河为“孙波河”。苏毗人后来逐渐向东迁徙，一直抵达拉萨河流域和昌都西北部。随着吐蕃帝国的扩张，苏毗人不断向东迁徙。据两唐书《女国传》记载，一部分苏毗人从西藏昌都迁入四川西北，建立了“东女国”。另一部分苏毗人则在青海东部定居，与吐谷浑为邻。因此，唐朝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天宝十四年（755）写给唐玄宗的书信中：“苏毗一蕃，最近河（指黄河上游）北吐泽（“吐浑”之误，指吐谷浑）部

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援之讹），军粮兵马，半出其中。”（《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门》）这些东迁青海的苏毗人，主要由禄东赞所出噶尔家族统领。令人振奋的是，在青海苏毗人分布区——德令哈市郭里木发现了两座唐代棺板画大墓。这些棺板画大墓的墓主又是谁人呢？据我们初步研究，其中一座墓很可能是禄东赞之子噶尔钦陵之墓。本片的摄影师实地拍摄了这些精美绝伦的棺板画，第一次报道了林梅村、齐东方教授领导的北京大学考古队，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发掘吐蕃大墓的实况，生动展示了青藏高原一系列考古新发现。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唐代诗人王昌龄描述的边塞，在今天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汉代称“居延”，宋元时代称“黑水城”。《新丝绸之路》第八集《探访黑水城》，将展示黑水城的考古发现以及西夏文化魅力。

额济纳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尚书·禹贡》记大禹治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的故事就发生在居延。弱水发源于甘肃张掖地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南山。这条河在甘肃境内称黑水，从南向北流，全长500多公里，经合黎山，进入内蒙古之后称“额济纳河”，古称“弱水”，全长200多公里，最后注入终点湖——居延海。弱水所经之地在巴丹吉林沙漠西部造就了大片绿洲。历史上，居延城不仅是漠北游牧人兵荒马乱或灾害之年的避难所，而且是一个国际化城市。丝绸之路开通后，“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埃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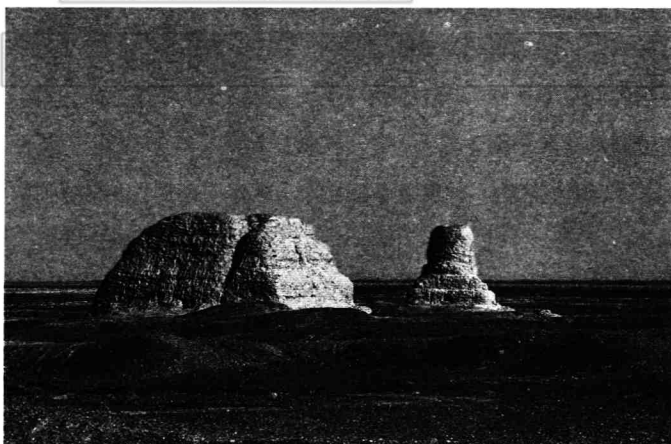


插图5 喀什近郊莫尔佛塔全景

中亚撒马尔干城的粟特人，乃至欧洲的罗马人，相继来河西经商，甚或归化侨居。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米撒尔，尤其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造访，使这个中国边城小镇成为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马可波罗游记》称黑水城为“亦集乃城”，源于西夏语“黑水”，今译“额济纳”。长期以来，有些欧洲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一直持怀疑态度。《马可波罗游记》竟然没有提到长城和泰山，这可是中国最有名的建筑和最有名的山脉。直到最近，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吴芳思仍写书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欧洲人说的长城指明长城，马可波罗时代明长城还没有建，他自然不会提到。此外，马可波罗是从西方人审美角度观察中国，他对元大都（北京）城外两万多名妓女津津乐道。中国人推崇的泰山，这位意大利商人未必放在眼里。然而，黑水城的发现再次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

元世祖忽必烈为讨伐海都之乱，彻底解除西北边患，在西夏故地设立亦集乃路总管府。黑水城是居延地区最大的元代城址，应为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旧址。黑水城外城是元代扩建的，那么马可波罗访问的亦集乃城就在黑水城内城。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四大发现对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也即1900年在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敦煌文书，1901年在新疆楼兰、尼雅两地发现汉晋十六国木简残纸，1909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下游黑水城遗址发现西夏及宋元文书，1931年在内蒙古居延海地区发现居延汉简。这四大发现在年代上相互衔接，居延汉简集中在两汉时期，楼兰尼雅文书从汉代直迄十六国前凉，敦煌藏经洞文书主要

插图 6  
西安大雁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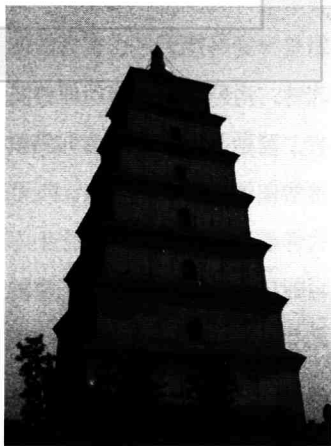




插图 7 西安新出土日本遣唐使墓志

在前秦至唐末五代，而黑水城出土文书在北宋至明初（相当于北元）。这四大发现之中有两大发现，都是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取得的。本片将以西夏黑水城一户人家，在兵荒马乱之年的动人故事，再现这个中国小镇的风土人俗。

《新丝绸之路》第九集《十字路口上的喀什》，讲述中国西部门户——喀什绿洲的故事。喀什全称“喀什噶尔”，古称“疏勒”，本来是帕米尔高原地带一个弱小的城邦之国，公元前1世纪并入汉帝国版图。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给它的经济和文化带来空前的繁荣。公元2世纪末，疏勒王国统一塔里木盆地西部城邦以及昆仑山和帕米尔的山居部落，建立了以疏勒城为中心的古代王国。同时，它还领有莎车、朱俱波、渴盘陀三个附庸国。此后，疏勒人虽然历经中亚贵霜、嚙哒、西突厥的羁绊，但是一直保持了自己古老的文化传统，并且一直与内地历代王朝曹魏、西晋、前凉、北魏、南朝梁国和隋朝保持友好关系。

疏勒是中国最早信仰佛教的地区之一（插图5）。贵霜王朝君主伽腻色迦的王师僧伽罗刹就是疏勒人。公元4世纪末，龟兹名僧鸠摩罗什曾在疏勒研究佛学。唐代佛教百科全书《一切经音义》的作者慧琳也是疏勒人。慧琳俗姓裴氏，所以他很可能还是疏勒王国裴氏王室的成员。从公元2世纪末佛教入华到8世纪末疏勒亡国凡600年，疏勒一直信奉佛教。

公元11—12世纪，是中国西部民族与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具有千年文明史的疏勒、于阗、龟兹王国，被中亚新崛起的突厥民族无情地逐出了历史舞台。



佛教及其文化艺术随之被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取代。在以后的数百年之间，既有血腥的“圣战”，也有伊玛目、阿匍的循循善诱，终于形成了今天伊斯兰文化遍布中国西北地区的格局。然而这一切都导源于一个由样磨、葛逻禄和部分西迁中亚的回鹘部落组成的联合政权——喀喇汗王国。汗王出自样磨族，自称“桃花石汗”，波斯和阿拉伯史家称其为“阿夫拉西亚家族”，中国史家则称之为“黑韩王”。这个王朝的第二首都就建在喀什。此后，喀什成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要传播中心。公元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就是一位在喀什出生的突厥学者喀什噶里在巴格达完成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喀什绿洲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西部资源的大本营。西方考古探险家在进入塔克拉玛干寻访沙漠古城之前，大都在喀什的俄国或英国领事馆准备行装，许多新疆珍贵古物也是从这里流散世界各地。如今俄国领事馆原址建起了现代化宾馆——色满宾馆，并且成为喀什市服务行业的地标性建筑。新疆喀什的西部门户——图尔尕特海关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另一标志。仅2004年一年，这个海关的货物吞吐量就高达25万吨，数量虽不算大，但每年递增的速度却相当惊人。图尔尕特海关的对外贸易，仅是中国国际贸易沧海之一粟。从这个中国西部小海关的对外贸易，人们可以看到古老的丝绸之路全面复兴的希望。

丝绸之路以长安和洛阳为起点。当年，张骞就从这座城市出发，踏上通往中亚大夏王国的征程。唐代高僧玄奘，也是从长安出发，越过千山万水，到西天取经的（插图6）。《新丝绸之路》第十集《永远的长安》，将讲述长安城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的突出贡献。

历史上，长安城曾经是十三朝古都。如果从西周丰镐城算起，这座古城已有3100多年的历史，而且一直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汉唐长安城是这座古城最为辉煌的时代。“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我们今天所见长安城，只是一些明清建筑，远不足以说明汉唐长安城昔日的辉煌。我们摄制组的电脑工程师用现代数码技术（Maya和3D Max），为唐代长安大明宫作了复原，以期全方位展示大唐帝国昔日的辉煌与梦想。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大唐帝国的盛况开启了一扇窗口。地宫内保存的大批珍贵文物，不仅等级高，品种多，有的甚至完好如初，尤其以唐懿宗、僖宗的供奉物最为珍贵。此外，法门寺地宫还藏有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及其他要员的供奉物。据统计，地宫各类宝藏总计两千余件。因此，



本片将以法门寺皇家宝藏为例，展示封尘千年的大唐盛事。

唐代长安城还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国际都市，并为古代东方城市建设的楷模。例如：日本奈良的京都城、就是模仿唐代城市而建造的。就像今天许多中国人梦想到北京天安门一样，当年世界各地的许多商人和使者，都把长安之行作为自己人生的梦想。在这些人当中，不仅包括丝绸之路终点东罗马帝国的拂林商人，中亚撒马尔干城的粟特使者，甚至包括来自海东日本的留学生——遣唐使。

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的最重要的国际商人，许多粟特人因此发家致富，并在长安城定居。例如：“安史之乱”的风云人物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有粟特血统。近年，在古都西安相继发现三座北周年间粟特古墓。这些古墓完全采用汉族的丧葬习俗，但是石棺床上的一些浮雕图案仍保持着粟特火祆教艺术。宋代以后，来华定居的粟特人进一步汉化。北宋名画《研山铭》的作者米芾就是一位汉化的粟特人。据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考证，宋神宗元丰间，米芾自号恭门居士，其印文“火正后人芾印”。故知米芾的父亲曾是一位负责火祆教神庙的官吏“火正”。<sup>[4]</sup>

近年西安考古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2004年发现的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据考证，这块墓志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明确提到“日本”国号的标记。

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日联合《新丝绸之路》摄制组重走丝绸之路。从长安到喀什，从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到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从大英博物馆到埃米塔什博物馆，为我们的观众记录下数不尽的珍贵镜头。

在世界六大古文明之中，惟有中国文明历经三千多年，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与公元前13世纪殷墟甲骨文一脉相承；而其他五大文明则相继衰落，早已不幸沦为所谓“失落的文明”（Lost Civilization）。尽管中国文明幸免于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却在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当前，中国经济的起飞，为我们“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时代要求我们不仅要去做经济巨人，而且要把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真正建设成一个具有先进思想、先进科学、先进文化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未来，也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注释：

〔1〕林梅村著，川上阳介、申英兰译，杉山正明监修：《シルクロードと中国古代文明》，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5年，9-10页。

〔2〕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d. 1,

Berlin, 1877, p. 454.

〔3〕E.H. Gombrich, *The Story of Art*, Oxford, 1950; 范景中译，贡布里希著：《艺术发展史——“艺术的故事”》，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页7。

〔4〕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页341。

## 一 中国史家笔下的犍陀罗

### 1. 犍陀罗的地理范围

犍陀罗位于印度河西部，以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为中心，属于古印度十六国之一，中国正史起初称之为“罽宾国”。《汉书·西域传》说：“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新疆轮台）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秣国（巴基斯坦的洪扎）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阿富汗西北）、西南与乌弋山离（阿富汗西境法拉）接。”由此可见，犍陀罗以阿富汗喀布尔河中下游及其各支流河谷平原为中心，包括迦毕试、犍陀罗、咀叉始罗、乌菴等地（插图1）。<sup>[1]</sup>

汉代史官所谓罽宾国，就是西方史家所谓“印度希腊王国”（公元前189—公



插图1 犍陀罗的地理位置

元90年)，亦称“希腊大夏王国”。一般认为，《汉书·西域传》提到的罽宾王阴末赴，就是中亚钱币所见贵霜王丘就却时代（约1—55）的希腊大夏王国君主赫尔廖斯（Hermaeus，公元前40年—公元1年）。〔2〕

公元7世纪初，玄奘西行求法，在犍陀罗故地凭吊了荒芜多年的佛教圣迹。《大唐西域记》卷二说：“健驮逻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八百余里，东临信度河，国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逻，周四十余里。王族绝嗣，役属迦毕试国。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宫城一隅有千余户。”从地理范围看，玄奘所谓“健驮逻国”就是汉代罽宾国。

最早游历犍陀罗的中国人是东晋高僧法显。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法显从长安出发，游历了中亚和印度次大陆三十余国。在汉文典籍中，犍陀罗起初译作“犍陀卫”（法显《佛国记》）或“犍陀越”〔《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来自犍陀罗语 Gandharva（香神）。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改称“乾陀罗”，《大唐西域记》译作“健驮逻”，皆为梵语 Gandhāra（香气袭人）的不同音译。〔3〕

西域诸国一般把都城名当作国名，所以罽宾国首都原来可能在迦毕试（阿富汗的贝格拉姆），故称罽宾国（Kapis）。迁到循鲜城（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以后，仍沿用罽宾之称。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所谓“循鲜”来自希腊语 Taxila（塔克希拉），相当于梵语 Takṣasīla（咀叉始罗），法显《佛国记》作“竺刹尸罗”。〔4〕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爵士就任英属印度考古局局长时，曾对咀叉始罗遗址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考古发掘。许多著名的犍陀罗建筑遗迹和艺术品（插图2）都是在这座古代遗址发现的。〔5〕

插图2  
犍陀罗出土古典艺术品



①

②

③

## 2. 贵霜王朝对犍陀罗的统治

两汉之际，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eses, 1 - 50）在大夏西北部崛起，统一大月氏五部翕侯，建立贵霜王朝。中亚诸国当时在伊朗高原安息王朝统治之下，丘就却迅速扩张，首先与安息王朝的帕提亚人争夺中亚，“侵安息，取高附（阿富汗的喀布尔），又灭濮达（巴克特里亚/大夏）、罽宾（阿富汗的贝格拉姆），悉有其国”。<sup>[6]</sup>此后，中国史书对犍陀罗始有“罽宾”、“贵霜”和“月氏”三个名称，而汉译佛典通常作“月支”或“罽宾”。

犍陀罗和大夏境内有许多希腊人定居，大多为公元前4世纪中叶随亚历山大到东方的希腊远征军，另一部分是叙利亚希腊化王国——塞琉古王朝统治中亚时代（公元前3世纪）再度迁来的希腊移民。他们主要来自希腊的爱奥尼亚滨海地区，所以被印度人称作“耶槃那人”（Yavana），也就是爱奥尼亚人。

希腊人的到来，使中亚呈现出一个希腊化世界。20世纪60年代，法国考古团在阿富汗昆都士发现的希腊化城市——阿伊哈努姆古城，就是大夏的希腊移民建造的。犍陀罗的希腊人则在巴基斯坦的塔克希拉、斯瓦特河谷留下大批古典建筑遗迹和艺术品。例如：大英博物馆藏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浮雕（插图2-1）、拉合尔博物馆藏雅典娜像（插图2-2）和塔克希拉博物馆藏维纳斯像（插图2-3）。<sup>[7]</sup>

希腊人酷爱艺术，他们带来的古典艺术与中亚和印度艺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所谓“希腊化艺术”（Hellenistic Arts），最终在公元前1世纪形成举世闻



插图3 犍陀罗浮雕——舍卫城给孤独长者奉献祇园，巴基斯坦卡拉奇博物馆

名的犍陀罗佛教美术。据法国学者福歇（Alfred Foucher）考证，巴基斯坦马尔达拿（Mardan）出土的“舍卫城给孤独长者奉献祇园”浮雕，可能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件出现佛像的犍陀罗艺术品（插图3）。<sup>[8]</sup>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自武帝（前140—前87年）始通罽宾。”如前所述，罽宾是中国史书对犍陀罗的古称，而“雕文刻镂，治宫室”的罽宾建筑艺术或指犍陀罗佛教美术。

贵霜王阎膏珍时代，大月氏人从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南下印度河，定都犍陀罗的布路沙布逻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西北）。这个城名来自梵语Puruṣapura（丈夫城），法显《佛国记》称“弗楼沙国”。<sup>[9]</sup>《大庄严论经》卷六说：迦腻色迦王“讨东天竺，即平定已，威势赫振，福利具足”，又将贵霜的版图推向恒河流域。从此，贵霜王朝跻身于中古世界——罗马、安息、贵霜、汉四大帝国之列。

《大唐西域记》援引印度史志说：“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看来，贵霜帝王夏季在迦毕试（阿富汗的贝格拉姆）避暑，冬天在印度（印度的秣菟罗）度寒，而贵霜帝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则在犍陀罗的布路沙布逻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西北）。在迦腻色迦大力支持下，五百比丘在犍陀罗举行小乘佛典第四次大结集。<sup>[10]</sup>不久，大乘佛教在贵霜帝国统治中心——犍陀罗和恒河流域相继兴起，小乘佛教不得不退避三舍，到锡兰、缅甸和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王国寻找新天地。<sup>[11]</sup>

### 3. 犍陀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犍陀罗与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四川盆地的蜀人业已和中亚古代居民发生交往。司马相如《告巴蜀民檄》说：“康居西域，重译清朝，稽首来享。”<sup>[12]</sup>康居指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城的粟特人，而这个檄文写于公元前130年。故知张骞通西域以前，中亚粟特商贾就抵达四川盆地的巴蜀。<sup>[13]</sup>

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sup>[14]</sup>邛竹或称“筇竹”，产于四川邛崃县邛山，地处西昌之东。根据这条记载，

目前学界多以为蜀地商贾取道云南，穿过缅甸和越南丛林，再南行印度恒河流域，然后从印度把蜀布和邛竹杖辗转运往大夏。大夏明明在阿富汗西北，西域胡商为什么舍近求远，采用如此遥远的通商路线呢？这个问题一直令研究者疑惑不解，近年考古新发现终于揭开了这个谜。

2002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丝绸之路南道重镇且末取得重要考古新发现。

他们在清理且末县城附近扎滚鲁克1号墓地时，发现一件残竹器。这件竹器已经断裂，皆为宽度和大小不等的小竹片（约50—60厘米）。竹片正面呈黑色或红色，据说是古人涂的漆，从漆脱落处可明显看出竹片表面缠绕了许多金黄色不明纤维。其中两片可以拼合在一起，残长1.05米。墓地年代约在春秋至西汉，可知这件残竹器的年代应在西汉或早些时候。新疆不产竹子，且末出土的残竹无疑来自中国内地。新疆博物馆的王博先生认为这件残竹器，也许就是史书记载的“邛竹杖”。<sup>[15]</sup>

这个发现相当重要，可与张骞在大夏见到邛竹的记载相互印证，说明蜀布、邛竹杖等四川物产更可能从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输入大夏。汉初蜀地物产从云南运往大夏的传言并不可信，恐为西域商贾为谋取暴利的不实之辞。

东汉灵帝年间，贵霜帝国频频发生内乱，数以百计的贵霜难民从犍陀罗流亡新疆塔里木盆地、甘肃敦煌乃至河南洛阳。《出三藏记集·支谦传》记载：“支谦字恭明，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168—189）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塔里木盆地突然流行佉卢文犍陀罗语，佛教初传中国内地，就和贵霜难民流亡中国密切相关。洛阳汉魏故城出土东汉佉卢文井阑（插图4），亦为贵霜大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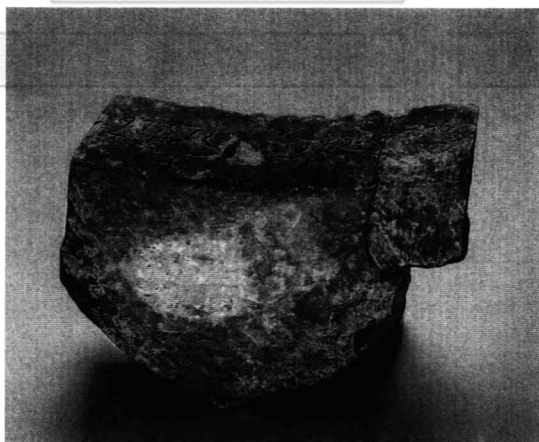


插图4 洛阳汉魏故城出土佉卢文井阑残石

氏侨民留下的遗物，现藏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sup>[16]</sup>

犍陀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宗教方面。作为帝国的首都，犍陀罗成了贵霜王朝政治、文化和艺术最重要的传播中心之一。汉晋时代来华的西域僧人，大多来自犍陀罗。例如：东汉来华的支娄迦谶，本月氏国人。三国时的高僧支谦，实乃东汉洛阳大月氏侨民的后裔。西晋名僧竺法护，其先月氏人。从姓氏看，西晋惠帝年间来华的支愍度，两晋之际来华的支孝龙、支道林，皆为贵霜大月氏高僧。东晋十六国时，从犍陀罗来华的法师仍络绎不绝。后秦的僧伽提婆，本姓瞿昙氏，北印度罽宾人。与其同时在长安城译经的弗若多罗、佛陀耶舍和昙摩耶舍等西域高僧，皆来自犍陀罗。公元3世纪中叶在交州（今越南北方）译经的支疆梁接（量良萎至），则是从犍陀罗经海路来华的贵霜高僧。对北凉佛教影响巨大的西域高僧昙无讫亦为时称“罽宾”的犍陀罗沙门。<sup>[17]</sup>

另一方面，犍陀罗还是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圣地，汉晋时代的中国高僧大都在犍陀罗修成正果。据《出三藏记集·僧伽罗刹经序》记载，“僧伽罗刹者，须赖国人也……游教诸邦，至犍陀越，士甄陀罽貳王，师焉。”须赖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疏勒国的别称，在新疆喀什绿洲。罽貳王指贵霜王迦腻色迦一世。<sup>[18]</sup>僧伽罗刹大概是作为质子到贵霜帝国的，或许就在迦毕试的中国质子伽蓝修成正果。又如：西晋高僧佛图澄本为龟兹人（新疆库车），九岁在乌苾国出家，两度到罽宾求法。另一位龟兹人鸠摩罗什，九岁随母亲渡印度河，前往罽宾国，师从著名法师盘头达多学习佛法。十二岁随母亲返回龟兹，后来成为享誉西域的一代佛学大师。前秦建元二十年（385），割据凉州（甘肃武威）的吕光出兵龟兹，将鸠摩罗什俘获。此后，他滞留凉州17年。直到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击败凉州主吕隆之后，鸠摩罗什才被迎入长安城译经。<sup>[19]</sup>佛经的许多原本，早就在中亚和印度本土失传，目前只在汉译佛经中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鸠摩罗什等人的佛经译本不仅是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宝库，同时也是中亚、印度人乃至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正如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中国保存的犍陀罗遗产不仅是佛经译本，还有许多精美的艺术品。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从犍陀罗输入的，另一些则是根据犍陀罗艺术原则在中国创作的。有些仿制品相当逼真，我们很难辨明真伪，所以本文姑且将二者统称为“汉晋艺术之犍陀罗文化因素”。20世纪以来，欧美和日本考察队在塔里木盆地和中国内地又发现许多犍陀罗文物。这些异国情调的文物一直受到海内外学人的广泛关注，并得以反复讨论。<sup>[20]</sup>有鉴于此，本文讨论的重点将放在中国学者后来发现的材料，尤其是近年考古新发现



## 二 中国内地

### 1. 汉元帝渭陵出土马神玉雕

1966年春，一位农民在汉元帝渭陵附近取土时，发现一件仙人骑马玉雕。通高7厘米，长8.9厘米，用和田出产的羊脂玉雕琢（插图5-1）。渭陵位于咸阳市北周陵乡新庄东南。据调查，玉雕出自渭陵前一座建筑遗址。除仙人骑马玉雕外，这里还发现玉熊、玉燕、玉辟邪等一批雕琢精美的西汉玉雕。目前收藏在咸阳市博物馆。有研究者把这件玉雕称作“羽人奔马”，认为“汉代帝王迷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羽化登升’的境界。从手持灵芝体生双翼的羽人看，应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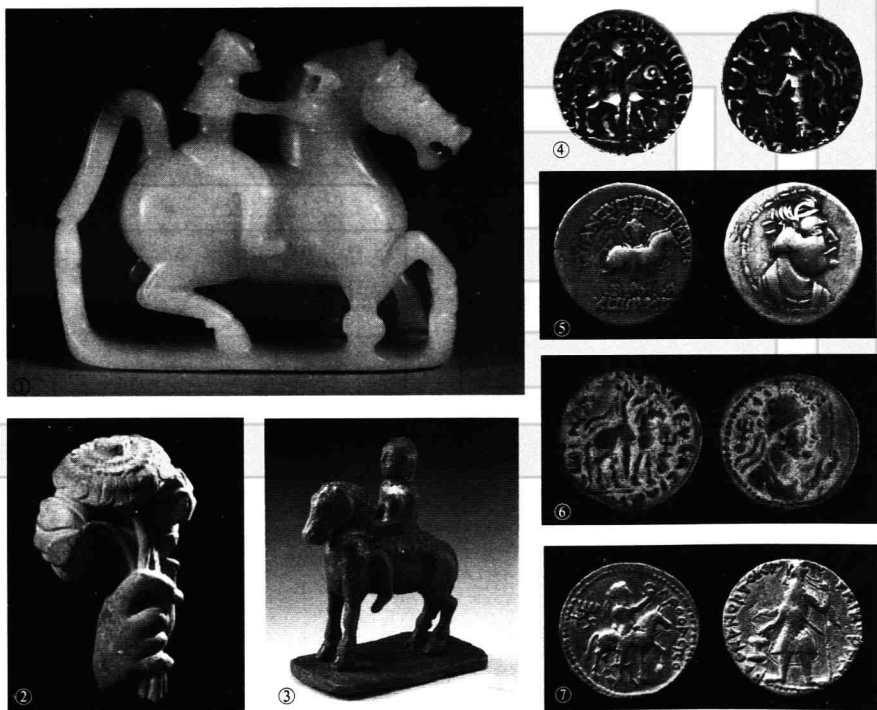


插图5 中国与中亚和波斯马神

仙人和体生双翼的奔马组合，加之云朵相配正是汉代流行‘羽化登升’思想的真实反映”。<sup>[21]</sup>

然而，仙人骑马形象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找不到丝毫线索，相反，同类主题却在中亚和波斯艺术盛极一时。近年阿富汗发现一批可与“阿姆河宝藏”相媲美的古波斯金银艺术品，时代在公元前5世纪。如今已流散日本，收藏在日本美秀博物馆(Miho Museum)。我们感兴趣的是其中一件骑马女神银像(插图5-3)，几乎与涪陵出土仙人骑马玉雕完全相同。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涪陵玉雕所谓“羽人”实际是个穿短裙的女神，与阿富汗新发现的德洛娃斯帕女神银像如出一辙。至于女神右手所持之物，不一定是灵芝，也许是犍陀罗艺术常见的莲花(插图5-2)。<sup>[22]</sup>从时间看，涪陵仙人骑马玉雕产生于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统治犍陀罗时代，中国史官称“塞人”或“塞种”王朝。《汉书·西域传》记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塞人入境随俗，末代君主阿泽斯二世(Azes II, 公元前35—公元前5年)钱币背面就打印有波斯马神像(插图5-4)。

据英国学者克利勃(J. Cribb)调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两枚丘就却钱，正面为贵霜王头像，背面为骑马人物，头上有胜利女神尼斯(Nike)在飞翔(插图5-5)。在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尼斯身插双翅，携带橄榄枝，给人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品，她曾协助希腊主神宙斯战胜提坦巨人。然而，丘就却钱背面的骑马人物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释，这类图像亦见于贵霜王阎膏珍和迦腻色迦钱币(插图5-6, 5-7)。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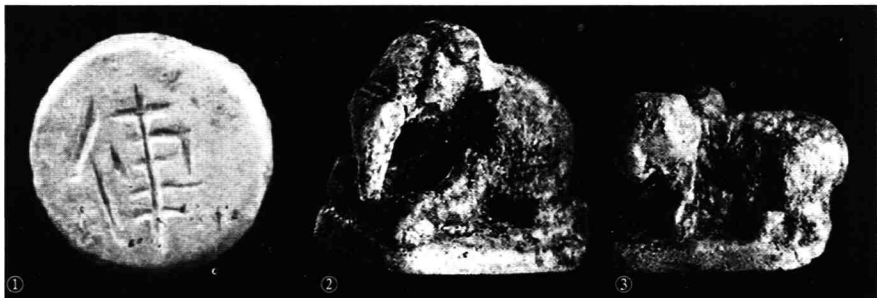


插图6 东汉与贵霜象棋

注意的是，迦膩色迦钱币边缘有大夏文旁注，读作Lrooaspo。据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 B. Henning)研究，这个词相当于婆罗钵语Dravasp(德洛娃斯帕)，意为“健康的牡马”。在波斯神话中，德洛娃斯帕女神专掌动物的健康，不仅保护家畜，而且保护儿童和友谊。

如前所述，中国和犍陀罗两地很早就开始发生交往。据考古发现，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沿丝绸之路古城遗址到处可以发现犍陀罗出产的一种蚀花肉红石髓珠。这种小石髓珠是犍陀罗特有的工艺品，起源于印度河古文明，据夏鼐先生调查，蚀花肉红石髓珠的分布范围：西边到罗马时代的埃及，南边到印度南部，东北面到我国新疆，尤其以罽宾国首都循鲜城(Taxila)发现最多，这一带的塞种、安息和贵霜时期的许多犍陀罗遗址中常有出土。我国新疆也出土过几颗，有的几乎与塔克希拉出土物完全相同。<sup>[23]</sup>既然如此，汉代仙人骑马玉雕完全可能是中国与犍陀罗两地文化交流的产物，艺术原型来自中亚流行的波斯马神——德洛娃斯帕女神像。

## 2. 重庆万州出土东汉象棋

2002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三峡库区老棺丘墓群发掘一座东汉墓时，在墓道中意外地发现一枚陶制象棋子，直径2.9厘米，厚1.3厘米，正面阴文刻带偏旁的“车”字(插图6-1)。老棺丘墓地位于重庆万州区溪口乡蒲家村。这里的古迹有墓葬、灰坑，墓葬为砖石结构，象棋子出自1号墓的墓道中。从墓葬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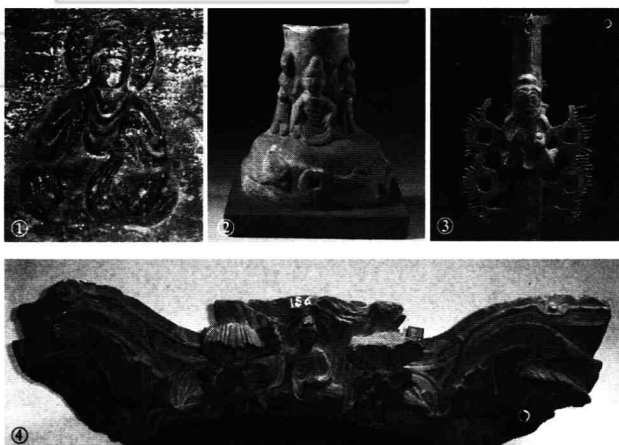


插图7 四川盆地与犍陀罗高浮雕佛像

制和随葬品看，年代在东汉或晚些时候。这个发现相当重要，说明公元2—3世纪象棋已开始在四川盆地流行。<sup>[24]</sup>

目前所见最古老的象棋属于中亚贵霜王朝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达维津·特佩（Dalverzin Tepe）佛寺遗址发现过两枚立体象棋子（插图6-2），俄国考古学家普加琴科娃将年代定在公元2世纪。<sup>[25]</sup> 一般认为，平面象棋源于立体象棋，而贵霜象棋仍保留了古老的立体形式。这时，贵霜王朝政治和文化中心已南移印度河西部的犍陀罗，这个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象棋起源于印度的理论。<sup>[26]</sup>

有关象棋起源的最早研究，首推海德·托马斯（Hyde Thomas）和奥林塔利布斯·德·陆迪斯（Orientalibus de Ludis）1694年合作出版的一本书。两人根据阿拉伯史料，认为象棋起源于印度，取道波斯和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同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象棋的前身可能是一种名叫“八脚棋”（Aṣṭapada）的古印度游戏。这个游戏本来还有骰子，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sup>[27]</sup> 四川盆地发现的东汉象棋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中国象棋，它的产生显然与贵霜时代印度文化艺术的东传密切相关。

### 3. 四川流行的犍陀罗式佛像

四川盆地与犍陀罗的文化交流更多地表现在佛教艺术方面。1940年，四川乐山市麻浩一区崖墓（1号）发现过一尊作为装饰物的小佛像。这尊佛像雕在崖墓后室的门楣上，高浮雕，有圆形头光，头顶有肉髻，身着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授印，左手握衣角，结迦趺坐（插图7-1）。类似的佛像亦见于四川彭山崖墓（116号）出土的东汉摇钱树，现为南京博物院藏品（插图7-2，7-3）。<sup>[28]</sup> 耐人寻味的是，四川东汉崖墓的小佛像颇具犍陀罗艺术风格，与犍陀罗本土发现的柯林斯柱头上作为装饰的小佛像如出一辙。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收藏了这样一件浮雕柱头（插图7-4），属于犍陀罗早期（约1—2世纪）艺术品。

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中亚的粟特商贾就把蜀地物产运送到阿富汗西北的大夏王国。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与日俱增，东汉年间佛教又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四川流行犍陀罗小佛像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但是这些小佛像只是作为建筑物或艺术品的装饰，与新疆克孜尔石窟和大同云冈石窟那种佛教徒顶礼膜拜的佛教造像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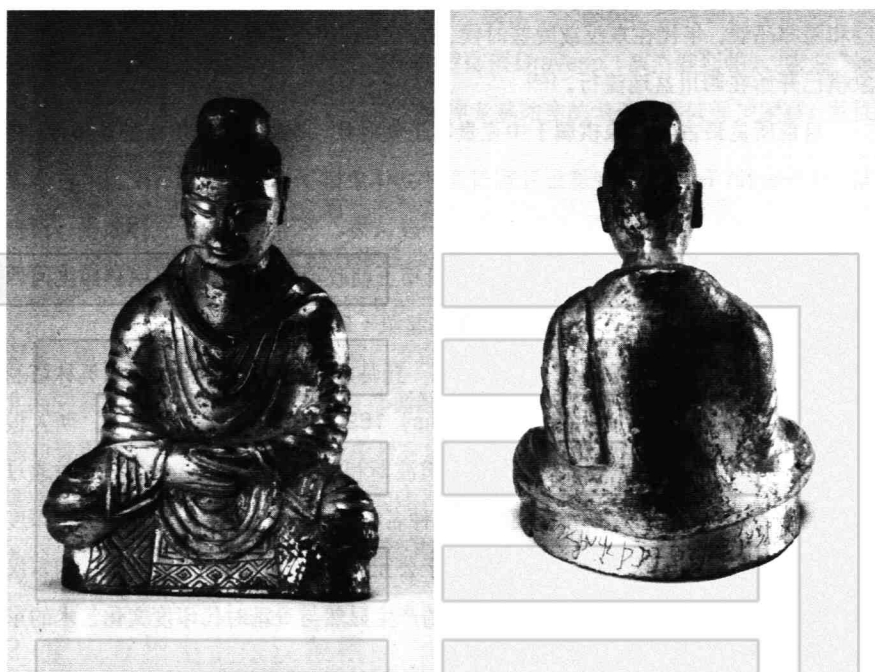


插图 8 长安出土公元 3 世纪金铜佛像



插图 9 长安金铜佛与西域和犍陀罗造像和菱格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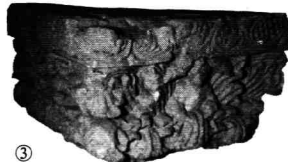
## 4. 长安出土金铜佛像

1979年，陕西长安县黄梁乡石佛寺村出土了一尊释金铜佛坐像（插图8），后来入藏西安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参观这家博物馆的藏品时注意到这尊佛像底座镌刻有西域文字。他请西安市文管所的韩宝全先生拓了两张拓片，1990年春托人带到北京，委托我们作文字鉴定。我们立刻认出铭文是汉魏时代犍陀罗与洛阳之间丝绸之路流行的佉卢文。铭文读作：“此佛为智猛所赠（或制作），谨向摩列迦之后裔弗斯陀迦·慧悦致意。”

尽管1991年我们就发表了对铭文的解读，<sup>[29]</sup>但是从未见这尊铜佛像的庐山真面目。佛教艺术史家金申先生最近告诉我们，他在2002年发表了这尊铜佛的彩色照片，并寄来他的大作。据他研究，这尊金铜佛像“磨光肉髻，通肩大衣，U行纹，上臂部衣纹呈圆棱状，手部亦略表现立体感，应作于公元400年左右。双腿下残存有汉代流行的菱格纹和山字纹……有汉风的影响，制作地点也说不定在陕甘一带”。<sup>[30]</sup>

由于该书发表的照片只有正面，而且比较小，看得不十分清楚。承蒙西安市博物馆杨军凯先生热心帮助，给我们寄来了高清晰的电子照片（插图8）。从照片看，这尊铜佛像颇具塔里木盆地早期佛像风格，与日本大谷考察队在新疆和田采集的一个公元3—4世纪的铜佛头（插图9-2）非常相似，目前收藏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这类佛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表现肉髻，似为犍陀罗佛教造像（插图9-1）的一种简化形式。

插图10  
楼兰与犍陀罗艺术的葡萄纹



据我们观察，金申先生说的“双腿下残存有汉代流行的菱格纹和山字纹”，实际上是塔里木盆地流行的一种纹饰，与先秦两汉中国传统艺术无关。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楼兰 LB 遗址发现一件菱格纹木雕门框残片（插图 9-5），时代在公元 2 - 3 世纪，现藏斯德哥尔摩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在新疆库车绿洲杜勒都·阿护尔佛寺发现的一个木雕佛像，也用菱格纹作装饰（插图 9-7），时代在公元 6 - 7 世纪，现藏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我们还注意到犍陀罗早期艺术亦流行菱格纹。例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公元 2 世纪犍陀罗浮雕的边框纹饰即为菱格纹（插图 9-4）。其中，犍陀罗流行菱格纹的时代最早，当即西域和长安金铜造像上菱格纹的艺术来源。

我们还注意到，长安铜佛的发式接近于阗铜佛头，而纹饰则接近楼兰木雕的菱格纹，所以它的产地完全可能在塔里木盆地，尤其是于阗王国或鄯善王国。

### 三 塔里木盆地

#### 1. 楼兰佛门

1900年3月下旬，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到新疆孔雀河下游的罗布荒漠考察。在穿越一片沙漠时，他们发现遗失了坎土曼。这是沙漠挖水的唯一工具，而水对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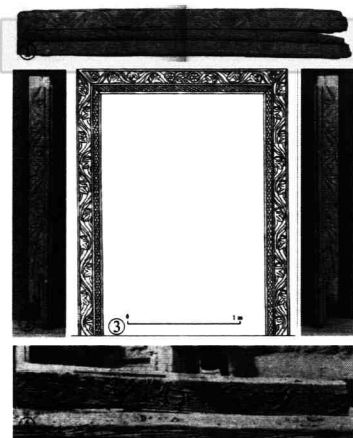


插图 11 楼兰的葡萄纹木雕佛门

赫定探险队性命攸关。斯文赫定只得让维吾尔族向导于德克沿原路返回。于德克不仅在前晚宿营地找回坎土曼，还在营地附近发现一片古代废墟，从中拣回几件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

1901年，斯文赫定重返罗布荒漠，对这座废墟进行大规模发掘，继而向东发现了著名的楼兰古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后来把楼兰城编号为LA，而把于德克发现的废墟编号为LB。楼兰最精美的木雕是LB遗址的一个葡萄纹门楣，我们从旅顺博物馆近年出版的图录上竟然见到这个门楣（插图10-1）。原来，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桔瑞超从LB遗址拆走了这个门楣，入藏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陈列所，也就是今天旅顺博物馆的前身。据旅顺博物馆图录的说明，这个木雕门楣，残长177厘米，宽24厘米。1912年在新疆罗布沙漠发现，1929年入藏该博物馆，但是该图录以为系唐代之物。<sup>[31]</sup>

1994年，我们实地考察了LB遗址。由于越野车只能开到距离遗址两公里处，以后的路全是雅丹地貌，必须徒步两公里后才能到达，故现代考察者俗称“两公里城”。其实，两公里城并不是什么古城，而是一个佛教寺院。这所寺院很有特点，以木结构建筑为主。木雕图案相当古老，风格接近公元1—2世纪流行的犍陀罗浮雕。例如：阿富汗的苏尔克·科塔勒遗址出土的犍陀罗柱头（插图10-2），就装饰有这种葡萄纹藤蔓，现为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品，<sup>[32]</sup>据马歇尔爵士研究，这种葡萄纹藤蔓图案的产生时代，处于犍陀罗艺术的“青春时期”（公元1—2世纪）。<sup>[33]</sup>

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根据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收集品，复原了这所寺院的木雕

插图12  
犍陀罗的出家逾城本生故事浮雕



佛门（插图11），雕琢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sup>[34]</sup>美中不足的是，伯格曼没有复原这个佛门的门槛。其实，尼雅遗址发现的木结构建筑，有助于进一步复原这个佛门。斯坦因在尼雅N.11遗址发现的葡萄纹木雕门槛，完全可以和伯格曼复原的葡萄纹佛门珠联璧合。

耐人寻味的是，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收藏的一个犍陀罗浮雕，与楼兰LB遗址的葡萄纹木雕佛门非常相似。由这个犍陀罗浮雕不难发现，楼兰木雕佛门的葡萄纹装饰应在门的内侧（插图11），而伯格曼误以为在门的外侧。这个巴基斯坦出土的犍陀罗浮雕（插图12）刻有须大拏太子出家逾城本生故事，时代在公元2—3世纪。<sup>[35]</sup>那么，楼兰LB佛寺与新疆米兰佛教寺院年代相仿，始建于公元2—3世纪，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

## 2. 尼雅出土犍陀罗残画

尼雅位于新疆民丰县北一百多公里沙漠腹地，古称“精绝”。190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首次发现该遗址，从中发掘出大批汉晋时代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木结构建筑和艺术品。

1959年，尼雅遗址的东汉墓出土了一件夹纈蓝印花棉布。据发掘者描述，其“上端残破处有佛脚、狮尾和蹄形痕迹，下边一条横格中，有长龙、飞鸟，左下角有一半身菩萨（或为供养人）像，裸体露胸，颈与臂上满佩缨络，头后有背光，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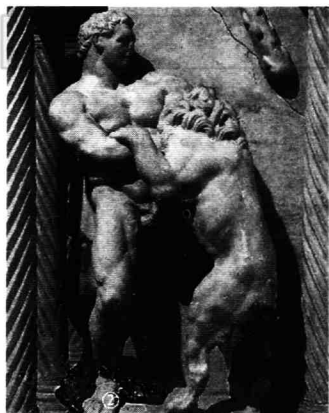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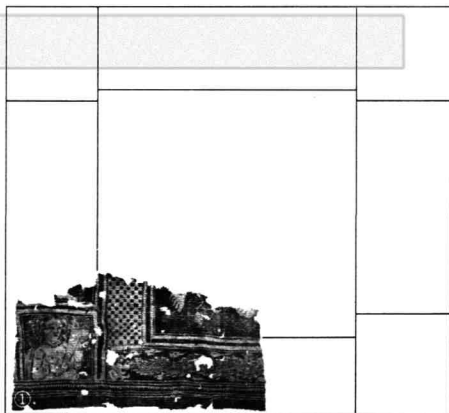


插图13  
石狮雕

尼雅的犍陀罗残画与古希腊赫拉克勒斯斗

手捧着一个喇叭口形状的长筒容器，内盛葡萄，侧身向右。残幅88厘米×77厘米，其中菩萨半身像高12厘米”（插图13左）。<sup>[36]</sup>

这幅画主要图案残存一个裸体人物的脚趾和狮尾，下边为鱼龙纹图案，左下角方框中绘有一位袒胸女神，头饰背光，颈戴缨络，手持丰饶角。所以俄国考古学家马尔沙克认为，右下角的鱼龙纹可能是印度的摩羯鱼，口中吐出河流，两边鳞片状起伏的是小山，并有飞鸟在山两边飞翔。从残存的人脚趾和狮尾看，这幅画的主画面应是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斗狮图（插图13右）。<sup>[37]</sup>我们在近年发表的论文中，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sup>[38]</sup>

塔里木盆地本来不产棉花，这种经济作物起源于印度。丝绸之路开通后，棉花才从印度河流域传入中国。因此，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件棉纺织品不一定是塔里木盆地本地的产品，很可能是从印度或中亚传来的犍陀罗艺术品。东汉史官班固在与弟书中，嘱咐驻守塔里木盆地的班超为国戚窦宪购买“月氏马、苏合香、毘登”等西域特产，并说“月氏毘氈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sup>[39]</sup>毘登、毘氈皆西域出产的名贵毛织物，月氏则指中亚贵霜王朝。这个记载说明东汉年间在塔里木盆地可以买到贵霜纺织品，而尼雅残画显然就是班固提到的贵霜纺织品。由于气候原因，犍陀罗纺织品很难在犍陀罗本土保存下来。尼雅残画的发现相当重要，为研究古代犍陀罗纺织艺术提供了重要的标本。

目前颇有争议的是：尼雅残画左下角的女神是谁？由于这幅画带有浓郁的波斯艺术风格，所以有的学者主张是西亚巴比伦崇祀的女神伊什塔尔（Ishtar）；另一些学者注意到这幅画表现了典型希腊画风格的裸体女性，因而主张是希腊丰收女神提喀（Tyche），相当于罗马幸运女神（Fortuna）。<sup>[40]</sup>此外，还有希腊农神得墨特尔（Demeter）、佛教的菩萨、鬼子母（Hariti）或吉祥天女（Lakshami）等不同说法。更有学者将此画与贵霜王胡维色迦金币图案相比较，认为残画中的女神是犍陀罗艺术特有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沙（Ardochsho）。<sup>[41]</sup>

从图像学角度看，尼雅残画的女神像与胡维色迦钱币的阿尔多克沙女神像（插图14-1）以及罗马钱币的幸运女神像（插图14-2）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尼雅残画的女神是正面像，而胡维色迦钱和罗马钱上的女神皆为侧面像。

相比较而言，尼雅残画女神像与贵霜王迦腻色迦二世钱币（插图14-3）、晚期贵霜王朝寄多罗钱币（插图14-4）的阿尔多克沙女神坐像以及笈多钱币的吉祥天女坐像（插图14-5）最为接近。<sup>[42]</sup>前者在位年代约在225—240年，后者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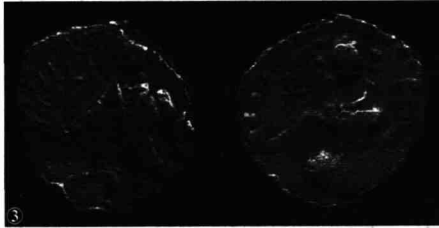




① 贵霜钱币 (Huvishka, 146-184)



② 罗马金币 (Lucius Verus, 161-169)



③ 贵霜钱币 (Kanishka II, 220-242)



④ 后贵霜钱币 (Kidara, c. 3rd century)



⑤ Samudra Gupta (c. 335-380 AD)



⑦



⑧



⑨

插图 14 犍陀罗与罗马之丰收女神

位年代约在320—370年。尼雅残画的年代与贵霜王迦赋色迦二世钱币接近，两者可能根据同一题材创作了这个模式的女神像。在犍陀罗艺术中，有不少阿尔多克沙女神石雕或铜像（插图14-7，14-8），早期为单身像，晚期往往和财神鸠毗罗一起出现。大英博物馆就收藏了这样一个犍陀罗浮雕像，阿尔多克沙女神和印度教财神鸠毗罗（Kubera）比肩而坐，膝下还有几个裸体小童。在印度神话中，财神与印度教圣母河利帝（Hariti）为夫妻，而吉祥天女与毗湿奴（Viṣṇu）互为婚媾。那么这位和财神在一起的阿尔多克沙女神显然用来表现印度教圣母河利帝。同时，这位犍陀罗女神还被引入佛教艺术，汉译佛经称作“鬼子母”。<sup>[43]</sup>

总之，犍陀罗女神阿尔多克沙的艺术形象肇源于古希腊丰收女神，相当于古罗马幸运女神。这位西方女神形象后来引入东方艺术殿堂，用来表现印度教圣母河利帝。几乎同时，佛教艺术也引入这位希腊罗马女神，用来表现佛传故事中鬼子母的艺术形象。

### 3. 和田出土贵霜文物

和田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古称“于阗”。尽管和田考古始于19世纪70年代，但是我们对于阗古文明的知识却是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步确立的。1983年，和田洛浦县发现一个古墓葬群，位于洛浦县山普拉乡一个戈壁滩上。1984年正式发掘，1992年再次大规模发掘，并陆续刊布发掘简报，2001年出版了正式报告。<sup>[44]</sup>

山普拉1号墓地的一座丛墓葬发现带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像的毛织物（插图15-1），美国艺术史家玛丽莲·丽艾（Marylin M. Rhie）注意到，这个毛织物上面的马人图案亦见于日本私家收藏的犍陀罗浮雕（插图15-2）。<sup>[4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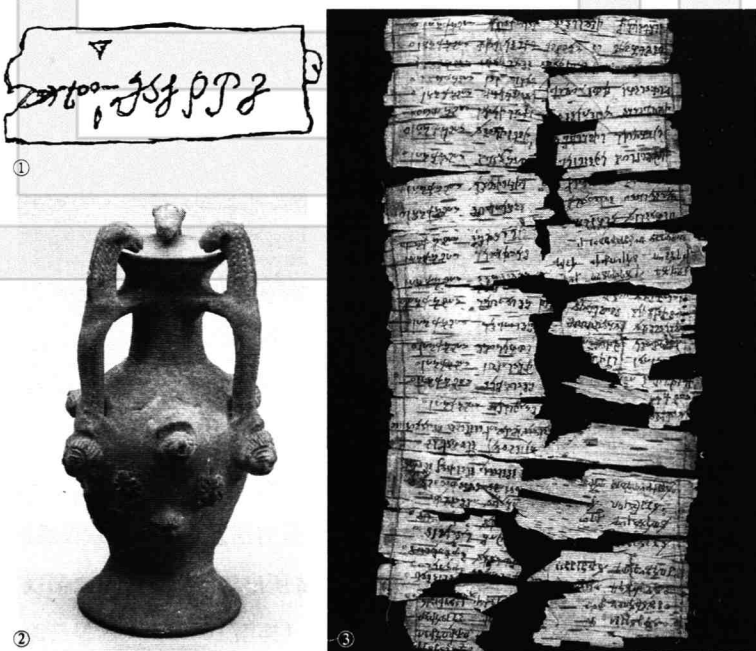
由于缺乏有确切年代的文物，人们起初对这座墓的时代认识不清，甚至认为晚至魏晋十六国时期。俄国考古学家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最先注意到这座墓随葬了一件贵霜早期陶器（插图15-3），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维津特佩公元2世纪佛教寺院遗址出土双耳罐（插图15-4）极其相似。我们注意到，同类双耳罐还见于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公元2—3世纪的犍陀罗浮雕，后者出土于阿富汗的哈达（Hadda）佛寺遗址。<sup>[46]</sup>由此推测，山普拉刀形墓年代应在东汉晚期。

除了贵霜陶器和犍陀罗毛织物之外，山普拉刀形墓所出佉卢文犍陀罗语绢残片更是犍陀罗文化影响塔里木盆地古文明最直接的证据（插图16-1）。发掘报告原以

插图15 于阗与贵霜文物



插图16 于阗的犍陀罗文物



为绢片上的墨书是于阗文，并把年代误作公元4—5世纪。其实，这是一个佉卢文绢片，字体和贵霜王朝使用的文字类型相似，并在楼兰和尼雅东汉墓多次出土，时代在公元2—3世纪。<sup>[47]</sup>

公元260年，朱士行从洛阳西行求法，在于阗求得梵语本《放光般若经》九十章。当他正打算把这部大乘佛经送回洛阳时，遭到于阗小乘教学众的强烈反对。说什么“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要求于阗王别让这部佛经流入中国内地。“婆罗门书”指梵语书写的大乘佛典，而于阗小乘教“正典”则是佉卢文写的犍陀罗语佛典。看来，公元3世纪中叶，小乘佛教仍在于阗王国占主导地位。<sup>[48]</sup>

19世纪末，法国杜特雷·德兰斯（1890-1895）考察队在和田牛角山收集到一部佉卢文《法句经》残卷，现藏巴黎法兰西国家图书馆。从字体类型看，这部佛经抄于公元2世纪左右，故知东汉末年于阗流行佉卢文。这个佛教残卷的另外三分之一为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洛夫斯基（N. Petrovsky）所得，现藏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插图16-3）。然而，法国印度学家福斯曼（G. Fussman）提出质疑，认为这部佛经残卷也许从犍陀罗带到于阗，未必说明于阗本土流行犍陀罗语。<sup>[49]</sup>不过，20世纪初，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洛夫斯基在和田收集到一个带佉卢文的三耳陶罐（插图16-2），目前收藏在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年代在公元2—3世纪。<sup>[50]</sup>山普拉东汉墓的佉卢文绢片相当重要，再次以出土实物证明汉代于阗确实流行佉卢文和犍陀罗语。

#### 4. 克孜尔石窟所见犍陀罗艺术

克孜尔在新疆库车地区拜城县境内，古代属于塔里木盆地西北龟兹王国。历史上，龟兹主要流行小乘佛教。唐圣历年中（698—699），于阗沙门实义难陀说：“龟兹国中唯习小乘，不知释迦分化百亿，现种种身云，示新境界，不信华严大经。有梵僧从天竺将华严梵本至其国中，小乘师等皆无信受，梵僧遂留经而师，小乘诸经师以经投弃于井。”<sup>[51]</sup>由此可知，公元7世纪末，龟兹佛教仍以小乘为主。唐代高僧义净在谈到印度部派佛教时说：“有部所分：一、法护（即‘法藏’），二、化地，三、迦摄卑。此并不行五天，唯乌长那国及龟兹、于阗杂有行者。”<sup>[52]</sup>换言之，法藏部等小乘佛教唐代已在印度本土绝迹，但是仍然活跃在犍陀罗北部的乌苻国以及塔里木盆地的于阗、龟兹等绿洲王国。

我们最近解读了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收集品中一批犍陀罗语文书，一共7件，其中两件是吐火罗犍陀罗双语文书。<sup>[53]</sup> 这批文书的出土地点——“最后窟”（Last Temple），是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谷后区内一座石窟。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为谷后区八个佛教洞窟编了号。<sup>[54]</sup> 其中“最后窟”就是克孜尔石窟谷后区的第8窟，新编号为克孜尔石窟第221窟，建筑类型属于僧房窟。<sup>[55]</sup> 犍陀罗语是小乘教最重要的经堂用语之一。犍陀罗语文书在库车的发现，有力地说明唐代龟兹国仍流行小乘佛教的记载是可信的。

在小乘佛教影响下，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上有许多佛本生故事，与大乘教的千佛形成鲜明对照。例如：勒柯在克孜尔第38窟挖走的须大拏太子本生画就属于小乘佛教艺术。

故事大意为：叶波国太子须大拏(Sudana)乐善好施，有求必应。敌国收买8个婆罗门，向太子乞讨国宝六牙白象，太子慷慨施与。国王得知此事后大怒，遂将须大拏太子驱逐出境。须大拏太子依旧不改乐善好施的本性，仍不断施舍钱财，最后甚至把老婆、孩子都施舍给婆罗门了。克孜尔38窟本生故事画描绘的是：须大拏太子正向婆罗门施舍自己的两个孩子（插图 17-1）。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收藏的一个犍陀罗浮雕表现了同一场景（插图 17-2），另一个犍陀罗浮雕表现了婆罗门带着太子两个孩子到叶波国沿街叫卖的场景（插图 17-3）。叶波国王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王孙赎回，并迎太子回国。<sup>[56]</sup> 这个故事是小乘佛教艺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公元前1世纪巴尔胡特（Bharhut）佛塔浮雕上就有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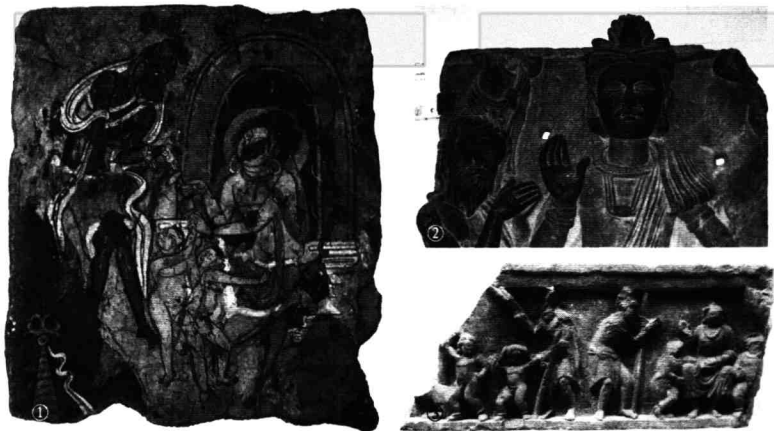


插图 17 克孜尔石窟壁画与犍陀罗浮雕的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



桑奇 (Sanchi) 一号塔和阿玛拉瓦提 (Amaravati) 佛塔也有这个题材的浮雕。此外, 犍陀罗浮雕以及中国现存最早的佛寺——新疆米兰佛寺壁画, 随处可见须大拏太子本生题材。<sup>[57]</sup> 佛教传入中国后, 这个题材还影响到中国佛教艺术。正如水野清一指出的, 公元4—5世纪, 中国佛教造像, 如释迦、弥勒、本生、佛传故事及交脚造像等, 在很大程度上受犍陀罗晚期艺术影响。<sup>[58]</sup>

## 5. 喀什噶尔的犍陀罗文物

喀什噶尔位于新疆西境, 古称“疏勒”。汉初疏勒仍是一个弱小的城邦之国, 公元前1世纪并入汉帝国版图。丝绸之路的开通, 国际贸易给疏勒经济和文化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公元2世纪末, 疏勒终于崛起, 统一塔里木盆地西部城邦以及昆仑山和帕米尔山居部落, 建立了以疏勒城为中心的绿洲王国, 同时领有莎车、朱俱波、汉盘陀三个附庸国。



插图 18 犍陀罗艺术对古代疏勒的影响

汉灵帝年间，东汉官兵退出西域。贵霜势力借机向东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塔里木盆地。<sup>[59]</sup>《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顺帝永建二年（127），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我们认为，臣磐和臣勋的“臣”字来自中古印度伊朗语 *amatya*（=梵语 *amaca*），意为“大臣”。直到隋唐时代，疏勒王仍沿用这个称号，《隋书·西域传》作“阿弥厥”，《新唐书·西域传》作“阿摩支”。<sup>[60]</sup>《后汉书·西域传》提到臣磐曾“徙于月氏”，也许就在贵霜王国当质子，不久“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拥立他为疏勒王。这大概就是臣磐和臣勋为什么以“阿摩支”为号的原因。这个称号暗示贵霜势力在塔里木盆地西部的扩张。贵霜统治塔里木盆地大概仿效汉朝经营西域——以夷治夷，通过扶植西域地方王室实施间接统治。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犍陀罗佛教艺术传入喀什噶尔河流域。20世纪初，法国和德国考察队多次对喀什噶尔河下游巴楚县图木舒克佛寺进行大规模发掘，从中挖走了许多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佛教石膏造像，分别入藏巴黎吉美博物馆和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另有一小部分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交换到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图木舒克又陆续发现许多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佛教石膏造像，目前分藏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喀什博物馆。其中一件泥塑四边用犍陀罗流行的葡萄藤蔓装饰，中心图案则完全按照犍陀罗艺术原则而创作（插图 18:1-2）。据说这个泥塑是1992年在图木舒克附近托古孜沙佛寺发现的，目前收藏在喀什博物馆。<sup>[61]</sup>

1977年，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古遗址出土了一个犍陀罗石浮雕，为了解犍陀罗艺术东传提供了实物标本。这个石浮雕长19厘米，宽10.5厘米，厚0.6厘米。两边图案为葡萄藤蔓，中心则是希腊人饮酒场面。在希腊的古典时代，狄奥尼苏斯（Dionysus）被尊为葡萄酒神，希腊人对这位葡萄酒神的祭典简直成了一场毫无节制的狂欢暴饮。喀什出土犍陀罗浮雕，表现的正是希腊人为祭祀葡萄酒神而狂热饮酒的场景（插图 18-3）。

这个浮雕发现后，一直无人知道它的实际用途。直到2000年，俄国考古学家马尔沙克到新疆博物馆访问时，才揭开了这个谜，原来，这是西域女子化妆用的黛砚，中亚古墓内经常出土，一般出自女性墓葬。马歇尔爵士在犍陀罗名城——咀叉始罗遗址发掘出许多制作精美的犍陀罗浮雕黛砚，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sup>[62]</sup> 有一件圆形黛砚的浮雕图案，亦表现希腊人为祭祀葡

葡萄酒神而狂饮的场面（插图 18-4）。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中国与犍陀罗两地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业已开始。丝绸之路开通后，两地交往又从民间发展到官方。尽管东汉末年中原王朝对西域失去控制，但是中国与犍陀罗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并未因此而中断。相反，犍陀罗语成了洛阳与犍陀罗之间国际通商用语，并且在中国西部塔里木盆地的众多绿洲王国一度成为官方语言。不过，犍陀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佛教艺术方面，米兰佛寺壁画和克孜尔石窟壁画、楼兰 LB 遗址的葡萄纹佛门以及于阗和喀什绿洲流行的艺术品，许多都是按照犍陀罗的艺术原则创作的。不仅如此，犍陀罗文化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玉雕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传统文化，但是西汉雕琢的仙人骑马玉雕的艺术形象却借鉴了中亚马神，中国象棋是中国最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殊不知，这种游戏源于古印度的立体象棋。中国文明有着独立的起源，而中国文明后来的发展则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我们对汉晋艺术之犍陀罗文化因素的讨论，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2004 年 10 月 22 日于蓝旗营寓所）

## 注释:

[1] 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收入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6-137页,注10。

[2]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the 3rd updated edition with a preface and a new bibliography by F. L. Holt, Chicago, 1985;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0页。

[3] 荻原云来等编:《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东京,讲谈社,1997年,第415-416页。

[4]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39页。

[5] 约翰·马歇尔(英)著,许建英译:《犍陀罗佛教艺术》,乌鲁木齐,新疆美术出版社,1999年(J. H. Marshall, *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 The story of the early school. Its birth, growth and decline*, Cambridge, 1960)。

[6] 《后汉书·西域传》。

[7] Fox L. Robin, *The Search for Alexander*, Boston and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哈尔马塔(匈)主编,徐文堪等译:《中亚文明史》第2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67-93页。

[8] A. Foucher, *L'art greco-bouddhique du Gandhara*,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5. 这个浮雕的彩色照片,参

见樋口隆康等编:《ツルケロード·佛教美术传来之道》,奈良,奈良国立博物馆,1988年,第71页,图版44。据后来的调查与研究,福歇从艺术风格推断出的某些最早的犍陀罗艺术品,年代有问题,很可能属于公元2世纪之物[参见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巴基斯坦)著,陆水林译:《犍陀罗艺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6-94页]。

[9]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5页。

[10] 玄奘《大唐西域记》说这次佛典结集在“迦湿弥罗”,被许多学者解释为今天的克什米尔。其实,玄奘所谓“迦湿弥罗”指汉代罽宾,当为犍陀罗。

[11] 林梅村:《洛阳所出东汉法卢文并阑题记——兼论东汉洛阳的僧团与佛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合刊,第240-249页;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见《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715-755页。

[12]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13]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页。

[14] 参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史记·大宛列传》。

[15] 龙新勇:《新疆首次出土西汉不明残竹器疑为邛竹杖》([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dqsj/](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dqsj/) 200201140701.html)。

[16] 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

考》，见《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715-755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3-67页。

[17] 《高僧传·昙无讖传》说昙无讖乃“中印度人”，但是更多的文献，如《魏书·释老志》则说昙无讖是罽宾人。

[18] 林梅村：《疏勒佛教考古概述》，《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第35页；收入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27-243页。

[19] 关于汉晋来华的西域高僧，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E.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72。

[20] 关于中国境内犍陀罗艺术的最新研究，参见Marylin M.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ume 1, Leiden/ Boston/ Koln: Brill, 1999；林梅村：《汉代西域艺术中的希腊文化因素》，郑培凯主编：《九州学林》第1卷第2期，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21] 贺雅君：《巧夺天工——西汉玉羽人奔马》([http://www.sxdaily.com.cn/data/gzgb/20021015\\_8826896\\_3.html](http://www.sxdaily.com.cn/data/gzgb/20021015_8826896_3.html))。

[22] 插图5-2手持莲花浮雕，参见犍陀罗雕塑网站([http://www.heritage.gov.pk/html\\_Pages/Gandhara%20Sculpture-1.html](http://www.heritage.gov.pk/html_Pages/Gandhara%20Sculpture-1.html))。

[23] John Marshall, *Taxila*, Cambridge, 1951, pp.737-738；夏鼐：《我国

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收入夏鼐《考古学论文集》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75-576页。

[24] 参见新华社两则报道《重庆市万州区老棺丘墓群陶制中国象棋》([http://www.gochess.com.tw/ct/2002\\_2/37.html](http://www.gochess.com.tw/ct/2002_2/37.html))；《三峡考古十大重要发现》(<http://chinese.news.yahoo.com/030531/21/s40u.html>)。

[25] 关于达尔维津·塔佩的贵霜象棋，参见G. Pougatchenkova, *Les Tresors de Dalverzin-Tepe*, Leningrad: Editions D'Art Aurore Leningrad, 1978, p.92, fig.70。

[26] 俄罗斯象棋史家林德认为这两件小塑像未必是象棋子，有可能是象棋的前身(I.M. Linder, *The Art of Chess Pieces*, Moscow: HG.S. publishers, 1994)。

[27] Sam Sloan, *The Origin of Chess*, Copyright Sloan Publishers, 1985; Horst Remus, *The Origin of Chess and the Silk Road* (<http://www.silk-road.com/toc/index.html>)。

[28] 贺云翱、阮荣春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1和第159页的图版说明。

[29] Lin Meicun, "A Kharoṣṭhi Inscription from Chang'an,"《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上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131页(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语言、民族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30] 金申：《佛像的鉴藏与辨伪》，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31] 刘广堂主编：《旅顺博物馆》，北



京, 文物出版社, 2003年, 第223页。

[32] 田边胜美、前田耕作(日)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アジア卷》, 东京, 小学馆, 1999年, 第133页, 插图第79。

[33] 约翰·马歇尔(英)著, 许建英译:《犍陀罗佛教艺术》,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出版社, 1999年, 第56-57页。

[34] F. Bergmann, "Loulan Wood-Carvings and Small Finds Discovered by Sven Hedin," *BMFEA*, No. 7, Stockholm, 1935, pp. 71-144 and Pl. I-XVI.

[35] 田边胜美、前田耕作(日)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アジア卷》, 东京, 小学馆, 1999年, 图版109。

[36] 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李遇春:《尼雅遗址和东汉合葬墓》,收入韩翔、王炳华等编:《尼雅考古资料》,乌鲁木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年,第16-43页;本文所引参见第35页。

[37]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毛民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西域·汉唐·葡萄香》(<http://artouch.com/story.asp?id=2004051563563420>)。

[38] 林梅村:《汉代西域艺术中的希腊文化因素》,郑培凯主编:《九州学林》第1卷第2期,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39]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09页。

[40] H.-J. Klimkeit, *Die Seidenstraße* (Köln: DuMont Buchverlag, 1988),

pp.48-49.

[41]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文物局编:《天山古道东西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鉴于尼雅残画主要表现希腊神话,所以我们在《楼兰》一书中倾向于支持希腊丰收女神和罗马幸运女神之说,参见林梅村:《楼兰》,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8-119页。

[42] 参见贵霜钱币网站 Kushan Empire(<http://www.grifterrec.com/coins/kushan/kushan6.html>)。

[43] A. D. H. Bivar, "Hariti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Kusan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Honour of Sir Harold Bailey) 33-1 (London, 1970), pp. 10-21.

[44] 新疆博物馆编:《新疆山普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45] Marilyn M.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ume One (Later Han, Three Kingdoms and Western Chin in China and Bactria to Shan-shan in Central Asia), Leiden/Boston/Köln: Brill, 1999. 关于这件毛织物的讨论,参见林梅村:《汉代西域艺术中的希腊文化因素》,郑培凯主编:《九州学林》第1卷第2期,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46] 樋口隆康等编:《ツルケロード・オアシスと草原の道》,奈良,奈良县立美术馆,1988年,第118页,图版124。

[47] 林梅村:《楼兰新发现的东汉佉卢文考释》,《文物》1988年第8期,第67-70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48]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参见林梅村:《佉卢文书及佉文二体钱所述于阗大王考》,《文物》1987年第2期,第35-43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49] G. Fussman, "Gāndhārīécrite, gāndhārīparlée," in *Dialectes dans les Littsraures indo-Aryennes*, ed. by C. Caillat,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1986, 433-501.

[50]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The Kyoto National Museum and Nihon Keizai Shimbun (ed.), *Scythian, Persian and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Hermitage Collection, Leningrad*, Tokyo: Nihon Keizai Shimbun, 1969, fig. 128.

[51] 惠英(唐):《大方广华严经感应传》,《大正藏》第五十一册,176页下。

[52] 义净(唐):《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大正藏》第五十四册,205页上。

[53] Lin Meicun, "Two Tokharo-Gāndhārī Bilingual Docu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 Coq Collection," 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9-97页; Lin Meicun, "Five Gāndhārī Docu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Coq Collection," *Cultura Antiqua*, vol. 55 (Kyoto, 2003), pp.1-15; 林梅村:《勒科克收藏品中的五件犍陀罗语文书》,《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第72-82页。

[54] Cf. Albert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e-Turkistan, ii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Kuca, Qarasahr und in der Oaser Turfan*, Berlin, 1912, s. 169.

[55]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第246-247页。

[56] 须大拏或称“须提梨拏”。《大智度论》卷十二说:“须提梨拏太子,秦言好爱。以其二子施婆罗门,次以妻施,其心不转……”关于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在中国的流传,参见李玉珉:《敦煌四二八窟新图像源流考》,《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第4期,1993年夏季,第1-34页。

[57] A. Foucher, *L'art grecobouddhiquedu Gandhara*, tome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5, fig. 144; Mario Bussagli, *Central Asian Painting*,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c., 1979, pp.19-28.

[58] 水野清一:《中国的佛教美术》,东京,平凡社,1968年,第55页。

[59]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朝绿洲诸国的两属现象——兼说贵霜史的一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第1-5页。

[60] 林梅村:《疏勒语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4期,第55-64页;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61]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文物局编:《天山古道东西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62] 约翰·马歇尔(英)著、许建英译:《犍陀罗佛教艺术》,乌鲁木齐,新疆美术出版社,1999年,图13-18。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三大发现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而汉代边塞遗址出土汉简就属于这三大发现之一。<sup>[1]</sup>西方考古探险队闻讯后，纷纷赶到新疆、甘肃访古寻宝，在汉代边塞遗址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汉简。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术开始从政治动荡中摆脱出来，敦煌和居延考古不断取得重要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边塞考古和简牍学研究的深入。综观中国西北汉代边塞考古史，大致划分为两个主要发展阶段。

## 第一阶段（1906 - 1949年）

### 斯坦因的发现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到中亚荒漠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探险考察。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 - 1908）经新疆，深入甘肃西部，首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遗址大肆发掘，在N.XIV号遗址发现12枚汉简，随后到楼兰、敦煌等地考察。在敦煌西北疏勒河流域考察时，发现汉长城边塞遗址，从中发掘出705枚汉简。1907年2月，斯坦因曾到甘肃酒泉考察汉代边塞，在北大河沿岸的汉代烽燧（插图1）发现一批汉简。汉代长城边塞及其汉简就这样被发现了。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1913 - 1915）重访敦煌汉长城遗址，再次掘获84枚汉简，随后又在酒泉汉代边塞遗址发现汉简105枚。尽管斯坦因在敦煌西北边塞发现的汉简实际上属于汉代敦煌和酒泉两郡，但是目前学界统称为“敦煌汉简”。尼雅和敦煌汉简现存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发掘情况著录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和《亚洲腹地》两本考古报告。<sup>[2]</sup>斯坦因将西域出土汉语文书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进行研究。1913年，沙畹出版了《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发现的汉语文书》

一书。<sup>[3]</sup> 在此之前，王国维写过一篇《简牍检署考》，从日本京都寄给沙畹。沙畹把即将出版的书稿寄给罗振玉和王国维，罗王二人合著《流沙坠简》（东山学社，1914年），后来又出增订本（1934年），校正了沙畹书稿中许多错误。王国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简牍学研究的奠基人，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sup>[4]</sup> 其研究至今仍被学术界奉为经典。

1917年，沙畹去世，斯坦因第三次考察所获汉文写本的研究改由他的学生马伯乐进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迟至1953年，马伯乐的研究成果才在巴黎发表，题为《斯坦因爵士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sup>[5]</sup> 中国旅法学者张凤此前从马伯乐处得到这批文书的照片和出土地点编号，1931年出版《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上下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年）。该书上编系沙畹已刊材料，下编系马伯乐未刊材料。马伯乐只研究了斯坦因收集品中较完整的文书，照片刊布的也不全。张凤的书中就许多马氏没发表的照片。1989年，兰州大学郭峰到大英图书馆对这批文书的残简作了进一步调查，著有《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包括一批敦煌汉代烽燧出土的残简。



插图1 居延汉代烽燧

斯坦因在印度退休后，到剑桥定居。1930-1931年，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之邀，组建中亚考察队第四次来新疆沙漠考古。这次他不能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处发掘了。在新疆地方政府监护人的监管下，他的活动到处受阻，只在尼雅遗址做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并在N.II和N.XIV发现一批西汉至新莽年间的汉简。斯坦因来华的消息被报界披露后，立即引起中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南京政府电令新疆地方政府立即将斯坦因驱逐出境。他不得不放弃他的最后一次新疆之行，改道去伊朗考察。由于这次考察中途夭折，斯坦因没写任何考察报告。1977年，美国女作家米尔斯基为斯坦因写传记，披露了当年的一些内幕。<sup>[6]</sup>更为详尽的报道则是我国学者近年来做的一系列调查。<sup>[7]</sup>由于所获文物被扣在喀什，斯坦因最终没能写成这次考察的报告，而被扣在喀什的汉简至今下落不明。不过斯坦因拍摄了这次考察所获文物的照片，一套照片和玻璃底板现藏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sup>[8]</sup>1998年，《大英图书馆馆刊》刊布了这批汉简的照片。<sup>[9]</sup>王冀青、林梅村此前访问大英图书馆时接触到这批材料，分别撰文讨论了尼雅汉简的年代和内容。<sup>[10]</sup>

## 周炳南的发现

清代中后期，西北舆地之学兴起。国人开始关注西部历史文化，而西域古物也引起国人广泛兴趣，周炳南先生即其中之一。1920年春，周炳南到敦煌西北古玉门关城（小方盘城）外旅行时，在附近戈壁滩上采集到17枚汉简。其中包括一枚东汉元嘉二年简。这批文物在20世纪50年代收归国家保存，现藏敦煌研究院。<sup>[11]</sup>李均明和何双全的释文收录于《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一书。

##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发现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再次来华组织大规模西北考察。然而，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北肆意发掘古物的行径遭到中国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斯文赫定不得和中国学术团体学会达成妥协，共同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由中外学者合作在内蒙、甘肃和新疆进行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多学科考察，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别任中外双方团长。负责考古工作的中方团员是北京大学的黄文弼先生。1930年，他曾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边塞遗址发现一批汉简。1930年2月，





插图 2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居延新简

黄文弼越新疆东境库鲁克塔格山抵达罗布泊北岸。他本来要调查那里的石器时代遗址，但是意外发现了汉代烽燧，今称“土垠遗址”，从中发掘出 17 枚汉简。1948 年，黄文弼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年)一书，详细介绍了他在罗布泊的发现并刊布了这批汉简。

著名的居延汉简也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的，发掘工作由瑞方团员伯格曼主持。1930 - 1931 年，伯格曼到内蒙古居延地区额济纳河流域汉塞烽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从中发掘出汉简万余枚，今称“居延汉简”(插图 2)。这批汉简出自三十余个不同地点，其中破城子遗址(甲渠候官治所)出简 5200 枚，红城子遗址出简 3500 枚。伯格曼考察的汉代边塞遗址今天分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县。这次考察过程中，伯格曼还到斯坦因以前调查编号的酒泉北大河汉代边塞进行调查。他在北大河 A41 (T.46) 和 A42 (T.46.i) 遗址采集的数枚汉简不属于居延汉边塞，而是汉酒泉郡东部都尉所属边塞。<sup>[12]</sup> 这次考察的初步报告见伯格曼《蒙新考古记行》，正式报告则由瑞典学者索马尔斯特罗姆根据伯格曼原始记录整理出版，题为《内蒙古额济纳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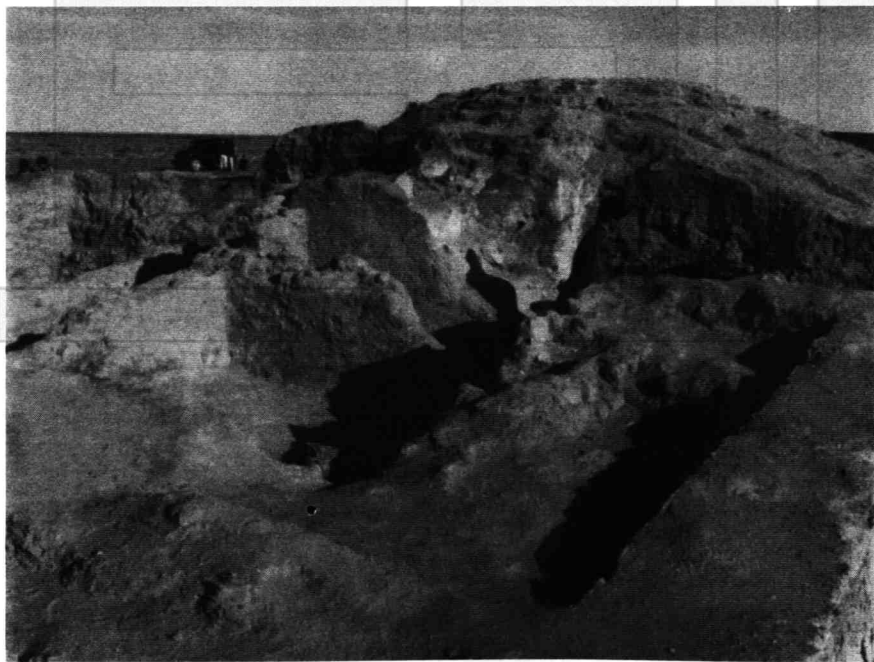


插图 3 内蒙古考古队居延发掘现场

域考古报告》。<sup>[13]</sup>

结束居延田野考古工作之后，伯格曼花费两年时间在北京整理这次考察所获古物。北京大学助教傅振伦和傅明德负责汉简登记编号，马衡和刘复教授进行汉简文字考释，据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参加过整理工作。1934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劳幹、贺昌群、余逊、向达等学者陆续参加整理，最后由劳幹定稿出版。<sup>[14]</sup> 最早的版本是1936年用晒蓝图纸晒印的汉简释文，今称“晒蓝本”。正式出版物题为《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凡四册（四川南溪石印本，1943年）。翌年，劳幹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凡两册。居延汉简后来经美国携往台湾，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说在从美国运回台湾时，有几枚居延简遗漏在美国，现存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sup>[15]</sup>

##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发现

1944—1945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正式开始考察河西走廊地区。该考察团历史考古组成员夏鼐和阎文儒考察了敦煌小方盘城以东汉代边塞遗址，从中掘获汉简48枚。这批敦煌简也被携往台湾，据说现存台北中央图书馆。<sup>[16]</sup> 1948年夏鼐考释了汉简，连同原简照片刊于《新获之敦煌汉简》。<sup>[17]</sup> 阎文儒的《河西考古杂记》介绍了遗址考察及汉简出土情况。这次河西考古意义重大，开创了中国学者独立进行西北科学考察的新纪元。

## 第二阶段（1949年至今）

20世纪50年代，新疆、内蒙古和甘肃陆续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域屯戍和汉代边塞遗址由这三个文物部门进行管理，并首先在甘肃取得重大考古发现。

早在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就开始派工作队到居延地区调查，由于受政治环境影响，这项工作一直未能开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术从政治动荡中摆脱出来。内蒙古和甘肃汉代边塞考古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在内蒙古居延和甘肃敦煌等地不断取得重要发现。

## 居延汉简的新发现

以甘肃省博物馆为主的居延汉简考古队，从1972年开始对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重新进行调查。1988年居延汉代边塞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彩版7）。

自1973年以来，甘肃省博物馆为主的居延汉简考古队开始在破城子甲渠候官治所（A8）、保格都甲渠第四燧（P1）和肩水金关（A32）三处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至198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居延采集、发掘、核查出土简牍近两万枚，包括七十多部完整和基本完整的简册。原简现存甘肃省博物馆，今称“居延新简”。<sup>〔18〕</sup>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首先将甲渠候官和甲渠第四燧出土的八千二百余枚汉简整理出版，题为《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著录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肩水金关出土汉简仍在整理过程中。

1982—1983年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分别到居延地区对汉代边塞烽燧进行考古调查。据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居延破城子文物普查时发现了22枚汉晋简牍，其中一枚为西晋太康元年纪年简。<sup>〔1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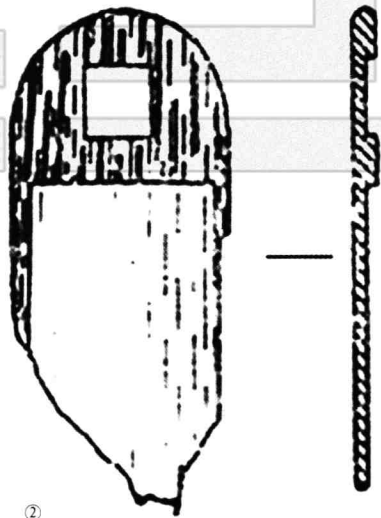


插图4 ①居延出土汉代封简；②山普拉出土汉代封简

1999年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为制定文物保护方案，再次到居延边塞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插图3和彩版8），在甲渠候官第16燧发掘出汉简百余枚，年代在汉宣帝至王莽年间。这是内蒙古文物考古部门首次发现居延汉简。<sup>[20]</sup>

## 敦煌汉简的新发现

1977年8月，甘肃省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工作人员在玉门花海农场附近汉代烽燧遗址中一共采集到91枚汉简，现藏嘉峪关市长城博物馆。这批汉简属于汉代酒泉郡北部都尉下属禽寇燧文书档案。<sup>[21]</sup> 甘肃省和敦煌地方文物部门多次到甘肃西部汉代边塞遗址进行文物普查，主要有以下5次重要发现：

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从敦煌开始，对河西汉塞进行全面调查，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11公里的马圈湾考察时，发现一座被斯坦因遗漏的汉代烽燧遗址。该遗址位于斯坦因编号的T.11和T.12a之间。同年9月，甘肃省考古队正式发掘这个遗址，掘获汉简1217枚。原简现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sup>[22]</sup> 汉简照片和释文著录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

1981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敦煌西北酥油兔汉代烽燧遗址采集到汉简76枚，原简现存敦煌市博物馆。考古简报和汉简释文著录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86—1988年间，敦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文物普查中，又在敦煌西北汉代边塞遗址陆续采集到汉简137枚，原简现存敦煌市博物馆。这些汉简的出土地点属于汉代敦煌郡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考察简况和汉简释文著录于吴弼骧等编《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90—1992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河西走廊西部安西—敦煌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山边发现一个汉代遗址，随即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共发现汉简和纸文书凡两万五千余件，其中完整或较为完整的簿册多达五十余册。这个汉代建筑群和以前发现的汉长城烽燧遗址明显有别，属于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类似后世的驿站。据报道，汉简主要出自悬泉置东南侧早期仓址的废墟物堆积中，时代最早的属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简，最晚的属于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魏晋时期废弃后，悬泉置改作烽燧使用。<sup>[23]</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堆积中许多汉代残纸与纪年简共出，这将为考订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的产生年代提供重要的考古学



依据。这些文物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考古报告尚未出版，目前只有零星消息报道。<sup>[24]</sup> 这个发现被评选为1991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 西域汉简的新发现

早在1963年，陈梦家就提出过“西域汉简”的概念，当时西域汉简名下只有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汉代边塞发现的楼兰汉简。于阗汉简的问世、尼雅汉简的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西域汉简的内容。

1983年，新疆博物馆文物普查队在和田洛浦县山普拉发现一处古代墓地，并在两座墓中发现汉简，一件为带汉字封检，写有“□小名□”字样（插图4-2）。据碳14年代数据，这座古墓的年代为距今 $2085 \pm 80$ 年（经树轮校正），相当于西汉。<sup>[25]</sup> 这也是目前所知汉简西传的最远之地。

1993年10月，中日联合尼雅遗迹考察队第五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考察尼雅遗址。这次考察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而最重要的则是中方队员林永建等人在N.XIV遗址发现的两枚汉简。<sup>[26]</sup> 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王炳华核实出土地点，它们出自斯坦因编号的N.XIV遗址。据考证，其中一枚残简系汉代字书《苍颉篇》残文。<sup>[27]</sup> 同出的另一枚汉简采用西汉尺牍(简)制度，故知这批尼雅汉简属于西汉简。

斯坦因以前在N.XIV遗址发现过两批汉简。关于它们的年代，学界有三种不同意见。沙畹起初认为，出自尼雅遗址的一组隶书木简系晋简。罗振玉和王国维深怀疑疑，他们根据书法推测“似汉末人书”。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根据汉代考古新发现提出新见。他认为这批隶书木简与西汉或新莽简书法风格相似。如果和西汉后期长沙刘骄墓出土“被绛函”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不仅书体相近，而且功用相同。<sup>[28]</sup> 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第二批汉简近年被大英图书馆刊布，绝大多数为西汉至新莽简，可证史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

## 中国西北出土汉简的研究

中国西北出土汉简研究史也可相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研究主要由中法两国学者承担。在这个阶段，法国学者沙畹、马伯乐和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张凤、劳幹、黄文弼和夏鼐对汉简研究先后做出重要贡献。除前文提到的汉简专著

外，这里还应补充西北大学陈直教授的两本专著——《木简考略》（石印本，1932年）和《汉简木简考略》（石印本，1934年）以及陈邦福的《汉魏木简义证》（十卷本，1931年）。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则在大陆、台湾、英国和日本学者之间展开。

现代欧洲汉学家大多把精力放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法国汉学家研究汉简的传统似乎没有得到传承，只有英国学者鲁惟一20世纪60年代在《通报》上陆续发表一些研究汉简的论文。1967年，剑桥出版社出版两卷本《汉代的行政记录》。这本书不仅是鲁惟一汉简研究的代表作，<sup>[29]</sup>也是继沙畹、马伯乐之后，欧洲汉学家推出的又一部汉简研究学术巨著。

日本学者比欧洲汉学家更加关注汉简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京都大学森鹿三教授就致力于汉简研究。1951年起，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居延汉简研究班，培养了许多简牍学专门人才。1959—1973年，在日本学术刊物陆续发表了一批汉简研究论文，并注意到居延汉简出土地点问题。代表作是同朋舍1975年出版的《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篇》。

日本简牍学研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是关西大学教授大庭修。1958年至今，他在日本学术刊物发表过许多汉简研究的论文。大庭修不仅经常到中国访问，了解汉简发现与研究的最新进展，而且邀请中国专家学者到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他还到英国、美国调查流散海外的汉简。其代表作是同朋舍1990年出版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简》，收录了许多沙畹、马伯乐未发表的汉简照片，他根据新出土敦煌汉简校正了旧释文中的许多错误。大庭修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居延汉简索引》（关西大学出版部，1995年），也是居延汉简研究必备的参考书。

日本简牍学研究可谓人才辈出。赤井清美的巨著《汉简》（东京堂，1977年），凡11卷，将日本的简牍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大庭修教授是日本敦煌汉简研究的代表人物，那么京都大学永田英正教授则是日本研究居延汉简的权威人士。他也十分注意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20世纪60年代至今不断推出新作。代表作是1989年同朋舍出版的《居延汉简的研究》，对破城子、博罗松治、瓦因托尼、大湾等地出土的汉简进行了全面整理。

近年日本汉简研究界新人不断涌现，例如：富谷至、吉村昌之和角谷常子等一批青年学者，充分显示了日本未来简牍学研究的雄厚实力。

台湾研究者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居延旧简的刊布与研究，早期代表人物是劳幹。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相继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台北，1949年）、《居延汉

简·图版之部》(台北,1957年)和《劳幹学术论文集甲编》上下册(台北,1976年)等重要著作,劳幹的工作是在王国维创立的简牍学研究基础上展开的,从居延汉简所见新史料重建汉代历史。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上下册(台北,1975年)也对推动台湾简牍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劳幹、陈槃之后,台湾汉简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马先醒,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继推出《汉简与汉代城市》(台北简牍学社,1976年)、《简牍论集》(台北简牍学社,1977年)和《居延汉简新编》(台北简牍学会,1981年)三部重要著作。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近年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文渊企业有限公司,1998年),采用红外线拍摄技术对褪色的简文墨迹进行复原,并取得许多重要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组织出版了两种简牍研究专刊。一种是马先醒主编的《简牍学报》,已经出版至第17期(1974—1999年),另一种是台湾国际简牍学会编《国际简牍学会会刊》,也出版了两期(1993年和1996年)。<sup>[30]</sup>

台湾学者对简牍学研究还有一个重要贡献。1997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网站(网址是:www.saturn.ihp.sinica.edu.tw/~liutk/shih),将《居延汉简甲乙编》和《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等八部汉简专著搬上国际互联网。通过这个网站,任何人可以免费对目前发表的所有汉简资料进行全文检索。这项工作率先将汉简研究带入网络时代,代表了简牍学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

大陆学者简牍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陈梦家。1960年起,他从研究武威仪礼简开始,进而扩展到居延汉简研究。代表作《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汇集了他对居延边塞组织、烽燧分布、居延史地沿革和汉简历法等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

和陈梦家同时或其后长期从事汉简研究的大陆学者,主要是来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原称“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及历史所等单位的一批学者,如陈直、于豪亮、傅振伦、陈公柔、徐苹芳、初师宾、谢桂华、李均明、何双全、薛英群等新老学者。尽管大陆学者的工作条件远不如英国、日本和台湾学者,但是他们毕竟处于汉代边塞考古和新出土汉简研究整理的第一线,并取得许多重要学术成果。<sup>[31]</sup>

在第一阶段研究中,边塞考古与出土汉简的研究往往是分开进行的,这样做不仅影响到我们对汉代边塞烽燧布局定位的认识,而且不利于对原来编连成册的汉简簿册的复原。20世纪50年代,大陆学者就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发表了1914枚居延汉简的出

土地点，后来又根据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档案中发现的“标记册”，在《居延汉简甲乙篇》（上海中华书局，1980年）中刊布了居延汉简全部出土地点。林梅村、李均明合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按出土地点重新整理了敦煌汉简。这种方法将居延、敦煌汉简从单纯的古文书研究提升到考古学研究的高度，因而受到日本简牍学家大庭修的高度评价。

大陆学者根据新发现的敦煌、居延汉简，重新整理考订以前发现的旧简，除了前文提到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外，还有谢桂华等人编写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此外，马王堆帛书、江苏连云港尹湾汉简、长沙三国吴简以及湖北江陵郭店战国楚简的发现与研究，也推动了汉代西域与边塞汉简研究的深入。例如：史树青先生就是根据长沙出土西汉简判定尼雅汉简的年代应在西汉。另一方面，大陆学者还加强了简牍学理论研究，如林剑鸣的《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高敏的《简牍研究入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是20世纪80年代简牍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李均明、刘军最近出版的《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将这项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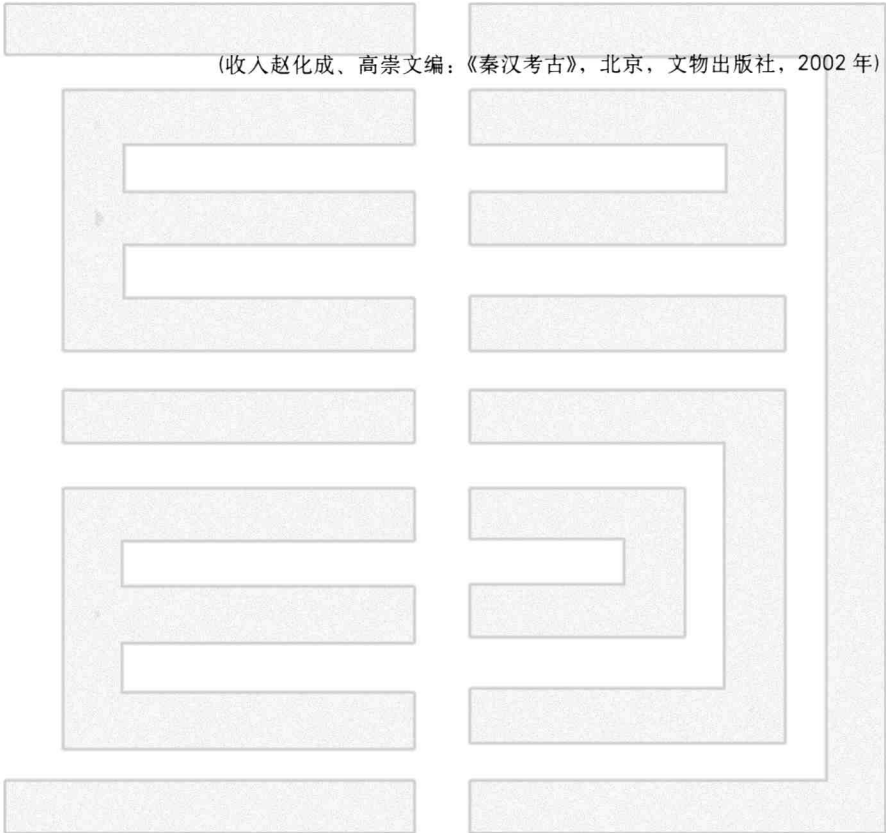
除了前文介绍的专著外，这里还应提到下面几本汉简研究专著，它们是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陈直著《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薛英群等编《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均明和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校》（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这些著作反映出大陆学者对汉简研究已经从单纯的文字考释和簿册编连等基础研究逐步转向专题研究阶段。

1983年以来，大陆有关单位组织出版了几种简牍研究专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组织出版的《简牍研究译丛》（1983—1987）和《简帛研究译丛》（1996—1998年）；李学勤等学者组织出版的《简帛研究》，已经出版三辑（1993—1998年）；1996年以来，西北大学历史系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出版的《简牍学研究》也出版了两辑（1996—1998年）。

为使本文不至遗漏过多，最后附带介绍一下中外学者对简牍研究文献目录的编纂。和本题相关的研究目录主要有四篇，也即日本学者大庭修编《中国出土简牍研

究文献目录》、大陆学者曹延尊、徐元邦编《简牍论著资料目录》、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编《简牍论著目录》、台湾学者邢义田编《秦汉简牍与帛书研究文献目录（1905 - 1985年）》以及1999年大陆学者谢桂华撰《百年简帛》所附研究目录。<sup>[32]</sup>从上述目录，基本上可了解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研究汉代边塞遗址和出土简牍的概况。

(收入赵化成、高崇文编：《秦汉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 注释:

[1] 这三大发现分别为1898年发现殷墟甲骨文, 1900年发现敦煌文书, 以及1906-1908年在新疆尼雅和甘肃敦煌汉长城遗址发现汉晋木简残纸。

[2] M.A. Stein, *Serindia*, 3 vols., Oxford, 1921; *Innermost Asia*, 4 vols.; Oxford, 1928. 关于斯坦因考察敦煌和酒泉边塞遗址的情况, 可参见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年。

[3] É.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4] 1922年, 鲁迅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这样写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 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 那才可以算是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 是王国维先生做的, 要谈国学, 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5] 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6] Jeannette Mirsky, *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译本参见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2年, 第459-463页。

[7] 张力和于江:《斯坦因第四次入新简述》,《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 第111-114页; 王冀青:《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第98-110页; 冯锡时:《法显西行路线考辨》,《西域考察与研究》,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291-298页。

[8]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 1998年, 第259-290页。

[9] Wang Jiqing, “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 Manuscripts from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vol. 24, no.1, spring, 1998, plates in pp. 40-41, p.51 and p.62.

[10] 王冀青:《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发现的文物》,《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 1995年, 第131-147页; 林梅村:《汉代精绝国与尼雅遗址》,《文物》1996年第12期, 第53-59页;《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九州》第1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7年, 第71-79页。后两文收入林梅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年。林梅村:《尼雅汉简综考——兼论汉文化在西域的最初传播》,《“作为文化制度的中国古典”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京都大学, 2000年。

[11] 初师宾:《关于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组汉简》,《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第59-62页。

[12] 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年, 第9页和第31-32页。

[13] F. Bergman, *Travels and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in Mongolia and Sinkiang*, Stockholm, 1945; B. Sommarströ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 2 vols., Stockholm, 1956-1958.

关于伯格曼考察居延汉代边塞的情况,参见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收入《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4] 参见《中瑞西北科学考古团大事记》,《开创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103页。

[15] 大庭修:《美国所存的居延汉简始末》,收入《汉简研究》,同朋舍,1992年。

[16] 吴初骧等编:《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17] 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1948年;收入夏鼐:《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

[18]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额济纳河下游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报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1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4页,注1。

[20] 参见《内蒙古居延遗址出土百余枚汉简》,《西安晚报》2000年1月31日。有些情况承蒙魏坚先生面告,谨致谢忱。

[21] 嘉峪关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收入《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22]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0期,第1-8页。

[2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并见《文物》2000年第5期,第1-45页。本

文所引敦煌新简均据此文,恕不一一出注。

[24] 参见《汉悬泉置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见《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5日版;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收入大庭修主编:《汉简研究的现状与瞻望》,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年;何双全、孟力:《甘肃出土简牍文献大观》,收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4年第10期,第3-10页;何双全:《敦煌新出简牍辑录》,收入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1期,第228-232页。

[25] 王博等:《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见《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第18-19页。

[26] 林永建等著:《梦幻尼雅》,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99页图版。

[27] 王榭:《略说尼雅发现的“苍颉篇”汉简》,《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第55-58页。

[28] 史树青:《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第22-23页。

[29] M. Lo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2 vol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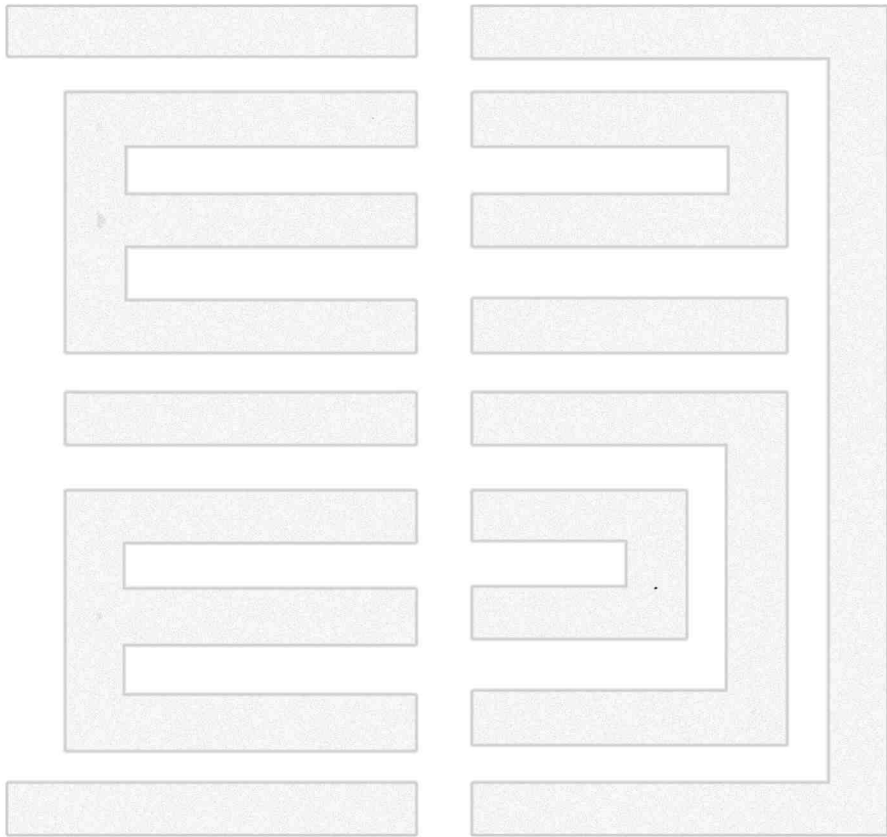
[30] 关于台湾学者的研究,参见徐莘芳:《汉简的发现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第57-64页;谢桂华:《百年简帛》,《文史知识》1999年第8-9期连载。

[31] 关于大陆学者的研究,参见徐莘芳:《汉简的发现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第57-64页;谢桂华:《百年简帛》,《文史知识》1999年第8-9期连载。

[32] 大庭修编、谢桂华译:《中国出土简牍研究文献目录》,收入《简牍研究译丛》

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曹延尊、徐元邦：《简牍论著资料目录》，《考古学辑刊》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03-230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编：《简牍论著目录》，收入《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314-330页；邢义田：《秦汉简牍与帛书研究文献目录(1905-1985)》，《秦汉史论稿》，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569-635页；谢桂华：《百年简帛》，《文史知识》1999年第8-9期连载。



## 第五章 | 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

1995年夏，我们在大英图书馆访问时，首次见到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 Stein）未曾刊布的一批尼雅汉简。在该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的帮助下，初步调查了这批汉简。为了使工作在尼雅考古第一线的中国学者及时了解这批重要史料，我们于1996—1997年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讨论了其中两枚汉简。<sup>[1]</sup>由于大英图书馆尚未公布这批材料，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批汉简照片的正式出版。1998年，《大英图书馆馆刊》刊布了这批汉简的照片以及兰州大学王冀青多年来对这批照片的调查研究。<sup>[2]</sup>王先生的调查对澄清尼雅汉简的来



插图1 鸟瞰尼雅遗址

龙去脉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在这批尼雅汉简发现前后，尼雅遗址还发现过两批汉简。目前学界对这三批汉简出土地点的研究和文字考释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因而有必要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撰写此文，求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 一 尼雅汉简的发现

1901年1月，斯坦因首次闯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尼雅遗址。此后，这座沙漠废墟成了他历次中亚考察的必经之地（插图1）。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于1906年10月重访尼雅。这次他组织了一支五十余人的庞大队伍，在尼雅遗址内大肆发掘。他们在尼雅遗址北端西侧，东南距尼雅佛塔大约8公里处发现一处大型建筑群。这个建筑群仅剩三组基址，西南组基址规模最大，地表可见2.75米高的胡杨木立柱，室内面积约 $17 \times 12.5$ 平方米，编号N.XIV.i遗址；西北组基址规模稍小，编号N.XIV.ii遗址。这两组建筑基址东面16米处还有一个建筑基址，面积约 $16 \times 15.25$ 平方米，编号N.XIV.iii遗址。这个遗址早期废弃后当作马厩使用，室内堆积厚达两米多，其中心部位发掘出一个大木箱，口径 $2.44 \times 1.98$ 平方米。斯坦因在这个木箱内清理出丝、毛、麻等织物碎片、绣花皮革片、漆器残片、木器具、12枚汉文木简（1枚无字）和一个佉卢文皮革残片。尼雅汉简就这样被发现了。<sup>[3]</sup>

然而，人们对这批尼雅汉简的认识却一波三折。斯坦因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考释尼雅等地出土的汉文文书。1913年，沙畹出版《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发现的汉语文书》，但是该书却把尼雅汉简与尼雅其他遗址出土的晋简混为一谈。<sup>[4]</sup>1914年，罗振玉和王国维研究了尼雅出土汉晋文书，首次指出尼雅N.XIV遗址出土简牍应是汉简，认为“今尼雅所出木简十余，隶书精妙，似汉末人书，尚在永平以后……盖后汉中叶，精绝仍离鄯善而自立也”。<sup>[5]</sup>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对尼雅隶书简的年代提出新说，<sup>[6]</sup>认为这批汉简的年代应在西汉或新莽年间。斯坦因在尼雅N.XIV遗址发现的第二批汉简，可证史先生的建议颇有见地。尽管早在1931年1月这批文物就被发现，但是迟至1998年学界才从大英图书馆刊布的照片上见到这批汉简的真面目。

1930年，斯坦因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之邀，组建中亚考察队第四次来塔克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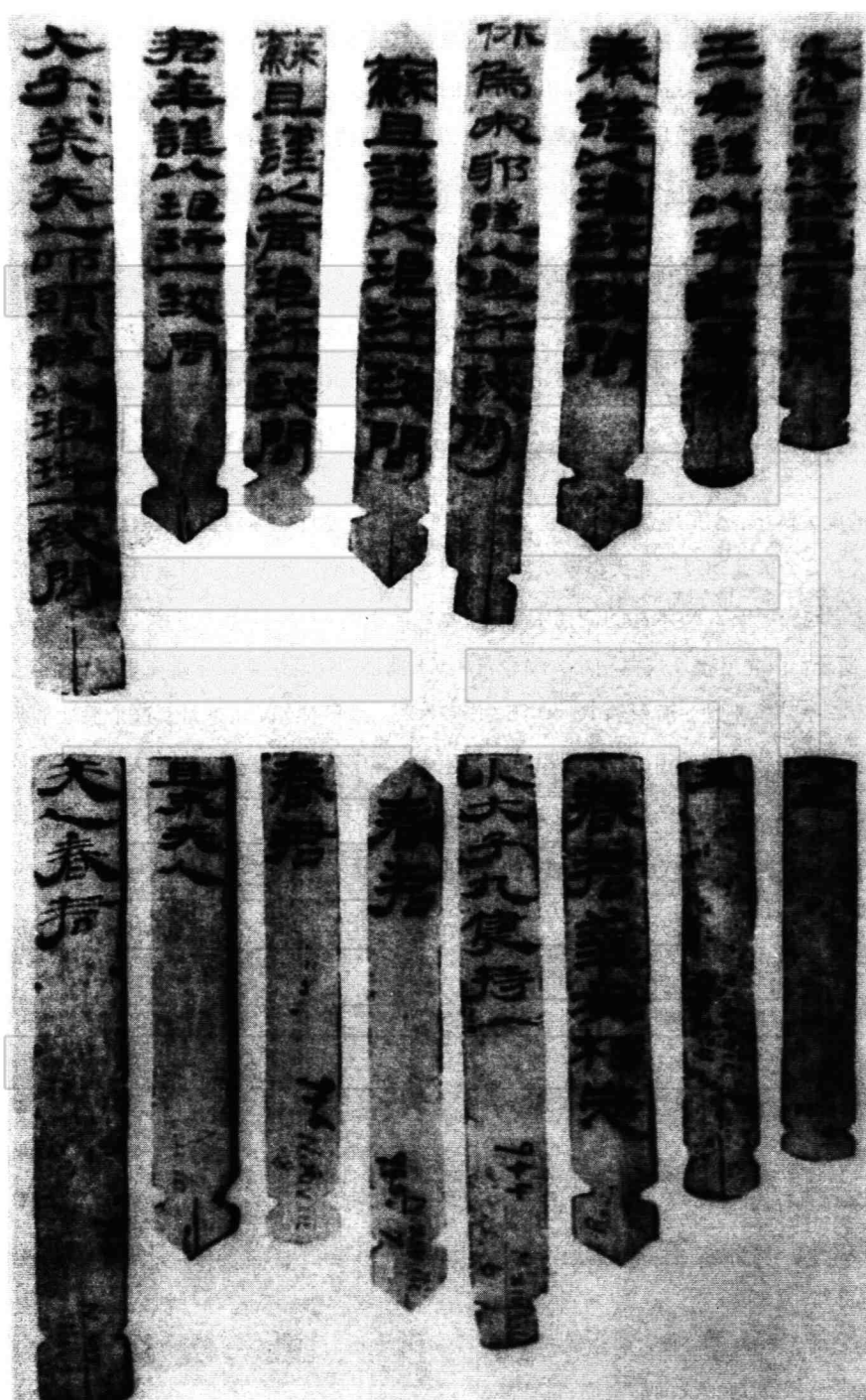


插图2 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汉简



玛干沙漠考古。这次他不能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处发掘了。在新疆地方政府监护人的监管下，斯坦因的活动到处受阻，只在尼雅 N.VIII、N.XXIII 和 N.R 遗址做了较大规模的发掘。<sup>[7]</sup> 据王冀青近年对斯坦因日记的调查，他这次考察还到过 N.II、N.XII 和 N.XIV 遗址。<sup>[8]</sup> 因为 N.XIV.iii 遗址出土简牍多次提到“王”（插图 2），斯坦因怀疑这个遗址可能是精绝王宫室。<sup>[9]</sup> 他派人以前发现汉文木简的遗址重新进行清理，可是没发现任何重要文物。

1931 年 1 月 22 日，斯坦因的雇工阿布杜·贾法尔终于在 N.XIV.ii 遗址发掘出 21 枚汉文木简，绝大部分是残片，一些简有两行文字。据斯坦因观察，这些木简和他在汉代烽燧发现的汉简书法风格一致。从斯坦因拍摄的文书照片（编号 T.O.15、T.O.16 和 T.O.37）看，N.XIV 号遗址实际上一共发现 22 枚汉文简牍，而不是斯坦因日记说的仅有 21 枚。同一天傍晚，雇工赛义德又给斯坦因带来 4 枚汉文木简残片。他起初说是在 N.II 遗址发现的，后来又改称在 N.XII 遗址以东 1/3 英里处某个草堆上发现的。第二天（1 月 23 日），雇工雅辛从尼雅 N.II 遗址一个房屋附近垃圾堆中找出 1 枚完整无损的汉文简牍。斯坦因在第三天（1 月 24 日）的日记中写道：“从古桥遗址派出的穆萨带回另外 3 支简牍，从以前已清理过的地点获得，但是仅有 1 支简上面存有文字。”第三天发现的 3 枚简牍无疑都带有文字，否则不会被称作“简牍”。至于这 3 枚简牍写的是什么文字，斯坦因的日记没有进一步说明。在斯坦因拍摄的尼雅文书照片（T.O.37）中，我们见到 3 件采自 N.II 号遗址的汉文残简，编号为 N.II.2、N.II.3 和 N.II.4 号。显然，它们就是穆萨在古桥附近某遗址采集的那 3 枚简牍。因为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书早在 1937 年就被英国梵学家巴罗刊布，其中没有任何出自尼雅 N.II 遗址的佉卢文书。<sup>[10]</sup> 那么穆萨发现这批简牍的地点应该是 N.II 遗址。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那么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在尼雅一共采获 30 枚汉文木简。

斯坦因来华的消息被报界披露，立即引起中国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南京政府电令新疆地方政府立即将这位不速之客驱逐出境。斯坦因不得不放弃最后一次新疆之行，改道去伊朗考察。

据以上研究，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在尼雅一共发现 30 枚汉文简牍。但是大英图书馆刊布的斯坦因这次中亚考察所获尼雅文书照片中却只有 26 枚汉文简牍，其中 22 枚采自 N.XIV 遗址，其余 4 枚采自 N.II 遗址。<sup>[11]</sup> 从目前刊布的尼雅文书照片中，我们没有找到赛义德在 N.XII 遗址附近采集的 4 枚汉文残简。<sup>[12]</sup> 这批简牍照

片的下落，尚有待进一步调查。

第三批尼雅汉简是近年才发现的。1993年10月，中日联合尼雅遗迹考察队第五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考察尼雅遗址。这次考察有许多重要收获，最重要的莫过于中方队员林永建等人在尼雅遗址中采获的两枚汉简。据说这批汉简是在尼雅佛塔西北大约七八公里一个房址附近发现的。这个房址东墙外侧有个马槽之类的遗物，大约1.5—2米长，里面充满了积沙。他们把马槽内积沙清空后，在底部发现了两枚木简，可是没发现其它遗物。其中一枚系竹简，相当完整，顶端写有两个汉字；另一枚系木简，已残，正反面均有汉字。<sup>[13]</sup> 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王炳华核实出土地点，确认这个遗址应是斯坦因编号的N.XIV遗址。另据上海博物馆王越考证，那枚残简是秦汉小学字书《苍颉篇》的残文。<sup>[14]</sup>

## 二 尼雅汉简释文

1985年，我们按照出土地点，对尼雅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残纸重新作过整理，统一编为1至728号。<sup>[15]</sup> 为了便于讨论和今后的研究，我们把尼雅第二批汉简和中日联合尼雅遗迹考察队新发现的汉简也编入这个序列。第718-728号为沙畹释读，后经罗振玉、王国维校订。<sup>[16]</sup> 第729-754号为王冀青释读，此前我们只讨论过其中两枚简（729和752号），第755和756号为上海博物馆王越释读。<sup>[17]</sup> 在前人与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大英图书馆刊布的照片以及1995年我们在该图书馆拍摄的照片，本文将目前发现的39枚尼雅汉简汇释如下。凡经我们校订过的文字，均加按语说明。有些释文仍然不令人满意，可是照片不甚清晰，只得照录旧释，以待识者。

### 718 (N.XIV.iii.1)

大(太)子二美夫人叩頭，謹以琅玕 | 致問(正面)

夫人春君(背面)

林按：美，沙畹释“笑”，罗振玉、王国维校正为“美”。重文符号“二”，沙畹未释；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这里的重文符号应表示双字重叠，那么简文读作：“太子、太子美夫人叩头，谨以琅玕，致问夫人春君。”

### 719 (N.XIV.iii.2)

臣承德叩頭，謹以玫瑰|再拜致問(正面)

大王(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0 (N.XIV.iii.4)

王母謹以琅玕|致問(正面)

王(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1 (N.XIV.iii.5)

奉謹以琅玕|致問(正面)

春君，幸毋相忘(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2 (N.XIV.iii.6)

休烏宋耶謹以琅玕|致問(正面)

小大(太)子九健持|(背面)

林按：此简正面的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背面的界隔符“|”，沙畹未释。

723 (N.XIV.iii.7)

蘇且謹以琅玕|致問(正面)

春君(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4 (N.XIV.iii.8)

蘇且謹以黃琅玕|致問(正面)

春君(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5 (N.XIV.iii.9)

二畦□□////

726 (N.XIV.iii.10)

君華謹以琅玕|致問(正面)

且末夫人(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7 (N.XIV.iii.11)

卯 之八

728 (N.XIV.iii.13)

午 十

729 (N.XIV.ii.1/ T.O.16)

1. 大宛王使羨左(佐)大月氏 使上所……//

2. 所寇。願得漢使者使此。故及言：兩□□羨//

林按：簡文兩次提到的“羨”字，王冀青均釋“坐次”。第一行的“使”，王冀青釋“及”；寇，王冀青釋“覆”。第二行的“使此”，我們原來讀“進奉”，王冀青釋“並比”，均不確。

730 (N.XIV.ii.2/ T.O.15)

廿三土，王立。王禁秦人等，見賊藏賦(匿)之使者貴人□□□人戟□□部使者大人

731 (N.XIV.ii.3/ T.O.15)

王姣

732 (N.XIV.ii.5/ T.O.16)

1. //□，而馬必強於人

2. //左將軍、右將軍至

林按：于，王冀青釋作“于□人”。

733 (N.XIV.ii.6/ T.O.15)

極而土德起也。

734 (N.XIV.ii.7/ T.O.16)

體者，明黃室之烈也。新//

林按：室，王冀青釋“堂”。新，王冀青釋“親”。

735 (N.XIV.ii.9/ T.O.15)

(不可辨讀)

736 (N.XIV.ii.10/ T.O.15)

將軍龍年□大小莫□□□□□//

737 (N.XIV.ii.12/ T.O.37)

//□□馬糞□□□□//

738 (N.XIV.ii.13/ T.O.37)

至府行□□府□////

739 (N.XIV.ii.14/ T.O.16)

池中皆空，井中水泉減少，不足以給，人無馬////

740 (N.XIV.ii.16/ T.O.37)

////□□□天内，難以告鎮中安寧。

林按：告，王冀青未释。

741 (N.XIV.ii.17/ T.O.16)

////賢聖以兩者□□////

林按：以，王冀青释“及”。

742 (N.XIV.ii.18/ T.O.37)

(不可辨读)

743 (N.XIV.ii.19/ T.O.37)

////□為先代之後，禮為新賓也。皇

林按：皇，王冀青释“里”。

744 (N.XIV.ii/ T.O.16)

唯元肆毋曰善二庶人明斯////

林按：重文符号“二”，王冀青未释。此简或读作：“唯元肆，毋曰‘善’。善，庶人明斯。”

745 (N.XIV.11/ T.O.16)

皇帝大軍////

林按：大军，王冀青释“以大军”。

746 (N.XIV.11.4/ T.O.26)

皇帝赫然斯怒，覆整英旅，命遣武臣，張弓發 簇////

林按：发，王冀青读“设”；簇，仅存上半，王冀青读“瓌”。最后一字前面有个为编连简册留下的空格。

747 (N.XIV.12.8/ T.O.26)

////(新戊)亭神井、諸田、諸溝者，明新室，以新為號。成記

林按：“新戊”两字仅存右半，王冀青释“新□”；诸田诸沟，王冀青释“诏田诏汙”；记，王冀青释“干”。

748 (N.XIV.15/ T.O.37)

月壬寅朔，大……////

林按：月，王冀青未释。

749 (N.XIV.20/ T.O.37)

//// 遷難解頓□□頓 ////

750(N.XIV.21/ T.O.37)

(不可辨读)

751 (N.II.1/ T.O.37)

1. //// 工室府。乙未，□羊一

2. //// □夫出并人·出入三□

林按：第一行：室，王冀青释“堂”；乙，王冀青释“之”；一，王冀青未释。  
第二行：夫，王冀青释“羊”；人，王冀青释“之”；符号“·”，王冀青未释；出  
人，王冀青释“土以”；三，王冀青未释。

752 (N.II.2/ T.O.37)

1. □□□武……////

2. 漢精絕王，承書從(事)////

林按：承，王冀青释“奉”；事，仅存上半，王冀青未释。

753 (N.II.3/ T.O.37)

//// □半如其 ////

林按：这枚残简在照片上倒置，王冀青显然把简上的字读反了，以为有两行字。  
第一行未释，第二行读作“宴服未□”。

754 (N.II.4/ T.O.37)

//// □羊一·若出□ ////

林按：出，王冀青未释。

755 (N.14.1)

溪穀阪險丘陵故舊長緩肆延渙□ (正面)

入全人(背面)

756 (N.14.2)

廿牡

林按：廿，王樾释“卅”。1996年夏，我们曾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仓库



见过这枚汉简。据当时的笔记，第一字似读“廿”。

### 三 尼雅汉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尼雅汉简可按时代大致分为西汉简、新莽简和东汉简三组，分别讨论于下。

#### 第一、西汉组

史树青将尼雅汉隶简断为西汉或新莽简的建议颇有见地，不过其中多次提到“王”，年代应在西汉。因为新莽始建国元年西域诸王皆被更名为“侯”。<sup>[18]</sup> 我们注意到，这批汉隶简多处用横线“一”表示界隔符。这个符号以前被沙畹读作数字“一”，后人皆从之。我们在《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首次予以校正，因为其中一简（722号）紧接在“小大（太）子九健持”等文字后写了这个符号，可见这批汉隶简中频频出现的“一”是界隔符而非数字“一”。这种界隔符亦见于包山楚简和江陵凤凰山楚简。用横线作界隔符有诸多弊病，后来逐渐被斜线“/”替代。陆锡兴对此考证说：“横划号是横的一笔，形状与数字‘一’相似，所以极易相混而误。如人们把仰天湖楚简的横划号释成数字‘一’就是例子。西汉中期以后，横划号已经基本废止，或者以斜划号的形式保存下来。”<sup>[19]</sup> 尼雅汉隶简的界隔符仍使用横线而不是斜线，年代不晚于西汉中期，而共出的其余3简亦应属于这个时期。

王冀青把“汉精绝王”简（752号）、“大宛王使”简（729号）归入西汉组。这个建议和我们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此外，“马必强于人”简（732号）与“大宛王使”简的字体、简牍形式皆相同，应属同一简册。“大宛王使”简提到西域为匈奴所寇，大宛王和大月氏使者朝汉，请求维持西域纲纪。这个事件似乎发生在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甘延寿讨伐北匈奴郅支单于前夕。《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引陈汤的话说：“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尽管正史没提大宛和大月氏此次出使，可是敦煌汉简记录了宣、成年间（前73—前7年）大月氏使者朝汉之事。<sup>[20]</sup> 那么“大宛王使”简也许写于汉元帝建昭三年之前不久。

关于尼雅汉简的断代，我们还找到一条重要线索，即从两汉尺牍（简）长度变化来判断年代。汉代通行尺牍或尺简。有学者对70年代初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简册作过统计。这批简牍绝大多数是西汉简，其中完整的简牍凡850枚，而长度在22-23厘米的简牍多达750枚。<sup>[21]</sup>故知西汉尺牍（简）长约22至23厘米。据考证，两汉大小尺度之变化如下：<sup>[22]</sup>

西汉尺：小尺23.1厘米，大尺27.72厘米。

新莽尺：23.1厘米。

东汉尺：23.2-23.9厘米。

尼雅新发现的“廿仕”简（756号）通长23.1厘米，比东汉尺牍长度（23.2—23.9厘米）稍短，应是西汉或新莽简。据调查，西汉简的“廿”字，至迟在新莽始建国三年已写作“二十”。<sup>[23]</sup>第756号简写有“廿”字，故为西汉简。尼雅《苍颉篇》简与此简共出，年代亦在西汉。

王冀青从书法风格推断：“工堂（室）府”简（751号）、“宴服未（半如其）”简（753号）、“羊一”简（754号）和“至府行”简（738号）等“4支木简，其书法粗草，与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晋代木简书法类同。”其说不尽然。敦煌和居延汉简不乏“书法粗草”之例，单凭书法是否粗草实际上很难断代，况且这4枚简都和汉简有共存关系。其中751、753和754号简与“汉精绝王”简（752号）皆出自尼雅N.II遗址。斯坦因将其统一编号，或表明它们出自同一地点。另一简（738号）与大批西汉新莽简共存于N.XIV.ii遗址。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曾在尼雅遗址发现1枚刻有“司禾府印”的汉印。<sup>[24]</sup>这枚汉印说明汉代精绝国一度实行中原的政治制度，并设有“府”之类的行政机构。尽管上述4简出自两个不同遗址，但是分别提到了“府”，此乃汉代精绝国之制。在没有充分根据判定其为晋简之前，我们只能认为它们都是汉简。

## 第二、新莽组

王冀青建议把“土德”简（733号）、“新宾”简（743号）、“明新室”简（747号）归入新莽组。其说可从。需要说明的是，新宾是“新室宾”的简称，该词见《汉书·王莽传》。其文曰：“莽乃策命孺子曰：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

永为新室宾。”此外，他对“明新室”简的释读存在许多问题。其实，这条简文应读作：“（新戍）亭神井、诸田、诸沟者，明新室，以新为号。成记。”从斯坦因拍摄的照片看，王冀青所谓“汉”实为“沟”字。新莽更改地名，喜将“渠”改为“沟”字。居延汉简屡见“甲沟”，实乃新莽所改西汉甲渠候官的“甲渠”。《汉书·地理志》北地郡下：“义渠道，莽曰义沟。”<sup>[25]</sup>那么“沟”字前面一字不会是王冀青释读的“诏”字。据我们观察，这个字和第六个字相同，实乃“诸”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孟凡人先生建议把“皇帝以大军”简（745号）、“皇帝赫然斯怒”简（746号）划归新莽组，以为与《汉书·西域传》所载王莽天凤三年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等事件有关。<sup>[26]</sup>其说亦可从，只是第745号简应读作“皇帝大军”。

除了上述5枚新莽简外，另外3枚尼雅汉简也可归入新莽组。其一（743号）提到“黄室”一词，但是被王冀青误作“黄堂”。居延新简有“中室御、黄室御”。正如李均明指出的，新莽称“宫”为“室”，而黄室是“黄皇室”的简称。<sup>[27]</sup>《汉书·外戚传》曰：“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悼伤哀，欲嫁之，乃更号为黄皇室主。”颜师古注：“莽自谓土德，故云黄室。室主者，若汉之称公主。”故“黄室”简必为新莽简无疑。另一简（744号）提到“元肆”。肆，意为赦罪。《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杜预注：“肆，赦有罪也。”元，犹言大。那么“元肆”意为“大赦”，疑指王莽篡位后大赦天下之事。<sup>[28]</sup>那么744号简亦为新莽简。而“池中皆空”简（739号）无论字体还是简牍形式，皆与前述新莽简相同，故可归入新莽组。

### 第三、东汉组

尼雅汉简中是否有东汉简牍，是目前尚待解决的一个难题。王冀青援引《后汉书·西域传》，认为“精绝、且末等国被鄯善并灭之时应在永平四年之后，永平十六年（73年）东汉复通西域之前；《后汉书·西域传》中无精绝国条，其道理便在于此”，进而推测尼雅汉简年代为西汉末至东汉初年。<sup>[29]</sup>然而他的长篇讨论未能解决究竟哪一枚尼雅汉简属于东汉。

孟凡人先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王冀青所言尼雅汉简年代下限尚有可商榷之处。“第一、《后汉书·西域传》无鄯善国传，但鄯善国仍然存在，所以《后汉

书·西域传》无精绝传不是精绝灭亡的铁证。第二、N.XIV.ii.2: ‘廿三, 土, 王立。王禁秦人等见贼藏赋之使者贵人, □□□人戟□□都使者大人,’ 其内容与永平十六年(73)鄯善和于阗为蒙蔽班超而藏匿匈奴使者的情况相似(是时匈奴向西域诸国多派使者进行控制, 参见《后汉书·西域传》, 年代基本相当)。<sup>[30]</sup> 若按他的说法, “王禁秦人”简写于东汉永平十六年。这个说法实难成立。汉简所谓“贼”通常指匈奴, “王禁秦人”简的“贼”亦如此。既然简文称匈奴为“贼”, 说明精绝当时和匈奴处于对立状态, 大概不会和永平十六年鄯善等国为蒙蔽班超而藏匿匈奴使者有什么联系。那么这枚汉简是否为东汉简有待进一步论证。

据文献记载, 东汉尺牍(简)通长一尺, 诏书或用一尺一寸。<sup>[31]</sup> 如前所述, 东汉一尺相当于23.2-23.9厘米, 要比西汉简稍长。我们注意到, “王禁秦人简”和“王姣”简(730-731号)的长度均为23.7厘米。<sup>[32]</sup> 这个尺寸要比尼雅发现的西汉简(756号)的长度(23.1厘米)稍长, 估计采用东汉尺牍(简)制度。在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西汉简之前, 我们姑且将这两枚具有东汉尺牍特征的简牍归入东汉组。

前文提到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在N.XIV遗址发现过佉卢文皮革文书残片(N.XIV. iii. 005)。这件文书采用中亚风格的皮革文书形式, 时代或早于目前所知塔里木盆地最早的佉卢文书——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 因为后者已采用中原风格的简牍文书形式。<sup>[33]</sup> 这个发现或说明N.XIV遗址的最终废弃当在佉卢文传入塔里木盆地时代(插图3)。

早在1963年, 陈梦家就曾提出“西域汉简”的概念, 当时西域汉简名下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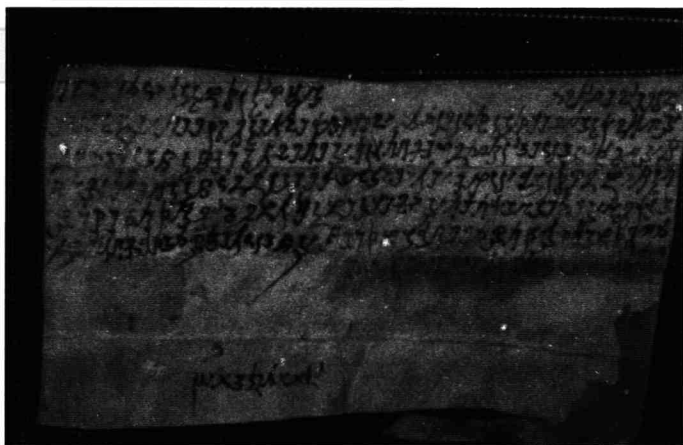


插图3 尼雅出土佉卢文皮革文书, 大英图书馆藏品

1932年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一组楼兰汉简。<sup>[34]</sup> 尼雅汉简的问世，以及近年在和田山普拉古墓地发现的于阗汉简，极大地丰富了西域汉简的内容。<sup>[35]</sup> 据以上讨论，目前发现的尼雅汉简中可判明属于西汉的凡二十枚，可判明属于新莽的凡八枚，可判明属于东汉的只有两枚。从出土地点看，尼雅 N.XIV.iii 号遗址所出 11 简皆为西汉简，尼雅 N.XIV.ii 号遗址所出 22 简既有西汉新莽简，亦有东汉简；尼雅 N.II 遗址发现的 4 简皆为西汉简。尼雅汉简出土地点揭示出，汉代精绝国遗址主要分布于尼雅 N.II 至 N.XIV 遗址一带。

#### 四 敦煌新出汉简中的西域史料

1990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河西走廊西部安西—敦煌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山边发现一个汉代遗址，随即进行大规模发掘，1990—1992年间出土汉简及残纸凡两万五千余件，其中完整或较为完整的簿册多达五十余册。这个汉代建筑群的性质和汉长城烽燧遗址有别，属于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类似于后世的驿站。汉简主要出自悬泉置东南侧早期仓址的废墟物堆积中，时代最早的属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的属于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sup>[36]</sup> 魏晋时期废弃后，悬泉置改作烽燧使用。如果尼雅汉简的730—731号简属于东汉，似不晚于107年。和尼雅汉简内容直接相关的悬泉简有以下五枚：

1) 以食大宛車騎將軍長史 以

2) 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車、渠勒、精絕、扞彌王使者十八人，貴人

□人。

3) 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趙平送自来大宛使者侯，奉獻詣[闕]，□以 以

4) 送精絕王諸國客，凡三百七十人 以

5) 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詔：使甘護民迎天馬，敦煌郡爲駕一乘。傳載，御一人。

御史 / 大夫廣明下右扶風，以次爲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公元前102年冬，李广利破大宛，得汗血马而归。汉武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此后，“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sup>[37]</sup> 史书对此事只有零星记载。例如：

公元前77年，傅介子破楼兰，曾派骏马监出使大宛；公元前66年，冯奉世送大宛诸国客回国，得宛王名马像龙而归。<sup>〔38〕</sup> 据此，悬泉汉简所言汉哀帝建平五年(前2年)大宛使者侯某“奉献诣阙”之物也许是天马。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汉使甘护民迎接的天马也许来自大宛，不一定是报告所言来自敦煌渥洼水。为了避免匈奴劫掠，大宛王送天马到长安取道丝绸之路南道的精绝、楼兰等地，然后经敦煌送天马至长安。那么尼雅出土的“大宛王使”简(729号)有可能写于公元前77、前74、前66或前2年大宛使者献天马之际。

悬泉汉简中还有不少和西域相关的重要史料，主要见于供食文书和乘传驾车簿等。《后汉书·西域传》记汉代河西驿置说“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临西海以望大秦(指罗马帝国)，距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悬泉汉简生动地反映了这个史实。从汉昭帝以后的悬泉简看，经常来往于长安而且和汉廷关系密切的西域王国，有：婼羌、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扞弥、渠勒、于阗、莎车、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犂、尉犂、焉耆、危须、狐胡、车师、卑陆、乌孙、皮山、蒲犂、大宛、大月氏、罽宾、康居、骊軒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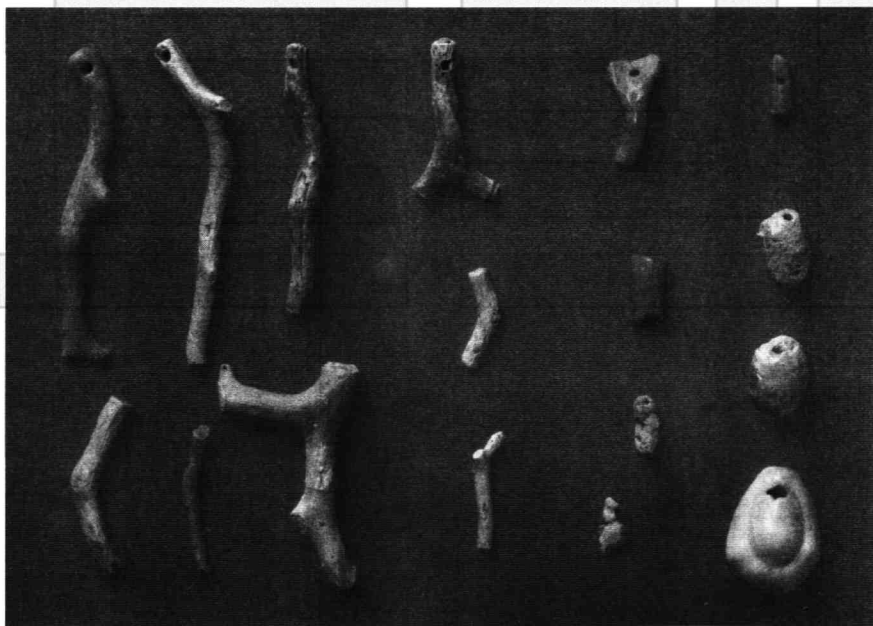


插图4 尼雅出土红珊瑚



和西汉交往的最遥远的王国当属骊靬，见于以下三枚悬泉简。

1. // // 所遣，骊靬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佗。

2. 出粟二斗四升以食骊靬佐单门安将转从者一人凡二人=往来四食=三升(读做：出粟二斗四升，以食骊靬佐单门安，将转从者一人，凡二人。二人往来四食。食三升)。

3. □ 骊靬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年廿七，□□

占家当乘物

□ // //

次女□□□□□□

这三枚汉简属于元、成时期（前48—前7年），正如报告指出的，简文提到的骊靬人均非汉人。不过报告以为骊靬人系罗马人不完全正确。正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指出的，“骊靬”一词译自埃及托勒密王国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城（Alexandria）之名。<sup>[39]</sup>托勒密王国的统治者是希腊人，而下层百姓则是埃及土著居民。亚历山大里亚城素以商业发达而著称，商人足迹遍及东方各地，远至河西走廊。<sup>[40]</sup>汉代为其立县，名曰“骊靬县”（今甘肃永昌县南古城）。<sup>[41]</sup>居延汉简著录了许多汉代流寓中国的黑皮肤西域人。据统计，大约46枚汉简提到了黑皮肤的西域人，主要聚居于河西走廊。<sup>[42]</sup>居延发现的一件过所文书（334.33号），读作：“骊靬万岁里公乘儿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已入，牛车一辆。”<sup>[43]</sup>故知骊靬人中有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埃及人。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屋大维（Gaius Octavius）于公元前30年攻灭托勒密王国，公元前27年建立罗马帝国。于是埃及沦为罗马帝国东方行省之一，亚历山大里亚城则成为罗马东方重镇。因此《魏略·西戎传》说“大秦一号犁靬”。《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珊瑚、琥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珊，珊瑚，色赤，生于海。”段注：“珊瑚有青色者。或云：‘赤为珊瑚，青为琅玕’。”尼雅汉简（718—726号）所记精绝王相互馈赠礼品有琅玕，中日联合考察队在尼雅遗址发现了产自地中海或红海的红珊瑚（插图4）。<sup>[44]</sup>不知是否为大秦国方物。

斯坦因曾在新疆米兰公元3世纪左右的佛教寺院（M.III）内发现罗马绘画风格的壁画，其绘画技法类似于埃及法雍（Fayum）发现的公元2世纪左右的罗马绘画。据米兰壁画题记，画师名叫tita，亦即希腊—罗马人常用名titus的佐卢文拼法。有些研究者对米兰壁画是否为希腊罗马画师所绘表示怀疑。既然骊靬人在河西走廊的

活动从西汉直迄西晋，<sup>[45]</sup> 那么罗马东方行省的画师出访敦煌以西的米兰，并留下画作并非不可能。

尼雅汉简以出土古文字资料揭示了一个重要史实：西域诸国最初使用汉文作为官方文字。尼雅汉隶简属于西汉中期精绝王室之物，那么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使用汉字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末至前1世纪初。尤为珍贵的是，西域汉简中还包括一批古书残简，如楼兰汉简的《论语·公治长篇》、《史记·匈奴列传》、尼雅汉简的《苍颉篇》等。它们为研究中原汉文化在西域的最初传播提供了生动的实例。即便在佉卢文成为西域诸国官方文字以后，汉文化对塔里木盆地诸国仍然颇具影响力，如鄯善、于阗等国流行的佉卢文书往往采用中国文化特有的简牍形式。尽管公元3世纪印度佛教已盛行于塔里木盆地，但是在尼雅出土佉卢文书中居然有一件秦汉古书《日书》的犍陀罗语译本（565号）。<sup>[46]</sup> 看来，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仍然仰慕古老的中原文化。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塔里木盆地成了世界五大文明交织荟萃、争奇斗艳的历史舞台。

(原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 注释:

[1] 林梅村:《汉代精绝国与尼雅遗址》,《文物》1996年第12期,第53-59页;《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九州》第1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1-79页;两文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2] Wang Jiqing, "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 Manuscripts from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xxiv-1, spring, 1998, pp. 23-76.

[3] M.A. Stein, *Serindia*, vol.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219; 此书最近出了汉译本,题为《西域考古图记》,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É.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pp.198-200.

[5]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1914年。

[6] 史树青:《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文物》1962年7-8期合刊,第22-23页。

[7] T. Burrow, "Further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Niya," *BSOS*, IX-1, 1937, pp.111-123.

[8]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1998年,第273-274页。本文所述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主要根据此文。为避

免烦琐,恕不一一出注。

[9] M.A.Stein, *op.cit*, p.219.

[10] T. Burrow. *op.cit*, pp.111-122.

[11] 其中一件文书的编号为N.XIV.ii.1号,这个编号中的“ii”,我们以前误读作ü,应从王冀青之说予以订正。

[12] 王冀青认为,3枚编号为N.II.2-4的残牍(T.O.37)和1枚编号为N.XIV.ii.2的完整简牍(T.O.15)名实不符,怀疑它们实际上采自N.XII号遗址附近。尽管我们反对斯坦因因在新疆沙漠肆无忌惮地发掘古物,但是对他的科学素养不必怀疑。斯坦因的日记和他给的文书出土地点编号可能会有出入,这是田野考古经常发生的事,但是斯坦因不可能给出土文书地点胡乱编号。王冀青这样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13] 上述情况承蒙发现者林永建告知,谨致谢忱。原简照片,参见林永建等编:《梦幻尼雅》,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99页图版。

[14] 王隼:《略说尼雅发现的“苍颉篇”汉简》,《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第55-58页。

[15]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6] 参见沙畹、罗振玉、王国维,前掲书。

[17] 参见王冀青、林梅村、王隼,前掲文。

[18] 《汉书·王莽传》。

[19] 陆锡兴:《简牍“/”号考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第96-97转28页。

[20] 1986-1988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一件大月氏副使供食文书,共出的纪年文书皆在西汉宣成年间。简文提到“大朋属禹一食西域大月氏副使者”(第1328号)。参见吴初骧等编:《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和第133-138页。

[21] 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22] 李均明、刘军,前揭书,第95页。

[23] 李均明、刘军,前揭书,第52-53页。

[24] 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报告》,收入韩翔等编:《尼雅考古资料》,乌鲁木齐,1988年,第6-9页。

[25] 参见李均明、刘军,前揭书,第58页。

[26] 孟凡人:《尼雅N.14遗迹的性质及相关问题》,《中日尼雅遗址学术研讨会发言提要》,乌鲁木齐,2000年,第16页。

[27] 李均明、刘军,前揭书,第53页。

[28] 《汉书·王莽传》。

[29] 王冀青,前揭文,1998年,第282-285页。

[30] 孟凡人,前揭文,第16页。

[31] 《后汉书·光武帝》注引《说文》:“檄,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谓之檄,以征诏也。”同书注引《汉制度》:“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后汉书·陈蕃传》:“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注曰:“尺一谓板长尺一,写诏书也。”《后汉书·光武帝》注引《汉制度》:“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

[32] Wang Jiqing, *op.cit.*, p.40.

[33] 1996年乌鲁木齐召开的“世纪之交古典文学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见马大正、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又见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34] 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收入《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6页。

[35] 王博等:《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第18-19页。该报告称之为“木匣”,不确,当为封检。据碳14年代资料,这枚于阗汉简的年代当在西汉。

[3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报告》,《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并见《文物》2000年第5期,第1-45页。

[37] 《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

[38] 《汉书·傅介子传》和《汉书·冯奉世传》。

[39] P. Pelliot, “L' origine de T'ou-kiue,” *T'oung Pao*, 1915, pp. 687-689.

[40]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3-14页。

[41] 《汉书·地理志》。

[42] 张春树:《居延汉简中所见汉代人的身型与肤色》,《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下册,台北,1967年,第1033-1045页。

[43] 谢桂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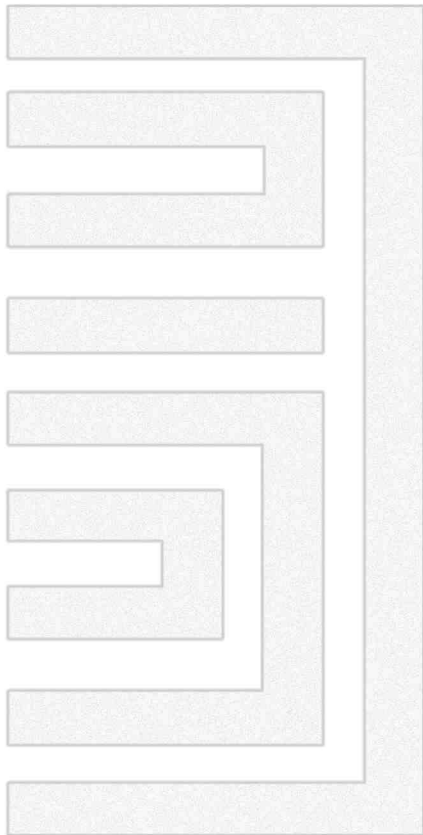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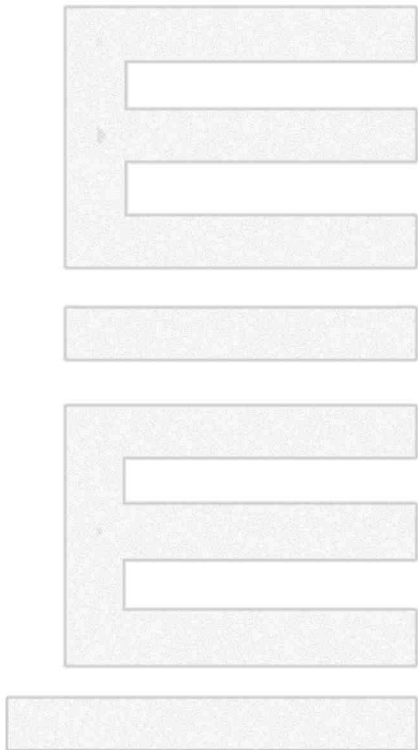
524页。

〔44〕中井真孝、小岛康誉编：《尼雅遗址之谜》，天津，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45〕《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注引《魏名臣奏》曰：“张掖番和、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弃恶诣(毋丘俭)兴。兴皆安恤，使

尽力田。”《晋书·张祚传》记张祚“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

〔46〕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中印文化交流》，收入《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67-368页。



## 《温室洗浴众僧经》残卷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 Stein）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年），重访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尼雅遗址，再获佉卢文（*Kharoṣṭhī*）文书凡232件。<sup>[1]</sup>波叶尔（A.M. Boyer）等欧洲语言学家后来将这批文书编入《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牛津，1927）第2卷。<sup>[2]</sup>由于斯坦因的考察经费由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分摊，这批尼雅收集品后来分散到伦敦和新德里两地；一半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另一半在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本文将要讨论的佉卢文《温室洗浴众僧经》残经，即属于斯坦因这次尼雅考察收集品。其中有两个残片属于这部佛经，一件（编号511）出自尼雅N.XXIV号遗址，现藏大英图书馆东方部（馆藏号Or. 8211/1682）；另一件（编号647）出自尼雅N.XII遗址，现藏印度国立博物馆中亚古物部（前身称中亚古物博物馆）。<sup>[3]</sup>

最先注意这部残经的是英国印度学家拉普逊（E.J. Rapson）。他在《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牛津，1929）第3卷，初步考证了尼雅出土第511号文书正面（以下简称511r）的内容。他首先解读了 *jamḍāka-sātra* 一词，指出该词即梵语版《撰集百缘经》（*Avadānaśataka*）提到的 *jenatāka-snātra*-（蒸气浴），<sup>[4]</sup>进而发现文书抄写的是一些佛教偈颂，内容涉及对佛寺内众僧沐浴和布施行善的热情赞美。该文书背面还抄有一个佛教律部（*Vinaya*）文献，可惜过于残破无法释读。至于511r文书的语言，拉普逊归类为混杂俗语的佛教梵语。<sup>[5]</sup>美国梵学家爱哲顿（F. Edgerton）后来将这类中亚佛教用语定名为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佛教混合梵语）。<sup>[6]</sup>

1940年，牛津大学教授巴罗（T. Burrow）将511r和647号文书抄写的佛教残经译成英文，收入《中国突厥斯坦所出佉卢文译文集》一书。<sup>[7]</sup>尼雅出土佉卢文佛典，近年引起日本佛学界的极大兴趣。龙谷大学莲池利隆先生和创价大学岩松浅夫教授相继撰文，讨论尼雅出土佉卢文佛经，为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sup>[8]</sup>



然而，上述研究者都不知道 511r 和 647 号文书究竟属于哪一部佛典。

我们最近重新研究了 511r 文书，发现和第 647 号文书抄写的佛经属于同一部佛典。其内容与东汉安世高译《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最为接近。更为深入的调查使我们相信，尼雅出土的这两部佉卢文残经，可能是《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的犍陀罗语版，经名可根据 511r 残经所见词汇，拟作 \**Jaṃḍāka-sātra-ganuktama-sūtra* (= 梵语 *Jantāka-snātra-gaṇottama-sūtra*)。本文拟分佉卢文残经的语言与定名、罗马字转写和翻译、词汇三节，介绍我们的发现和初步研究。由于我们不是佛学领域的研究者，本文只侧重于文字解读和语言分析。至于经文内容方面更为深入的讨论，则有待佛学领域的专家们参与。<sup>[9]</sup>

## 一 佉卢文残经的语言与定名

第 511r 文书使用何种语言拼写？迄今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我们认为，这件文书的基础语言(the basic language)仍是犍陀罗语，但是它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强烈影响。第一个影响来自梵语。<sup>[10]</sup>正如拉普逊注意到的，511r 文书大量使用犍陀罗语所没有的长元音，如 *sātra*、*gātra*、*prahīna* 或 *ekābhirāma* 等。一些地方采用梵语才有的连声 (*sandhi*) 乃至梵语的送气音 (*visarga*)。该文书至少三处使用了梵语才有的连声：

*yadriṣa' tma* = *yadriṣa atma* (647.3a-b)

*prahīna-doṣāpagatena* = *prahīna-doṣā apagatena* (511r.8b)

*te pi* = *te api* (511r.6a)

至少三处使用了梵语才有的送气音：

*stha' irača* = *stha' iraśca* (511r.7a)

*navakača* = *navakaśca* (511r.7a)

*sasyača* = *sasyaśca* (511r.12b)

511r 文书下面还有几行字，与经文无关。其中部分内容是某比丘团写给精绝州长勤军 (*ṣamaṣenan*) 和伏果 (*puḡo*) 的书信的底稿。勤军和伏果曾任鄯善王摩习梨 (*Mahiri*) 时期精绝 (即今尼雅) 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cozbo*)，活动年代大致在东晋时期<sup>[11]</sup>，正是法显西行印度的年代 (约 4 世纪初)。法显赴印度途中，

经过鄯善国，见到丝绸之路南道诸国，“唯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sup>[12]</sup> 所谓天竺书就是婆罗谜文 (Brāhmī)，天竺语则指梵语 (Sanskrit)。这个记载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 511r 文书会受梵语的强烈影响。

另一方面，这件文书的语言还受到尼雅本地土著语言——吐火罗语 (Tokharian) 的影响。许多词汇含有颇具吐火罗语特点的变元音 (umlaut)<sup>[13]</sup>，如 *viśūḍha* (= 梵语 *viśuddha*)、*ūtama* (= 梵语 *uttama*)、*subhādra* (= 梵语 *subhadra*) 等。一些词汇使用吐火罗语特有的名词后缀 *-mca*，如 *ciraṃca* (= 梵语 *cira*)、*pratyekabudhaca* (= 梵语 *pratyekabuddha*) 和 *samaṃca* (= 梵语 *sama*) 等。耐人寻味的是，511r 文书频繁出现的一个词 *ūktama* 或 *-uktama* (见复合词 *ganuktama*)。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该词相当于梵语 *uttama* (最上) 或于阗塞语 *ustama* (最上)。我们知道，印度伊朗语 s 相当于吐火罗 k，如吐火罗语的 *kante* (一百) 相当于梵语的 *śata* (一百)。<sup>[14]</sup> 所以 511r 文书的 *ūktama* 或 *uktama* 应是一个具有吐火罗语发音特点的词汇。<sup>[15]</sup>

尽管 511r 文书受到梵语和吐火罗语两方面的影响，但是该文书的语言应视为犍陀罗语。因为该文书绝大部分，尤其是基础语言仍是犍陀罗语，而非佛教混合梵语。这个问题从下文对这个残经所属部派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们还注意到，511r 文书频繁出现的 *jaṃḍāka* 在汉译佛典中译作“暖房”<sup>[16]</sup> 或“温室”，那么 *jaṃḍāka-sātra* (见 511r) 或其简称 *sāna* (见 647) 意为“温室浴”。佛门之浴分浴佛 (洗浴佛像) 和浴僧 (澡浴众僧) 两类，“温室浴”则属于浴僧。这个发现相当重要，使我们初步判定两残经应和《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有关。于是按图索骥，从东汉安世高译本中找出大量与之相同或相似的偈颂和经文。<sup>[17]</sup>

《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简称《温室经》，是佛世尊与印度神医耆域的对话录，内容主要为印度神医耆域向佛请教如何通过沐浴，治疗百病，修身养性，从而获取功德。第 647 号文书正是佛世尊 (*nayaḡa*) 和耆域 (*jivaka*) 两人关于沐浴众僧的对话录。第 647 和 511r 文书一共 13 首偈颂，其中 8 首可在《温室经》中找到相同或相似内容。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温室经》中相关偈颂排列在这 8 首偈颂译文之下。本文所引旧译皆出自安世高译本 (详见文末附录)。两者比较如下：

No. 647

3a tasya śrutva avayati nayaḡa jivaka apa | rimāna te guna /

译文：“请听我说法！”佛世尊开导耆域说，“这可是功德无量啊！”

旧译：“其福无量，一心谛听！吾当为汝先说澡浴众僧反报之福。”佛告耆域(经文上：4)。

3b śāna kṛtvā tu viraka yadriśa | atma<sup>2</sup> śrunahi parituṭṭhu mānasa // 3 //

译文：“请洗浴众僧吧！保持清洁，这样的身体，才能令人从内心欢喜众僧。”

旧译：“如是供养，便得七福……身体常香，衣服洁净，见者欢喜，莫不恭敬。”

(经文上：4)

林按：偈颂 3a-b 和旧译第一个偈颂也非常相似。其文曰：“道德无限量，谛听次说之；夫人生处世，端正人所敬；体性常清静，斯由洗众僧。”

No. 511r

1a viśudha-cakṣu bhavati prabhasvara viśudha-gātra sukhumāla-suchavi /

译文：谁要想眉清目秀，容光焕发，身体洁净，肌肤润泽，

旧译：“所生清静，面目端正，尘水不着。”(经文上：4)肌体润泽，

1b ciraṃca āyu labhati anālpakaṃ karomti yo śātra ganuktamasya // 1//

译文：寿比南山，无人可比，谁就得洗浴众僧。// 1//

旧译：“独步无双”(经文上：4)，“端正寿延长，斯由洗众僧”(偈颂：5)。

2a na tasya gaṃḍa piṭakā bhavaṃti śilipataṃ taṭi vicārcikaṃ vā /

译文：谁要想不得水肿，不生溃疡，不起湿痹，不得佝偻病，不长毒疮(经文上：4)，

旧译：“一者四大安隐，二者除风病，三者除湿痹，四者除寒冰，五者除热气”，

2b suci-sugaṃḍha labhati sa āśraya karomti yo śātra ganuktamasya // 2//

译文：洁白清静，体散芳香，身体健康，谁就得洗浴众僧。// 2//

旧译：“身体常香，衣服洁净”(经文上：4)，“所生常安，勇武丁健”(经文上：4)，“斯由洗众僧”(偈颂：5)。

林按：《温室经》没有和偈颂 2a 完全相同的句子，但是经文提到，洗浴众僧可除七病，前五个病名和偈颂 2a 提到的病名大致相当。为便于比较，我们把这五个病名的旧译列在这里。

3a viśāla-netra bhavati prabhasvara suvarṇa-gātra abhirūpa-darśani/

译文：谁要想目大有神，容光焕发，身如金色，容貌端庄，

旧译：“身体轻便，眼目精明”(经文上：4)，“金体玉为璲，尘垢不着身”(偈颂：9)，

3b samamca-pādo utarā prasamṭhita karomti yo sātra ganuktamasya // 3//

译文：正足更胜一筹，获得降流相，谁就得洗浴众僧。// 3//

旧译：“圆光相具足，斯由洗众僧”(偈颂：9)。

林按：偈颂3b前两句不太明白含义，只能按照字面来翻译。这两个句子在《温室经》中似作“圆光相具足”。

4a imasmi dāna vara dāna-uktama jamdāka-karma śukrya-nidarśana /

译文：向众僧布施甚好，最好的布施是温室浴，必功成名就。

旧译：“斯造温室浴，洗僧之福报”(偈颂：3)；“功成志就，遂致作佛”(经文上：5)。

5a pratyekabudhaca vivegaṃ āśrta ekābhirāma girikaṃtarālaya /

译文：辟支佛离家隐居，独自寻乐，居山野洞窟，

旧译：“梵魔三钵天，净居修自然”(偈颂：8)。

5b svakartha-yuktaśamathe gune rata // 书文编号 //

译文：洁身自好；为上涅槃之道，乐善好施。

旧译：“梵行修洁己，志淳在泥洹”(偈颂：8)。

林按：偈颂5a的辟支佛，《温室经》作“梵魔三钵天”(=梵语 brahmāsahampati)，其余大致相同。

9a imasmi jamdāka malaprakarṣana-pradāyaka sāpaka ta' ila-dāyaka /

译文：凡是向众僧提供温室浴和皂膏的人、搓澡的人、提供油膏的人，

旧译：“一者然火，二者净水，三者澡豆，四者苏膏，五者淳灰”(经文上：4)，

9b ye lābha-jamdaka dadāti śuśkaka bhavaṃtu nirdoṣa malaprahina // 441 //

译文：以及供养众僧和提供温室浴的人，不遭灾惹祸，一尘不染。// 9 //

旧译：“供养众僧，无量福田，旱涝不伤”(经文上：5)。

林按：《温室经》没有和偈颂9a完全相同的句子，但是提到洗浴众僧用七物，其中前五物和偈颂9a提到洗浴用具大致相当。为便于比较，我们把旧译名列在这里。

10a vihāraṃ asmi anurakta r(ā)kṣasa tathāgate dharma guṇe ca ūtama /

译文：恶魔寻欢作乐之所，远不如如来的法与德。

旧译：佛为三界尊，修道甚苦勤(偈颂：9)。

10b malā-prakarṣeṇa prasaṃna-mānasa karṃti ta rakṣya manuḷāna dharmiya //10//

译文：他坐禅入静，躲过多次劫难；在神的保护下，终于修成正果。

旧译：积行无数劫，今乃得道真(偈颂：9)。

11a avici heṭṭha upari bhavāgra atrāṃtare ye upapaṃna satva /

译文：但愿上至天顶下至地狱，此时此刻降生的众生，

旧译：“愿令众生”，

11b tathāgatānaṃ upagaṃmya śāsane karṃti jāti-maranasya aṃta // 10 1 //

译文：都听从如来佛们的教诲，告别前生，迎接新生。// 11//

旧译：“唯佛圣旨，不忽所愿”(经文上：5)。

从以上比较不难发现，《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的汉译本和犍陀罗语本不尽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佛典的编纂有部派之分，不同部派编写佛典，有时主题相同，但是经堂用语乃至内容则不完全相同。例如：巴利文《法句经》、犍陀罗语《法句经》、梵语《法集要颂经》以及俗语《法句经》本系同一佛典，由于分属不同部派，经堂用语和经文却不尽相同。安世高的汉译本可能来自梵语或其他胡语本，和犍陀罗语《温室洗浴众僧经》分属不同部派，因而采用不同语言文字，内容亦有差别。

有证据表明，犍陀罗语是小乘佛教法藏部的经堂用语，尽管其他佛教部派也曾使用犍陀罗语在中亚传教。法藏部(Dharmagupta)，亦名昙无鞞多、昙无德、法密部等。关于法藏部佛典的编纂方式，梁慧皎撰《高僧传·释僧佑传》引《大集经》云：“我灭度后，遗法分为五部。颠倒解义，隐覆法藏，名昙无鞞多，即昙无德也。”<sup>[18]</sup>北凉昙无讖译《大方等大集经》卷22译作：

憍陈如！我涅槃后，有诸弟子受持如来十二部经。书写读诵，颠倒解义，颠倒宣说，以倒解说，覆隐法藏以覆法，故名昙摩鞞多。<sup>[19]</sup>

所谓“书写读诵，颠倒解义”指法藏部使用佉卢文书写，因为佉卢文的书写方式是从右至左，恰好和婆罗谜文从左至右的书写方式相反。<sup>[20]</sup>所谓“颠倒宣说，以倒解说，覆隐法藏以覆法”，是指法藏部经典的内容编排和其他部派的编排方式不

同。例如：巴利文《法句经》将《梵志品》排在最后一品，而法藏部的犍陀罗语《法句经》则将《梵志品》排在第一品。<sup>[21]</sup> 凡此表明，犍陀罗语《温室洗浴众僧经》属于法藏部传本，因而和来自梵语或其他俗语本的安世高汉译本不同。

据我们初步调查，在汉译佛经史上，至少流传过两三个不同系统的《温室洗浴众僧经》，如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著录的失译人《浴僧功德经》和刘宋僧伽跋摩译《请圣僧浴文》，可惜今已失传。<sup>[22]</sup> 犍陀罗语《温室洗浴众僧经》的发现，为我们了解不同部派的《温室洗浴众僧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 二 罗马字转写和翻译

第647号文书的照片，刊于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报告《西域考古记》第4卷图版XXIII；第511号文书的照片，刊于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报告《西域考古记》第4卷图版XXV和波叶尔等人编《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第2卷图版VIII。根据这些图版，并参考巴罗和岩松浅夫等学者的研究，我们重新校勘这部残经。由于647号文书出自《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的前半部经文，511r文书则主要出自此经后半部的偈颂。因此，我们把647号文书排在前面，而把511r文书排在其后。（参见插图1和2）

我们的罗马字转写采用拉普逊的体系，但是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对其中一些错误作了修订，如cā改读kṣa；ḍa改读ḍa；ai改读a'i等。<sup>[23]</sup> 此外，511r文书的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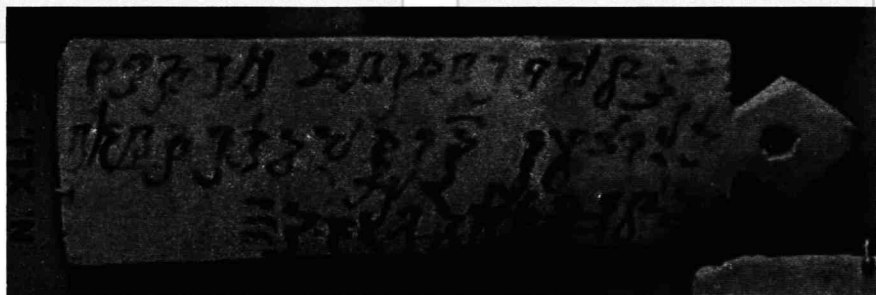


插图1 尼雅出土第647号文书，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中亚古物部藏品



些元音字母下面标有一个类似“-”的符号，正如拉普逊指出的，这是一个表示变元音(the modification of vowel)的符号。<sup>[24]</sup> 所以我们把带有这个符号的 -u 转写为变元音 -ü，而把带有这个符号的 -a 转写为变元音 -ä。缩略语表列在本文之末，其余凡例如下：

//1// 该符号内的阿拉伯数字是文书自身编号。

1a 或 2b 为便于比较研究，我们把每颂分为两节。1a 表示第 1 颂上半节，2b 表示第 2 颂下半节，标在每行之前。

- | 表示文书原来换行的地方。
- ( ) 圆括号内是模糊不清的字母。
- [ ] 方括号内的是后来补入的字母。
- 原文是圆点，表示和上一个字母连读。
- r 文书正面(recto)
- v 文书背面(verso)

1. 罗马字转写

[Jaṃḍāka-sātra-ganuktama Sūtra]

No. 647

3a tasya śrūtva avayati nayāga jivaka apa | rimāna te guna /

3b sāna kṛtvā tu viraka<sup>1</sup> yadriśa<sup>2</sup> tma<sup>2</sup> śrunahi parituṭṭhu mānasa // 3 //

林按：此文书背面无字。

<sup>1</sup> 波叶尔等人转写作 vivaka。

<sup>2</sup> 波叶尔等人转写作 · tvaṃ 或 · tuṃ；岩松浅夫复原作 [he]tuṃ。我们认为，该字应和上一行连读作 yadriśa<sup>2</sup> tma (= yadriśa atma)。

No. 511r

1a viśūḍha-caḅṣu bhavati prabhasvara viśūḍha-gātra sukhumāla-suchavi<sup>1</sup> /

1b ciraṃca<sup>2</sup> āyu labhati anālpakaṃ karomṭi yo śātra ganuktamasya //1//

2a na tasya gaṃḍa-piṭakā bhavaṃṭiśilipataṃ taṭi<sup>3</sup> vicārcikaṃ vā<sup>4</sup> /

2b suci sugaṃḍha labhati sa āśraya karomṭi yo śātra ganuktamasya<sup>5</sup> //2//

3a viśāla-netra bhavati prabhasvara suvarna-gātra abhirūpa-darśani | /

- 3b samañca<sup>6</sup>-pādo utarā prasamñhita karomñti yo sātra ganuktamasya //3//  
 4a imasmi dāna vara dāna-ūktama<sup>7</sup> jaṃḍāka-karma śukṛya-nidarśana<sup>8</sup> /  
 4b tathāgatānaṃ bhavatu hiterśina-jināna pūjā paramārtha-darśana //4//  
 5a pratyekabudhaca<sup>9</sup> vivegaṃ āśrīta ekābhirāma girikaṃtarālaya /  
 5b svakartha-yukta śamathe gune rata teṣaṃ pi pūjā bhavatu svayaṃ-bhu(na)

//4 1//

- 6a koḍinya-gotra prathamanaśrāvaka teṣaṃ ca yo āsi subhādra paçima /  
 6b etasmi abhyaṃdare ya atita jinorasa te pi bhavaṃtu pujita //42//  
 7a imasmi dāna g[u]na-rāya-ūta<sup>10</sup> stha'iraçā<sup>11</sup> madhya navakaça<sup>12</sup> bhikṣu  
 7b aprāpta tiṣu anubhoṃtu utsuka prāpteṣu bhoṃtu satata viśārata //4 3//  
 8a imasmi yo bhikṣu g[u]ne upasthita | jaṃḍāka-sātra guru-prema gārava/  
 8b vyāvuca karmana bhavaṃtu nirmala prahīna-doṣāpagatena<sup>13</sup> cetasa //4 4//  
 9a imasmi jaṃḍāka mala-prakarṣana-pradāyaka śāpaka ta'ila-dāyaka /  
 9b ya lābha-jaṃḍāka dadātiśuṣkaka bhavaṃtu nirdoṣa mala-prahīna //4 4 1//  
 10a vihāraṃ asmi anurakta r(ā)kṣasa tathāgate dharmā gune ca ūta /  
 10b malā-prakarṣena prasamñna-mānasa karomñti ta rakṣya manujāna dharmiya  
 //10//  
 11a avīci heṭha upari bhavāgra atrāntare ye upapaṃna satva /  
 11b tathāgatānaṃ upagaṃmya śāsane karomñti jāti-maranasya aṃta //1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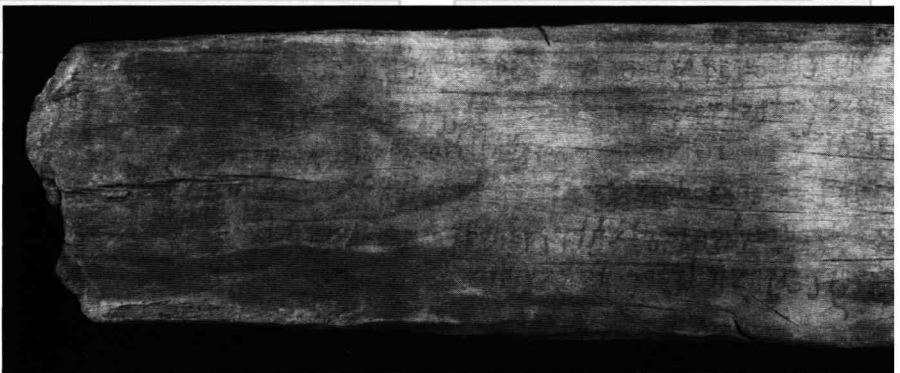


插图 2 尼雅出土 511r 文书，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藏品

12a *sataṃ subhikṣu bhavatu samākula| iṃdraṃ vivṛdhi abhivaṛṣa(n)u<sup>14</sup>-makhi /*

12b *udemtu sasya<sup>15</sup>jayāya pāṛthiva ciraṃca<sup>16</sup> dharma sugatasya tṣṭhatu //102//*

林按：511r下面还有几行文字，与经文无关。其中部分内容是某比丘团写给精绝州长勤军(śamaśenan)和伏果(pugo)的书信底稿。此文书背面是一个残破的佛教律部文献。

1 波叶尔等人读作 *suchati*，巴罗读作 *suchavi*。

2 *-mca* 为俗语后缀，故波叶尔等人的 *ciraṃ ca* 应读成一个词。

3 波叶尔等人读作 *tatri*。

4 波叶尔等人读作 *nā*；岩松浅夫读作 *vā*。

5 波叶尔等人读作 *ganuktam asya*；巴罗读成一个词 *ganuktamasya*。

6 *-mca* 为俗语后缀，所以波叶尔等人的 *samaṃ ca* 应读成一个词，参见注2。

7 *dāna-ūktama* 应读成一个词，比较 *ganuktama-*。

8 波叶尔等人读作 *jaṃdāka-karma ṣukṛya-nidarśana*，巴罗和岩松浅夫读作 *jaṃdāka-karmaṣu kṛya-nidarś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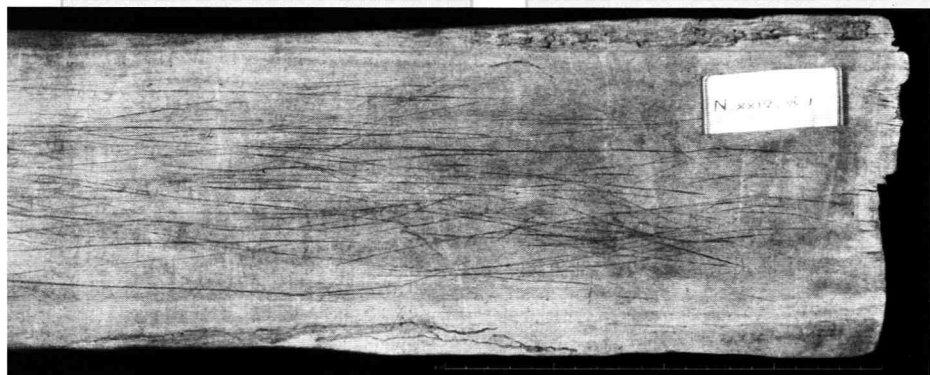
9 - *ca* 为俗语后缀(= *-mca*)，故波叶尔等人的 *pratyekabudha ca* 应读成一个词。

10 波叶尔等人的 *g[lu]na rāya ūtama* 应读成一个词，比较 *ganuktama-*。

11 波叶尔等人的 *stha' ira ḥa* 应连读作 *stha' iraḥa*(= *stha' iraśca*)。

12 波叶尔等人的 *navaka ḥa* 应连读作 *navakaḥa*(= *navakaś ca*)。

13 波叶尔等人读作 *prahīna doṣā pagatena*；岩松浅夫读作 *prahīna doṣā'*



pagatena。其实，此句使用了连声，= prahīna-doṣā apagatena，比较647号文书的 yadriśa' tma(= yadriśa atma)。

14 波叶尔等人读作 abhivaṛṣatu。

15 波叶尔等人的 sasya cā 应连读作 sasyācā(= sasyāś ca)。

16 -mca 为俗语后缀，故波叶尔等人的 ciraṃ ca 应读成一个词，参见注2。

## II. 译文

《温室洗浴众僧经》

No. 647

3a 译文：“请听我说法！”佛世尊开导耆域，“这可是功德无量啊！”

3b 译文：“请洗浴众僧吧！保持清洁，这样的身体，才能令人从内心欢喜众僧。”

No. 511r

1a 谁要想眉清目秀，容光焕发，身体洁净，肌肤润泽，

1b 寿比南山，无人可比，就得洗浴众僧。

2a 谁要想不得水肿，不生溃疡，不起湿癣，不得佝偻病，不长毒疮，

2b 洁白清静，体散芳香，身体健康，谁就得洗浴众僧。

3a 谁要想目大放光，容光焕发，身如金色，容貌端庄，

3b 双腿挺拔，谁就得洗浴众僧。

4a 向众僧布施甚好，最好的布施是温室浴，必功成名就。

4b 请供养如来、有善意的人和至真们吧！必达最胜谛观。

5a 辟支佛离家隐居，独自寻乐，身居山野之窟，

5b 洁身自好，乐善好施，旨在涅槃之道，请供养辟支诸佛吧！

6a 那个出身憍陈如家族的人属于第一批佛弟子，而苏跋陀罗是最后一位。

6b 他们随时光的间歇而逝去，让佛的得意门生得到供养吧！

7a 请一心供养最胜功德王、长老、中年和小比丘们，

7b 以及将获而未获(功德)的人吧，祝他们得到热情持久、无私无畏的供养！

8a 祝愿有功德的、经过温室洗浴的、敬爱法师的、尊贵的比丘们，

8b 勤修行，获解脱，清静无垢，无失无过，心灵获得解脱。

9a 凡是向众僧提供温室和皂膏的人、搓澡的人、提供油膏的人

9b 以及供养众僧和提供温室浴的人，不遭灾惹祸，一尘不染。

10a 恶魔寻欢作乐之所，远不如如来的法与德。

10b 他坐禅入静，躲过多次劫难；在神的保护下，修成正果。

11a 祝愿上至天顶下至地狱，此时此刻降生的众生们，

11b 听从如来佛的教诲，告别前生而获新生。

12a 祝果实丰收而饱满！祝天帝释多加降雨的神丹妙药！

12b 并祝愿五谷丰登！祝国王多打胜仗！祝永守善逝之法！

### 三 词汇

拉普逊在《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第3卷，最先讨论了511r和647号文书的部分词汇（*KI.III*, 329 – 379），后来巴罗在《中国突厥斯坦所出佉卢文书的语言》一书分析过部分词汇（*LKD*. 71 – 134）。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研究，是岩松浅夫的近年发表的讨论511r文书的论文（岩松浅夫2001年：177 – 183）。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两件文书出现的词汇综合分析如下：

#### No. 647 词汇

aparimāna: 3a, “无限的”，《温室经》译作“无限量”。梵语作 *aparimāna*，旧译“广大、无量，不可度量”。（《梵和大辞典》95）

avayati: 3a, “指导，开导，开化”，由前缀 *a-*（= 梵语 *ā-*）和 *-vayati* 构成，后者相当于梵语 *vahati* “指导，引导”（*SED*. 933；《梵和大辞典》1185）因为梵语 *ha* 在犍陀罗语中或作 *ya*。例如：梵语 *viharin* 在犍陀罗语中或写作 *viyari*。所以 *avayati* 相当于《温室经》的“告”或“说”。巴罗的《中国突厥斯坦所出佉卢文书译文集》译作 *go away* “走开”（*TKD*. 134），似不确。

*krtvā*: 3b, “应做”，动词 *kr* 的动形容词 (*gerundives*，参见 *LKD*. 48)。

guna: 3a, “利益”，《温室经》译作“道德”。梵语作 *guṇa*，旧译“功德”（《梵和大辞典》427）。

*jivaka*: 3a, 印度神医的名字，梵语作 *jivaka*，旧译“耆婆，耆域，祇域”（《梵和大辞典》506）。

*tasya*: 3a, “他，这个”，这里指佛准备宣讲的法。指示代词 *ta-* 的单数属格形

式(LKD. 33)。《温室经》译作“吾当为汝先说澡浴众僧反报之福”；《温室经疏》作“佛为说法”。

tu: 3b, “只有, 唯有”,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542)。

tu viraka yadriśa=atma śrunahi parituṭhu mānasa: 3b, “只有净化身心, 这样才能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温室经》译作: “夫人生处世, 端正人所敬, 体性常清静。”

te: 3a, “他, 这个”, 这里指沐浴众僧。指示代词ta-的单数依格形式(LKD. 33)。

nayaḡa: 3a, “导师”, 这里指佛世尊, 梵语作 nāyaka (《梵和大辞典》669)。

parituṭhu: 3b, “非常喜欢”, 梵语作 parituṣṭa, 旧译“甚大欢喜”(《梵和大辞典》802)。

mānasa: 3b, “心, 意”,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1032)。

yadriśa'tma: 3a-b, = yadriśa atma “这样的身体”, 词形同梵语 yādriśa=ātman (SED. 851 和 135)。后一成分ātman, “自身”, 旧译“己身”(《梵和大辞典》188)。

viraka: 3b, “清心寡欲”, 《温室经》译作“体性常清静”。梵语作 virāga, 旧译“不染欲、离贪欲”(《梵和大辞典》1238)。

śrutva: 3a, “请听”, 动词śru的动形容词, 《温室经》译作“谛听”, 《温室经疏》作“一心听法”。梵语作 śrutvā或śrunitva, 旧译“闻”(《梵和大辞典》1358)。

śruna-: 3b, “听讲而获知识”, 梵语作 śravaṇa, 相当于 śravaka “佛弟子”或 śramaṇa “沙门”(SED. 1096)。śrunahi 是其复数为格形式。

sāna: 3b, “沐浴”, 佛门之浴有浴僧、浴佛两类, 这里指浴僧, 故《温室经》译作“洗众僧”。正如拉普逊指出的, 该词读作 snāna, = 梵语 snāna (KI.III, 379; 《梵和大辞典》1522)。

#### No. 511r 词汇

atita: 6b, “逝去”, 词形同梵语, 旧译“过去, 过去世”(《梵和大辞典》26)。

atrāntare: 11a, “此时此刻”, 梵语作 atrāntare (《梵和大辞典》28)。

aṃta: 11b, “终结”, 梵语作 anta (《梵和大辞典》71)。

anālpakaṃ: 1b, “很少”, 梵语作 analpa (《梵和大辞典》46), 指“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温室经》译作“独步无双”。

anu-bhoṃtu: 7b, 连系动词 anu-bhū的命令语气。(Imperative) 第三人称复



数（《梵和大辞典》966；LKD. 45）。

anurakta: 10a, “乐, 喜欢”,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64）。

apagata: 8b, “灭尽, 远离”,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80）。-ena 是单数具格语尾。（LKD. 22）

aprapta: 7b, “未获, 未到达”,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97）。

abhirūpa-darśani: 3a, “端正的样子”, 梵语作 abhirūpa-darśana（《梵和大辞典》108 和 570）。

abhivaṛṣa(n)u-makhi: 12a, “下雨的神丹妙药”。其中前一成分, 梵语作 abhivaṛṣaṇa（《梵和大辞典》109）。正如岩松浅夫指出的, 该词后一成分, 相当于梵语 maghi（岩松浅夫 2001: 175; 《梵和大辞典》984）, 而非拉普逊建议的 makhe。（KI.III, 361）

abhyamdare: 6b, “时光的间歇”, 梵语作 abhyantara（《梵和大辞典》114）。-e 为单数依格语尾。

avīci: 11a, “地狱”, 旧译“阿鼻、地狱”,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154）。

asmi: 10a, “其中”, 梵语作 asmin（《梵和大辞典》175）。

āyu: 1b, “寿命”,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203）。

āśraya: 2b, “有依靠的”, 指身体健康, 梵语亦作 āśraya（《梵和大辞典》216）。

āśṛta: 2b 和 5a, “居住”, 梵语作 āśṛta 或 āśrita, 旧译“依止”（SED.158 和《梵和大辞典》216-217）。

āsi: 6a, 拉普逊认为, 该词相当于印度俗语 asit “曾经是”, 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该词亦见尼雅 625 号文书, 相关句子读作: (purva) cozbo kolji(na s)ādha (r) ājadharaḡaāsi “前任州长柯利那曾经负责这件事”（KI.III, 334, KI.III, 235 和 TKD, 130）。

iṃdraṃ: 12a, “因陀罗, 帝释天”, 梵语作 indra（《梵和大辞典》227）。

imasmi: 4a, 7a, 8a 和 9a, “其中”, 梵语作 asmin（KI.III, 334; 《梵和大辞典》175）。

utarā: 3b, “更好, 更胜一筹”, 梵语作 uttara（《梵和大辞典》243）。

utsuka: 7b, “热情”,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249）。

udeṃtu: 12b, “祝愿成为”, 动词 ude(字根为 ud+ā+i-) 的命令语气复数第三人称（LKD. 45）。

upagaṃmya: 11b, “接近, 得到”, 梵语作 upagamyā (《梵和大辞典》262)。

upapaṃna: 11a, “降生, 坠落”, 梵语作 upapanna (《梵和大辞典》267)。

upari: 11a, “上方, 其后”,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270)。

upasthita: 8a, “住, 受”,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275)。

-ūktama: 4a, = ūtama “最好的”, 亦见 ganuktama- (=ganauktama), 于阆塞语作 astama。由于吐火罗语的 k 相当于印度伊朗语的 s, 所以 ūktama 可能是个前吐火罗语词。

ūtama: 10a, “最好的”, 梵语作 uttama, 旧译“最上, 第一”(《梵和大辞典》243); 犍陀罗语作 -utama, 见于大英图书馆收集品残片 5 C sarvasatvutamam “超越一切众生”(Salomon 1999: 39)。

ekābhirāma: 5a, “独乐”,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108)。

etasmi: 6b, “其中”, = eta asmin, 参见上文 asmin 的讨论。

karmana: “修行”, 正如岩松浅夫指出的, 该词相当于梵语 karman (岩松浅夫 2001: 181; 《梵和大辞典》323)。

karomti: 1b, 2b, 3b, 10b 和 11b, “他们做”, 字根和语干相当于梵语的 kr/ karo-, 旧译“修, 行”(《梵和大辞典》366-367)。

koḍinya-gotra: 6a, “僑陈如家族的人”。正如拉普逊指出的, 该词前一成分相当于梵语 kaṇḍinya (*KI.III*, 340; 《梵和大辞典》382), 是佛弟子的名字; 后一成分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436)。

gaṃda: 2a, “水肿, 腹水”, 正如岩松浅夫建议的, 该词相当于梵语 gaṇḍa “甲状腺肿大, 疮”(岩松浅夫 2001: 179)。

ganuktama: 1b, 2b 和 3b, “最上僧, 众僧”, 正如巴罗指出的, 该词相当于梵语 gaṇottama (=gaṇa uttama)。ganuktamasya 是其单数属格形式 (*TKD*. 101)。

gārava: 8a, “尊重”, 正如拉普逊指出的, 该词相当于梵语 gaurava (*KI.III*, 342; 《梵和大辞典》440)。

giriḅaṃtarālaya: 5a, “山野之窟”, 由 giriḅaṃtara (山泽) 和 -ālaya (洞窟) 构成。其中前一成分, 梵语作 girikandara; 后一成分 -ālaya,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210)。

gune: 5b, 8a 和 10a, “功德”, 正如拉普逊指出的, 该词相当于梵语 guṇa (*KI.III*, 342; 《梵和大辞典》428)。-e 为单数依格语尾。

g[u]na-rāya-ūtama: 7a, “最胜功德王”, 梵语作 guṇa-rāja (功德王) 或 guṇa-rāja-prabhāsa (功德光明王), 指佛世尊 (Burrow1940: 101; 《梵和大辞典》428)。

guru-prema: 8a, “尊敬法师的人”,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428和899)。

ca: 6a和10a, “和”, 连词,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451)。

ciraṃca: 1b和12b, “长久”, 梵语作 cira (《梵和大辞典》474)。-ṃca 是俗语名词或形容词语尾, 屡见尼雅文书 (LKD. 31)。

ciraṃca-āyu labhati: 1b, “获得长寿”, 《温室经》译作“端正寿延长”。

cetasa: 8b, “心灵, 意志”, 梵语作 cetas (《梵和大辞典》478)。

jaṃḍāka: 9a, “蒸气浴”, 正如拉普逊指出的, 该词相当于梵语 jenaṭāka, jentaṃ, jentaḥ (KI.III, 346; SED. 424) 或 jontaka, 旧译“暖房” (《翻译名义大集》595: 9289号; 《梵和大辞典》509)。我们注意到, 该词还相当于《温室经》所谓“温室”。佛书常提到“温室”, 如后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四(初诵之四)《十三僧残法之余》记“大舍者: 温室、凉室、殿堂、楼阁、一柱舍、重舍, 乃至容四威仪, 行立坐卧” (《大正藏》卷23第1435号)。

jaṃḍāka-karma: 4a, “做温室浴”。其中后一成分, 梵语作 karman, 旧译“业, 结果, 仪式” (《梵和大辞典》323)。

jaṃḍāka-sātra: 8a, “蒸气浴式沐浴, 温室浴”, 分别见 jaṃḍāka 和 sātra 的讨论。

jayāya: 12b, “胜利者”, 梵语作 jayin (《梵和大辞典》494)。

jāti-marana-: 11b, “宿命, 生死轮回”, 梵语作 jātiśmarāṇa (《梵和大辞典》500)。jāti-maranaśya 是其单数属格。

jina: 4b, “至真”, 指佛世尊,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503)。jināna 是其复数属格形式。

jīnorasa: 6b, “得意门生”, 梵语作 jīnaurasa, 旧译“最胜子, 最胜爱子” (《梵和大辞典》504)。

ta: 10b, = taṃ, “这个, 他”, 指示代词 ta- 的单数业格 (LKD. 33)。

ta' ila-dāyaka: 9a, “油膏的提供者, 油膏的施主”, 梵语作 taila-dāyaka (《梵和大辞典》551和577)。

taṭi: 2a, “佝偻病, 鸡胸病”, 《温室经》似称此病为“寒冰”。梵语作 taṭi 或 taṭa (《梵和大辞典》519)。

tathāgata: 10a, “如来”,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522)。tathāgatānaṃ,

11b, 该词复数属格形式; tathagate 为复数体格或业格形式。

tasya: 2a, “这个, 它”, 指示代词 ta- 的单数属格 (LKD. 33)。

tiṣu: 7b, “在此”, =teṣam, 详下。

tiṣṭhatu: 12b, “住”, 动词 sthā- 的命令语气单数第二人称,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1514)。

te: 6b, “他们, 这些”, 代词 ta- 的复数体格或业格 (LKD. 34)。

tepi: 6b, = te api, “然而”,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90)。

teṣam: 5b 和 6a, “在此”, 指示代词单数属格 (LKD. 34)。

dadāti: 9b, “给, 布施”, 动词 dā- 的过去式第三人称, 或作 didati (LKD. 50)。

dāna: 4a 和 7a, “给, 布施, 供养”,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576)。

dāna-ūktama: 4a, “最好的布施”, 构词法参见 ganuktama (众僧, 最上僧); 词义讨论见前文 dāna 和 ūktama。

dharma: 10a 和 12b, “法, 正法”,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631)。

dharmiya: 10b, “具法有道的人”, 梵语作 dharmika (《梵和大辞典》638)。

na: 2a, 否定词,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652)。

navaka: 7a, “年少的人, 新出家的人”,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661)。

nirdoṣa: 9b, “无暇, 无过失”,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688)。

nirmala: 8b, “清净无垢”,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690)。

paścima: 6a, “最后”, 梵语作 paścima (《梵和大辞典》769)。

paramārtha-darśana: 4b, “最胜谛观”, 指通过修行达到的某种境界, 属于 samādhi (三昧) 之一,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739)。

pārthiva: 12b, “王侯”,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781)。

pi: 5b, 6b, = api “皆, 共同”,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90)。

piṭakā: 2a, “溃疡”, 梵语作 piṭaka, 旧译“牛眼疮, 溃疡” (《翻译名义大集》610: 9556 号)。

pūjā: 5b, “尊敬”,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802)。

pujita: 6b, “所供养”, 过去分词, 梵语作 pūjita (《梵和大辞典》802)。

pratyekabuddha: 5a, “独觉, 缘觉, 辟支佛”, 梵语作 pratyekabuddha (《梵和大辞典》854)。该词最后的 -ca 是俗语语尾, 亦作 -ṛca (LKD. 31)。

prathama: 6a, “第一”,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855)。-ana 是其复数属

格语尾。

prāpta-: 7b, “到达, 获得”,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891)。-esu 是其单数属格语尾。

prabhasvara: 1a 和 3a, “容光焕发”, 《温室经》作“威光德大”。梵语作 prabhāsvara, 旧译“光明, 清净” (《梵和大辞典》862)。

prasamñhita: 3b, 梵语作 praśaṭhatā, 旧译“降诸相, 平等而流, 放流相继” (《梵和大辞典》875)。

prasamñna-mānasa: 10b, “心情平静”, 这里指坐禅入静, 梵语作 prasanna-mānasa (《梵和大辞典》877)。

prahīna-doṣā: 8b, “不犯错误, 无失无过”, 梵语作 prahīna-doṣā (《梵和大辞典》614 — 615)。

bhavāgra: 11a, “天顶, 极天”,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950)。

bhavati: 1a 和 3a, 动词 bhū- (是) 的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

bhavatu: 5b 和 12a, 动词 bhū- (是) 的命令语气第二人称单数。

bhavaṃti: 2a, 动词 bhū- (是) 的现在时第三人称复数。

bhavaṃtu: 6b, 8b 和 9b, 动词 bhū- (是) 的现在时第二人称复数。

bhikṣu: 7a 和 8a, “比丘, 乞食者”, 梵语作 bhikṣu (《梵和大辞典》960)。

bhoṃtu: 7b, =bhavaṃti, 详上文。

madhya: 7a, “中年的”,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955)。

manujāna: 10b, “爱神”, 梵语作 manoja- (《梵和大辞典》1000)。

malā-prakarṣa: 10b, “多次劫难”。其中前一成分, 梵语作 mala “污垢”; 后一成分词形同梵语, 旧译“多次” (《梵和大辞典》1009 和 817)。-ena 是其单数具格语尾。

mala-prakarṣana-: 9a, “去污物”, 指肥皂。其中前一成分词形同梵语; 后一成分, 梵语作 prakarṣaṇa “去除” (《梵和大辞典》817)。

mala-prakarṣana-pradāyaka: 9a, “肥皂的提供者”。后一成分“供养人, 施主”,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856); mala-prakarṣana 参见前文。

mala-prahīna: 9b, “污垢灭尽”, 梵语作 mala-prahīna (《梵和大辞典》883)。

ya: 6b 和 9b, 引导从句的代词 ya- 的单数业格 (LKD. 37)。

ye: 11a, 引导从句的代词 ya- 的复数体格 (LKD. 37)。

yo: 1b, 2b, 3b, 6a 和 8a, 引导从句的代词 ya- 的所有格。例如: yo śātra ganuktamasya, 《温室经》译作“斯由洗众僧”。

r(ā)kṣasa: 10a, “罗刹, 恶魔”,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1119)。

rakṣya: 10b, “防护”, 梵语作 rakṣya (《梵和大辞典》1106)。

rata: 5b, “娱乐”,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1110)。

lābha-jamḍaka: 9b, “获福与洗浴众僧”。其中前一成分,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1149); 后一成分同 jamḍaka, 详见上文讨论。

labhati: 1b, “获得”,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1145)。

vā: 2a, “或者”, 连词,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1187)。

vara: 4a, “妙, 最好的”,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1173)。

vicārcikam: 2a, “毒疮”, 《温室经》似称此病为“热气”。梵语作 vicārcikā, 旧译“连疮” (《梵和大辞典》1205 和《翻译名义大集》607: 9494 号)。

vivṛdhi: 12a, “增长”,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1245)。

vivegam: 5a, “远离”, 梵语作 viveka, 旧译“寂然不动, 空寂” (《梵和大辞典》1245)。

viśārata: 7b, “无所畏惧”, 梵语作 viśārada (《梵和大辞典》1247)。

viśāla-netra: 3a, “大眼睛”, 《温室经》作“眼目精明”,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1247 和 712)。正如岩松浅夫指出的, 此乃《翻译名义大集》第 328 号所言佛世尊“八十种好”之一, 旧译“目清净” (岩松浅夫 2001: 177)。

viśudha-gātra: 1a, “身体干净”, 《温室经》作“体性常清净”。正如岩松浅夫指出的, 此乃《翻译名义大集》第 291 号所言佛世尊“八十种好”之一 (岩松浅夫 2001: 177)。梵语作 viśuddha-gātra, 旧译“四肢清净, 手足洁净” (《梵和大辞典》1248 和 423-424)。

viśudha-cakṣu: 1a, “眉清目秀”, 《温室经》译作“眼目精明”。梵语作 viśuddha-cakṣu, 旧译“清净眼” (《梵和大辞典》1248 和 453)。

vihāram: 10a, “精舍, 寺院”, 这里指魔鬼的住所, 词形同梵语 (《梵和大辞典》1260)。

vyāvūca: 8b, “灭, 解脱”, 正如拉普逊指出的, 该词相当于梵语 vyāvṛtya (*Kl.* III: 371; 《梵和大辞典》1298)。

śamathe: 5b, “逝世”, 词形同梵语, 旧译“涅槃, 寂灭, 禅定” (《梵和大辞典》1248 和 423-424)。



典》1312)。*-e* 为单数依格语尾。

*śāsane*: 11b, “教”, 词形同梵语, 旧译“教法”(《梵和大辞典》1326); *-e* 为单数依格语尾。

*ślipatam*: 2a, “湿疹, 橡皮癣”, 《温室经》译作“湿痹”。梵语作 *ślipata*, 旧译“橡皮病, 足病”(《梵和大辞典》1361)。

*śuškaka*: 9b, “干燥”,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1342)。

*śrāvaka*: 6a, “听法者, 佛弟子”,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1354)。

*śukrya-nidarśana*: 4a, “有功成名就之前景”。其中前一成分, 梵语作 *śrava-kriyā*(功成名就); 后一成分词形同梵语, 意为“前兆, 前景”(SED.1097 和 320; 《梵和大辞典》675)。

*sa*: 2b, “这个”, 指示代词 *sa-* 的阴性单数体格(LKD.33)。

*satam*: 12a, “果实”, 梵语作 *sada*(《梵和大辞典》1396), 而非拉普逊建议的等于 *satām*(*Kl.III*, 375)。

*satata*: 7b, “经常, 持久”,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1390)。

*satva*: 11a, “众生”, 梵语作 *sattva*(《梵和大辞典》1391)。

*samaṃca-pādo*: 3b, 《温室经》作“圆光相具足”。其中 *-mca* 是俗语语尾, 该词相当于梵语 *samā-pāda*, 旧译“正轮, 正足”(《梵和大辞典》774 和 1049)。

*samākula*: 12a, “饱满”, 词形同梵语, 旧译“具足”(SED.1158 和《梵和大辞典》1417)。

*sasya*: 12b, “谷物”,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1450)。

*sukhumāla-suchavi*: 1a, “细嫩得像小儿一样的皮肤”, 《温室经》译作“肌体润泽”。正如岩松浅夫指出的, 此乃《翻译名义大集》第295号所言佛世尊“八十种好”之一(岩松浅夫2001: 177)。梵语亦作 *su-kumāra-gātra*, 旧译“身色嫩软”(《梵和大辞典》1473 和 484)。

*sugata-*: 12b, “好的归宿”, 这里指佛。词形同梵语, 旧译“善逝”, 亦指佛或法师(《梵和大辞典》1476)。*sugatasya* 是其单数属格。

*su-gaṃdha*: 2a, “芳香”, 《温室经》译作“身体常香”。梵语作 *su-gandha*(《梵和大辞典》1476)。

*suci*: 2a, “洁白”, 《温室经》译作“衣服洁净”。梵语作 *śuci*(《梵和大辞典》1338)。

subhādra: 6a, “圣贤, 胜妙”, 佛弟子的名字。梵名作 subhadra (《梵和大辞典》1485)。

subhikṣu: 12a, “丰收”, 梵语作 subhikṣa (《梵和大辞典》1485)。

suvarna-gātra: 3a, “金色的身体”, 正如岩松浅夫指出的, 此乃《翻译名义大集》第252号所言佛世尊三十二相之一(岩松浅夫2001: 178)。梵语或作 suvarṇa-cchavi, 旧译“皮肤金色, 身如金色, 身如真金”(《梵和大辞典》1490)。唐代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一曰:“时彼王弟引佛世尊, 入温室内授香水等, 以充澡浴。见佛世尊, 身如金色。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周遍庄严。见已欢喜, 生深信心”(《大正藏》第24卷1451号)。《温室经》的“金体玉为璿”, 或与该词有关。

stha'ira-: 7a, “上座, 长老”, 正如拉普逊指出的, 该词相当于梵语 sthavira (KI.III, 379; 《梵和大辞典》1514)。

svakartha-yukta: 5b, “洁身自好”, 梵语作 svakārtha-yukta (《梵和大辞典》1532 和 1094)。

svayaṃ-bhu: 5b, “归于自然”, 这里指修身成佛, 词形同梵语(《梵和大辞典》1537)。svayaṃ-bhu (na) 是其复数属格。

sātra: 1b, 2b 和 3b, “洗澡, 沐浴”, 正如拉普逊指出的, 该词相当于梵语 snātra (KI.III, 379; 《梵和大辞典》1522)。

sāpaka: 9a, “搓澡的人”, 正如拉普逊指出的, 该词相当于梵语 snāpaka (KI.III, 379 《梵和大辞典》1523)。

hiterṣina: 4b, “善意的”, 正如岩松浅夫指出的, 该词相当于梵语 hitaiṣina (岩松浅夫2001: 180; 《梵和大辞典》1557)。

heṭha: 11a, “下方”, 梵语作 heṭa (《梵和大辞典》1566)。

20世纪90年代初, 阿富汗发现大批犍陀罗语佛经写卷, 主要有两大收集品——大英图书馆收集品 (the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 和斯柯因收集品 (the Schøyen Collection)。<sup>[25]</sup> 大批犍陀罗语佛经写卷的发现, 足以构成可以和梵文佛典、巴利文佛典相媲美的一个新的佛教圣典集成。而犍陀罗语《温室洗浴众僧经》的发现, 不仅为犍陀罗语圣典 (the Gandhāri Canon of Scriptures) 家族添加了新的成员, 而且为研究中亚佛典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 附录：东汉高僧安世高译《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录文

安世高，名“安清”，本为西域安息（Parthia）国王子，东汉桓帝初年（约2世纪中叶）从中亚来洛阳传教。<sup>[26]</sup> 据美国伊朗语学者乌茨（David A. Utz）考证，所谓“世高”是其胡名，来自中古伊朗语 Aršaka（安息王族姓氏）。<sup>[27]</sup> 《温室洗浴众僧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汉译佛经之一，首见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新集经论录》，但僧祐没有明确说是谁翻译的。<sup>[28]</sup> 历代经录都认为，《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是安世高在洛阳传教期间翻译的45部佛经之一。此经别名《浴僧缘记》，<sup>[29]</sup> 除安世高译本外，还有西晋竺法护和唐代玄应两个译本，可惜后两个译本今已不传。<sup>[30]</sup> 隋末唐初慧净著《温室经疏》，唐代慧远著《温室经义记》，对安世高译本进行注疏和解说。<sup>[31]</sup> 目前所见《温室洗浴众僧经》的汉译本和各种经疏，皆本自安世高译本系统。为了便于引用，我们将其分为经文上、偈颂和经文下三部分，并将经文的自然段或每个偈颂进行编号。录文如下：<sup>[32]</sup>

（经文上）

阿难曰：“吾从佛闻如是：一时佛在摩竭国因沙崛山中，王舍城内有大长者。奈女之子，名曰耆域。为大医王，疗治众病。少小好学，才艺过通。智达五经，天文地理。其所治者，莫不除愈。死者更生，丧车得还。其德甚多，不可具陈。八国宗仰，见者欢喜。”（1）

于是耆域，夜歎生念，明至佛所，当问我疑。晨旦勅家大小眷属，严至佛所。到精舍门见佛炳然，光照天地。众坐四辈，数千万人，佛为说法，一心静听。耆域眷属，下车直进，为佛作礼，各坐一面。（2）

佛慰劳曰：“善来医王，欲有所问，莫得疑难。”耆域长跪，白佛言：“虽得生世，为人疎野；随俗众流，未曾为福。今欲请佛及诸众僧、菩萨、大士，入温室洗浴。愿令众生，长夜清静，秽垢消除，不遭众患。唯佛圣旨，不忽所愿。”（3）

佛告医王：“善哉妙意！治众人病，皆蒙除愈；远近庆赖，莫不欢喜。今复请佛及诸众僧，入温室洗浴；愿及十方众药疗病，洗浴除垢。其福无量，一心谛听！吾当为汝先说洗浴众僧反报之福。”佛告耆域：“洗浴之法，当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报。何谓七物？一者然火，二者净水，三者澡豆，四者苏膏，五者淳灰，六者杨枝，七者内衣。此是洗浴之法。何谓除去七病？一者四大安隐，二者除风病，三者除湿痹，四者除寒冰，五者除热气，六者除垢秽，七者身体轻便，眼目精明。是为除去众僧七病。如是供养，便得七福。何谓七福？一者四大无病，所

生常安，勇武丁健，众所敬仰。二者所生清净，面目端正；尘水不着，为人所敬。三者身体常香，衣服洁净，见者欢喜，莫不恭敬。四者肌体润泽，威光德大，莫不敬叹，独步无双。五者多饶人从，拂拭尘垢，自然受福，常识宿命。六者口齿香好，方白齐平，所说教令，莫不肃用。七者所生之处，自然衣裳，光饰珍宝，见者悚息。”（4）

佛告耆域：“作此洗浴众僧开士，七福如是。从此因缘，或为人臣，或为帝王，或为日月四天神王，或为帝释转轮圣王。或生梵天，受福难量。或为菩萨，发意持地。功成志就，遂致作佛。斯之因缘，供养众僧；无量福田，旱涝不伤。于是，世尊重为耆域而作颂曰：（5）

（偈颂）

观诸三界中，天人受景福；道德无限量，谛听次说之；

夫人生处世，端正人所敬；体性常清净，斯由洗众僧。（1）

若为大臣子，财富常吉安，勇健忠贤良，出入无罣碍；

所说人奉用，身体常香洁；端正色从容，斯由洗众僧。（2）

若生天王家，生即常洁净；洗浴以香汤，苾芬以熏身；

形体与众异，见者莫不欣；斯造温室浴，洗僧之福报。（3）

第一四天王，典领四方域；光明身端正，威德护四镇；

日月及星宿，光照除阴冥；斯由洗众僧，福报如影响。（4）

第二忉利天，帝释名曰因；六重之宝城，七宝为宫殿；

勇猛天中尊，端正寿延长，斯由洗众僧，其报无等伦。（5）

世间转轮王，七宝导在前；周行四海外，兵马八万四；

明宝照昼夜，玉女随时供；端正身香洁，斯由洗众僧。（6）

第六化应天，欲界中独尊；天相光影足，威灵震六天；

自然食甘露，妓女常在边；众德难称誉，斯由洗众僧。（7）

梵魔三钵天，净居修自然；行净无垢秽，又无女人形；

梵行修洁己，志淳在泥洹；得生彼天中，斯由洗众僧。（8）

佛为三界尊，修道甚苦勤；积行无数劫，今乃得道真；

金体玉为瓔，尘垢不着身；圆光相具足，斯由洗众僧。（9）

诸佛从行得，种种不劳勤；所施三界人，无所不周遍；

众僧之圣尊，四道良福田；道德从中出，是行最妙真。（10）

(经文下)

佛说偈已，重告耆域：“观彼三界，人天品类，高下长短，福德多少，皆由先世用心不等，是以所受各异。不同如此，受诸福报，皆由洗浴圣众得之耳。”佛说经已，阿难白佛言：“当何名此经？以何劝诲之？”（1）

佛告阿难：“此经名曰《温室洗浴众僧经》。诸佛所说，非我独造。行者得度，非神授予。求清净福，自当奉行。”佛说是经竟，耆域眷属，闻经欢喜，皆得须陀洹道。礼佛求退，严办洗具。众坐大小，各得道迹。皆共稽首，礼佛而去。（2）

参考文献要目

莲池利隆（1995）：《新疆ニヤ遗迹出土の文献について(1)》，《印度学佛教学研究》44-42。

岩松浅夫（2000）：《カローシユテイー文书第511番について》，《创价大学人文论集》13，第157-191页。

赤松明颜（2001）：《楼兰・ニヤ出土カローシユテイー文书について》，收入富古至编：《流沙出土の文字资料》，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第420和第647页。

林梅村（1989）：《犍陀罗语〈法句经〉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55-264页（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林梅村（1991）：《佉卢文时代的鄯善王世系》，《西域研究》第1期，第39-50页（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林梅村（1997）：《法藏部在中国》，收入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Burrow, T. (1935) "Tokharian Elements in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JRAS*, pp.667-679.

Edgerton, F. (1953)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s. I-II*,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lass, A. (2000) *A Preliminary Study of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 Paleography*,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n Meicun "Kharoṣṭhī Bibliography: The Collections from China (1897-

1993),” *CAJ*. 40/2,1996, pp.188-220.

Salomon, R. *Indian Epigraphy: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 Prakrit, and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a.

Salomon, R. (1998b) “Kharoṣṭhi Manuscript Fragments in the Pelliot Collectio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EI*.16, pp. 123-160.

Salomon, R. (1999)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i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British Library (Review by Falk,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pp.210-211).

Speyer, J.S. (1902-1909) *Avadānaśataka, A Century of Edifying Tales Belonging to the Hīnayāna*, Bibliotheca Buddhica III, St. Petersburg (repr. Osnabrück, 1970), vol. I, pp. 71-77.

Stein, M.A. (1921)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 India Government*,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p.212-269 and pp. 271-289.

Utz, David A., “Arśak, Parthian Buddhists, and ‘Iranian’ Buddhism,” *Collection of Essays 1993: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 — 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aipei: Fo Guang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and Culture Education, 1999, pp.421-447.

(原载北京大学东方学院、上海龙华寺合编：《华林》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 注释：

[1] Cf. M.A. Stein, 1921, pp.247-269.

[2] Cf. *Kl.I*, pp.155-248.

[3] 关于这批文书目前收藏情况, 参见赤松明颜 2001, 第 420 和第 647 页。

[4] Cf. J.S. Speyer, 1902-1909, vol. I, pp.71-77.

[5] E.J. Rapson, "The Kharoṣṭhī Alphabet of Chinese Turkestan," in *Kl. III*, pp.295-296, p.299, p.316 and p.321.

[6] Cf. F. Edgerton, 1953.

[7] Cf. *TKD*, pp.100-101 and p.134.

[8] 参见莲池利隆 1995; 岩松浅夫 2000; 第 157-191 页。

[9] 首先要借此机会感谢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 使我能于 2001 年 6 月至 2002 年 3 月在日本佛教大学专心从事犍陀罗语研究。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小岛康誉先生、真田康道、松田和信和杉本宪司教授在我访日期间给予的热情帮助。

[10] 中亚发现的佉卢文文学残片或佛教写经有不少俗语、梵语混杂之例, 如尼雅出土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残片(第 523 号文书)和新疆库车出土佛教残卷等。关于梵语对中亚佉卢文的影响, 参见 Lin Meicun 1996, pp.188-220; R. Salomon, 1998b, pp.123-160.

[11] 参见林梅村 1991, pp.39-50.

[12] 参见《法显传》, 又名《游天竺事》(《大正藏》卷 51 第 2085 号)。

[13] 拉普逊谓之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vowel sound", 参见 *Kl. III*, p.299.

[14] D.Q., Adams, "A Dictionary of Tocharian B", *Leiden Studies in Indo-European* 10, Amsterdam/ Atlanta, GA, 1999: p.139.

[15] 关于尼雅文书中的吐火罗语因素, 参见 Burrow 1935: pp.667-679.

[16] 参见《翻译名义大集》595: 9289 号和《梵和大辞典》509。

[17] 参见《大正藏》卷 16 第 701 号。

[18] 参见《大正藏》卷 50 第 2059 号。

[19] 参见该书第 22 卷《虚空目分》第十之一《初声闻品》第一; 收入《大正藏》卷 13 第 397 号。

[20] 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一《汉译经音义同异记》曰: "昔造书之主, 凡有三人。长名曰梵, 其书右行。次曰佉楼, 其书左行。少者苍颉, 其书下行。梵及佉楼, 居于天竺。黄史苍颉, 在于中夏"(《大正藏》卷 55 第 2145 号)。

[21] 参见林梅村 1997 年。

[22] 参见该书卷 2《新集经论录第一》(《大正藏》卷 55 第 2145 号)和同书卷 4《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大正藏》卷 55 第 2145 号)。

[23] Cf. R. Salomon, 1998a and A. Glass, 2000.

[24] Cf. *Kl. III*, p.299.

[25] Cf. R. Salomon, 1999 and Jens Braarvig (ed.), *Manuscriptis in the Schøff yen Collection - I: Buddhist Manuscripts*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0. 在大英图书馆收集品中, 有一个编号为

Fragment 5 C 的残片，属于佛赞(stotra)之类的文献。Salomon 认为，其内容和尼雅 510 号和 511 号文书相似。这个材料尚未全部发表，而 Salomon 引用的若干偈颂中没有和 511r 相同的句子。其中一句读作 *soma-sadiśa-[va]dana* “面如神月”，似为“佛八十种好”名称之一。梵语作 *bimba-pratibimba-darśana-vadana* “面满净如满月”(《翻译名义大集》第 315 号)。

[26]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 13《安世高传》记载：“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幼怀淳孝，敬养竭诚。惻隐之仁，爰及蠢类。其动言立行，若践规矩焉。加以志业聪敏，刻意好学。外国典籍，莫不该贯。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靚色知病，投药必济。乃至鸟兽鸣呼，闻声知心。于是俊异之名，被于西域。远近邻国，咸敬而伟之。世高虽在居家，而奉戒精峻。讲集法施，与时相续。后王薨，将嗣国位，乃深惟苦空，厌离名器。行服既毕，遂让国与叔。出家修道，博综经藏。尤精阿毘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帝之初，始到中夏。世高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语。

于是宣释众经，改胡为汉。出《安般守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及《百六十品》等。初，外国三藏众护撰述经要为二十七章。世高乃剖析护所集七章，译为汉文，即《道地经》也。其先后所出经，凡三十五部。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叠叠而不倦焉”(参见《大正藏》卷 55 第 2145 号)。

[27] David A. Utz 1999: pp.421-447.

[28] 其文曰：“《温室经》一卷，《旧录》云《温室洗浴众僧经》”(参见《大正藏》卷 55 第 2145 号)。

[29] 《浴僧缘记》见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据说“出《温室经》”(参见《大正藏》卷 55 第 2145 号)。

[30] 玄应译本称《温室洗浴众僧经》，收入《大正藏》卷 54 第 2128 号。

[31] 慧远《温室经义记》，收入《大正藏》卷 39 第 1793 号；慧净《温室经疏》，收入《大正藏》卷 85 第 2780 号。

[32] 参见《大正藏》卷 16 第 701 号。录文中经文或偈颂编号(1)、(2)等，是为便于引用而添加的。

## 第七章 | 且末所出鄯善王安归伽纪年文书考

——兼论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流行之外道

1995年，我们在大英图书馆访问时，初次见到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未曾刊布的一批中亚古写本的照片，不仅包括和田发现的于阗塞语文书、唐代于阗文汉文双语文书，而且还有尼雅出土汉简和佉卢文书。在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热情帮助下，我们初步调查了这批材料。由于这批材料尚未公布，我们一直等待它们的正式出版。《大英图书馆馆刊》最近终于刊布了这批中亚写本的照片。<sup>[1]</sup>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斯坦因在车尔臣河流域的且末买到一件佉卢文木牍。这个发现相当重要，意味着一个以前不知道的佉卢文遗址被重新发现。除了佛教信徒外，这件文书还提到鄯善国一位外道神职人员。草成此文，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见教于向家。

### 一 且末发现佉卢文书始末

斯坦因在印度退休后，到英国剑桥定居。1930—1931年，应哈佛燕京学社之邀，组建中亚考察队第四次来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中国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南京政府电令新疆地方政府立即将这位不速之客驱逐出境，并扣留所获一切古物。斯坦因不得不放弃他的最后一次新疆之行。由于考察中途夭折，斯坦因没写任何考察报告。1977年，美国女作家米尔斯基为斯坦因写传记，披露了当年许多内幕。<sup>[2]</sup>更为详尽的报道则是我国学者近年来的一系列调查。<sup>[3]</sup>

斯坦因这次中亚考察到处受阻，只在尼雅河下游做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并发现一批佉卢文书。回国后，他委托牛津大学教授拉普逊解读这些写本。1933年，拉普逊将初步研究结果寄给斯坦因，后来编号为第765和782号文书，凡18件。这

个序列号接着他和波叶尔等人合编的《佉卢文集》一书继续编号。<sup>[4]</sup> 1937年，拉普逊去世，这项研究改由他的高足牛津大学的巴罗教授继续进行。并很快刊布了研究结果，包括拉丁字转写和英文译文，但是没发表文书照片。<sup>[5]</sup> 这是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惟一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由于文书出土地点采用N(=Niya)系列编号，而巴罗的论文题目为《尼雅续出佉卢文写本》，足以误导人们以为这批写本全部出自尼雅。

巴罗的研究基于斯坦因提供的一套照片。1995年，我们在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未刊中亚收藏品照片中找到了这套照片。核对巴罗论文后才发现，巴罗的第782号文书出土地点编号不完全正确，误作N.R.(char) 2，而斯坦因照片(T.O.21)明明写的是Char. 1和Char. 2。起初，我们怀疑Char.是Charkhlik(若羌)的缩写，现在终于了解到这件木牍文书的真实来源。

斯坦因在1931年写给拉普逊的一封信透露了这个秘密，而兰州大学王冀青先生从牛津大学包德雷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信件中查到这封信。原来，这件文书是斯坦因在且末购买的，“Char.”系当地维族村民对且末的称谓Charchen(车尔臣)的缩写。斯坦因似乎没意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他在给拉普逊的信中说：“所有简牍都确切无疑来自那里(指尼雅)，除了那件标号为Char.1和Char.2的长方形的双片木牍，那是有人在且末(Charchen)偷偷卖给我的。我毫不怀疑，它也是从尼雅遗址带来的。”<sup>[6]</sup> 斯坦因的说法并无真凭实据。东汉末年，且末被鄯善兼并，此后一直是鄯善国重镇，鄯善末代君主最后就逃亡到且末。如果在且末一带发现佉卢文，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当年塔克拉玛干觅宝人经常到和田或喀什兜售盗掘古物，而且末偏在一隅，人迹罕至，尼雅沙漠觅宝人不可能到这样偏僻地方找外国人兜售古物。

关于这座埋藏佉卢文的且末遗址，目前已有重要线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马雍先生参加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河西走廊沙漠考察时，听到考察队成员谈起前几年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考察发现的一座沙漠古城。这座古城保存完好，并有数以百计的佉卢文木牍暴露地表。当时因不知其重要价值，未予采集，仅捡回十余件作木材标本，后复散失，下落不明，只有两小块残木牍送给了甘肃博物馆(插图1)。<sup>[7]</sup>

新疆文物考古所前所长王炳华对此事作了进一步调查。他告诉我，这支沙漠考察队的负责人是中国著名沙漠专家朱震达先生。据他介绍，这座古城位于且末县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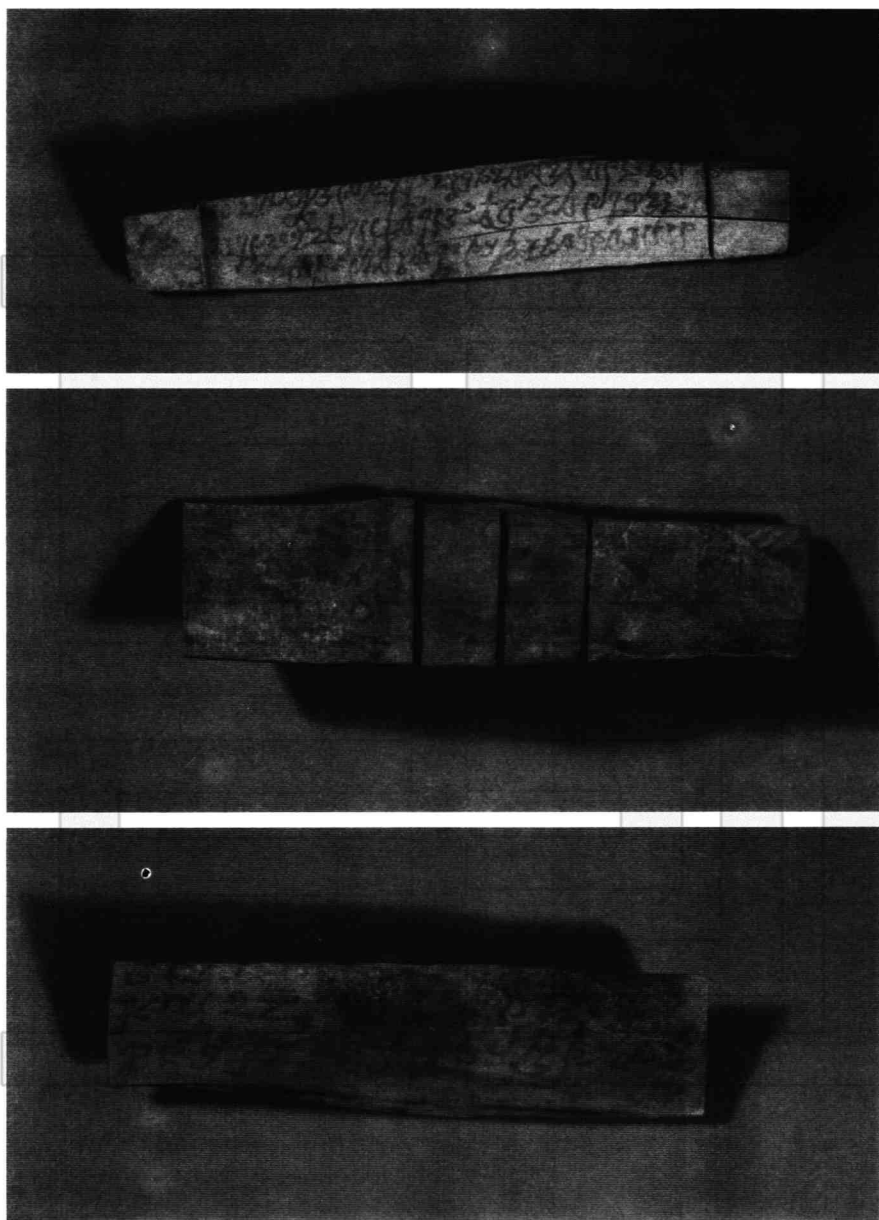


插图1 甘肃省博物馆藏且末出土佉卢文书

北沙漠腹地，他们的考察队对古城的位置作过详细记录，资料现存兰州中国沙漠土壤研究所朱震达档案。<sup>[8]</sup>承蒙甘肃省博物馆提供照片，我们解读了这两块佉卢文残牍。<sup>[9]</sup>可惜这两块木牍过于残破，没能提供更多信息。斯坦因在且末收集的佉卢文书相当完整，并有鄯善王纪年。它的重要科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 二 且末出土佉卢文考释

这件文书被编为第782号文书，由底牍和封牍两片木牍组成。照片分别见斯坦因拍摄的T.O. 21号照片上半部和右下。由于照片不甚清晰，巴罗对封牍正面的文字没能完全解读。<sup>[10]</sup>佉卢文契约有一定行文格式。据419号文书类似的格式<sup>[11]</sup>，我们复原了这件文书残缺部分，并根据照片进一步解读了巴罗没能释出的部分文字。不过419号文书和这件文书出现的人名不同，无法复原这部分内容。据我们的解读，这件文书应该读作：

拉丁字转写

(底牍正面)

1. samvatsare 2 maharayasa rayatirayasa mahamṭasa ja[yaṃṭasa]
2. dharmi' aṣa mahanu' ava rayasa akvaḡa devaputraṣa asti kṣunaṃ-
3. mi maṣe 4 2 divajhe 4 3 suveṣṭa kutreyasa dajha ca-
4. teya kolḡesa ca bhuma miṣi vikrida cuṭṭhi' e eka milimi
5. bhij' apayati śramamṇa ciprima' aṣa krīda tita muli uṭi
6. puṭḡetsa 1 viṣiti muliyena paḡ' i[ch]ida samena sama

(封牍背面)

1. [sarajidati] tatra sakṣi jaṃnaṃti vaṭayaḡa onu[ḡi]
2. aḡeta à...sakṣi maravara manasoḡa śramaṃ-
3. ṇa [à...] pu ti [à...] sakṣi yo ca pravamṇaḡa lihidama e-
4. śvareyana putra tivira apḡeyena vaṭayaḡa onuḡi-
5. yena anatena pramana varṣa sa[hasra]mi [ko] pacima kala[ṃmi]
6. [bhiti vajo maṃtra nikhaleyati vikarida karaṃna' e] à...

译文

(底牒正面)

1. 时惟 2 年，大王、王中之王、伟人、胜利者
2. 正义者、威德宏大的国王、安归伽天子在位之年
3. 6 月 7 日，今有督军库特罗耶和科勒格的奴仆
4. 左特耶出售可耕地，这块地可以生长种子 1 弥厘码
5. 由沙门智波利玛耶出钱买下，价格为
6. 价值 20 目厘钱的驮水用母骆驼一头，钱已收讫。双方在公平条件下

(封牒背面)

1. 达成交易。现有证人出面作证：瓦德耶伽·乌奴耆
2. 税吏[……]出面为证，巫师玛纳索伽、沙门
3. [……]和[……]出面为证。这件文书由我、(这块土地的)所
4. 有者之子、书吏阿波耆耶，奉瓦德耶伽·乌奴耆
5. 之命抄写。千年有效。今后无论谁
6. [对此项协议有争议，皆无效]……

据第 419 号佉卢文书的行文格式，封牒背面第 1 行残缺的字可复原作 sarajidati，而封牒背面第 6 行残缺的字应复原作 bhiti vajo maṃtra nikhaleyati vikarida karaṃna'e。此外，我们还根据斯坦因的照片，读出了一些以前没能释出的字。例如：封牒背面第 1 字要和上一行的 e- 连读，转写作 eśvareyana，意指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封牒背面第 5 行前两个字要和前 1 行的 onugi- 连读，转写作 onugiyena anatena，意思是“奉乌奴耆之命”。

### 三 公元 3 世纪鄯善国且末州的宗教与世俗生活

这件契约文书一共提到七位不同身份的人物，从国王到奴仆，从宗教界到世俗阶层，生动展示了一幅公元 3 世纪鄯善国且末州宗教与世俗社会的画卷。

鄯善王安归伽是目前所见佉卢文书提到的鄯善国第四代君主，执掌君权长达 38 年，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鄯善王。安归伽执政第 17 年，加强了和中原王朝的



关系，开始使用“侍中”头衔。尼雅 N.V.xv 号遗址出土两枚的晋简文义相连，读作“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它们和泰始五年（269）纪年简共出于同一个遗址<sup>[12]</sup>，说明鄯善王安归伽的“侍中”头衔乃西晋所封。佉卢文书所记鄯善王世系亦表明安归伽 17 年大约在泰始年间。<sup>[13]</sup> 如果安归伽 17 年相当于公元 269 年，那么这件鄯善王安归伽在位第二年文书约写于公元 253 年，也即曹魏嘉平五年。

这件契约提到鄯善世俗社会四位不同身份的人物。督军库特罗耶属于上层社会人物，他的官号原文作 *suḡeṣṭa*，在其它文书中亦写作 *spetha*、*suḡ'e* 或 *sveta*。于阗国后来也用这个官号，相当于阗塞语 *spātā*（军官），和田策勒县达玛沟遗址出土的于阗文汉文双语文书（Hedin 24）中和汉语“萨波”对译。<sup>[14]</sup> 据英国伊朗学家贝利考证，这是一个古伊朗语官号，相当于古波斯语 *spāda-*（军官）。<sup>[15]</sup>

有些学者根据佉卢文书提到的 *dajha*（奴隶、奴仆）大谈鄯善国奴隶制。现在看来，此种研究颇成问题。从这件契约可知，督军库特罗耶的奴仆左特耶虽然地位低下，但是他依附豪门，不仅有钱有势，而且拥有土地。这种奴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绝非寻常百姓可以攀比。

这件文书还提到一位税吏，可惜名字已漫漶不清，只留下官号 *a□eta*。这个官号或写作 *a□ita* 或 *aghita*（税吏）。在其它文书中，冠以这个头衔的官吏往往负责征税，可惜词源不明。我们怀疑，该词可能来自伊朗语，似乎可与婆罗钵语动词 *gird*（收集）作语言学比较。<sup>[16]</sup>

这件文书两次提到 *śramamaṇa*（和尚、沙门）。沙门智波利玛耶的法号表明他是一位佛门子弟。佛教徒在鄯善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所以沙门智波利玛耶有能力购买土地。从下文看，他是这件文书的抄写者阿波耆耶的父亲。许多佉卢文书都是沙门抄写的，而书吏往往世代相承，故知鄯善国教育主要由佛教寺院承担，而沙门是鄯善佛教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汉文史籍很少提到曹魏年间的西域佛教，只有《出三藏记集》披露了一点于阗、龟兹当时流行佛教的情况。该书卷 13《放光经记》记“朱土行，以甘露五年（260），出家学道为沙门，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关于公元 3 世纪的鄯善佛教史，目前只有考古资料，如 20 世纪初在米兰荒漠发现的伊循州寺院遗址和近年中日联合尼雅遗迹考察队在尼雅发现的精绝州早期佛寺遗址。这件出自且末的佉卢文书提供了公元 3 世纪鄯善国且末州流行佛教的确凿证据。

## 四 公元1—3世纪塔里木盆地流行之外道

除佛教之外，鄯善国还流行其它宗教，或称“外道”。这件文书提到的巫师玛纳索伽就是一位外道人士。据巴罗研究，巫师玛纳索伽的法号 *maravara* 源于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 *māns̄rbar*（牧师）或粟特语 *m'r'kr'k*（男巫）。除男巫师之外，鄯善国还有女巫。后者的胡名由 *khakhorna*（巫）和 *striya*（女子）两个词组成。前一词源于阿维斯塔语 *kax'arda*（有魔力的、巫术师），相当于亚美尼亚语 *kaxard*（巫师）或梵语 *kākhorda*（蛊道、邪教）。<sup>[17]</sup>

塔里木盆地流行巫教由来已久。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佛教传入西域以前，塔里木盆地流行巫教。公元73年顷，于阗国“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驷马，急求取以祠我”。佛教祭典从来不用马，那么于阗巫教是一种什么宗教呢？于阗塞语文献的研究初步揭开了这个谜。于阗塞语文献往往用袄教词汇来翻译梵语佛教名词。例如：于阗语表示“太阳”的词 *urmaysde*，即袄教主神的名字 *ahura mazdā*（阿胡拉·马兹达）。又如：于阗佛典用来翻译印度女神 *śrī*（吉祥天女）的词 *śāndrāmātā*，源于波斯古经《阿维斯塔》的神祇 *spenta āramaiti (i)*。于阗人还用《阿维斯塔》所言世界最高峰 *harā* 或 *haraiti* 来翻译梵语佛典的 *sumeru*（须弥山）。<sup>[18]</sup> 这个现象说明，佛教传入于阗以前当地流行火袄教。关于中亚火袄教的祭典，段成式《酉阳杂俎》有一段记载。文中说：“铜马，俱德建国乌浒河中，淮派（流）中有火袄祠。相传袄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袄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有一铜马，大如次马，国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对神立，后脚入土……。西域以五月为岁，每岁日，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金，与此铜马嘶相应，俄复入水。”<sup>[19]</sup> 而汉代于阗巫教典祀用马祭，似与中亚火袄教典祀有关。

楼兰古城出土的两件佉卢文书（编号685和686号）进一步披露了公元3世纪塔里木盆地流行外道的情况。这两件文书与鄯善王安归伽纪年文书共出，内容是楼兰百姓为供祀或供食而交纳家畜的登录账。巴罗在《佉卢文译文集》中将后一件文书译为英文，可惜他没弄明白文书内容，误将其当作楼兰百姓家畜亡失账。<sup>[20]</sup> 我们的译文如下：

685号

(A栏)

1. 取克列耶的羊一头，供祀三眼神。
2. 取坎迪那的羊一头，供祀三眼神。
3. 取皮尔突亚的羊一头，供祀音乐女神。
4. 取左摩色纳的羊一头，供祀三眼神。

(B栏)

取梭图亚的羊一头，供祀三眼神。

5. 取普尔那沙的羊一头，供祀三眼神。

6. 取帕尔柯耶的羊一头，供祀三眼神。

686号

(A栏)

1. 取[……]牛一头，供祀[……]
2. 取[……]牛一头，向乌宾陀来的秦人供食
3. 取[……]牛一头，向于阗来的信使供食
4. 取[……]牛一头，向且未来的秦人供食
5. 取[……]牛一头，供祀神庙
6. 取[……]牛一头，供祀三眼神
7. 取迦延达伽的牛一头，供祀三眼神
8. 取[……]牛一头，供祀三眼神

(B栏)

1. 取塔迦左的牛一头，向秦人供食
2. 取乌纳卡的牛一头，向州长鸠尼塔供食
3. 取斯摩甘塔的牛一头，向秦人供食
4. 取鸠乌那的牛一头，供祀三眼神
5. 取昆帕罗的牛一头，供祀天神
6. 取税监皮格那的牛一头，向秦人供食

9. 取[……]牛一头，向尼壤来的秦人供食

这两件文书和吐鲁番出土《高昌章和五年取牛羊供祀账》的内容颇为相似。为便于比较，我们将这件吐鲁番文书抄录于下：<sup>[21]</sup>

1. 章和五年(535)乙卯岁正月□日，取严天奴羊一口，供始耕(旁注：辰英羊一口，供始耕，合二口)。次三月

2. 十一日，取胡未豹羊一口，供祀风伯。次取曲孟顺羊一口，供祀树石。

3. 次三月廿四日，康祈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五月廿八日，取白姚

4. 羊一口，供祀清山神(旁注：勿浑堂)。次六月十六日，取屠儿胡羊一口，供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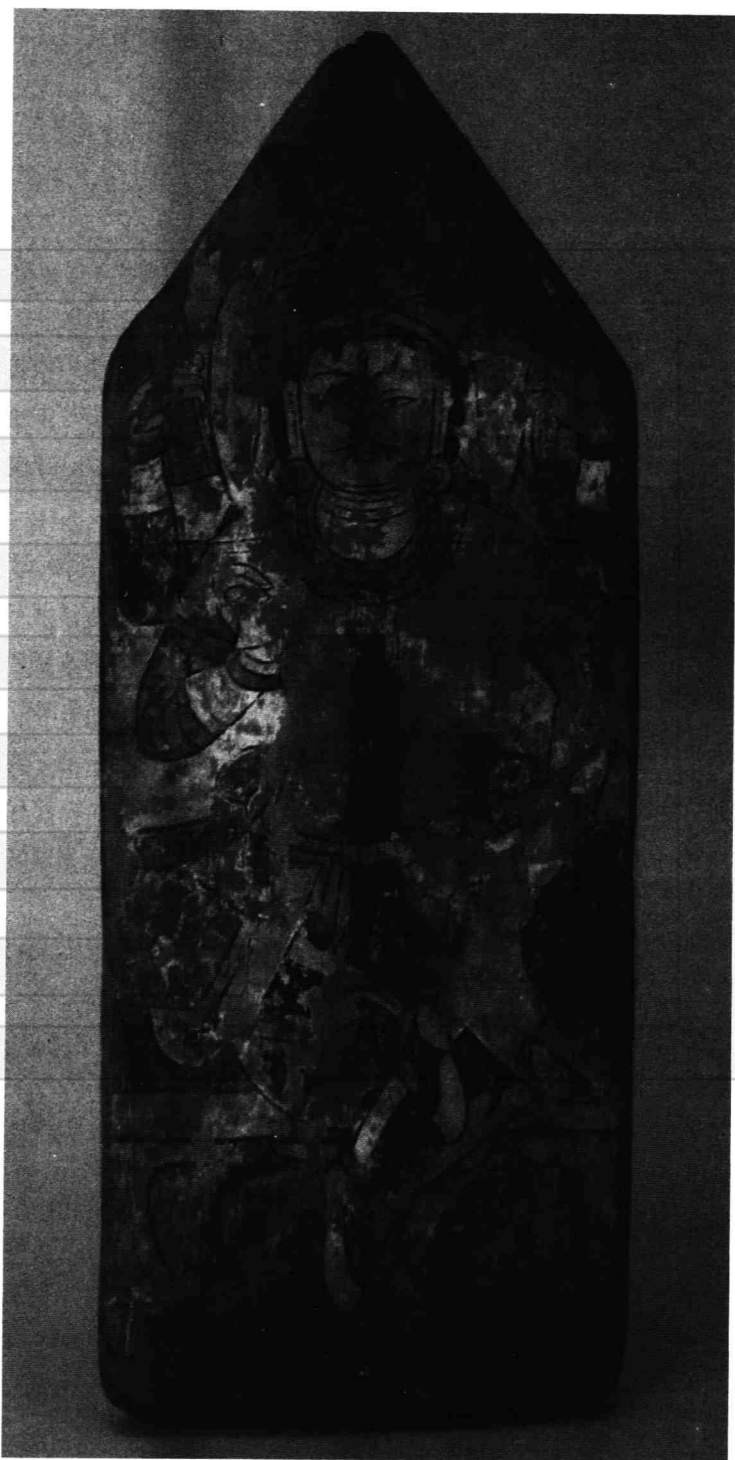


插图 2 和田出土公元6世纪三眼神木板画，埃米塔什博物馆藏品

5. 丁谷天。次取孟阿石儿羊一口，供祀大坞阿摩。次七

6. □月十四日，取康酉儿牛一头，供谷里祀。

据《北史》和《隋书》记载，高昌国流行火祆教，“俗事天神”。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正确指出，《高昌章和五年取牛羊供祀账》所谓“大坞阿摩”来自粟特语 Adbag，在粟特语中表示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sup>[22]</sup> 如果和这件吐鲁番供祀文书相比较，不难发现第 685 和 686 号佉卢文书与鄯善外道活动有关。

鄯善人供祀的三眼神，原文作 *dhyakṣiya* 或 *dryakṣiya*，相当于梵语 *tryakṣa*（三眼神）。三眼神是古代印欧人共有的神祇之一，在波斯火祆教中指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而在印度婆罗门教中则指阿修罗。波斯火祆教与印度婆罗门教同出一源，两者典祀的神灵和宗教轨仪在许多方面相似。这就提出一个问题，鄯善崇祀的三眼神属于婆罗门教，还是火祆教？

据前文讨论，鄯善外道各类神职人员的称谓大都来自波斯语。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呢？《北史·西域传》记载：“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旧唐书·西戎列传》又载：“波斯国……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据中亚考古资料，粟特祆神庙所立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即为三眼神。<sup>[23]</sup> 基于这一认识，德国艺术史家默德认为公元 8 世纪于阗艺术受祆教艺术强烈影响，<sup>[24]</sup> 而和田丹丹乌里克佛寺发现的木板画就有祆教神祇——三眼神像，年代最早的约在公元 6 世纪（插图 2）。<sup>[25]</sup> 因此，《旧唐书·西戎列传》说“于阗国好事祆神，崇佛教”。由此可见，鄯善王国流行的外道源于波斯或中亚火祆教。

除三眼神外，楼兰百姓供祀账（685 号）还提到另一位鄯善外道神祇 *nivāga*（妮娃迦）。在其他佉卢文书（193 号）中，这位外道神祇或称 *deviya'e nav'a<sup>2</sup>ga*（女神妮娃迦），故知是位女神。从词源分析，这位女神的名字源于婆罗钵语 *niwāg*（音乐）或中古波斯语 *nw'g*（音乐），<sup>[26]</sup> 故知她是鄯善外道一位乐神。在尼雅出土佉卢文文书（193 和 366 号）中，鄯善国精绝州某个村镇还用这位女神的名字命名。

楼兰百姓供祀账（686 号）提到的第三位鄯善外道神灵称作 *pakhi*。这个词不像印度雅利安语，很可能是大夏语 *bago*（天神）的形容词形式 *bagi*（天神的、神者），<sup>[27]</sup> 后者相当于婆罗钵语 *pākih*（纯洁、神圣）。<sup>[28]</sup> 《魏书·世宗纪》记永平二年（509）正月壬辰，“呶哒薄知国遣使来朝，贡白象一。”呶哒人信奉火祆教，所谓“薄知”似即大夏语 *bagi*（天神的、神者）。那么佉卢文 *pakhi* 意为“天神的”或“神者”。

耐人寻味的是，楼兰百姓供祀账（686 号）A 栏第 5 行提到楼兰有祆神庙，写

作 lamğa (神庙)。《大唐西域记》卷1记中也有“缚伽浪国”，德国学者马迦特将这个地名的胡语原文比定为 baghlan。<sup>[29]</sup> 其实，这个地名相当于大夏语 bagolaggo (神庙) 或摩尼教粟特语 βγδ' n' k (神庙)。<sup>[30]</sup> 这两个伊朗语词的后一成分 -laggo 或 -δ' n' k 就是楼兰百姓供祀账所谓 lamğa，意为“庙宇”。由于这件文书提到的神都和祆教有关，它在这件文书中当表示祆神庙。

尼雅佉卢文书(418号)中出现 denuğa 一词。巴罗怀疑源于阿维斯塔语 daenā (宗教的、教徒)。<sup>[31]</sup> 不过从词形看，它或许直接来自婆罗钵语 denig (祆教的、祆教徒)。<sup>[32]</sup> 这件文书写于鄯善王安归伽36年。文中提到一位好心的和尚收养了祆教徒阿莫托的女儿，后来把她嫁给一位佛教法师。<sup>[33]</sup> 看来，鄯善佛教徒对异教徒相当宽容，不仅和睦相处，甚至相互通婚。

火祆教在鄯善的流行直迄唐代。敦煌唐写本《沙州图经》卷5提到鄯善石城镇有“一所祆舍”。<sup>[34]</sup> 可惜下文残缺，石城镇这所祆教法堂的详情不得而知。贾耽《皇华四达记》提到播仙镇以西某地曰“祆井”。播仙镇乃且末别称，且末以西的“祆井”似为塔里木盆地火祆教徒另一活动场所。

陈垣先生早年提出“中国之祀胡天神，自北魏始”，而唐长孺先生根据《晋书》有关记载将祆教入华年代从6世纪初提到4世纪前半叶。<sup>[35]</sup> 我们的研究表明，火祆教在塔里木盆地流行年代不晚于公元3世纪，而在塔里木盆地西部的最初流行至少要追溯到公元1世纪。

(原载《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 注释：

[1] Wang Jiqing, "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 Manuscripts from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XXIV-1, 1998, pp. 23-76.

[2] J. Mirsky, *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译本参见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第459-463页。

[3] 张力、于江：《斯坦因第四次入新简述》，见《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第111-114页；王冀青：《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见《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第98-110页；冯锡时：《法显西行路线考辨》，《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298页。

[4] A.M. Boyer et al.,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II, Oxford, 1920-1929.

[5] T. Burrow, "Further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Niya," *BSOS*, IX-1, 1937, pp.111-123.

[6] 据王冀青论文所引斯坦因1931年9月18日给拉普逊的信译出，Wang Jiqing, *op.cit.*, p34.

[7] 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资料综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7-68页。

[8] 承蒙王先生告知上述情况，谨致

谢忱。

[9] 林梅村：《楼兰鄯善王朝的最后所在地》，《燕京学报》新三期，1997年，第257-271页。

[10] T. Burrow, *op.cit.*, 1937, p117.

[11] A.M. Boyer et al., *op.cit.*, 1920-1929, p.150.

[12]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6-87页。

[13] 林梅村：《佉卢文时代的鄯善王世系》，《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40页。

[14] 林梅村：《新疆和田出土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跋》，原载《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第89-107页；收入《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13-215页。

[15] H.W.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436.

[16] D.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6.

[17]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1937, p.86.

[18] H.W. Bailey, *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New York, 1982, pp.48-51; P.O. Skjaervo, "Khotan: An Early Centre of Buddhism in Chinese Turkestan," A paper submit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 Los Angeles,



1993, p.3.

[19]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8-99页。

[20] 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0, pp.139-140.

[21]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单位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22]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39-240页。

[23] G. Azarpay et al., *Sogdian Painting*, Universti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30.

[24] M. Mode, "Sogdian Gods in Exile – Some Iconographic Evidence from Khotan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Excavated Material from Sogdian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2, 1991-1992, pp.179-214.

[25] 田边胜美、前田耕作(日)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アジア卷》,

东京,小学馆,1999年,图版241。

[26] 参见D.N. MacKenzie, 前掲书, 1971年,第60页。

[27] G. Djelani Davary, *Baktrisch Ein Wörterbuch auf Grund der Inschriften, Handschriften, Münzen und Siegelsteine*, Heidelberg: Julius Groos Verlag, 1982, pp.171-172.

[28] D.N. MacKenzie, *op.cit.*,p.64.

[29] 季羨林等著:《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3页。

[30] G. Djelani Davary, *op.cit.*,p.172

[31] T. Burrow, *op.cit.*,1937,p.26.

[32] D.N. MacKenzie, *op.cit.*,p.60.

[33] T. Burrow, *op.cit.*,p.84.

[34] 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97页。

[35] 陈垣:《火袄教人中国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5-307页;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416-417页。

## 勒柯克收集品的五件 犍陀罗语文书

本文是勒柯克收集品的五件直体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的初步解读报告。这批文书是在中国西部库车地区著名的克孜尔千佛洞发现的，现藏德国柏林，属于勒柯克收集品（Le Coq collection）。

直体佉卢文（Formal Kharoṣṭhī），是丝绸之路北道流行的一种中亚死文字。从文字类型看，它和丝绸之路南道及中亚其它地区流行的佉卢文非常接近，又不完全相同。由于这种文字最初发现于古代龟兹（今新疆库车），所以英国语言学家贝利（H.W. Bailey）教授建议命名为“龟兹佉卢文”（Kuci Kharoṣṭhī）。<sup>[1]</sup>近年开始知道，类似的文字亦见于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地区。所以德国中亚古文字学家桑德尔（Lore Sander）建议将这种文字重新命名为“直体佉卢文”，以便和阿育王碑铭、贵霜碑铭及尼雅文书采用的标准的、斜体类型的佉卢文相区别。<sup>[2]</sup>我们倾向于接受她的建议，称这种文字为“直体佉卢文”。

早在20世纪初，直体佉卢文就被发现。由于它和人们通常见到的佉卢文不太一样，出现许多新符号，所以一直没能解读。我们最近在勒柯克收集品中意外发现两件吐火罗犍陀罗双语文书，凭借这两件双语文书的吐火罗语部分，我们解读了它们的直体佉卢文部分，从而发现直体佉卢文拼写的是一种吐火罗—犍陀罗混合语。<sup>[3]</sup>这个发现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解读勒柯克收集品中另外五件直体佉卢文书。本文原用英文写成，分导言、转写和翻译、字母分析和词汇四个部分。<sup>[4]</sup>为便于广大中国读者了解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本文把前两个部分翻译成中文。

### 一 导言

公元2—7世纪，佉卢文犍陀罗语（或称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西北俗语）在中国西

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许多绿洲王国被普遍用作官方文字和佛教经堂用语，包括鄯善、和田、疏勒、龟兹、焉耆和高昌等王国。佉卢文书大多出自丝绸之路南道诸国的古代遗址，只有少数文书发现于丝绸之路北道古代遗址。就目前所知，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考古探险队都在丝绸之路北道发现过佉卢文书，分别属于伯希和收集品、勒柯克收集品和大谷收集品。1986年，我们曾经撰文讨论新疆库车苏巴什佛教寺院发现的一个直体佉卢文题记，属于勒柯克收集品。<sup>[5]</sup> 近年美国印度学家邵瑞琪 (Richard Salomon) 校勘出版了伯希和在新疆发现的一些佉卢文贝叶经残片。然而，这些贝叶经拼写的语言并非佉卢文通常表达的犍陀罗语，而是佛教混合梵语。<sup>[6]</sup> 本文讨论的五件文书也出自库车地区，属于勒柯克收集品，目前分别收藏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zu Berlin) 和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在德国印度学家威勒 (Klaus Wille) 博士的帮助下，柏林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费斯特勒 (Hartmut-Ortwin Feistel) 博士从勒柯克收集品中一共找到六件佉卢文木牍。据我们研究，其中两件是吐火罗—犍陀罗双语文书 (编号为 T III 155.1-2)，吐火罗语用婆罗谜文书写，犍陀罗语用直体佉卢文书写。其余四件为直体佉卢文犍陀罗语书 (编号为 T III MQ 01、020、169 和 224)。从文书编号可知，这六件文书是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三次 (皇家第二次) 中亚考察期间 (1906—1907)，在新疆库车地区克孜尔千佛洞发现的，发现点在第 01、020、155、169 和 224 号遗址。此外，勒柯克收集品中还有一件直体佉卢文书。这件文书背面绘有一幅佛像，所以当作艺术品收藏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这件文书没有原始编号，博物馆藏品编号为 MIK III 7389。文书形式与勒柯克收集品另外几件佉卢文书没什么差别，估计是和其他几件直体佉卢文书一起在克孜尔石窟寺发现的。据印度学者跋达查娅 (C. Bhattacharya) 调查，这件文书出自克孜尔石窟所谓 Last Temple (最后神庙) 或 Last Enclosure (最后围墙)，时代断在公元 7 世纪。<sup>[7]</sup> 费斯特勒博士寄来了这些文书的彩色照片，并写信介绍了这些文书各方面情况。同时，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亚尔迪茨 (Marianne Yaldiz) 寄来她们收藏的带佛像的那件文书的照片。为便于研究，我们把这七件文书的相关数据列表如表 1：<sup>[8]</sup>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这七件文书简称为“勒柯克收集品 1-7 号文书”。勒柯克收集品 6-7 号文书是双语文书，我们将另拟专文讨论。<sup>[9]</sup> 尽管这些文书采用同一类型的木牍，但是内容却截然不同。勒柯克收集品 1-3 号文书是残文书，只剩文书

表1 德藏直体佉卢文一览表

新号	材料	原编号	正面	背面
Kh 1	残木牍	MIK III 7389	直体佉卢文	佛像
Kh 2	残木牍	T III MQ 169	直体佉卢文	无字
Kh 3	残木牍	T III MQ 020	直体佉卢文	直体佉卢文
Kh 4	木牍	T III MQ 224	直体佉卢文	婆罗谜文
Kh 5	木牍	T III MQ 01	直体佉卢文	直体佉卢文
Kh 6	木牍	T III MQ 155 (1)	直体佉卢文	婆罗谜文
Kh 7	木牍	T III MQ 155 (2)	直体佉卢文	婆罗谜文

下半部。其中1号文书背面绘有一幅佛像（插图1）。

印度艺术史家跋达查娅（C. Bhattacharya）最先注意到这幅画背面写有佉卢文，她从绘画风格分析，认为佛画的创作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sup>[10]</sup> 德国中亚古文字学家桑德尔博士也讨论过这件文书，认为佛像是后来画的，并在文书废弃后用作祷告牌。<sup>[11]</sup> 文书中提到一些女供养人，她们想从佛陀的教诲中寻求觉醒。文书大量使用佛教术语，例如：*maha (na) ya*（=梵语 *mahānāya*，伟大的导师）、*ropasta*（=梵语 *rūpastha*，有形的）、*maṣida*（=梵语 *maṛṣita*，宽恕）、*vakṣana*（=梵语 *vakṣaṇa*，元气）*stema-dakṣeṇaya*（=梵语 *sthema-dakṣiṇiya*，静立的圣人或立佛）等。<sup>[12]</sup> 可惜这个残片留下的内容太少，无法得出更多的结论。

勒柯克收集品2号文书读起来像是一则现代报刊上的新闻，内容涉及一桩住宅抢劫案。一个龟兹女贼洗劫了一所房子，不仅偷盗了房东的珠宝，诱拐了房东的女奴，而且拐跑了房东的儿子，以至于房东不得不计划再买一些女奴。直体佉卢文表示“女奴”的词写作 *kkole*，相当于尼雅文书的 *kuḍi*（养女）。<sup>[13]</sup> 库车的古称“龟兹”在这件文书中写作 *koṣiya*（龟兹的），和吐火罗B方言完全一致；<sup>[14]</sup> 而在尼雅文书中，“龟兹”一词通常写作 *kuci*（龟兹）。<sup>[15]</sup>

勒柯克收集品3号文书似乎摘自公元1世纪印度著名哲学家马鸣（Aśvaghoṣa）的某个戏曲作品。马鸣在印度文学史享有崇高的地位，被视为印度诗人伽厘达萨（Kālidāsa，约公元5世纪）以前最伟大的印度诗人和梵剧之父。在3号文书的第8行，马鸣的作品谓之 *aśpaḡiṣa-ṣolpeyo*（马鸣的偈颂）。所谓 *solpeyo*，旧译“偈颂”，在尼雅文书中写作 *ṣulḡa* 或 *ṣilyōga*，相当于梵语的 *śloka*（赞美诗）。同一词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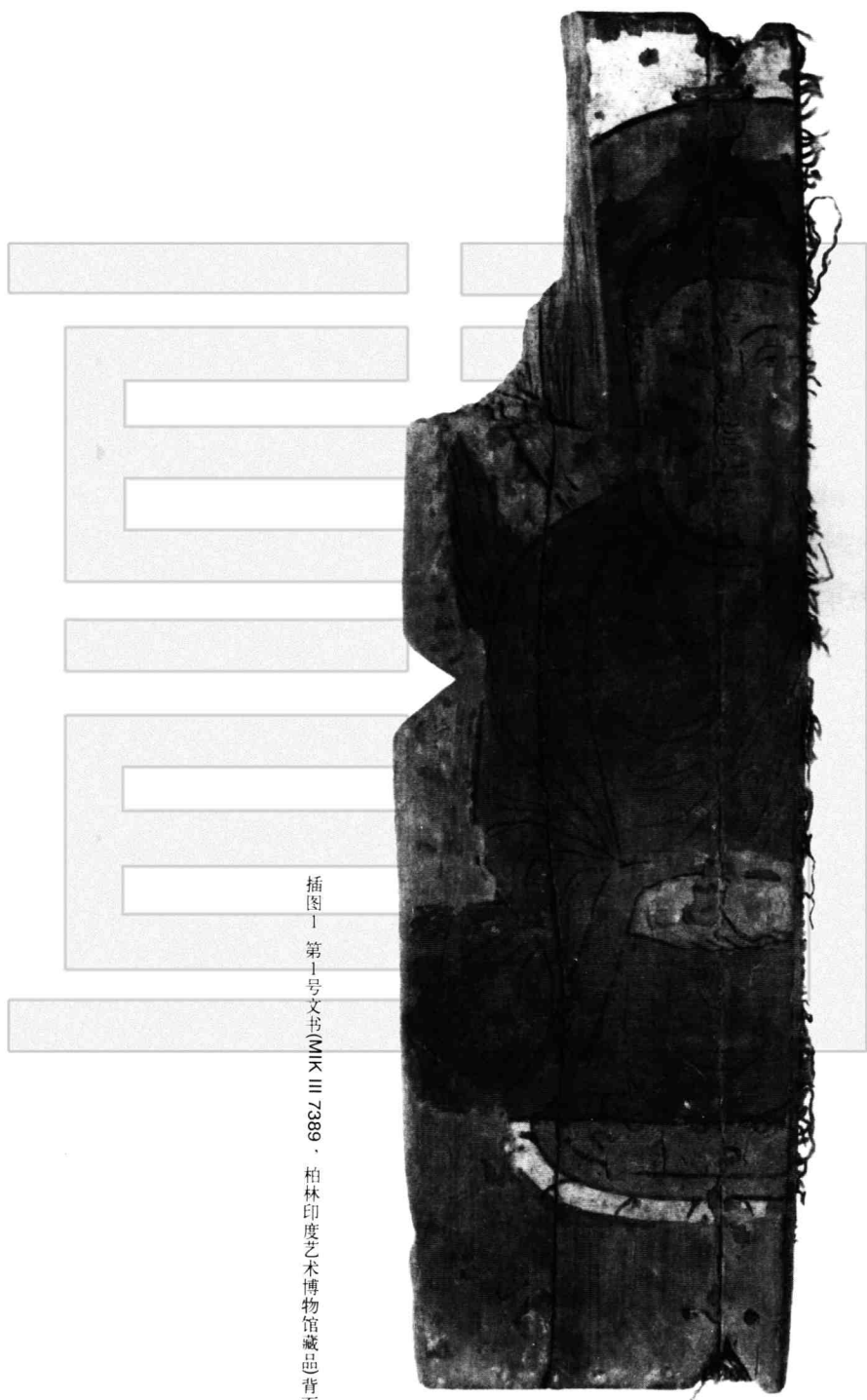


插图 1 第一号文书(MIK III 7389) · 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品背面

借入吐火罗语，吐火罗语 B 方言作 *ślok*，A 方言作 *ṣlyok*。<sup>[16]</sup> 在一份梵语和吐火罗语双语文书中，该词用来表示佛教梵语的 *gātha*-（偈颂）。<sup>[17]</sup> 直体佉卢文的元音 *i* 有时与元音 *u* 或 *o* 相互替代。例如：直体佉卢文 *godiva*（小麦）相当于犍陀罗语 *goduma*（小麦）；直体佉卢文 *tamo*（此时）相当于犍陀罗语 *taṃmi*（此时）。因此，3 号文书的 *aśpaḡīsa* 是梵语 *aśvaghōṣa*（马鸣）的犍陀罗语形式。这位印度诗人毕生致力于普及梵语诗歌（*kāvya*）。该词出现于 3 号文书第 9 行，但是按照吐火罗语的读音，写作 *kawya*（诗歌）。相关的句子如下：

/// bhara orpoḡe ... te ṇarthe achi asmaka taṇuvaḡa dāsa kawya “舞台上的一场搏斗……[舞蹈者拥有]这些舞蹈，而我们拥有他的诗歌。”

既然这文书第六行出现 *naṭaṃ*（= 梵语 *naṭa*，舞蹈者）和 *ka viṃ*（= 梵语 *kavi*，歌手或诗人）等，<sup>[18]</sup> 那么同一文书第九行那个含义不明的 *ṇarthe* 可能是梵语 *naṭa*（舞蹈）一词的俗语形式，而 3 号文书很可能出自马鸣某个剧本。可惜过于残破，无法验证它究竟出自马鸣哪个作品。

早在 1911 年，德国印度学家吕德斯（H. Lüders）就在克孜尔石窟寺出土的梵文残片中鉴定出马鸣创作的三个戏曲。<sup>[19]</sup> 1988 年，德国印度学家哈特曼（J-W. Hartmann）在勒柯克收集品中又发现一些马鸣戏剧作品残片。<sup>[20]</sup> 然而，犍陀罗语文献中的马鸣剧本残卷，我们还是头一次发现。

在勒柯克收集品 3 号文书中，这类文书称作 *tsera-kāsta*（寺院文书）。该词后一成分相当于梵语 *kāṣṭha*（木牍），<sup>[21]</sup> 但前一成分既不是犍陀罗语或其它印度俗语。我们认为该词可能是吐火罗语借词，相当于吐火罗语 B 方言的 *tsāro*（寺院）<sup>[22]</sup> 此外，我们还发现一些吐火罗语借词。例如：3 号文书的 *orpoka*（= 吐火罗语 B 方言 *orponka*，讲坛），*orpoḡe*（= 吐火罗语 B 方言 *orponka*，舞台），*kośiya*（= 吐火罗语 B 方言 *kośiññe*，龟兹的）和 *moka*（= 吐火罗语 B 方言 *moko*，长老）等。<sup>[23]</sup> 这就清楚地表明，直体佉卢文拼写的是一种吐火罗—犍陀罗语混合语。我们发现直体佉卢文还深受伊朗语影响。例如：3 号文书第 10 行有个词，写作 *divinu*，既不是犍陀罗语，亦非吐火罗语，估计来自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的 *dēwān*（档案，文书）。<sup>[24]</sup> 丝绸之路古代语言的交流盛况，在这件文书中得到生动地体现。

尽管勒柯克收集品 4-5 号文书完好地保存下来，但是字迹却十分模糊。这两件

文书都带有龟兹王纪年，龟兹王名拼作 *ysaṣape*，显然是龟兹王金花的吐火罗语名称 *ysaṣa-pyāpyo* 的缩写。在新疆库车出土的混合梵语文书中，这位龟兹王亦名 *suvaṃapuṣpa*（金花），两唐书的《西域传》译作“苏伐勃驮”。苏伐勃驮统治龟兹王国约在6世纪末至7世纪初。那么这些直体佉卢文的年代不晚于公元7世纪初。

勒柯克收集品6号文书的吐火罗语部分提到另一位龟兹王。相关句子读作: *śak kṣuna kṣe[mārjuni lānti]*“国王安光（*Kṣemārjune*）在位第六年”。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在库车发现的一件吐火罗语文书（编号 G-Su34.1）也提到这位龟兹王。据法国学者皮诺（*G.-J. Pinault*）解读，相关句子读作: *skas kṣuntsa kṣemārjuni lānti yakwe-pikulneśkañce memne*“国王安光（*Kṣemārjune*）在位六年十月”。<sup>[25]</sup> 考虑到6号文书和4-5号文书都写有直体佉卢文，安光和苏伐勃驮在位年代应相去不远。关于这个时期的龟兹王世系，《新唐书·西域传》有详细记载。该书提到6世纪末至8世纪初，一共有7位龟兹王，但是没有一个名字和安光的名字相符。由此推测，安光统治龟兹的年代应在苏伐勃驮之前，也就是公元6世纪末。为便于今后的研究，我们把《新唐书·西域传》、吐火罗语文书和直体佉卢文提到的龟兹王列表如下（见表2）：

据以上讨论，直体佉卢文书的年代大致在公元6世纪至7世纪之交，是我们目前所见年代最晚的佉卢文书。

## 二 转写和翻译

我们的罗马字转写仍采用拉普逊体系，但是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对其中一些错误作了修订，如 *cha* 改读 *kṣa*；*ḍa* 改读 *ḍa*；*ai* 改读 *a'i* 等。<sup>[26]</sup> 据图版 2-9，我们对这五件文书的转写和翻译如下：

### 拉丁字转写

#### 1号文书

##### 正面

1-4 ... (文书上半部残缺，行数仅是一个估计)



5 ... ši vara ...

6 maha(na)ya(sya) mu(kh)ena ropasta yatra wātsale stape dida speye  
vakṣanena avakṣane kṣa(m)di dida stema dakṣenaya

7 ///yovadi strike (ca) O namne śikṣaneyo/ maṣida manane chi[dita] ///

8 /// potra ... /

2号文书

正面

1-4 ... (文书上半部残缺, 行数仅是一个估计)

5 ... (此行只留下半个字母, 无法释读)

表2 公元7-8世纪龟兹王世系

龟兹王	胡名	梵名	主要事件(据《新唐书·西域传》)
安光(约6世纪末)	Ksemārjune	Ksemārjuna	此王仅见吐火罗语文书(伯希和收集品 G-Su34.1)和吐火罗一健陀罗双语文书(勒柯克收集品 T III MQ 155.1-2)
苏伐勃跋(约6世纪末-618)	Svarṇabūṣpe Ysasape Ysāsapyāpyo	Suvamapuspa	高祖受禅(618), 龟兹王苏伐勃跋遣使来朝。寻卒。其子苏伐叠立
苏伐叠(618-647)	Swarnatepe	Suvarnadeva	贞观二十一年(647)十二月, 龟兹王苏伐叠死。弟河黎布失毕立
河黎布失毕(647-658)	Haribūṣpe	Haripuṣpa	贞观二十一年(647), 阿史那社尔一度立王弟叶护。寻河黎布失毕复立
素稽(658-675-?)	Sujāte		显庆三年(658), 立河黎布失毕子素稽为王。唐上元中年(675), 素稽献银颇罗, 名马
延田跌(692)			天授三年(692), 王延田跌来朝
白莫苾(? -719)			开元七年(719)七月, 王白莫苾死。其子多匝嗣位, 改名孝节
白孝节/多匝(719-730-?)			开元九年(721)六月, 王白孝节献马及狗。唐开元十八年(730), 王遣弟孝义来朝

6 lavatati yašo śāle/ lavatati yaši ... kritiya kośiya striya bhaśa nama/ ha-

7 rarthe/ lavatati yatso kkole/ lavatati ya... śā bhaśa asmaka goṭhe naḡa  
khyayati śa hāra-

8 tvace/ sva yaśa potra tañatha muṣitaka/ O asmaka atsamayā dāsi yena  
kriniśāte/

3号文书

正面

1-5 ... (文书上半部残缺，行数仅是一个估计)

6 /// (a)śara/ ka... (ga)chama naṭam ka(vi)ṃ chadā

7 /// + che/ śoka-pati ... ṇi asmaka komāra emkṣanasya a-

8 /// /aśpaḡiśa ṣolpeyo/ ... [a]śpeṇa aviṃdā bhamne halya bhavati

9 ///kṣa bhara orpoḡe/ ... te ṇarthe asti asmaka tanovaḡa dāśa kawya

10 /// [tse]rasya divinu-pataḡa/ O

背面

///sare/ iyo naveḡe/ tsera-kāste O ṣolpeyo-orpoke

4号文书

正面

1 [saṃ ... maśe] 4 divaśe 10 4 4 taṃ kṣana ko- O ci-maharaya-devapotra-e  
(spā)rasya ýśa(śape) asti ota ...

2 + le[n]aṃ[ma]-potra eśa lenaṃma-potra emṇa (le)naṃma è śanayaṃti/ (ā)

hudṇi aśaka arti-dama yaṃ vaūśya bhavati

3 śpaśarthe achi asmaka tanovaka tāśa ṇirjataka kośiya koma[ra]ka ajhake  
naṃma śpamaṃnaye ajo-padaye adalitaṃ-

4 O [ti] yaṃ (ba)dhaka-(tha)re ma rupa-maśi stri-bramaṇaḡa asti śruptaśśa  
[bra]managa na maṃtri jeṭha arta lenaṃma bharya yakṣ[i]- O

5 (ni) naṃma spaśa eśata lenaṃma-potra avi lenaṃma maṣātati badhaka-  
thare mama dāyaṃ maṇā śi ṇiśaṃ [ta] ///

6 + + + yakṣa-pada-mule gośonaśa ýśarne stina pada/ iśa ṇaiyi gośo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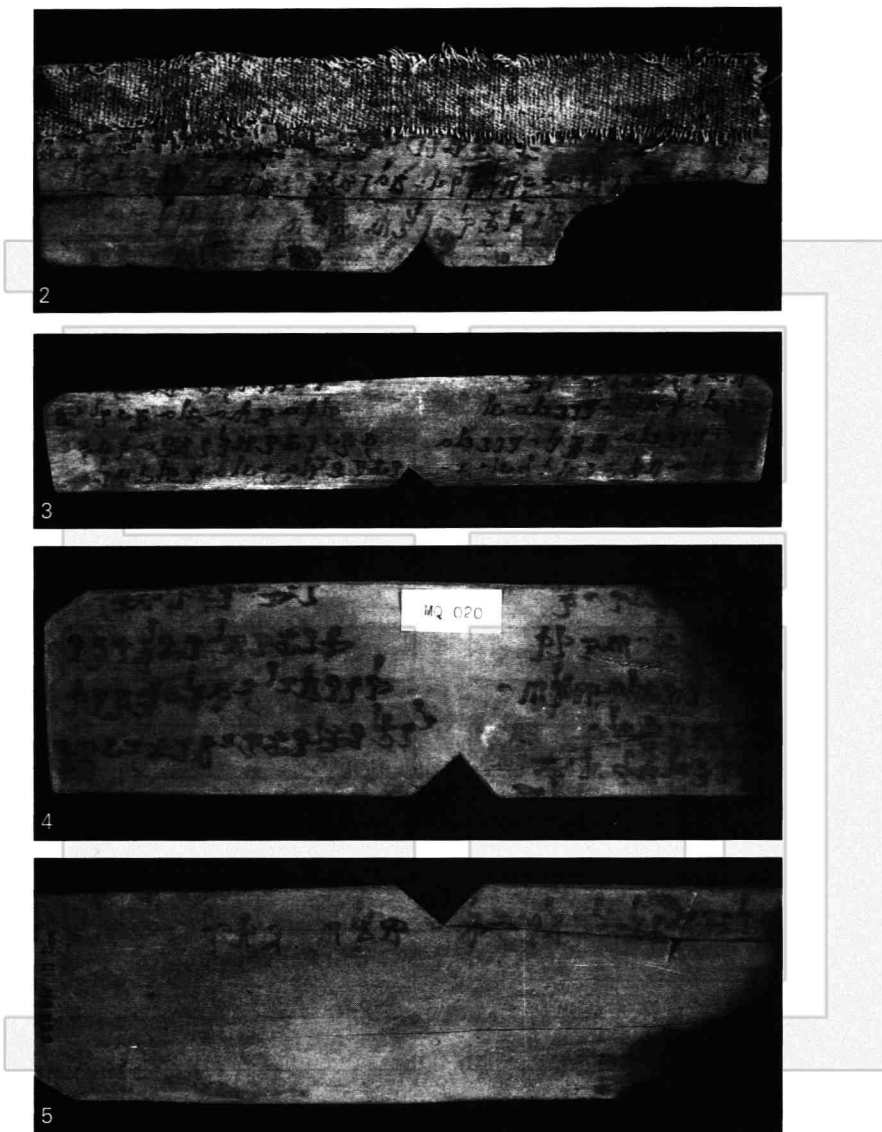


插图 2 第 1 号文书(MIK III 7389, 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品)正面

插图 3 第 2 号文书(T III MQ 169, 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 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部)正面

插图 4 第 3 号文书(T III MQ 020, 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 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部)正面

插图 5 第 3 号文书(T III MQ 020, 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 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部)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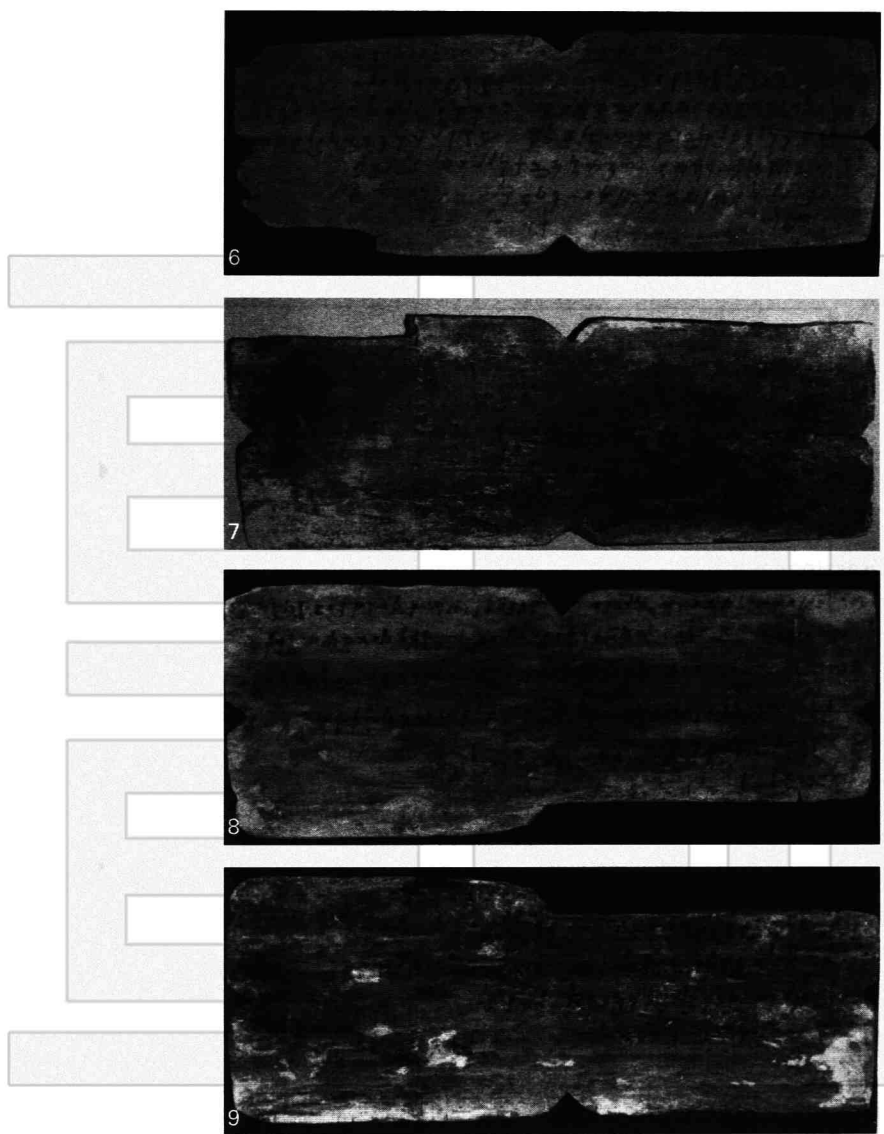


插图6 第4号文书(T III MQ 224, 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 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正面

插图7 第4号文书(T III MQ 224, 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 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背面

插图8 第5号文书(T III MQ 010, 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 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正面

插图9 第5号文书(T III MQ 010, 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 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背面

jayataṣa prapada/ ṅagha/ se

7 + + + ṣaṅimre/ gośa ... ṣaṅimre/

8 ...

背面(婆罗谜文)

1 ... ikrainā

2 ... daja (?) nauśca

3 ... na

5 号文书

正面

1 [saṃ] ... 10 maṣe 4 4 1 divaṣe 4 4 ta kṣanya (k)oci-maharaya- O yaśasya  
yśaṣa(pe) asti ahona praya rayasya dāṣapati mamtra + +

2 se ha + atra + + asti a + + + + ne rta + + ca bhiṣṇaṇi athṛta nata mamata  
soniyasya parinaṃdi tatra koṣiya kula moka

3 + no k[o]ṣiya (kula) moka atra bhataṛiya bhiṣṇaṇi athṛta nata ye kona  
sokhayamti tena sahā ima śodaṃne chinu athṛta

4 O nate + + + yena eda jesta vṛṣabha kṛinadi so kamū namā kṣi(ti)pa tatra  
tra(kh)mena 4 1 1000 asti ṣere paṃṇapori vi-

5 vi(ya)[ri] yasya tatra (e)ṣati x x ma x ma x na ya vi.i manata ...

6 + + (a)rdha ena mita ṇe ...

背面

1 ... na .ṃno ...

2 ... ka mūlya mūlyahi 4 1 1000 + [i]chayate na + + viharena va ...

3 + + + +kai nama tasya vaṃti vikramṇiti ṣerena spayaṃ/ ... śrama(ṇa) ...

4 dane ta śramaṇa kamaya devasya sva + + ardha tapami mu ...

5 ... bhaṣaṃna-bhekṣe ...

翻译

1 号文书

正面

6 在伟大的法师指导下，他们才具有了形。因此，他们赞美积德行善。他把宽容和元气赋予没有元气的人。向着静立的圣人（立佛）

7 ……这些女孩和夫人躬身寻求觉醒。宽恕并在反省中消除……

8 …… 儿子……

2号文书

正面

6 她偷盗……并洗劫了这些房子。这个刚买来的龟兹女，名叫光明（Bhasa）。

7 她不仅偷了珠宝，而且诱拐了女奴……就是这个光明，给我家造成损失。

8 我们美丽的儿子塔那托（Tañatha），佩戴珠宝，身着皮衣，也被她拐跑了。

因此，我们只好再买一些不带契约的女奴。

3号文书

正面

1-5 ……（残缺，行数仅是一个估计）

6 ……徒劳无益……我们都去……（落幕）遮盖了舞蹈者和歌手……

7 ……悲伤之主……我们的孩子，此时此刻……

8 ……马鸣的诗歌……骑着马，不在寻找。于是发生了一场争夺财产的搏斗。

9 ……在舞台上搏斗……（舞蹈者拥有）舞蹈，而我们拥有他的诗歌。

10 ……这个写在木牍上的文书属于（寺）院所有。

背面

……对刚出家的僧人来说，这些寺院木牍文书就是诗歌的讲坛。

4号文书

正面

1 时惟伟大的龟兹王、天子、金华（Ysaṣape）王在位第……年4月18日，是时……

2 ……勒那摩（Lenamma）之子。勒那摩夫妇生了此位勒那摩之子。布施供物是对我们的痛苦的一种惩罚，它将给我们带来财富。

3 在我们岳母的财富中有我们的财产，也即名叫阿杂克 (Ajhake) 的小男孩，来自龟兹。从即日起，他们要瓜分这笔财产。

4 这些负有罪责的人不是长着一幅黑脸的、丑陋的女婆罗门，因为丑陋的女婆罗门不会倾听（佛的）教诲。这位母亲最大的愿望，是让勒那摩的妻子。

5 药叉尼皈依佛门。勒那摩宽恕了勒那摩之子的罪责，而布施亦使我感到宽慰。

6 ……在药叉神足下，在胜利之神足下。

7-8 ……

背面（婆罗谜文）

1-3（过于残破，无法释读）

5 号文书

正面

1 时惟伟大的龟兹王、威德宏大的金华 (Ysasape) 在位第……年9月8日，现在奴隶之主向尊敬的藩王致言（如下）：

2 ……今有……在此……他们不断地向比沙尼 (Bhiysani) 鞠躬，龟兹长老对她的无私奉献感到高兴。

3 此地龟兹老人们不断地向女供养人比沙尼鞠躬，不仅对她的美德感到欣喜，而且为她解囊相助感到高兴。他们不断地……



插图10  
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谷后区



4 向……鞠躬，因为他买了最优秀的公牛。为此，名叫伽摩（Kamu）的藩王支付了5000德拉克麦(drakhma)钱。上座长老帕尼普里（Panyapuri）

5 要给他派一些学生……无（私）……

6 ……的一半已经称量，他们……

背面

1 ……

2 ……他愿意支付5000……目厘（mūlya）钱……由寺院……

3 他的名字叫……凯，在长老的帮助下买给他。我们……僧人……

4 供养人为了……神的利益，向僧人伽摩耶（Kamaya）（布施）……一半在苦修之中。上座长老列……

5 ……乞讨的光辉……

正如考古发现所揭示的，古代龟兹王国是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传播中心，并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直体佉卢文的发现和解读，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丝绸之路北道历史文化的知识。

补充说明：这批文书的出土地点“最后窟”（Last Temple），是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谷后区（插图10）内一座佛教石窟。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为谷后区为八个佛教洞窟编了号 [Cf. Albert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e-Turkistan, ii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Kuca, Qarasahr und in der Oaser Turfan* (Berlin, 1912), s. 169]，所谓“最后窟”就是今天克孜尔石窟的谷后区第8窟，新编号为克孜尔石窟第221窟，结构属于僧房窟（参见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第246—247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林立同学提供上述资料，谨致谢忱。

## 注释：

[1] H.W. Bailey, "Taklamakan Miscellany," *BSOAS*, 36, London, 1973, p.226.

[2] L. Sander, "Early Prakrit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Xinjiang (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 Paleography and Literary Evid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st Schools," in J. McRae and J. Nattier (eds.), *Collection of Essays 1993: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aipei: Fogua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1999, pp.61-106.

[3] Lin Meicun, "Two Tokharo-Gāndhāri Bilingual Docu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 Coq Collection," 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9-97页。

[4] "Five Gāndhāri Docu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 Coq Collection," *Cultura Antiqua*, vol. 55, Kyoto, 2003, pp.1-15.

[5] Lin Meicun, "A Formal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Subashi," 《段文杰先生治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兰州，敦煌研究院，1996年，第328-347页。

[6] R. Salomon,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 Fragments in the Pelliot Collectio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EI*, 16, 1998, pp.123-160.

[7] C. Bhattacharya, *Art of Central*

*Asia*, Delhi: Agam Prakashan, 1977, pp. 61-62 and note 35.

[8] 参见费斯特勒博士2001年10月2日给作者的信。这里再次感谢费斯特勒博士和亚尔迪茨博士的帮助，允许我们使用这些珍贵照片。这里，我们还要感谢桑德尔博士提供的T III MQ 224号文书背面照片，她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保存的勒柯克档案中发现这件文书的底片。从勒柯克当年拍摄的照片上，仍可看到文书背面写有零星的婆罗谜文。

[9] Lin Meicun, "Two Tokharo-Gāndhāri Bilingual Docu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 Coq Collection," 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9-97页。

[10] C. Bhattacharya, *op. cit.*, pp. 61-62 and note 35.

[11] L. Sander, *op. cit.*, p.71 note 23.

[12] 荻原云来编：《梵和大辞典》，东京，1940年，第669、1135、1163、1522和1009页。

[13]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83.

[14] Douglas A. Adams, *A Dictionary of Tocharian B, Leiden Studies in Indo-European 10*, Amsterdam - Atlanta, GA, 1999, p.186.

[15] E.J. Rapson and P.S. Noble,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9, p.339.

[16] T. Burrow, *op. cit.*, p.127.

[17] Douglas A. Adams, *op. cit.*, p. 645.

[18] 荻原云来, 前掲书, 第654和330页。

[19] H. Lüders, *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 Turfan-Expeditionen, Kleinere Sanskrit-Texte. Heft I; Berlin: Georg Reimer, 1911; "Das śāriputraprakaraṇa, ein Drama des Aśvaghōṣa,"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1, pp.388-411. For a new study on Aśvaghōṣa's drama, see B. Bhattacharya, *Aśvaghōṣa, A Critical Study of his Authentic Kavyas, and the Apocryphal Works*, Santiniketan: Santiniketan Press, 1976, pp.178-191; R. Salomon, "Aśvaghōṣa in Central Asia: Some Comments on the Recensional History of his Works in Light of Recent Manuscript Discoveries," in J. McRae and J. Nattier (eds.), *Collection of Essays 1993: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 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aipei: Fogua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1999, pp.220-263.

[20] J.-W. Hartmann, "Neue

Aśvaghōṣa und Mātṭceta-Fragmente aus Ostturkistan,"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I.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Jahrgang 1988, Nr. 2.

[21] 荻原云来, 前掲书, 第347页。

[22] Douglas A. Adams, *op. cit.*, p. 731.

[23] Douglas A. Adams, *op. cit.*, p. 123, p.186 and p.473.

[24] D.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41.

[25] G.-J. Pinault, "Epigraphie Koutchéenne," in Chao Huashan et al., *Sties divers de la région de Koutcha, Epigraphie Koutchéenn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1989, pp.137-138.

[26] E.J. Rapson and P.S. Noble,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9; R. Salomon, *Indian Epigraphy: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 Prakrit, and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 Glas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 Paleography*,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0.

稽胡是十六国至隋唐时期活跃于甘肃东部至山西北部的杂胡之一，最先关注稽胡史迹的是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他在《燕京学报》第39期（1948年）撰文，首次对稽胡进行系统研究。<sup>〔1〕</sup>此后，唐长孺、马长寿、林幹、周伟洲等学者相继加入讨论，于是稽胡史迹成了中古史研究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sup>〔2〕</sup>1994年，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E.G. Pulleyblank）教授撰文《稽胡——陕北晋西的土著居民考》，遂使稽胡史迹成为一个国际性研究课题。<sup>〔3〕</sup>

1999年7月，山西太原发现一座隋代浮雕石棺大墓（插图1）。墓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家出鱼国。祖父曾任北魏领民酋长，父亲改仕北方草原柔然汗国，任莫贺去汾达官。虞弘曾代表柔然出使西域，访问过波斯、吐谷浑诸国。北齐文宣帝时，虞弘回到中原，相继在北齐、北周和隋三朝为官。北周时，职掌祆寺和外交事务，隋开皇十二年（592）死在并州晋阳府第，终年59岁。<sup>〔4〕</sup>2000年7月，北京大学召开“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山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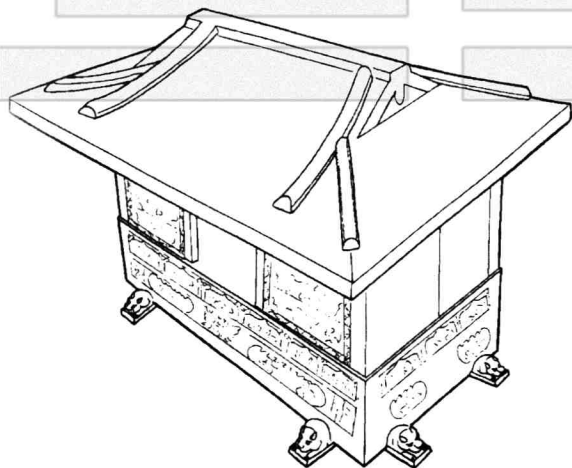


插图1  
虞弘墓石棺

捷所长、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和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在会上分别介绍了他们对虞弘墓志和石椁浮雕图像的研究成果。<sup>[5]</sup> 这些报道和研究使我们对虞弘墓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2000年夏，应张庆捷所长盛情邀请，我们到太原实地考察虞弘墓。<sup>[6]</sup> 据我们初步研究，虞弘家族实乃十六国以来活跃于中国北方的稽胡，族源或与中亚突厥系统民族有关。撰写此文，谈谈一点粗浅的认识，更为深入的探讨，则有待于各个领域专家们的参与。

## 一 虞弘之种族

虞弘墓发现后，太原虞氏究竟属于什么种族？引起中外学人的普遍兴趣，但迄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虞弘墓志说：“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骠城人也。”我们找到一些证据，说明虞弘之族属实乃十六国以来活跃于甘肃东部至山西北部的杂胡之一，北魏称“步落坚”，北周称“步落稽”，隋唐称“部落稽”，简称“稽胡”。<sup>[7]</sup> 《周书·异域上·稽胡传》记载：

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刘渊）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泾川）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然语言类夷狄，因译乃通。

虞弘墓为砖砌单室墓，带斜坡墓道，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长宽各3.8米，石椁外部造型基本采用汉式建筑结构，并使用汉文墓志，几乎无异于汉族墓葬。<sup>[8]</sup> 这和稽胡“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其渠帅颇识文字”完全相符。

十六国至隋唐时期，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可按语系分为四个系统：月氏、塞人、粟特、羯胡属于西胡，讲印欧语系的语言；氐、羌、党项、吐蕃属于西羌，讲汉藏语系的语言；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吐谷浑属于东胡，讲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言；鲜虞、丁零、敕勒、高车、铁勒、突厥、回鹘、黠戛斯属于北狄，讲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语言。既然稽胡“语言类夷狄”，稽胡语当属突厥语族。稽胡的族名“步落稽”，古音可读 buo-lak-kiei，<sup>[9]</sup> 疑为突厥语 balaq（鱼）之音译。在突厥语中，其名亦作 baliq 或 balux（鱼）。<sup>[10]</sup> 而虞弘恰为鱼国人，恐非偶然。

隋初一度依靠稽胡抵御北方突厥人,《隋书·高祖本纪上》记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一些稽胡将领因此立下赫赫战功而载入史册。虞弘时代,稽胡著名将领有鱼俱罗和虞庆则,《隋书》和《北史》有二人列传。

史载开皇十八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杨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sup>[11]</sup>杨素“路逢(鱼)俱罗,大悦,遂奏与同行。及遇贼,俱罗与数骑奔击,瞋目大呼,所当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飞。以功进位柱国,拜丰州总管。初,突厥数入境为寇,俱罗辄擒斩之,自是突厥畏惧屏迹,不敢畜牧于塞上”。<sup>[12]</sup>鱼俱罗是冯翊下邳(今陕西渭南市东北)人。西晋以来,冯翊就是北方游牧人频繁出没之地。《晋书·北狄传》记载:

惠帝元康(291-299)中,匈奴郝散攻上党,杀长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冯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后,北狄渐盛,中原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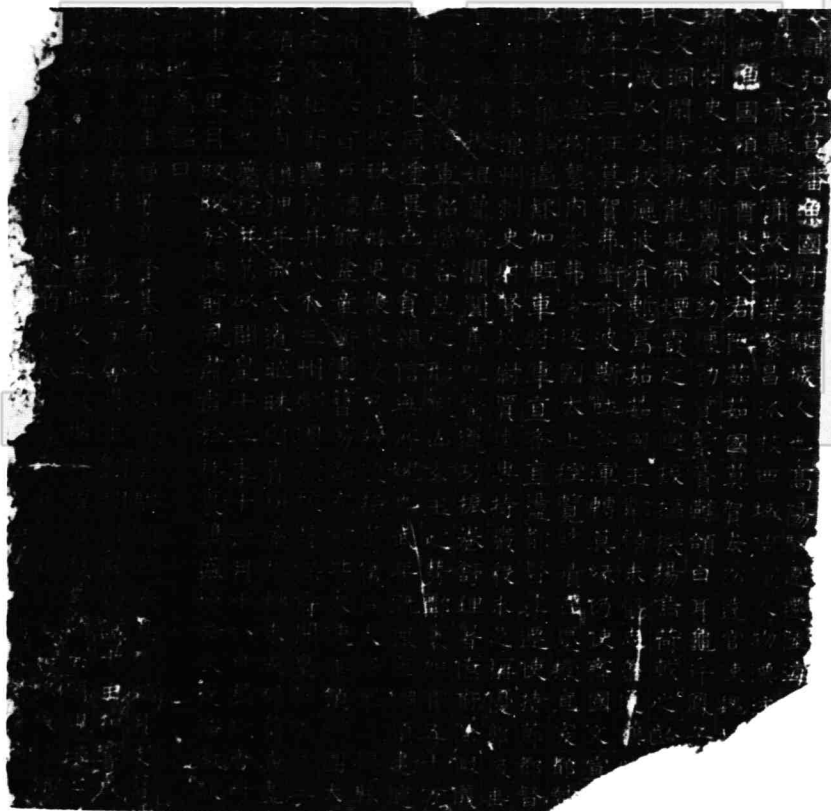


插图2 虞弘墓志

稽胡迁入长城以南后，一部分人慕仪中原文化而逐渐汉化，甚至讳言胡人身份而改用汉姓。虞庆则就是这样一位汉化稽胡。《隋书·虞庆则传》记载：

虞庆则，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父祥，周灵武太守。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長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鞬，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初以弋猎为事，中便折节读书，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为人。仕周，释褐中外府行参军，稍迁外兵参军事，袭爵沁源县公。

唐人林宝对灵武虞氏的族源已不甚了解。《元和姓纂》卷2灵武回乐县说：“状云，本自会稽徙焉。后周有沁源公虞祥；生庆则，隋右仆射、鲁公。孙操，唐长江令。”岑仲勉先生已指出其说有误。<sup>[13]</sup>虞庆则善骑射，通鲜卑语，自然和会稽虞氏无涉。从虞庆则本姓不难判断，此人当系稽胡。虞弘是鱼国人，他和虞庆则一样，本该姓鱼氏，二人皆因慕中原文化而改姓虞氏。

北魏正光五年（524），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人在汾、肆二州（今山西隰县和忻县）作乱，后被肆州秀容酋长尔朱荣派兵镇压，<sup>[14]</sup>这是步落稽首次见于史籍。

据美国突厥学家鲍培（N. Poppe）研究，古阿尔泰语词汇常带有一个不稳定的尾音/n/。这个尾音有时可释为复数语尾，相当于突厥语复数语尾-lar。<sup>[15]</sup>例如：蒙古语mori（马），复数作morin（马群）；<sup>[16]</sup>突厥语bod（部落），复数为bodun（诸部落）。又如：铁勒亦称“丁零”，茹茹或称“柔然”，结骨又作“坚昆”；三者分别为“铁勒”、“茹茹”和“坚昆”的复数形式，表示“铁勒族”、“茹茹族”和“结骨族”。<sup>[17]</sup>同理，“步落坚”实乃突厥语balaq（鱼）的复数形式，意为“步落稽族”或“步落稽部落”。

史书对北朝胡姓采用两种处理方法，一般采用音译，如柔然姓氏“郁久闾”（首秃）；有时也采用意译，鱼国即为“步落稽”的意译。此外，北朝人姓氏与其氏族或所在部落名称基本上是一致的。《魏书·官氏志》说：“姓则表其所由生，氏则记族所由出。”所以，从姓氏往往可以找出该姓所出氏族或部落。

据墓志介绍，虞弘祖先迁入黄河流域后，首先“徙赤县于蒲坂”。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乡。这个地方历史上是否有鱼氏？史无明载，不过蒲坂以西不足百公里的冯翔却早有鱼氏人居。《元和姓纂》卷29记载：“鱼姓，冯翔下邳。苻秦（351—394年）有鱼遵，元孙经，后魏吏部尚书，生徽、俊、代略。”<sup>[18]</sup>冯翔系“冯翊”之讹。下邳即“下邳”之误，因避拓跋珪讳，改作“下封”或“下邳”，故地在今陕西



渭南市东北。<sup>[19]</sup> 隋初鱼俱罗即为冯翊下邳人，后来下邳鱼氏在唐代居然发展为冯翊郡八大望族之一。<sup>[20]</sup>

虞弘和虞庆则皆从鱼氏改为虞氏，似属同一家族，那么虞庆则的家族史或许能向我们披露一些虞弘祖先的活动轨迹。《隋书·虞庆则传》说，“其先仕于赫连氏（407 - 431年），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可知鱼氏家族从蒲坂、冯翊一带北迁灵武约在5世纪初。志文提到：虞弘祖父鱼奴栖，早年任鱼国领民酋长。领民酋长是北魏赐予不在编户的北方部落酋长的一种官职。<sup>[21]</sup> 史载太延二年（436），北魏破薄骨律城。<sup>[22]</sup> 而鱼奴栖改任北魏鱼国领民酋长疑在是年。《魏书·杨播传附弟椿传》又载：

初，显祖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太和之末（499），叛走略尽，唯有一千余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诏许之，虑不从命，乃使椿持节往徙焉……遂徙于济州（今山东东阿西北黄河南岸），缘河居之。

灵武原名薄骨律，所谓“显祖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当指献文帝皇兴四年（470）击柔然降万余人之事。<sup>[23]</sup> 那么虞弘之父改仕柔然疑在470 - 499年之间，他们一家很可能是随柔然降户，从灵武亡命漠北的。

总之，稽胡属于讲突厥语的北狄系统民族。至少在4世纪中叶，就从欧亚草原某地迁入黄河流域，最初在山西永济至陕西渭南一带定居。5世纪初，鱼氏祖先入仕夏国赫连氏，迁到薄骨律城。北魏破蒲骨律后，虞弘祖父任北魏领民酋长。大约5世纪末，虞弘之父离开薄骨律城，随柔然降户亡命漠北，改仕柔然汗国。

## 二 尉纥麟与 b(a)krīn

虞弘墓志的第二个谜是尉纥麟城于今何处？虞弘之父改仕柔然后，曾以“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身份出使北魏。520年，柔然发生内乱，同时受到高车汗国的沉重打击，柔然可汗阿那瓌一度逃到洛阳避难。此后，柔然分裂为二部。西部以婆罗门为主，东部以阿那瓌为主。

据《北史·蠕蠕传》记载，正光二年（521）二月，“婆罗门遭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瓌”。大官当即达官，译自突厥官号 tarqan。

虞弘之父以“莫贺去汾达官”身份出使北魏，疑为婆罗门所遣“大官莫何去汾”等六位使臣之一。

虞弘早年也在柔然效力，“年十三（546），任莫贺弗，衔命波斯、吐谷浑，转莫缘”。那么尉纥麟城必在柔然境内，虞弘在该城出生，故称“尉纥麟城人”。

柔然乃游牧民族，“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毡帐为居，随所迁徙”。<sup>[24]</sup> 不过《梁书·西北诸戎传》提到：柔然于“天监中（约510），始破丁零，复其旧土。始筑城郭，名曰木末城”，丁零又称铁勒，这里当指高车汗国，王庭在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附近。<sup>[25]</sup>

《资治通鉴》称沃野镇（今内蒙古河套北）北有“木赖山”，突厥科罗可汗在此大破柔然邓叔子。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木赖山也可译作“木来山”，故疑木末城实乃“木来城”之讹。<sup>[26]</sup> 周伟洲教授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柔然筑此城是为了控制和防御高车，故可能在王庭的西南。”<sup>[27]</sup> 尽管松田寿男将木末城置于沃野镇之北有误，但是他对木末城系“木来城”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

木来，古音作 muk-leg。<sup>[28]</sup> 吐鲁番出土粟特语地名表（T.ii.D.94）也提到这个地名，写作 mykryk（部落名）。<sup>[29]</sup> 英国伊朗学家亨宁怀疑：该部落就是波斯史家拉施特（约14世纪初）《史集》所言 m(a)krin 部落。据《史集》介绍，维吾尔人边境有个叫 b(a)krin（别克邻）的部落，“又称篋克邻 [m(a)krin]。他们的营地在畏兀儿斯坦的险峻山岭中。他们既非蒙古人，又不是畏兀儿人。因为他们生活于山岭特别多的地区，所以他们惯于走山路，他们全都擅长攀登崖壁”。<sup>[30]</sup> 在古代西北方音中，汉语“伏”（b'iuk）有时译作“尉”（jwei），如唐代于阗王尉迟信或译“伏闍信”。我们怀疑，尉纥麟城很可能来自 b(a)krin 部落之名。

金兴定四年（元太祖十五年 / 1220）七月，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访问漠北成吉思汗大帐后，由蒙古草原出访中亚。据刘祁《北使记》记载，他们一行“历城百余，皆非汉名，访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纥里纥斯、乃蛮、航里、瑰古、途马、合鲁诸番族居焉”。<sup>[31]</sup> 德国学者布列茨施奈德尔认为，文中所谓“磨可里”就是《史集》提到的“篋克邻”。

如前所述，古阿尔泰语族名尾音“n”有时表示复数，而磨可里城的胡名疑即 m(a)krin 的单数形式 m(a)kri。同理，b(a)krin 的单数当为 b(a)kri。我们还发现，这个族名似即敦煌吐蕃文献（P.T.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所载北方部落 ba-ker（部落名）。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尧、陈践教授译文如下：

往昔回鹘王颁诏：北方究竟有多少国君？命五名回鹘人前往侦察。此即其回报文书，系取自玉府也。

某地，汉语称为室韦(ji-vur)，突厥语称之为莫贺婆力(ba-ker-pa-lig)。以此为主体，在其上，有突厥默啜(vbug-chor)十二部落。<sup>[32]</sup>

默啜是后突厥汗国的第二代可汗，天授二年至开元四年(691-716)在位。从语言分析，地名ba-ker-pa-lig(莫贺婆力)是由ba-ker和pa-lig两词组成。前一词为b(a)krin的单数形式，而后一词pa-lig则为突厥语balīq(城)，相当于蒙古语balgasun(城)。<sup>[33]</sup>那么其名意为“b(a)krin城”。在以往的研究中，b(a)krin常与突厥鲁尼文碑铭的bökli(部落名)相混淆。<sup>[34]</sup>然而，两者在这份敦煌吐蕃文献中同时出现，ba-ker相当于b(a)krin(别克邻)，而bökli相当于mug-lig(高句丽)，不可混为一谈。<sup>[35]</sup>

另一个问题是，室韦偏处大兴安岭一隅，而默啜可汗南庭在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其下(南)不可能有室韦部落。吐蕃文ji-vur是否指室韦需要重新考虑。

研究者早就注意到，室韦和鲜卑实乃同一词的不同音译。<sup>[36]</sup>那么敦煌吐蕃文献中相关文字似应译作：

某地，汉语称为鲜卑(ji-vur)，突厥语称之为b(a)krin城。以此为主体，在其上，有突厥默啜(vbug-chor)十二部落。

这个记载相当重要，说明b(a)krin有城郭。此城或即虞弘出生地——尉纥骊城，也即柔然所筑“木来城”。柔然人属于鲜卑族，所以尉纥骊城人亦被称为ji-vur(鲜卑)人。

### 三 尉纥骊城与墨离城

柔然可汗社仑统一漠北之后，“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磧”。东魏兴和三年(541)，天山北麓的高车汗国被柔然所灭。<sup>[37]</sup>木来城本是柔然人为防备天山北麓高车人(即铁勒人)东山再起而筑。据周伟洲教授考证，木来城当在柔然王庭西南。<sup>[38]</sup>史载柔然汗庭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以北某地，<sup>[39]</sup>其西南则为今新疆哈密北山。东汉永平十六年(73)，“耿秉出張掖居延塞，击匈奴(句)林王，到沐楼山，度莫(漠)六百余里，绝无水草。得生口，辞云匈奴(句)林王转北逐水草。”<sup>[40]</sup>度漠，指度过居延之西的莫贺延磧，那么沐楼山应在居延以西600里哈密北山东端。木来城大概地近沐楼山而得名。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地志屡次提到哈密北山有墨离城，而“墨离”古音作mek-ljie，疑为木来城之别称。<sup>[41]</sup>《新唐书·地理志四》瓜州晋昌郡记载：“有府一，曰大黄，西北千里有墨离军。”《新唐书·兵志》曰：“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墨离城是规模较大的边镇，故称“墨离军”。《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凉州条》亦载：“墨离军，瓜州(今甘肃安西县琐阳城)西北一千里。管兵五千人，马四百匹。东去理所(今甘肃武威市附近)一千四百余里。”

令人费解的是，从瓜州到伊州治所伊吾(今新疆哈密市附近)不过900里<sup>[42]</sup>，而瓜州到墨离城却长达1000里，比瓜州到伊吾还要远100里。另一方面，从墨离城养有400匹马看，该城只能在适于畜牧的哈密北山草原地带。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墨离城比伊吾远100里。

唐代文献将哈密北山分为两个部分，西部称“俱密山”，东部称“折罗漫山”。<sup>[43]</sup>《元和郡县图志·卷40·伊州条》说：“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折罗漫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sup>[44]</sup>如果加上从伊州到折罗漫山的120里，瓜州到折罗漫山凡1020里，正是《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瓜州到墨离城的里程。

折罗漫山，亦作“时罗漫山”，由伊吾和柔远县分管。据《唐光启元年(885)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柔远北部天山有“源泉水(原注：县北十里)、第二水、(原注：县东北五里)、第三水(原注：县东北九里)，凡三水皆临崖涌出，南流入磧即绝”。源泉水，《元和郡县图志》称“柳谷水”。该书伊州柔远县条说：

贞观四年(630)置。县东有柔远故镇，因以为名，兼置守捉。天山在县北二十里。柳谷水，有东西二源，出县东北天山，南流十五里合。

据钟兴麒先生调查，唐代柔远县在今哈密市东北95公里的沁城附近。“沁城北有大天生圈，小天生圈二水，至南城合流，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相符。”柳谷水，或称“甘露川”，即今伊吾河，唐代景龙年间曾在此地设伊吾军。<sup>[45]</sup>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

隋末唐初，伊吾一度在东突厥统治下。贞观四年，唐朝才得以收复伊吾。《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记载：“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内属，置伊吾郡；隋乱，臣于突厥。颉利(东突厥可汗)既灭，举其属七城来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与此同时，柔远北部天山被西突厥处月部占据。《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七月记载：“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于磧口贮粮，来者赈给，使者招慰，相望于道。”西突厥种落，指西突厥处月部，亦

称沙陀。《新唐书·沙陀传》记载：

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龙朔初（661），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

有学者将沙陀碛置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庭故城）西北，<sup>[46]</sup>不一定正确。沙陀碛是指伊州、瓜州之间的莫贺延碛，汉代称“沙头”。《汉书·地理志》记：“酒泉郡，县九……玉门、会水、池（沙）头、绥弥、乾齐。”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记酒泉郡有“沙头县”，不见“池头县”的记载，文中说：“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sup>[47]</sup>可知池头系“沙头”之误。<sup>[48]</sup>《汉书·地理志》酒泉郡乾齐县本注：“西部都尉治所西部障。”据李并成先生考证，西部障在今甘肃玉门市北石河十二墩西南障城。<sup>[49]</sup>那么沙头县约在汉代西部障之东85里，今玉门市东北。沙陀碛则因在汉代沙头县而得名。《新唐书·沙陀传》提到的蒲类，是指唐代蒲类县城，故址在今新疆巴里坤县大河古城。蒲类之东则为折罗漫山，汉代称“祁连山”，今新疆伊吾县北哈尔里克山。山上有大草原，水草丰美，本系月氏人牧地。《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元狩二年（前121）：

元狩二年（前121）……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骑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票骑将军涉钧者，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觶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

汉代居延泽在今内蒙古额济那旗的苏古淖尔（东居延海）。霍去病对匈奴作战的路线是：首先经过苏古淖尔，再到小月氏牧地，然后到祁连山。这个地方今天仍有大片草原，中国最大的军马场——伊吾军马场就建在此地。<sup>[50]</sup>

《唐会要》卷78河西节度使条再次提到墨离城的位置。文中说：“墨离军，本是月氏旧国，武德（618—626年）初置军焉。”再次表明墨离城在月氏故地。从处月酋长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看，处月牙帐或在墨离城。

尽管墨离城近在伊州北部天山，但该城始终归瓜州统辖，墨离军使亦由瓜州刺史（或都督）兼领。例如：景龙四年（710），李思明任“墨离军使、瓜州都督”；开元十五年（727），张守珪任“瓜州刺史、墨离军使”；景福元年（892），索勋任“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墨离军押蕃”。<sup>[51]</sup>

关于墨离军的方位，法藏敦煌文书 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阴氏条又载：

守忠……充墨离军副使……蒙凉州都督郭元振判录奏：谋略克宣，勤劳久著，当王（五）凉之西面，处四镇之东门。<sup>[52]</sup>

安西四镇东界在柔远县东境，阴守忠驻守的墨离城应在柔远与瓜州分界处瓜州一侧。据考古调查，新疆伊吾县下马崖乡西南3公里有一座古城。该城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01-103米，高约4米，城墙为两次筑成，下部墙基，高约2.5米，厚约4米；上部筑女儿墙，高约1.35米，厚0.5米，每隔3米有一个城垛。南北各开一门，门宽5米。城墙四角分筑角楼。城内尚存部分房屋遗迹，布局以南北城门为轴心，东西两侧有房屋，房屋多为长方形，有回廊相连。出土物很少，偶见清代钱币。古城东北1.5公里处有烽燧遗址。<sup>[53]</sup>调查者将下马崖古城定为清城，不一定正确。从古城附近有烽燧看，该城疑为唐代边镇，沿用至清。关于伊州东界，杜佑《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记载：

北至伊吾郡界三百里，北戎界。东南到敦煌郡磧，无行路马道；到晋昌郡境界不知远近。西南到敦煌郡磧，无路马道；西北到折罗漫山一百四十六里，其山北有大川连大磧，入金山哥罗禄住处。东北到折罗漫山二〔三〕百四十里，其山北有大川入回纥界，马行三十日，无里数。

其中，“马道西北到折罗漫山一百四十六里”指伊州北界；“北至伊吾郡界三百里”指伊州东北界；“东北到折罗漫山三百四十里”则为伊州到柔远县的里程。<sup>[54]</sup>故知柔远县到伊州东北界不过60华里。而柔远县（沁城）和下马崖古城之间皆为沙漠，两地交通须绕道而行，先北行小堡、大石头，再东行下马崖，全程至少200华里。那么下马崖古城已不在唐代柔远县境内。

另一方面，《新唐书·地理志》说瓜州府（今甘肃安西县）“西北千里有墨离军”。今甘肃安西县西北1000里，正是新疆伊吾县下马崖乡所在地。从自然环境看，下马崖乃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气候温暖，冬夏季均饮川泉水及灌溉农田，为利非鲜”。<sup>[55]</sup>这个地方既可从事牧业，亦适于屯垦戍边。唐代墨离军疑在此城。

下马崖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时，霍去病“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就在此地。宋永初元年（420），南朝高僧昙无谶从南朝到青海吐谷浑国，北上西海郡（今额济纳河），渡流沙，到高昌。<sup>[56]</sup>昙无谶所渡流沙当即下马崖附近的莫贺延磧，只是此地当时尚未建城。

北宋王延德出使高昌时，途经下马崖。《王延德使高昌记》记载：“次历拽利王

子族，有合罗川（今蒙古固哈刺合林河），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次历阿墩族，经马鬃山望乡岭（今甘肃西境马鬃山），岭上石龕有李陵题字处。次历格啰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鸥鹭鳧雁之类甚众。次至托边城，亦名李仆射城，城中首领号‘通天王’。次，极望无际，鸥鹭鳧雁之类甚。历小石州（今伊吾大石头乡）。次历伊州（今哈密），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sup>[57]</sup>小石州似在唐代伊吾军城，而托边城则为唐代墨离军城——今下马崖古城。

一部分墨离城人后来从哈密北山迁到额济纳河流域。《明实录》宣德五年（1430）记载：“麦克零部属，今居亦集乃，迁徙无时，恐为边患。上命遣人招喻，如其归来，即与官赏，择善地处之。”亦集乃系西夏威福监军司的城名，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旗哈拉浩特古城。麦克零就是《史集》的m(a)krin，明代亦称“乜克力”。《明史·罕东左卫传》记载：“闻罕东左卫居哈密之南，仅三日程，野乜克力居哈密东北，仅二日程。是皆唇齿之地，利害共之。”由此可见，明代仍有墨离人在哈密北山至额济纳河一带游牧。

总之，尉纥驎本为中国北方草原一个地名或部落名，北魏称“木来”，唐代称“墨离”，元代称“篋克邻”，明代称“麦克零”或“乜克力”。柔然可汗曾在此地建城，名曰“木来城”或“尉纥驎城”，历代沿用，直至明清。结合考古资料分析，该城很可能就是新疆东境伊吾县的下马崖古城。

## 四 稽胡之族源

关于稽胡的族源，史书有三种不同说法。其一，匈奴说：“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其二，赤狄说：“或云山戎、赤狄之后”<sup>[58]</sup>。其三，白翟说：“今其俗云，丹州白室，胡头汉舌，即言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白室即白翟语讹耳。近代号为步落稽胡，自言白翟后也”；“石州……春秋时属赵，亦为白狄之地，今步落稽其胄也”<sup>[59]</sup>。

现代研究者对稽胡的族源亦无统一认识。周伟洲教授认为，“稽胡应是以南匈奴五部后裔为主体，融合了西域胡及山居土著（包括汉族）而形成的一种杂胡。”<sup>[60]</sup>这个看法基本代表了当前学界对稽胡族源的主流意见。蒲立本的看法有所不同，主



张稽胡主体与陕北和晋西土著居民义渠、山戎或北狄的关系更为密切。<sup>[61]</sup> 虞弘墓志的发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稽胡先后依附于南匈奴后裔刘渊和赫连勃勃，自然和南匈奴有所融合，但是族源似与匈奴无涉。匈牙利人是从东方迁到欧洲的，并被视为匈奴后裔。如果稽胡源于匈奴，语言应和匈牙利语残留的匈奴词汇保持一致，但是两者却明显有别。例如：

稽胡族名“步落稽”译自突厥语 balaq (鱼)，但匈牙利语却将鱼称作 szalka (鱼骨)，相当于蒙古语 zagas (鱼)。<sup>[62]</sup> 又如：稽胡将奴隶称作“库利”，<sup>[63]</sup> 源自突厥语 qul 或 kul (奴隶)；<sup>[64]</sup> 而匈奴人将奴隶称作“贖虏”或“贖”，<sup>[65]</sup> 相当于匈牙利语 szloga (奴隶) 或蒙古语 zarts (奴隶)。<sup>[66]</sup> 正如陈寅恪指出的，现代汉语“苦力”就来自古突厥语的“奴”字。<sup>[67]</sup> 此外，稽胡将城堡称为“可野”，来自突厥语 qoruq (围墙)，相当于突厥语图瓦方言 kerem (堡垒)。<sup>[68]</sup> 尽管匈牙利语也有类似的词汇，含义却不是“城堡”。<sup>[69]</sup> 换言之，匈奴属于讲蒙古语的东胡，稽胡属于讲突厥语的北狄，不可混为一谈。蒲立本将稽胡归入北狄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把稽胡和先秦时期迁入陕北和晋西的赤狄、义渠等古代游牧人混为一谈，则不可取。

虞弘墓志明言，鱼氏祖先“奕叶繁昌，派枝西域”，说明稽胡主体来自中亚。尽管我们目前仍不十分清楚稽胡的确切来源，可是无论族名还是习俗，都可表明稽胡原为渔猎兼畜牧的部族。虞庆则之子虞孝仁“性奢华，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而自给”，而稽胡“妇人则多贯蜃、蚌、贝以为耳及颈饰物”，一直保持着古老的渔猎传统。<sup>[70]</sup> 所以稽胡主体不太可能源于匈奴。

虞弘祖父曾任北魏领民酋长，这是北朝授予散居长城内外，不在编户的部落酋长的一种封号。据周一良教授分析，“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勒、匈奴、契胡族”。<sup>[71]</sup> 敕勒即铁勒，而中亚铁勒确实有渔猎部落。《隋书·铁勒传》说：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康国（粟特）北，傍阿得水（今锡尔河），则有诃咥、曷巖、拔忽、比干（千）、具海、曷比悉、何嗟苏、拔也未渴达等。

比干之“干”因与“千”字形近而讹，也即拜占庭史家所载 9—10 世纪活跃于欧亚草原的铁勒 pečeneg 部。俄国突厥学家克利亚什托尔内发现，比千人的经济非常独特，属于“那种半定居的原始经济，已经把畜牧业、农业和捕鱼业结合起来”。因为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利西《地理志》说比千牧地附近有大湖，“这是个很大的湖……里面有很多鱼，它是该民族的主要食物……湖畔有许多属于比千的牧场

和肥沃的土地。这种古斯人经常携带武器，他们对待毗邻的突厥种是异常小心而又勇敢的”。<sup>[72]</sup> 既然虞弘祖先“派枝西域”，来自中亚某“鱼国”，有可能源于中亚靠渔猎为生的比千部落。

比千人一度在康居统治下，两者互有融合。东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七世 (Constantinus VII, 911 - 959) 的《帝国行政论》称比千八族中有三个族属于 kangar (康居) 人。<sup>[73]</sup> 正如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的，kangar 人就是突厥鲁尼文碑铭提到的 kangaras，汉代称“康居”，唐代称“弓月”或“康曷利”。<sup>[74]</sup> 康居本是锡尔河北岸讲东伊朗语的斯基泰部落，南与粟特以锡尔河为界，北与丁零 (即铁勒) 为邻。<sup>[75]</sup> 汉代以来，粟特一度在康居统治下，故粟特人亦被称为康居人。

此外，康居联盟中还融入不少中亚北方草原的铁勒部落。《资治通鉴》卷94晋成帝咸和五年 (330) 记载：“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丁零即铁勒。赵指中亚粟特人石勒在今河北、山西等地建立的少数族政权 (约 319 - 351)，史称“后赵”。既然前秦时 (351 - 394) 黄河流域始见稽胡鱼氏，那么虞弘祖先或许随 3 - 4 世纪中亚粟特、铁勒向东方迁徙浪潮，从西域辗转迁入中原的。

## 五 虞弘之宗教信仰

关于北朝人姓名，周一良教授分析说：“北朝人往往先取胡名，其后更取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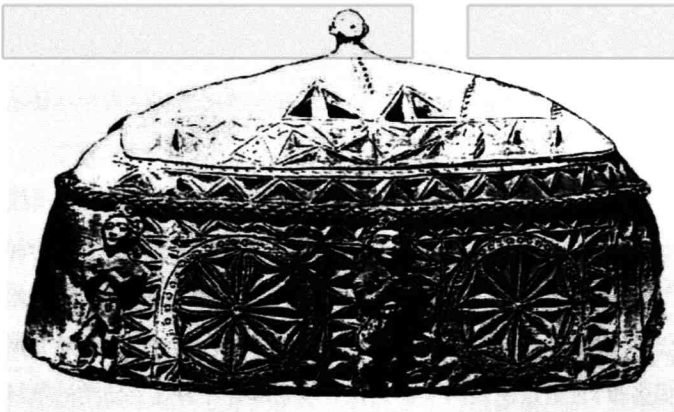


插图 3 中亚出土突厥式纳骨器

则以胡名为小字。”例如：周明帝“讳毓，小名统万突，太祖长子也。……永熙三年太祖临夏州，生帝于统万城，因以名焉”。<sup>[76]</sup> 虞弘墓志说：“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也。”那么莫潘应是虞弘的胡名。许多粟特人或铁勒人叫这个名字。例如：吐鲁番文书中有“何莫潘”和“曹莫盆”等。<sup>[77]</sup> 我们怀疑，其名来自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 bayaspān（主使、神使），像是个火祆教徒的教名。

北周时，虞弘任“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北周管理火祆教的机构。虞弘之所以担任这个职务，与他本人信仰火祆教不无联系。据文献记载，唐代并州晋阳郡（今山西太原）有鱼、仪、景三大姓。<sup>[78]</sup> 而虞弘墓志首揭太原鱼氏信仰火祆教。这将有助于了结火祆教研究史上一段公案。唐开元年间，太原一度流行弃尸饲狗的陋俗。《旧唐书·李暹传》记载：

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暹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

中山大学岑仲勉教授认为，“此实祆教之习俗，所谓黄坑，西人称曰无言台。”<sup>[79]</sup> 他的主要根据是公元7世纪韦节《西蕃记》中关于中亚祆教葬俗的一段记载。文中说：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干）“俗事天神，崇敬甚重……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槨”<sup>[80]</sup>。由于《新唐书·李暹传》将“僧徒”改作“为浮屠法者”，所以有些学者对岑仲勉之说表示怀疑。这个习俗则被释为天竺古法——印度式野葬。<sup>[81]</sup> 虞弘墓的发现可证岑仲勉的判断是正确的。

并州以犬食人的陋俗可能在北齐年间业已流行。《隋书·五行志上》毛虫之孽条说：“武平末，并、肆诸州多狼而食人。《洪范·五行传》曰：‘狼贪暴之兽，大体以白色为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祸也。’”并、肆二州是稽胡主要聚集地之一，稽胡首次起义就发生在肆州。<sup>[82]</sup> 信仰火祆教的稽胡采用弃尸饲狗的葬俗，结果导致饿犬食人。所以武平末年这场狼灾或许与稽胡弃尸饲狗而引起的犬祸有牵连。

据前文讨论，稽胡主体属于讲突厥语的北狄系统民族，源于中亚铁勒。受中亚粟特文化影响，许多铁勒人信仰火祆教。而突厥系统民族信仰火祆教后，将火祆教传统葬具——纳骨器加以改造，出现了帐篷式的纳骨器。<sup>[83]</sup> 新疆博物馆藏有这样一件纳骨器。据日本学者影山悦子调查，这件纳骨器出自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

尔附近，长62.5厘米，宽45厘米，高44厘米，呈帐篷形，器盖上有入头塑像(保护神)，器内盛有人骨。<sup>[84]</sup>类似的葬器在中亚屡有发现(插图3)，年代约在7—8世纪，皆为突厥系火祆教徒葬具。

铁勒迁入中国后，或以“翟”为氏，并把中亚祆教带入中原。洛阳出土《翟突娑墓志》曰：

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日月以见勋效，右改宣惠尉；不出其年，右可除奋武尉，拟通守……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615)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寢。卒于河南郡洛阳县崇化乡嘉善里。葬在芒山北之翟村东南一里。<sup>[85]</sup>

翟突娑即铁勒人，而萨宝译自粟特语 s' rtp' w (商团首领)，亦表示“祆主”。<sup>[86]</sup>翟突娑出身祆教世家，他的胡名“薄贺比多”译自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 mgwpt (祆教牧师)。<sup>[87]</sup>既然突厥系民族信奉火祆教，那么魏文成帝时高车五部“合聚祭天”之“天”或许也是胡天神——阿胡拉·玛兹达。<sup>[88]</sup>此外，信仰火祆教的铁勒人还有伊州(今新疆伊吾)祆主翟槃陀。敦煌写本 S.0367号《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

时罗漫山，(原注：与柔远县分管)……火祆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有祆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刀夹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微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sup>[89]</sup>

耐人寻味的是，这所祆祠距离虞弘出生地——尉纥驛城不远。

1923年，陈垣教授首次系统研究了祆教入华问题，提出“中国之祀胡天神，自北魏始。”<sup>[90]</sup>不过《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为镇压冉闵的反叛，“龙骧孙伏都、刘铉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唐长孺教授援引这条史料，提出后赵石勒所奉“胡天”当为中亚粟特敬奉的祆神。<sup>[91]</sup>上述考证对后来的研究影响至巨，以至于一些本来和粟特无关的祆教史料亦被比附为波斯或粟特祆教。虞弘墓志的发现提醒我们，火祆教不单为波斯人或粟特人所独有，中亚铁勒以及讲突厥语的稽胡也曾信仰火祆教，并为祆教传入中国做出重要贡献。

## 注释:

[1]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0-167页。

[2]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439-444页;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林幹:《稽胡(山胡)略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第148-156页;周伟洲:《中国中世纪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7-150页。

[3] E. G. Pulleyblank, "JI HU 稽胡: Indigenous Inhabitants of Shaanbei and Western Shanxi," in E. H. Kaplan and D. W. Whisenhunt (ed.), *Opuscula Altaica: Essays Presented in Honor of Henry Schwarz*, Western Washington, 1994, pp. 498-529.

[4] 最初的报道见程书林、郭喜梅、张兴民:《太原清理一罕见隋代墓》,《中国文物报》1999年10月24日第1版;正式报道见张庆捷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第27-52页;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第102-108页。

[5] 张庆捷:《隋代虞弘墓志石椁浮雕的初步考察》;姜伯勤:《隋检校萨宝虞弘墓志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荣新江:《粟特系祆教的流传及其在艺术上的影响》;收入《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2000年,第1-24、

第25-41和第111-128页。

[6] 这次考察得到山西省考古所张庆捷所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实地观摩了虞弘墓石椁浮雕图像、随葬品和墓志等。张所长还提供了墓志录文。这里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

[7] 参见《魏书·尔朱荣传》、《北史·蠕蠕传》、《旧唐书·程务挺传》和《隋图经杂记》(《太平寰宇记》卷35引)。

[8] 虞弘墓出土石椁呈房屋形,模仿木结构建筑形式。隋代李静训墓、唐代李寿墓、郑仁泰墓、永泰公主墓和章怀太子墓皆采用此种形制。

[9] 高本汉:《汉文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38、第338和第237页。

[10] A. von Gabain, *Altü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4, p.326; 陈宗振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48-49页。

[11] 《隋书·杨素传》。

[12] 《隋书·鱼俱罗传》。

[13] 岑仲勉:《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9页。

[14] 《魏书·尔朱荣传》。

[15] 鲍培(N. Poppe)著,黄建华、曜堂译:《阿尔泰语和乌拉尔语复数语尾研究》,收入李祥瑞、牛汝极:《阿尔泰学论丛》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5-142页。

[16] Juhan Janhunen, "The Horse in East Asia: Reviewing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in Victor H. Mair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1,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1998, p.417.

[17] 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p.317.

[18] 《元和姓纂》卷二九。

[19] 《魏书·地形志》雍州冯翊郡莲勺县注云：“有下封城”。岑仲勉先生以为“下邳”系“下邳”之讹(参见《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10, 第二册, 第1582页)。甘肃武威出土《大唐故右威卫将军武威安公故妻新息郡夫人下邳翟氏墓志铭并序》亦将“下邳”写作“下邳”，疑是避讳改字。墓志拓片及录文见《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第37-49页。

[20] 敦煌文书(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卷一并序》记载：“同州冯翊郡出八姓：鱼、吉、党、雷、印、合、力、寇。”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21] 《周书·叱列伏龟传》记叱列伏龟说：“代郡西部人也。世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为第一领民酋长。”

[22] 《魏书·地形志》灵州注：“太延二年(436)置薄骨律镇，孝昌(526-527)中改，后陷陇关西”。

[23] 《魏书·蠕蠕传》。

[24] 《宋书·索虏传》。

[25]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26] 松田寿男著、陈俊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24-225页。

[27]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9页。

[28] 高本汉，前掲书，第536和第420页。

[29] W.B. Henning, "Sogdian List," *Sogdica*, London, 1940, pp. 8-11.

[30] 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44页。

[31] 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77页。该书引德国学者布列茨施奈德尔《中世纪史研究》(卷1, 第28页, 注48)之说，以为磨里奚即勿吉(merkits)，磨可里即篋克邻(mekrin)，纥里乞斯即黠戛斯(kirghiz)，乃蛮即naiman，航里即康曷里(kankalis)，瑰古即回鹘(uiguri)，涂马即tumats，合鲁即葛逻禄(karluks)。其说可从。

[32] 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7页。

[33] N. Poppe,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 I, 1960, p.122.

[34] 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81页。

[35] mug-lig指高句丽，唐礼言《梵语杂名》将高句丽称为mukuri，可为佐证。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92-893页。

[36] 沈曾植：《鲜卑语与蒙古语》，收

入《海日楼札丛》卷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7] 《魏书·高车传》：“天平(534-537)中，越居复为蠕蠕所破，伊匄子比适复杀越居而自立。兴和中，比适又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宾自蠕蠕来奔，齐献武王欲招纳远人，上言封去宾为高车王，拜安北将军、肆州刺史。既而病死。”《魏书·孝静纪》将去宾来奔之年系于兴和三年(541)。

[38]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9页。

[39] 402年，柔然社仑统一漠北，“常所会庭”，设在“敦煌、张掖之北”(《魏书·蠕蠕传》)；429年，北魏世祖讨伐柔然，“沿弱水(今内蒙古额济纳河)西行，至涿邪山”(《魏书·崔浩传》)。

[40] 参见袁宏《后汉纪·明帝纪》，或作“三木楼山”，参见《后汉书·南匈奴传》和《窦固传》。

[41] 高本汉，前掲书，第405和第14页。

[42] 《元和郡县图志》卷40伊吾县记伊州八到说：“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九百里。”《太平寰宇记》记瓜州“西北至伊州九十里”。九十当系“九百”之讹。

[43] 《元和郡县图志》伊州条纳职县(今哈密市四堡)“俱密山，在县北一百四十里有俱密山，山北二十里正抵蒲类海”。

[44]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45] 钟兴麒：《唐伊吾军驻所甘露川考》，《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第57页。

[46]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5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42-43页。

[4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第33页。

[48] 参《汉书·地理志》王先谦补注。

[49]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0页。

[50] 关于月氏故乡在哈密北山的讨论，参见林梅村：《吐火罗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20页；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51] 《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参《旧唐书·张守珪传》及《索勋纪德碑》(收入罗振玉：《西陲石刻录》，云窗丛刻本)。

[5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0页。

[53] 王毅民主编：《哈密文物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0页。

[54] 《元和郡县志》卷40伊州柔远县本注：“西北至州(伊吾)二百四十里。”

[55] 《哈密专区兵要地志》。

[56] 《高僧传》卷三《昙无谶传》记载：“释昙无谶……姓李，幽州黄龙人……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420)，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赉幡盖供养之具，发迹此土，远遁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西海)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



[57] 《古行记四种校注》，《王观堂先生全集》第七册。

[58] 这两种说法并见《周书·稽胡传》。

[59]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丹州条；《太平寰宇记》卷35《丹州·风俗》条引《隋图经杂记》。

[60] 周伟洲：《中国中世纪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61] E.G. Pulleyblank, "JI HU 稽胡: Indigenous Inhabitants of Shaanbei and Western Shanxi," in E.H. Kaplan and D. W. Whisenant (ed.), *Opuscula Altaica: Essays Presented in Honor of Henry Schwarz*, Western Washington, 1994, pp. 498-529.

[62] 朱学渊：《Magyar 人的远东祖渊》，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一辑，1999年，第103页。

[63] 《太平寰宇记》卷35丹州云岩县条说：“库利川，在县西，从西延州临真县界入。当县土谚云：‘昔有奴贼居此川内，稽胡呼奴为库利’。因此为川名。”

[64] 陈宗振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420-421页。

[65] 《三国志·魏书·东夷乌桓鲜卑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66] 朱学渊：《Magyar 人的远东祖渊》，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一辑，1999年，第109页。

[67] 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7页。

[68] 陈宗振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

言词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414-415和417页。

[69] 匈牙利语有gyuru(圆圈)和kor(圆环)，相当于蒙古语 kuriyan(圈子)。参见朱学渊：《Magyar 人的远东祖渊》，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一辑，1999年，第101页。

[70] 参见《隋书·虞庆则传》、《周书·稽胡传》。

[71] 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1937年；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0-214页。

[72] 克利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吉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7-198页。

[73] Mooravcsik Gy (ed.),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Budapest, 1949, p.171.

[74] 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93-427页。

[75]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6-117页。

[76] 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1937年；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2-253页。

[77] 参见《唐神龙三年高昌崇化乡点籍样》，收入唐长孺主编：《吐鲁番文书》第七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68页。

[78] 《太平寰宇记》卷40并州姓氏条：“晋郡三姓：鱼、仪、景。”北京图书馆藏敦

煌文书(新编354:8418号)《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记载:“[晋]阳郡三姓(原注:并州),仪、景、鱼。”张庆捷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个材料,谨致谢忱。

[79]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页。

[80] 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康居》。

[81]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7页。

[82] 《魏书·尔朱荣传》。

[83] G. Pugachenkova and A. Khakimov,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8, P128.

[84] 影山悦子:《東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のオッサリ(ゾロアスター教徒の納骨器)について》,《オリエント》第40卷第1号,第73-89页。

[85] 参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1页。

[86] 日本伊朗学家吉田丰最近从敦煌

出土第五封粟特古书信中检出火祆教教长 s' rtp' w 一词。参见吉田丰:《ソグド语杂录》,《オリエント》第31卷第2号,1989年,第168-171页。

[87] D.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56.

[88] 《魏书·高车传》记高车“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

[89] 《新唐书·百官志》曰:“从五品上曰游骑将军,从五品下曰游击将军。”那么翟槃陀所授官职也许是“游骑将军”。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第40-41页。

[90]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期;收入作者《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5-307页。

[91]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416-417页。



下编

丝绸之路考古



# 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 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的朋友最近和我们联系，希望能为读者讲讲新发现的吐蕃大墓棺板画。这个发现的科学报告尚未出版，我们只能从目前的零星报道以及这家杂志社提供的彩色照片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这个发现相当重要，但是既不属于发掘者认为的“吐蕃赞普墓”，亦非某些学者倡导的“吐谷浑王墓”。据我们初步研究，这两座吐蕃大墓的真正主人，极可能是吐蕃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禄东赞家族某位权贵。草成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 一 苏毗人的起源及其在青藏高原的分布

现代藏族由吐蕃、象雄、苏毗和吐谷浑四大部族相互融合而成（插图1）。吐蕃权臣禄东赞就是苏毗人，藏名“噶尔东赞”。阎立本所绘《步辇图》，生动描绘了禄东赞觐见唐太宗，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请婚的盛大场面（插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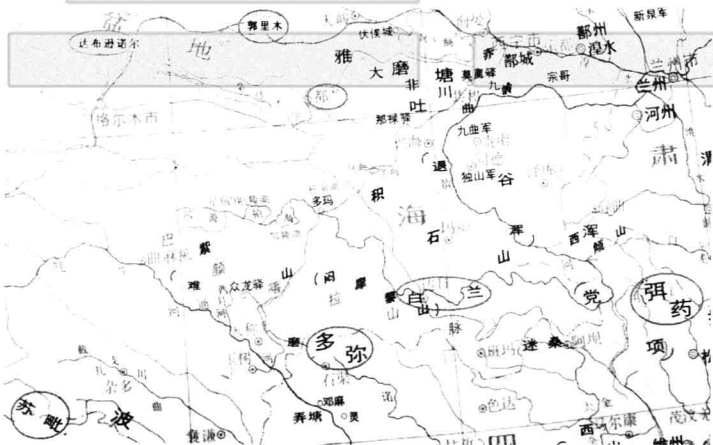


插图1 青藏高原古民族分布图

苏毗人起源于青藏高原西北部，或称“孙波”。他们的原始故乡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的囊曲河流域，所以藏文史籍称此河为孙波河（sum po cho bo）。后来，苏毗人逐渐向东迁徙，一直抵达拉萨流域和昌都西北部。

公元7世纪，雅鲁藏布江中游雅隆河谷的吐蕃人迅速崛起，建立了南至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中亚，东至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庞大帝国。吐蕃军队主要由苏毗人组成，随着吐蕃帝国的扩张，苏毗人不断向东迁徙。据两唐书《女国传》记载，一部分苏毗人从西藏昌都迁入四川西北，建立了“东女国”。另一部分苏毗人则在青海东部定居，与吐谷浑为邻。因此，唐朝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天宝十四年（755）写给唐玄宗的书信中说：“苏毗一蕃，最近河（指黄河上游）北吐浑（“吐浑”之误，指吐谷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授”之讹），军粮兵马，半出其中”（《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门》）。今天青海互助哈拉直沟乡有“苏毗村”，而贵德县东与黄南尖扎县交界有“苏毗峡”，皆为唐代东迁青海的苏毗人不甘磨灭的历史遗迹。<sup>〔1〕</sup>这些东迁青海的苏毗人主要由禄东赞所出噶尔家族统领，而新发现的吐蕃棺板画正是在噶尔家族所统苏毗人活动区域内发现的。

## 二 吐蕃棺板画发现始末

早在2001年下半年，出土棺板画的吐蕃墓地就被盗墓贼发现。2002年8月，青



插图2 郭里木吐蕃墓发掘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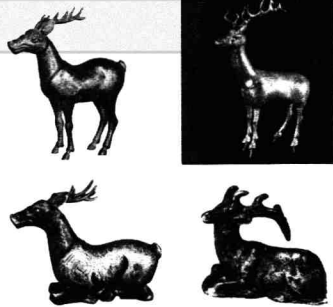


插图3 青海新发现的银鹿

海考古工作者对其中两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插图2），结果发现了彩绘棺板画。

关于这两座墓的年代，发掘者认为随葬丝织品中有盛唐时代流行的卷草宝花、印花、双连珠对龙等纹样，故将两墓年代定在盛唐，也就是公元700—750年之间。发掘者还披露：“出土木结构上书写有墨书古藏文，也证明墓葬属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贵族的墓葬。”

这两座墓在发掘前，业已遭到盗墓贼严重破坏；否则不知要出多少金银艺术品。就在两墓惨遭盗掘的同时，西宁文物市场上突然出现一批古代动物形银器（插图3）。数量之多，造型之精美，令人震惊。据报道，“2001年下半年和2002年上半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宁征集到一批都兰吐蕃墓葬的盗掘文物，共35件。其中动物造型的银器有20件。这批动物造型的银器分容器和俑两类，有鸟、马、牛、鹿、狗、羊、虎等种属”（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藏学研究网）。

据我所知，这批银器中的卧鹿以前在新疆米兰发现过，但是误当作匈奴艺术品。看来，这类动物形银器的年代应在吐蕃统治青藏高原时期。这批银器中的立鹿，与土耳其考古队近年在蒙古高原发现的突厥毗伽可汗宝藏中的银立鹿如出一辙，属于国王一级的皇家艺术品。<sup>[2]</sup>青海考古工作者发掘郭里木吐蕃大墓的时间在2002年8月，而这批银器在西宁文物市场上出现的时间在“2001年下半年和2002年上半年”，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因此，这批具有皇家艺术风格的动物形银器不一定出自都兰吐蕃大墓，更可能出自郭里木新发现的吐蕃大墓。

### 三 解读“男女合欢图”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批棺板画大墓属于苏毗贵族墓，有以下几条证据：

其一，据《隋书·女国传》记载，苏毗“贵人死，剥其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纳）于铁器埋之”。郭里木吐蕃墓中有一座属于迁葬墓。此墓先将人骨架装在小棺内，再将小棺置于大棺内。大棺用柏木封顶，柏木上放置殉牲羊骨架。墓内随葬木鞍、木鸟、箭囊等随葬品。由于受到盗墓贼破坏，无法了解这座迁葬墓的具体细节，但是二次迁葬则与苏毗人丧葬习俗完全吻合。

其二，发掘者注意到棺板画上一个细节，“吐蕃墓棺板画中有两处出现树纹，这在中国传统狩猎图中是没有的，因此，很容易令人想起西亚、中亚艺术中的‘生命





插图4 郭里木吐蕃棺板画墓祭祀神树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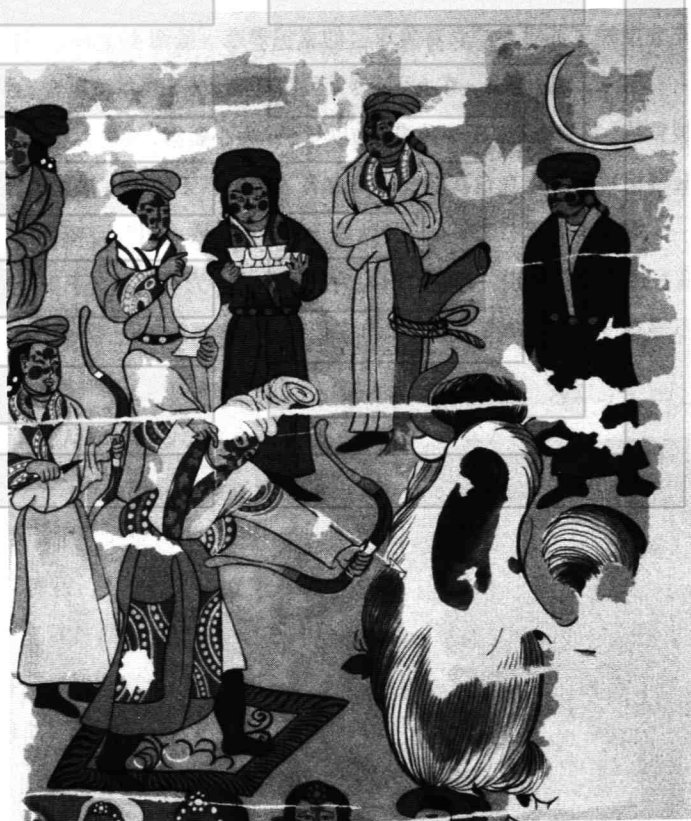


插图5 郭里木吐蕃棺板画墓男女合欢图摹本

树’”。其实，这两处表现“生命树”的画面应该是苏毗人崇祀的神树的场景（插图5）。据《隋书·女国传》记载，苏毗人“俗事阿修罗，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郭里木棺板画所绘神树上有绳索，也许是苏毗人举行人牲祭祀时使用的绳索。棺板画上神树前有射杀野牦牛的场面，大概由于青海没有猕猴，所以苏毗人用牦牛替代猕猴，血祭神树。

其三，苏毗人保留了许多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重女轻男，实行一妻多夫制。《隋书·女国传》说：“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故称“女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苏毗国实行一妻多夫制。《唐会要》记载：“其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尤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郭里木棺板画上有一幅男女合欢图，对苏毗人“一妻多夫”的习俗作了生动描述，并非时下所言藏传佛教密宗法术或吐谷浑巫师作法。

首先，这幅男女合欢图上的青衣女子居上位，而男子居下位，并且跪在地上，充分反映了苏毗人“女尊男卑”的意识形态（插图4）。

第二，《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苏毗女王夏季“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小鬟髻，饰之以金。耳垂珰，足履鞞鞞”。吐蕃棺板画中正在合欢的女子身穿青色长袍，正是史书描述的苏毗女王的形象。

第三，两唐书《东女国传》称，苏毗人“俗重妇人而轻丈夫”。《唐会要》、《通典》进一步描述说：苏毗“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则有多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有数夫焉。生子该从母姓。”《隋书·女国传》



插图6 阎立本《步辇图》

又载：苏毗“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据英国藏学家托马斯（F.W. Thomas）考证，汉语“金聚”一词，来自藏语 khyim-tsun，意为“家人”（托马斯著，李有义、王青山译：《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页）。我们以为，金聚当即《唐会要》所谓苏毗女王的“侍男”。

郭里木棺板画上与青衣女子合欢的男子以及正准备与青衣女子合欢的男子，表现的正是苏毗女王的“侍男”或“金聚”。

在棺木外绘制彩色图案，是东汉以来河西走廊西部和罗布泊一带流行的葬俗。例如：甘肃酒泉、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以及楼兰LE城魏晋壁画墓皆发现过东汉至魏晋时代的彩绘木棺。这个文化传统在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一直传承到晚唐五代。在新疆和田发现了晚唐五代时期的彩绘木棺，上面绘有四神图案，与郭里木的彩绘木棺如出一辙。早在公元3世纪，苏毗人就开始和于阗、鄯善两个沙漠绿洲王国频繁发生接触。公元6—8世纪的于阗语文书屡次提到苏毗人，那么苏毗人采用彩绘木棺的习俗很可能来自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文明。

## 四 谁是吐蕃棺板画大墓的主人

既然郭里木棺板画墓是苏毗贵族大墓，那么它们的主人又是什么人呢？吐蕃大相禄东赞死后，其子钦陵、赞婆、悉多于、勃论兄弟四人，继续职掌吐蕃军政大权。然而，就在棺板画墓主人下葬前夕，吐蕃统治阶层爆发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权力之争，不可一世的噶尔家族以失败告终，惨遭灭族之灾。

据《新唐书·吐蕃上》记载，禄东赞死后，其子“（噶尔）钦陵专国久，常居中制事，诸弟皆领方面兵，而赞婆专东境几三十年，为边患。兄弟皆才略沈雄，众惮之。器弩悉弄既长，欲自得国，渐不平，乃与大臣论岩等图去之。钦陵方提兵居外，赞普托言猎，即勒兵执其亲党二千余人杀之。发使者召钦陵、赞婆，钦陵不受命，赞普自讨之。未战，钦陵兵溃，乃自杀，左右殉而死者百余人。赞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款塞……”可知禄东赞之子噶尔钦陵因反叛吐蕃赞普而在吐蕃东境（今青海）自杀身亡。史书还提到吐蕃本土的噶尔家族被杀者达两千余人，钦陵自然无法归葬故土，只能在青海就地掩埋。

关于噶尔家族最后的命运，《新唐书·论弓仁传》又载：“论弓仁，本吐蕃族也。父钦陵，世相其国。圣历二年（699），弓仁以所统吐浑七千帐自归。授左玉铃卫将军，封酒泉郡公。”论弓仁是钦陵的长子，既然他从吐谷浑率七千帐投奔唐朝，其父钦陵显然葬在了吐谷浑。发现吐蕃棺板画的郭里木之南，就是吐谷浑王的夏宫和王陵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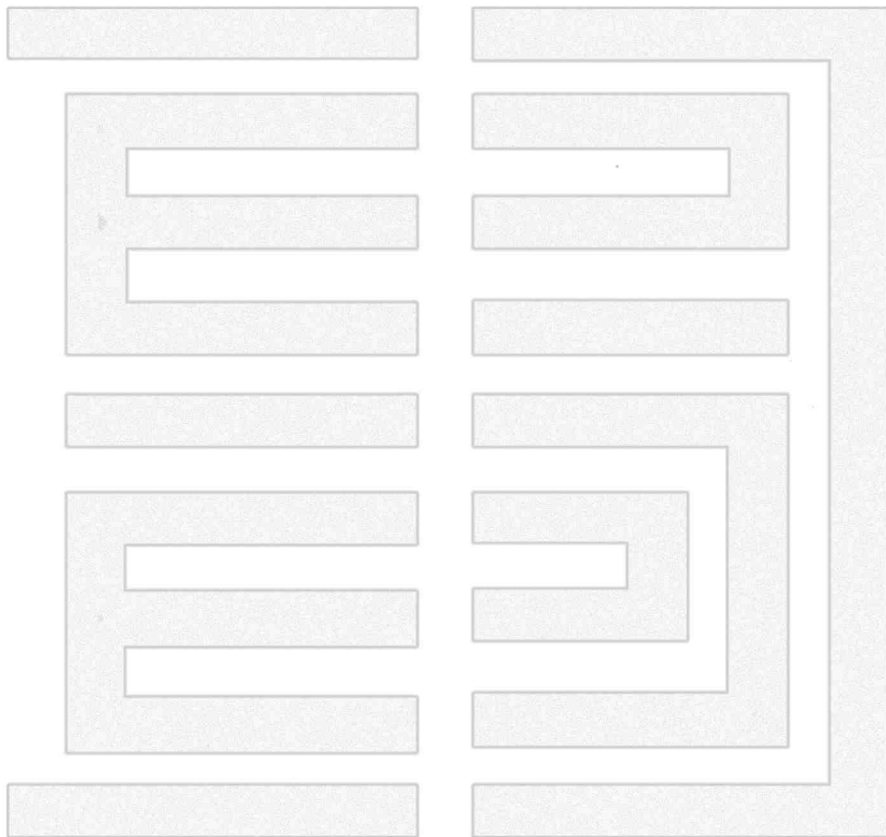
1999年夏，在美国企业家罗杰伟（Roger E. Covey）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和齐东方教授曾率领北京大学考古队到青藏高原工作了三个月，在青海都兰县热水乡发掘了四座吐蕃大墓，最近出版了《都兰吐蕃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这也是青藏高原吐蕃考古第一个科学发掘报告。我们在都兰发掘的四座大墓皆为木椁墓，墓中随葬灰陶罐、灰陶杯、漆木碗、彩绘木鸡、木马鞍、各种动物和人物形小木俑、彩绘木器物、皮靴、金银饰件、铜铁饰件、珍珠、绿松石、藏文木简以及各类丝织品残片。从墓中出土吐蕃碑铭和木简看，一号墓（99DRNMI）为吐蕃尚论（宰相）思结桑墓。据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考证，此人就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提到的“论（思）结桑甲贡，任副大相多年”，死于鸡年（唐肃宗至德二年/757）。郭里木两座吐蕃大墓的规格相当高，绝不亚于我们在都兰发掘的吐蕃大论思结桑墓。因此，两墓之中必有一座是吐蕃大相噶尔钦陵之墓。钦陵自杀时，左右殉死者百余人，因此，郭里木吐蕃大墓中的合葬墓更可能是噶尔钦陵之墓，与他合葬的女性墓主人也许是为他殉死的一位苏毗王妃。

（此文原以《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为题，刊于《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第96-98页。限于篇幅和体例，编辑作了较多删除，本书首次全文刊出）

## 注释：

〔1〕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67页。草原艺术》，《上海文博》2005年第1期，第68-76页。

〔2〕林梅村：《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



公元7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伊斯兰文明迅速取代拜占庭、波斯和粟特文明，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的主流文化。阿拉伯帝国有伍麦叶、阿拔斯和萨曼三大王朝。伍麦叶王朝（Umayyids, 661—750）旗帜尚白，史称“白衣大食”；阿拔斯王朝（Abbasids, 750—868）旗帜尚黑，史称“黑衣大食”；<sup>[1]</sup>萨曼王朝（Samanids, 875-999）名义上尊奉黑衣大食，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拥兵自立的独立王国。

阿拉伯人本为游牧人，长期生活在贫瘠的荒漠地带，文明程度不高。因此，伊斯兰文化兴起之初，不得不依赖于阿拉伯帝国各地被统治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



插图1 巴楚托古孜沙来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早期伊斯兰新月纹织锦

白衣大食——伍麦叶王朝定都大马士革，颇受拜占庭文化影响；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得益于古老的波斯文化。萨曼王朝定都布哈拉，实际上传承了具有千年文明史的粟特文化。由于深受拜占庭、波斯和粟特文化的影响，早期伊斯兰文化有时很难与上述三种文化相区别。我们找到一些证据，可从青海都兰唐代吐蕃大墓随葬品中分辨出一批早期伊斯兰织锦。这个发现使我们认识到，早期伊斯兰艺术的形成不仅受拜占庭、波斯和粟特文化的影响，而且得益于遥远的中国文化。草成是文，以飨读者。

## 一 早期伊斯兰织锦的发现

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发现一件织有外国文字的新月纹丝绸残片，目前和其他大谷收集品一起入藏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插图1-1）。长期以来，这个织锦的文化属性及其文字一直无人能识。<sup>[2]</sup>

1985年，泉州博物馆的陈达生先生终于揭开了这个谜。他发现织锦上的文字应为科菲体阿拉伯文 *farid fath*，意为“唯有胜利”。众所周知，新月纹是伊斯兰艺术最为常见的艺术题材。从纺织技术看，这件织锦采用斜纹重组织技法，可能来自波斯或粟特地区。杭州丝绸博物馆的赵丰先生提出，这件新月纹织锦应为8世纪早期伊斯兰织物。<sup>[3]</sup>另据新疆博物馆贾应逸介绍，新疆巴楚县托古孜沙来古城出土了一件新月和兔子图案的唐代织锦（插图1-2），赵丰把这件新月纹织锦也归入伊斯兰艺术品。<sup>[4]</sup>

由于纺织品不易保存，早期伊斯兰织物在阿拉伯本土罕有发现。1996年，哥本哈根大卫藏品博物馆（Museum of the David Collection, Copenhagen）居然收集到一件出自西亚的伊斯兰织锦残片（编号622）。<sup>[5]</sup>据这家博物馆藏品目录《伊斯兰世界之艺术》，这个残片出自伊拉克或伊朗，残长48.5厘米，残宽11厘米。就在这方寸之间，留下两组图案。上边一组是成对的孔雀，下边一组是成对的苍鹰，两对飞禽皆用萨珊波斯风格的联珠纹装饰（插图2）。收藏者将年代断在7—8世纪中期，相当于阿拉伯帝国第一王朝——白衣大食时期。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禁止在艺术品中采用人物或动物形象。然而，“阿拉伯人虽然成功地以一种新的宗教加诸伊朗，但却证明他们无力并吞伊朗民族。他们



在种族上以及语言上同化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然而在对雅利安主义的统治上却未收到任何效果”。<sup>[6]</sup> 因此，禁用动物或人物的伊斯兰教规在阿拉伯世界并未严格执行。西亚和埃及的许多伊斯兰艺术品，尤其是早期艺术品，广泛采用人物或动物图案。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犹太教、基督教和火祆教文化，所以伊斯兰文化实际上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例如：新月纹来自萨珊波斯王冠上表示王权的月神符号，以苍鹰为保护神则来自波斯火祆教。据波斯火祆教经典《祈祷书》(Yasht) 解释，苍鹰是火祆教军神的十大化身之一，<sup>[7]</sup> 波斯人称为Varhran (战神或胜利之神)，相当于粟特语Wesparkar或阿维斯塔语Verethraghna。<sup>[8]</sup> 阿拉伯工匠在织锦上采用苍鹰图案的寓意，显然与吐鲁番伊斯兰织锦上书写阿拉伯文“胜利”是一致的。波斯火祆教艺术表现军神苍鹰的例子不胜枚举，并且对后来兴起的伊斯兰艺术影响至巨。

俄国考古学家马尔沙克 (Boris Marshak) 的名作《粟特金银器》列举了许多带鹰纹图案的萨珊波斯艺术品。例如：埃米塔什博物馆藏萨珊波斯鹰纹银瓶、斯朵克勒特收藏品中的萨珊波斯晚期鹰纹银盘 (插图 3-1, 3-2)。<sup>[9]</sup> 而苍鹰作为伊斯兰



插图 2 哥本哈根大卫藏品博物馆收藏的伊斯兰织锦残片

教保护神亦有案可稽。俄罗斯埃米塔什博物馆藏有一件鹰形青铜镶银水注, 通高38厘米, 宽45厘米(插图3-3)。水注顶部本来有个执柄, 可惜早就遗失。这个水注通体镶嵌白银或红铜花纹, 颈部有一行阿拉伯文, 读作: “以仁慈的、富于同情心的安拉之名义, 愿真主保佑。” 铭文最后刻工匠名称“苏莱曼大师”和作器时间“回历180年(796/797)”。据说, 这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伊斯兰纪年镶银铜器。<sup>[10]</sup>

此外, 鹰纹图案还见于埃及开罗出土公元8—9世纪伊斯兰鹰纹织锦以及青海都兰出土早期伊斯兰织锦(插图3-4、3-5), 后者目前分别收藏在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sup>[11]</sup>

哥本哈根戴维藏品中的鹰纹织物残片并非科学发掘品, 凭什么将这个带有萨珊波斯风格的织锦归入伊斯兰艺术呢? 该博物馆展品目录中没有说明其立论根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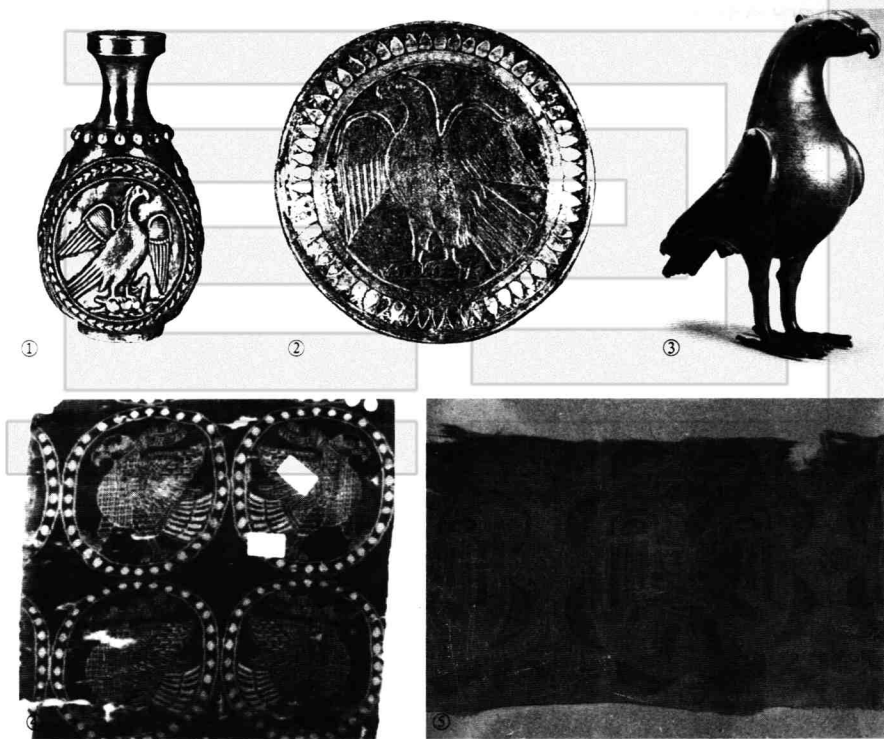


插图3 ①萨珊波斯鹰纹胡瓶, 埃米塔什博物馆藏品 ②萨珊波斯晚期鹰纹银盘, 斯朵克勒特收藏品  
③伊斯兰式鹰形水罐, 回历180年(796-797) ④埃及出土早期伊斯兰鹰纹织锦, 公元8-9世纪  
⑤青海都兰出土伊斯兰风格的鹰纹织锦, 唐代

们注意到这件织锦上有孔雀纹，这种纹饰从不见于萨珊波斯艺术，但是广泛应用于伊斯兰艺术。青海都兰吐蕃大墓（1号墓）出土伊斯兰风格的星月孔雀纹织锦就采用孔雀图案（插图4）。大概由于这个原因，收藏者将这个孔雀纹织锦归入早期伊斯兰艺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下文的讨论中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

## 二 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伊斯兰织锦

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青藏高原发现唐代吐蕃墓群。这个墓群位于都兰县热水乡，调查发掘工作迄今已持续进行了20年。

都兰墓群中最大的陵墓封土堆呈金字塔状（1号墓），墓基160米长，100米宽，高达30米，周围陪葬遗迹占地面积达1500平方米（插图5），并有27座圆形陪葬坑和5条陪葬坑，其内殉葬了87匹骏马以及大批牛、狗等家畜。这批吐蕃贵族墓出土文物相当惊人，单丝织品一项就多达三百五十余片，可分一百三十余种，绝大多数为中原输入品，计有锦、绫、罗、绢、纱以及代表唐朝纺织技术最高水平的缣丝，几乎囊括了唐代所有丝绸品种。据报导，都兰吐蕃墓地至少发现了18种外来丝织品，其中既有萨珊波斯王室使用的婆罗钵文织锦和大食出产的织金锦，亦



插图4  
青海都兰吐蕃大墓出土星月孔雀纹织锦

有中亚撒马尔干的粟特锦和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大秦锦,生动地反映了唐朝与拜占庭之间丝绸古路文化交流的盛况。<sup>[12]</sup>

大食与唐朝的交往,史不绝书。唐开元四年(716)“七月,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漫遣使上表,献金线织袍、宝装玉洒池瓶各一”<sup>[13]</sup>。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漫即白衣大食第十代哈里发苏莱曼(715-717)<sup>[14]</sup>,而“金线织袍”和“宝装玉洒池瓶”大概就是青海都兰吐蕃大墓以及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织金锦和伊斯兰风格玻璃瓶。<sup>[15]</sup>

除大食织金锦外,都兰吐蕃宝藏中还有另一类伊斯兰风格的织锦,可惜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没能引起充分注意。主持都兰发掘工作的许新国先生最近刊布了吐蕃大墓一部分新数据,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外来丝织品。<sup>[16]</sup>有几件称作“红地对鸟纹锦”的丝绸残片(插图6-1),竟然与戴维收集品中早期伊斯兰织锦完全相同。另外两件织锦残片上有成双成对的孔雀纹或苍鹰纹图案(彩版6),与伊斯兰织锦艺术风格相近,亦属于早期伊斯兰织锦(插图6-2,6-3)。

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都兰吐蕃大墓前的殉马坑内还清理出一个镀金银青铜透雕盒饰残片,主题图案为凤纹和忍冬纹(插图7-2),发掘者以为是佛教舍利容器的装饰物。<sup>[17]</sup>无独有偶,叙利亚伍麦叶时期遗址中发现过类似的青铜透雕盒饰,主题图案亦为类似凤凰的孔雀纹和忍冬纹,目前作为早期伊斯兰艺术标本入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插图7-1)。<sup>[18]</sup>如前所述,早期伊斯兰艺术广泛采用孔雀纹。

插图5  
都兰唐代吐蕃墓群1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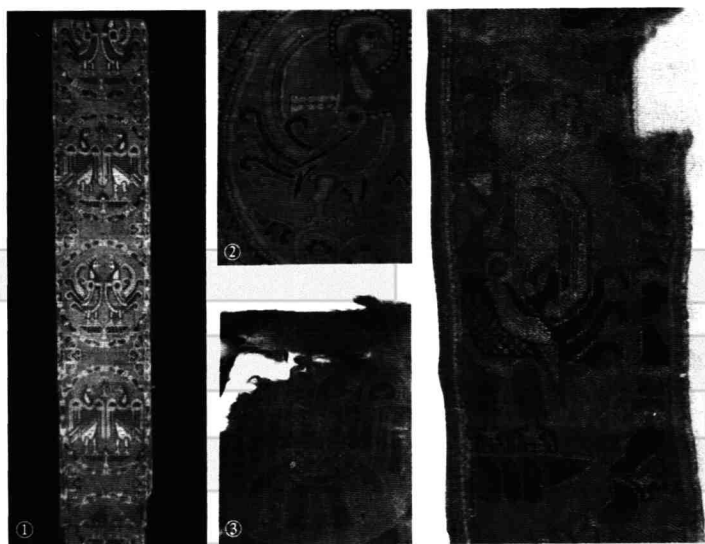


插图6 都兰吐蕃墓地出土伊斯兰织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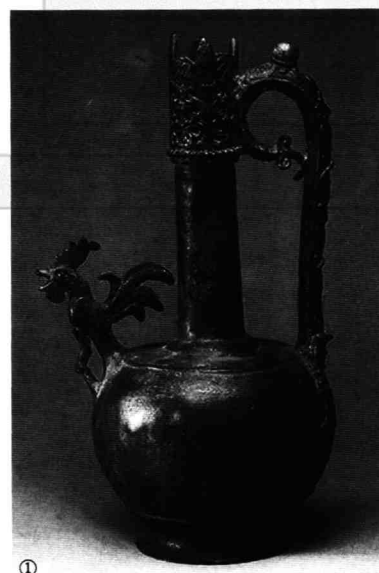


①



②

插图7 ①叙利亚出土早期伊斯兰风格的凤纹透雕青铜花盆，伍麦叶王朝  
②都兰吐蕃，1号大墓出土早期伊斯兰风格的凤纹青铜盆饰，唐代



①



②

插图8 ①叙利亚出土伊斯兰青铜水注，公元8—9世纪早期，大都会博物馆藏品  
②白瓷龙柄鸡首壶，隋代—唐初

由此推测，都兰镀金银青铜凤纹透雕盒饰大概不是佛教舍利盒，而属于早期伊斯兰艺术品。

### 三 伊斯兰艺术中孔雀纹的文化来源

如前所述，孔雀纹是早期伊斯兰艺术流行的重要题材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伊斯兰艺术中的孔雀纹又来自何方呢？据我们调查，这个艺术题材实际上来自中国。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570-632）曾有圣训（Hadith）曰：“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sup>[19]</sup> 不过，最早踏上中国土地的阿拉伯人并非学者，而是商人，他们把大批中国物品运回故乡。

众所周知，瓷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阿拉伯商人将唐三彩和瓷器带回故乡后，极大地刺激了伊斯兰手工业和艺术创作。叙利亚曾发现一件早期伊斯兰青铜水注（插图8-1），年代在公元8-9世纪，其艺术造型完全模仿中国隋唐时期流行的青瓷鸡首壶（插图8-2）。这件珍贵文物作为早期伊斯兰艺术品的重要标本入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sup>[20]</sup>

近年海洋考古新发现为了解中国文化如何影响阿拉伯世界提供了进一步证据。1998年，印度尼西亚渔民在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海域意外发现一条中世纪波斯沉船，根据发现地点命名为黑石号（Batu Hitam），打捞工作于2001年结束，出水中国各类瓷器和金银器多达六万余件。沉船文物分类整理工作由海德堡大学的陈玉秀女士负责。据她调查，沉船多数文物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中期，有纪年铭文的瓷器皆属于晚唐时期。

台湾大学谢明良教授撰写长文，介绍了沉船中六万余件中世纪瓷器的窑口（包括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和广东窑系等）及其相关问题，认为这条船是从扬州启航，经广州等地驶往波斯湾，目的地可能是波斯著名的东方贸易海港尸罗夫（Siraf）。此外，他还讨论了这个考古新发现对中国陶瓷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sup>[21]</sup> 殊不知，这条波斯船仅是驶往阿拉伯世界的千万条海船中的一艘，中国文化对阿拉伯文明的巨大冲击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伊斯兰文化中的孔雀纹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神鸟凤凰。

耐人寻味的是，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中有相当数量的凤首三彩壶。有学者以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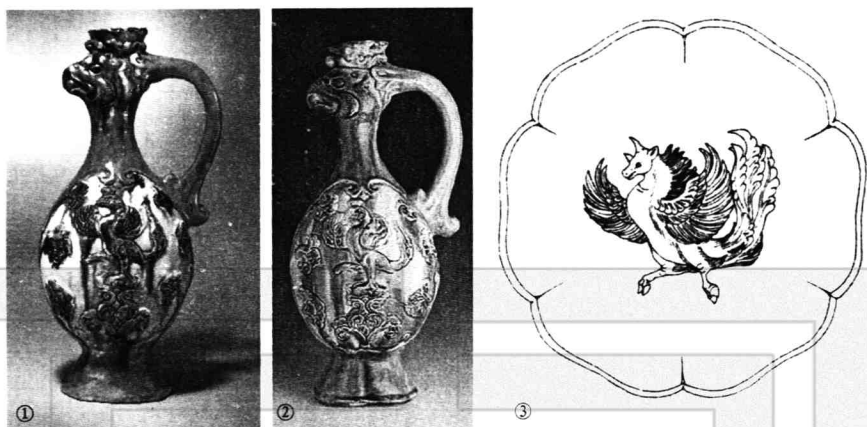


插图9 ①台湾国立博物馆藏，唐代凤首三彩壶  
 ②中国出土唐代凤首三彩壶  
 ③西安何家庄出土唐代凤纹银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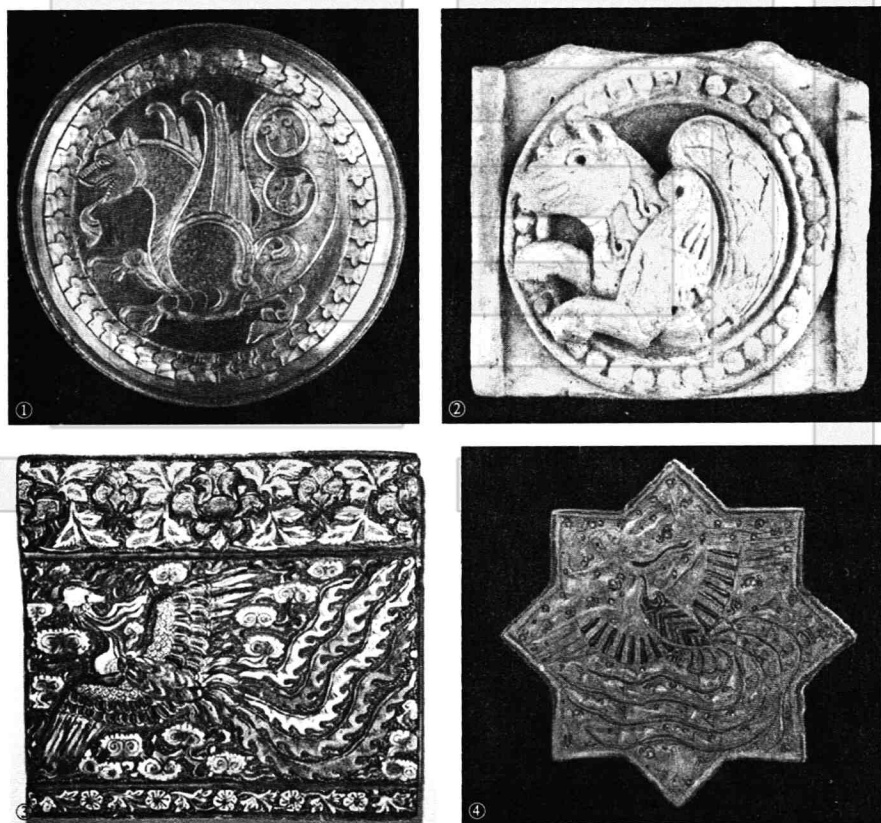


插图10 帕提亚银器和建筑构件上的森穆夫(1-2)与伊斯兰凤纹瓷板(3-4)



是龙首或鸡首三彩壶。从谢明良提供的局部放大照片看，这件三彩壶显然是凤首而非龙首或鸡首。此外，这类三彩壶上往往有凤凰堆塑图案，阿拉伯或波斯工匠不难从中得到创作伊斯兰凤凰的灵感。台湾国立博物馆收藏了这样一件三彩壶，类似的三彩壶还见于《东方》(Orientation)杂志1994年6月刊，两者壶壁上都有凤纹堆塑图案(插图9-1、9-2)。西安何家庄唐代窖藏金银器中有一个凤纹银盘(插图9-3)，样式与唐三彩凤首壶上凤凰造型如出一辙。据中国历史博物馆孙机先生考证，此类凤凰源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风神“飞廉”，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广泛流行于中国北方。<sup>[22]</sup>

萨珊波斯艺术中亦有类似凤凰的神鸟，波斯人谓之“森穆夫”(Sermuv)，是波斯火祆教十大保护神之一。萨珊金银器和建筑构件上常见森穆夫图案，主要为有翼神犬、有翼骆驼形象，只是尾部采用孔雀尾(插图10-1、10-2)。伊斯兰的凤纹或孔雀纹与之不同。例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一件12世纪伊斯兰风格的孔雀纹三彩瓷板，出自伊朗著名伊斯兰遗址喀山(插图10-3)。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伊斯兰凤纹瓷板的年代稍晚，约在公元14世纪中叶，出自伊朗高原塔克提·苏莱曼遗址(插图10-4)。<sup>[23]</sup>只要稍作比较，不难发现伊斯兰孔雀纹与波斯火祆教的森穆夫形象相去甚远，而与中国的凤凰如出一辙。

伊斯兰文化后来居上，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阿拉伯世界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地带，成为中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印度数学十进制和中国四大发明，相继从伊斯兰世界传入欧洲，最终促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和现代文明的产生。本文对青海都兰出土伊斯兰织锦的讨论，再次揭示了伊斯兰文化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原载《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 注释：

[1] 阿拔斯王朝年代下限或定在1258年——伊尔汗国建立之年，但是实际上868年以后阿拔斯的哈里发只是一些傀儡，实权掌握在身边的突厥权臣手中。因此，研究者或将868年以后的阿拔斯王朝称作“塞尔柱突厥王朝”。本文亦主张如此。

[2] 井ノ口泰淳：《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探险队将来西域文化资料选》，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1983年，第48页图版及其文字说明。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曾把这个织锦的彩色照片作为《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的封面装潢，以为出自新疆米兰，并把织锦上文字说成是粟特文。不知其说有何根据（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18-219页）。

[3] 赵丰：《魏晋织锦中的异域神祇》，《考古》1995年第2期，第173-181页及148页。

[4] 贾应逸：《新疆丝织技术的起源及其特点》，《考古》1985年第2期。

[5] 这件文物的彩色图版，参见大都会博物馆网站（[http://www.davidmus.dk/frameset\\_en/frameset01.html](http://www.davidmus.dk/frameset_en/frameset01.html)）。

[6] 格鲁塞著，常任侠等译：《近东与中东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5-86页。

[7] 波斯火袄教经典《祈祷书》第14章罗列的军神化身有牡牛、马、骆驼、牡野猪、青年、鹰、牡羊、黄羊、武士等动物或人物，凡十种之多，萨珊波斯艺术品中有大量表现各类军神的金银器或纺织品。

[8] H.S. Nyberg, *A Manual of Pahlav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4, p.203.

[9] Boris Marshak, *Soghdian Silver*, trans. by G. M. Sergheyev, Moscow, 1971, p.225, plate B.

[10] 关于这件伊斯兰艺术品，参见埃米塔什博物馆网站（[http://www.hermitagemuseum.org/html\\_En/03/hm3\\_5\\_5b.html](http://www.hermitagemuseum.org/html_En/03/hm3_5_5b.html)）。

[11] Annette L. Juliano and Judith A Lerner,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with The Asia Society, 2002, p.315.

[12]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合刊，第18-21页。

[13] 《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

[14] 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378页和第903页。

[15] 关于大食金线织袍与唐代织金锦的讨论，参见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3-84页。

[16] 许新国：《中国青海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中国青海省におけるシルクロードの研究》，京都，明新印刷株式会社，2002年，第212-225页。

[17] 许新国：《中国青海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中国青海省にお

るシルクロードの研究》，京都，明新印刷株式会社，2002年，第216-217页。

〔18〕关于这件早期伊斯兰文物，参见大都会博物馆网站 ([http://www.metmuseum.org/toah/hd/umay/hd\\_umay.html](http://www.metmuseum.org/toah/hd/umay/hd_umay.html))。

〔19〕希提(P.K. Hitti)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65页。

〔20〕关于这件早期伊斯兰文物，参见大都会博物馆网站 ([http://www.metmuseum.org/toah/hd/umay/ho\\_41](http://www.metmuseum.org/toah/hd/umay/ho_41)。

65.html)。

〔21〕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期，台北，2002年，第1-45页。

〔22〕孙机：《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3-172页。

〔23〕关于这两件伊斯兰三彩瓷板，参见大都会博物馆网站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s/view1>) 和弗利尔美术馆网站 (<http://web4.si.edu/asia/collections>)。

## 一 特克斯河突厥遗迹的发现

小洪那海的突厥遗迹发现于50年代初。1953年，以武伯伦为首的伊犁考古队在新疆昭苏县特克斯河（Tekes river）支流小洪那海（Little Khonakhai）发现刻有文字的突厥石人，当地牧民俗称“小洪那海石人”（插图1）。他们在昭苏草原一共找到3处突厥石人：<sup>[1]</sup>

其一，“小洪那海石人：在县城东南约五公里的草原中，面向东，双手交叉胸前，头发散披身后，身旁衣褶上刻有不认识的文字（插图1）。高230厘米，头部宽35厘米，身宽50厘米。刻工朴素。”据1990年伊犁考古资料，小洪那海石人位于昭苏种羊场东南大约3.5公里处；地理坐标东经81° 11'48"，北纬43° 47'49"，海拔1790米。<sup>[2]</sup>

其二，“叶森培孜儿石人：雕刻十分简单，长75厘米，宽20厘米，勉强可以辨出胡须。面向东，无题记。在石人后面还有用卵石堆起的石堆，形如墓丘。”

其三，“哈萨克培孜儿石人：有两个石人，在叶森培孜儿东约八公里，大小与叶森培孜儿相同，也有类似墓葬的石堆和方阵。”1990年，伊犁考古调查改称“土胡图尔石人”。这个石人位于昭苏县74团场南部约2.5公里处，地理坐标东经80° 42'44"，北纬42° 41'51"，海拔1815米。<sup>[3]</sup>“石人面向东，高1.3米，刻石为长方形，在上面雕刻了人的面部……髭呈八字形。”<sup>[4]</sup>

1957年，黄文弼先生到伊犁考古调查，在小洪那海北岸大约50公里处再次发现突厥石人。<sup>[5]</sup>

考古发现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特克斯河流域是古代突厥人一个重要活动中心。

1953年，新疆博物馆馆长李遇春先生将小洪那海碑铭的拓片送到北京，请中央民族学院冯家昇教授研究。他发现这个碑铭是粟特文写的，中国当时没有古代伊

朗语专家，冯先生本人只懂突厥文和回鹘文，无法释读这个碑铭。50年代末，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到伊犁考察。1960年，他在一篇新疆考古调查简报中指出：“昭苏县小洪那海的一个石人，正面腰下衣褶间刻宰利文字（即粟特文……）”<sup>[6]</sup>这个说法即来自冯家昇的鉴定。<sup>[7]</sup>小洪那海石人发现后第三年（1956），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C. Doržsuren）在蒙古国后杭爱省呼尼河畔布古特发现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再次证明突厥汗国最初以粟特文为官方文字。<sup>[8]</sup>

人们似乎没注意史树青的报道。7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刊布小洪那海石人照片时，图版说明仍以为石人上的文字是“突厥文”。<sup>[9]</sup>这张照片引起大洋彼岸的美国突厥学家克拉克（L.V. Clark）教授的注意。他发现石人上的文字应是粟特文，由于照片模糊，无法确定碑铭的语言是否亦为粟特语。1978年，克拉克教授调查了中俄杂志的相关报道，<sup>[10]</sup>在德国一家中亚杂志《乌拉尔阿尔泰年鉴》上撰文，强调小洪那海石人对古代突厥史研究的重要性。<sup>[11]</sup>

第一个研究小洪那海碑铭的伊朗学家，是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吉田丰（Yutaka Yoshida）博士。1990年，他从新疆博物馆维吾尔族学者伊斯拉菲尔·玉苏甫那里得到一份拓片和照片。这份照片和拓片都不太清楚，他在1991年的论文中只认出几个字。例如：第2行  $ct\ \beta' r\ kyr' n$ （四方的）；第3-4行  $rty\ 21\ sr\ \delta' x\ s' wnh\ \delta' r\ rty\ lllll\ m' x'$ （持国凡二十一年，尔后六个月内）；第5行  $rty\ XX\ lllll\ sr\ \delta$ （二十六年之后）；第7行  $mw\ \gamma' nx' \gamma' n\ n\ py\ sn\ \beta\ \gamma' \gamma'$ （木杆可汗之孙、国君）。<sup>[12]</sup>

插图1  
小洪那海石人



1992年8月，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大泽孝（Takashi Ōsawa）先生实地考察小洪那海石人，随即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据说1993年2月23日，他在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一个研讨会上，就此问题作了口头发言，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吉田丰的bry(第19行)读作nry（泥利）；第6行末尾亦出现“泥利”一词，大泽孝读作mw γ' n x' γ' n npγsn βγγ…… p' γ nry x' γ' n（木杆可汗之孙、国君……泥利可汗）；第二，吉田丰对第7行的辨识有误，实际读作srδwmz' γx x' γ' n β' γ（……年，成为大可汗、国君）；第三，吉田丰在第16行读出的m' tyh（母亲）实际应读x'ttwnh（可敦）。不过，吉田丰告诉大泽孝，伦敦大学教授西姆斯·威廉斯1993年3月28日写给吉田丰的信中，早就得出了“泥利可汗”的读法。直到1999年，大泽孝才正式发表上述改进意见。<sup>[13]</sup>

1996年7月，吉田丰和大阪大学森安孝夫（Takao Moriyasu）教授实地考察小洪那海石人后，又在碑铭最后一行读出cwr γ x' γ' nt（处罗可汗）和δ r' γ δ（统领）两字。<sup>[14]</sup>

处罗可汗时代（605 - 611），突厥汗国分裂，相互攻伐。中亚草原形成大可汗系、阿波系和室点密系三大势力。突厥统治下的铁勒部落两次发动起义，最终形成中亚草原第四大势力。中亚草原当时的政治格局如下图所示（插图2）。

泥利可汗属于阿波系突厥可汗，由于文献语焉不详，这个系统的突厥人属于西突厥还是东突厥，学术界颇多争议。<sup>[15]</sup> 我们的看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玉贵先生不谋而合。<sup>[16]</sup> 阿波可汗是从突厥大可汗系分化出来的，其汗位传承为：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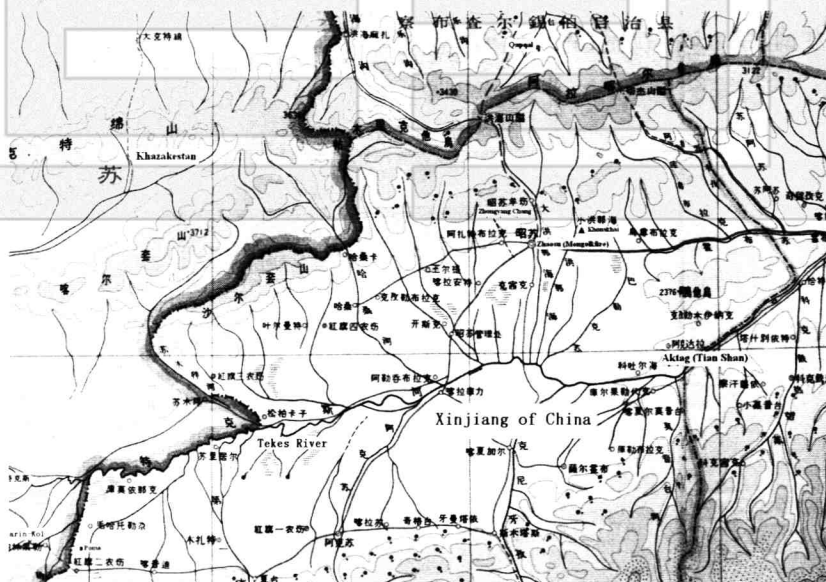
插图2 公元7世纪初割据四方的突厥可汗

杆可汗——阿波可汗（大逻便，木杆可汗之子）——泥利可汗（鞅素特勤之子）——泥橛处罗可汗（达漫，泥利之子）。

阿波系突厥可汗本来驻牧金山之阳（今阿尔泰山南麓），后来投靠西突厥达头可汗。在铁勒人两次起义打击下，阿波系突厥可汗处罗旧地丧失殆尽，被迫率部众西迁。此后，“处罗可汗居无恒处，然多在乌孙故地。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在龟兹北，其地名应娑。”<sup>[17]</sup> 处罗可汗控制疆域，东起应娑（今新疆天山裕勒都斯河谷），西至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以北，统治中心则在乌孙故地（今新疆昭苏草原特克斯河流域）。隋大业六年，在西突厥可汗射匮的打击下，处罗可汗又率部东迁时罗漫山（今新疆东境巴里坤山）。大业七年，处罗可汗在其母向氏劝说下降隋，流寓长安。唐武德二年（619），处罗可汗在长安被东突厥使者谋杀，阿波系突厥汗国遂亡。<sup>[18]</sup>

尽管小洪那海碑尚未通读，但是目前读出的几个字，足以说明这个石人不是一般人，而是突厥可汗石像。这个发现，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日本学术界掀起一股研究小洪那海石人的热潮。他们不满足于只讨论碑文，多次前往昭苏实地考察（插图3）。据我们所知，除吉田丰和森安孝夫教授（1996）外，前往昭苏的日本学者还有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松原正毅和大泽孝先生（1992）、创价大学教授林俊雄先生（1992）、九州大学教授西谷正（1993）和大塚纪宜先生（1995）。<sup>[19]</sup>

插图3 小洪那海石人位置图





## 二 1991年第一次调查

我们对小洪那海石人的调查始于90年代初。受新疆文化厅厅长谢耀华先生的委托，我们于1991年10月前往新疆伊犁地区昭苏县调查古代突厥遗迹。昭苏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特克斯河流域，当地牧民称Mongolküre（蒙古廓勒）。特克斯河自东而西流，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则称“纳林河”（Narin-kol）。特克斯河上游有两条支流，一条称“大洪那海”，另一条称“小洪那海”（插图3）。后者从突厥石人附近流过，所以当地牧民称它为“小洪那海石人”。

古代突厥人采用火葬，陵墓不起坟冢。7世纪初，颉利可汗死，“诏其国人葬之，从其礼俗，焚尸于霸水之东”<sup>[20]</sup>。在中原礼仪影响下，有些突厥人改用中原葬俗。所以唐太宗谈及突厥葬俗时（628）说：“其俗死则焚之，今起坟墓，背其父母之命。”<sup>[21]</sup>小洪那海突厥陵园保持了突厥人古老的葬俗，地表无坟冢。据我们当时的记录，石人立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土台上，石质为花岗岩。土台后似有盗掘痕迹，地表明显下凹（插图4）。除胸部略有残损外，石人保存状况良好，由一个半身突厥人像和方形底座两部分构成。通高1.83米（地表至头顶），头宽0.35米，身宽0.50米。石人面向东方，右手持钵，左手扶腰带。由于没有发掘，石人地下部分尺寸不详。据王明哲勘测，这个石人通高2.30米，那么地下部分不少于0.47米。<sup>[22]</sup>据当地牧民说，新疆文物部门打算把这个石人运回乌鲁木齐，动用大型拖拉机试图拉倒石人，结果拉坏了两台东方红拖拉机，都没成功。看来，埋在地下的部分至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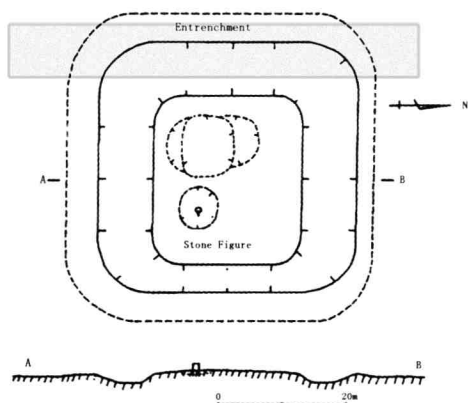


插图4  
小洪那海突厥陵园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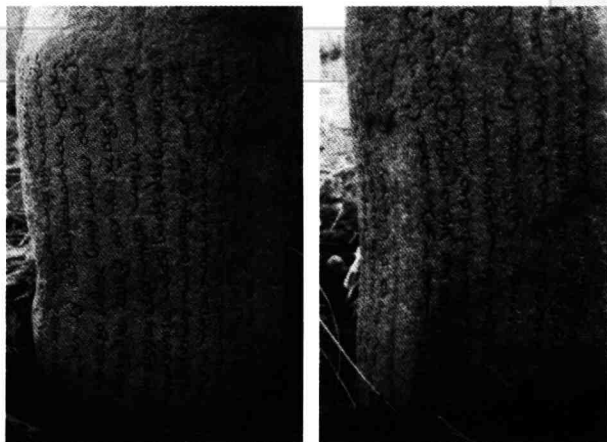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两米，否则石人不可能如此根深蒂固。

古代突厥石人可分两大类：第一类具有较强的写实性，从脸形和胡子形式看，应为墓主人肖像，大多带有蒙古人种特征。雕工较精的石人刻有帽子或发髻、发辫、耳环、衣著、腰带及其上的饰牌、大刀、短剑、小袋等，手上常持一个容器。萨颜-阿尔泰山突厥石雕像（约8—9世纪）皆属此类；第二类只作简单雕琢或不作雕琢，表示墓主人生前所杀俘虏，突厥人称Balbal（杀人石）。小洪那海石人属于第一类。尽管石像长发散披于腰部，但是脸上刻有八字胡，当系男性形象。新疆特克斯县和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畔所见突厥男性石人，皆长发散披于肩后。<sup>〔23〕</sup>

这次昭苏之行的首要目的是考察突厥遗迹和中亚碑铭。由于冬季即将来临，我们必须在大雪封山前翻越天山达坂，赶回乌鲁木齐，未及勘测整个陵园。小洪那海突厥陵园布局，是林俊雄教授1993年勘测的。据他实地调查，石人下的土台，南北宽30.5米，东西长31米。土台四周环绕一条大约1米深、5—6米宽的围墓沟（插图4）。<sup>〔24〕</sup>

我们考察的第一个重点，是昭苏草原突厥遗迹的分布。我们找到一些证据，说明室点密系突厥可汗早期活动中心就在特克斯河流域，史称“阿羯田山”（突厥语Aktar）。<sup>〔25〕</sup>我们考察的第二个重点，是小洪那海石人底座碑铭。据当时的记录，石人底座的东、北两面皆有文字，东面12行，北面8行，一共20行粟特文。石人面向东方，所以东为正面，北为侧面。正如蒙古高原的突厥碑铭一样，碑文从东面起读，至北面结束（插图5和彩版9）。

插图5  
小洪那海粟特碑铭



值得庆幸的是，伊犁博物馆的赵德荣先生为拍摄碑铭照片，不久前刚用墨水描过石人底座上的文字，所以我们能够拍摄到比较清楚的照片。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拍的照片只是碑铭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仍埋在土中，无法拍摄。身为考古学家和国家文物局工作人员，我们不能擅自发掘古物，只得带着万分遗憾，告别昭苏草原。

90年代初，中国仍没有研究古代伊朗语的学者，我本人只懂一点梵语和犍陀罗语。凡是遇到伊朗学问题，我们都向剑桥大学教授贝利（Harold W. Bailey）爵士或伦敦大学的西姆斯·威廉斯（Nichola Sims-Williams）教授请教。他们总是伸出友谊之手，热情帮助我们解读新发现的各种古代伊朗语碑铭。<sup>[26]</sup>一回到北京，我们就把小洪那海粟特碑铭照片寄往伦敦。不久，西姆斯·威廉斯教授回信说，我们的照片只有碑铭上半部分，有些地方字迹不清，尤其是第10-11行和第14行的摹写有误，不太好读。他正全力以赴，业已读出“木杆可汗”、“泥利可汗”等字。在多次的通信往来之后，我们商定协手研究碑文。

为此，我们向新疆博物馆老馆长李遇春先生求援，寻找1953年他们考察小洪那海石人时做的拓片。他来信说：这个拓片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但是他找到了这个拓片的三寸照片和底片，我们把这些资料一并寄往伦敦。不久，西姆斯·威廉斯教授回信说：拓片照片太小，字迹仍不清楚。从拓片看，我们拍到了绝大部分碑文，似乎只有一小部分没有拍全。他在信中还提到：他有个日本学生（即吉田丰）也在研究这个碑铭。此外，一位叫大泽孝的日本学者认出了“泥利可汗”一词。他们的照片似乎不如我们的清楚，所以没认出几个字。<sup>[27]</sup>这时，我们才知道日本朋友正投入大批人力物力，积极参与小洪那海粟特碑铭的调查与研究。

1992年冬，我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回国后，本打算重返小洪那海，去拍摄照片上不清楚的碑文，然后赴伦敦与西姆斯·威廉斯教授共同研究。偏偏在这时，季羨林和宿白两位恩师要我回北大教书，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殊不知，新工作终日忙忙碌碌，我们与当代伊朗学大师合作研究之梦亦逐渐破灭。

### 三 2002年第二次调查

就在我们一直苦于找不到机会重返小洪那海时，机会却送上门来。中国国土资

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对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地质勘探。2002年7月，中国地质调查局下属勘探队在小洪那海石人附近开展工作，一个勘探队员无意中有人从这个突厥石像下挖出陶片。尽管陶片相当残破，他们还是做了采集，编号D251L300。2002年10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队派人将小洪那海石人下采集的陶片送到北京大学，同时，他们还送来了一批新拍摄的小洪那海碑铭照片。<sup>[28]</sup> 这个新发现重新燃起了我们对小洪那海石人的热情。

据我们初步调查，这批陶片可以按照陶质分为两类：一类是加砂灰陶；另一类是加砂黄陶。我们知道，中亚青铜时代晚期文化（如卡拉苏克文化）流行加砂黄陶，所以加砂黄陶可能是小洪那海早期文化堆积中的遗物。这类陶片不过一两片，绝大多数陶片属于加砂灰陶。可惜过于残破，我们只能看出两种器形：第一种是突厥典型陶器——折肩罐残片。萨颜-阿尔泰山和蒙古高原的突厥石人就手持这种折肩罐，同类器物亦见于突厥金银器（插图6）<sup>[29]</sup>。

第二种陶片颇为重要，居然是板瓦和筒瓦残片。中国传统建筑用瓦防雨，最早见于河南郑州商城宫殿遗址和陕西扶风西周早期遗址出土板瓦。<sup>[30]</sup> 制作方法：先用泥条盘筑成陶水管状圆筒泥坯，如果切割成两半，可以做成两个“筒瓦”；如果切割成三等分，可以做成三个“板瓦”。小洪那海石人下采集的一些陶片，带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器壁较直，必为建筑用瓦。弧度大的为筒瓦，弧度小的为板瓦（插图7）。唐代大明宫遗址所见唐瓦，包括灰瓦、黑瓦（表面打磨抛光）和琉璃瓦三种类型。小洪那海灰瓦表面未经打磨，亦无琉璃层，无疑属于第一种类型。河南洛阳隋唐砖瓦窑出土板瓦的厚度多为2.5-3厘米，少数为1.7厘米，年代在隋大业元年至唐开元十九年（605—731）。<sup>[31]</sup> 小洪那海板瓦厚2.5-3厘米，与隋唐板瓦厚度相同。这个发现说明小洪那海石人原来建有汉式碑亭或宗庙。

隋代末年，许多中原居民被突厥人劫掠到西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五年条说：“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赎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有些中原人甚至流落中亚楚河流域。公元7世纪初，玄奘西行中亚时，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古城）西南450余里处寻访到一个汉族聚居地，时称“小孤城”。城内有“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国人，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sup>[32]</sup> 中亚的汉族侨民不仅把中原汉文化传到西域，而且对西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据史家陈寅恪考证，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祖先，实乃中亚碎叶城的汉化胡人。<sup>[3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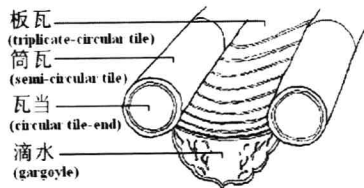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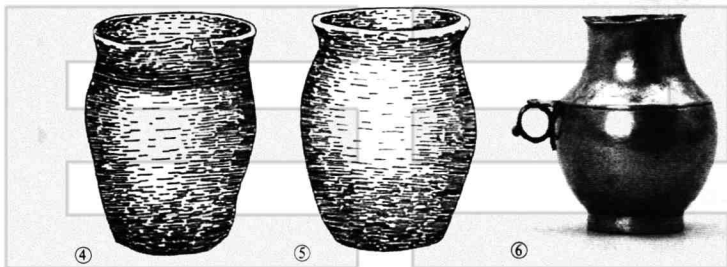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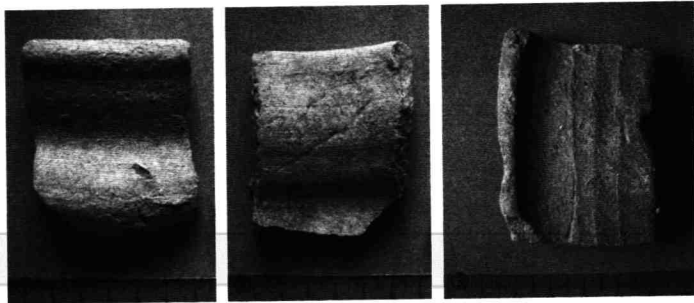


插图6 小洪那海折肩罐陶片(1-3)、突厥折肩罐(4)的陶器、(5)银器

插图7 小洪那海石人下出土的筒瓦和板瓦残片

处罗可汗是泥利可汗与汉族妃子向氏所生，后者恐为掠入突厥的中原女子。《隋书·西突厥传》记载：“（泥利）卒，子达漫立，号泥掘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关于突厥葬俗，《隋书·突厥传》说“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这个记载来自长安城的突厥人，诸如处罗可汗的母亲向氏或叔叔婆实特勤等突厥侨民。小洪那海石人下所出土筒瓦和板瓦，可与文献相互印证，说明这个突厥可汗陵园建有汉式碑亭或宗庙建筑，不知是否为泥利可汗的汉族妃子向氏为亡夫所建。

#### 四 小洪那海粟特碑铭之年代

关于泥利可汗在位年代，文献语焉不详。小洪那海粟特碑铭的发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据史书记载，突厥人“不知年历，唯以青草为记”。<sup>[34]</sup>隋文帝开皇“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项羌内附。庚午（586年2月12日），班历于突厥”。<sup>[35]</sup>此后，突厥人改用中原历法。正如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指出的，向周边国家或地区颁布中国历法，是中原王朝体现宗主权的一种统治术。这样一来，“受历者”就等于承认自己为中国的附庸国。<sup>[36]</sup>

有证据表明，突厥人早就采用中原历法。布古特碑说佗钵可汗于兔年（xrywšk srδ）登基，恰与史书说佗钵可汗即位于北周天和六年（571），岁在辛卯（兔年）相合。<sup>[37]</sup>一部唐代颇为流行的密教经典说：“西国以子丑十二属记年，以星曜记日。”<sup>[38]</sup>也就是说，西域诸国是以十二生肖的周期来计算的年代，他们的日子则以星期来计算。据伯希和与巴赞（Liouss Bazin）考证，这里的“西国”主要指伊朗语世界，尤其指中亚粟特王国。<sup>[39]</sup>

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一份粟特语历书。据德国语言学家缪勒（F. W. K. Müller）解读，这份历书在每日之下标出粟特语、汉语和突厥语三种称谓，每日先标以粟特语七曜日名称，然后标以甲乙丙丁等汉语十干的粟特语对音，最后标以十二生肖粟特译名。每隔二日，用朱笔记上汉语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粟特译名。<sup>[40]</sup>显然，小洪那海碑就根据此类粟特历书来纪年。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碑文纪年、

公元纪年、中原历法、突厥历法以及粟特语生肖列表如下：<sup>[41]</sup>

表1 泥利可汗时代各类纪年

历史事件	突厥历法	公元纪年	中原历法	粟特历法
木杆可汗去世	21 鼠	572	北周建德元年 壬辰 / 龙	n'k
	22 牛	573	北周建德二年 癸巳 / 蛇	kyrmy
	23 虎	574	北周建德三年 甲午 / 马	'spy
	24 兔	575	北周建德四年 乙未 / 羊	psyy
	25 龙	576	北周建德五年 丙申 / 猴	mkr
	26 蛇	577	北周建德六年 丁酉 / 鸡	myyy
	27 马	578	北周建德七年 戊戌 / 狗	kwty
	28 羊	579	北周建德八年 己亥 / 猪	k's
	29 猴	580	北周大象元年 庚子 / 鼠	mws
	30 鸡	581	隋开皇元年 辛丑 / 牛	y'w
	31 狗	582	隋开皇二年 壬寅 / 虎	myw
	32 猪	583	隋开皇三年 癸卯 / 兔	xrywšy
	33 鼠	584	隋开皇四年 甲辰 / 龙	n'k
	34 牛	585	隋开皇五年 乙巳 / 蛇	kyrmy
	35 虎 / 马	586	隋开皇六年 丙午 / 马	'spy
泥利可汗即位	36 兔 / 羊	587	隋开皇七年 丁未 / 羊	psyy
	龙 / 猴	588	隋开皇八年 戊申 / 猴	mkr
	蛇 / 鸡	589	隋开皇九年 己酉 / 鸡	myyy
	马 / 狗	590	隋开皇十年 庚戌 / 狗	kwty
	羊 / 猪	591	隋开皇十一年 辛亥 / 猪	k's
	猴 / 鼠	592	隋开皇十二年 壬子 / 鼠	mws
	鸡 / 牛	593	隋开皇十三年 癸丑 / 牛	y'w
	狗 / 虎	594	隋开皇十四年 甲寅 / 虎	myw
	猪 / 兔	595	隋开皇十五年 乙卯 / 兔	xrywšy
	鼠 / 龙	596	隋开皇十六年 丙辰 / 龙	n'k
	牛 / 蛇	597	隋开皇十七年 丁巳 / 蛇	kyrmy
	虎 / 马	598	隋开皇十八年 戊午 / 马	'spy
	兔 / 羊	599	隋开皇十九年 己未 / 羊	psyy
泥利可汗去世(1)	龙 / 猴	600	隋开皇二十年 庚申 / 猴	mkr
	蛇 / 鸡	601	隋仁寿元年 辛酉 / 鸡	myyy
	马 / 狗	602	隋仁寿二年 壬戌 / 狗	kwty
	羊 / 猪	603	隋仁寿三年 癸亥 / 猪	k's
泥利可汗去世(2)	猴 / 鼠	604	隋仁寿四年 甲子 / 鼠	mws

小洪那海碑提出的第一个年代问题，是木杆可汗的在位年代。据《隋书·突厥传》，“木杆在位二十年（553 - 571），卒，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这个记载与布古特碑完全一致，而小洪那海碑却说木杆可汗“持国凡二十



一年”。如果后者是正确的，木杆可汗在位年代则在552—572年。突厥人“唯以青草为记”的传统历法建立在游牧文化基础上，如果换算成适应农业文化的中原历法，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文化冲突。例如：如何解决中原历法中闰13月的问题。大概由于这个原因，突厥人在计算木杆可汗在年代时，不得不增加一年。无论如何，此处碑文与史书出入不大。

小洪那海碑下文又说：“二十六年后，木杆可汗之孙泥利于兔年即大可汗位”（第5行）。<sup>[42]</sup>关于泥利可汗即位之年，《隋书·西突厥传》说：“大逻便（即阿波可汗）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勤之子，是为泥利可汗。”<sup>[43]</sup>《资治通鉴》将处罗侯在位年代系于隋开皇七至八年间（587—588）。隋朝于开皇七年班历于突厥，但是泥利可汗统辖下的突厥人并没采用中原历法的“羊年”，而是采用突厥历法的“兔年”。此外，碑文的“二十六年”，相当于木杆可汗去世后“第三十六年”（参见表1），讫始年代并非木杆可汗即位之年。

关于泥利可汗的卒年，史书记载不一，目前学界主要持两种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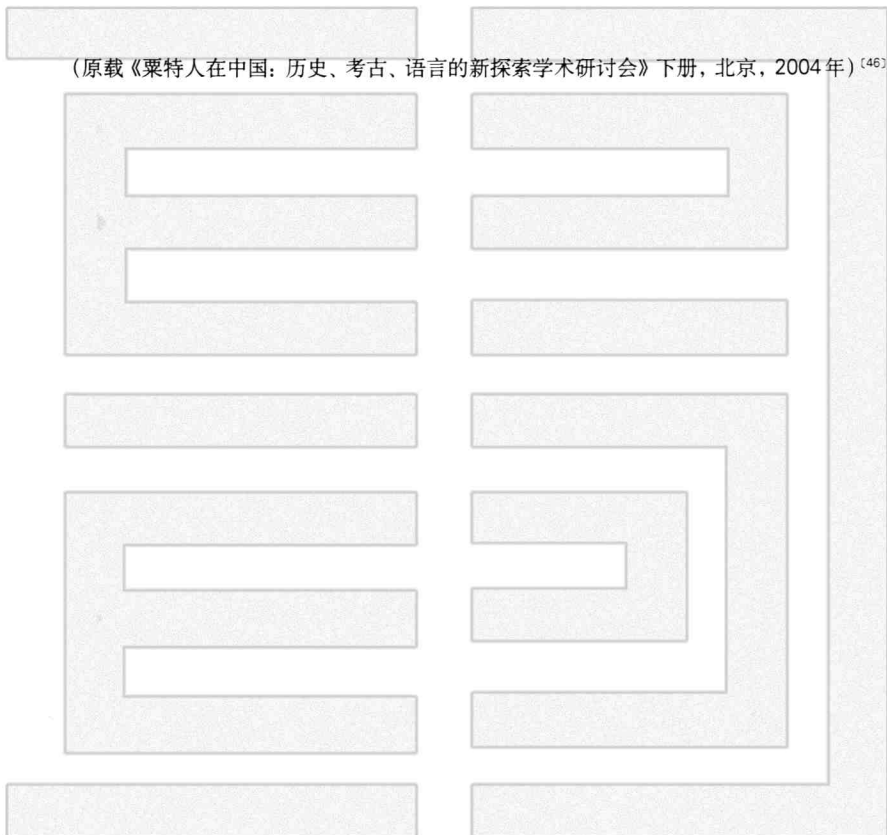
其一，隋开皇末年（600）说：据《隋书·西突厥传》记载，“（泥利）卒，子达漫立，号泥撒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年，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勤。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臚寺。”<sup>[44]</sup>据此，泥利可汗卒于开皇末年或稍早。这一年是开皇二十年（600），岁在庚申（猴年）。

其二，隋仁寿四年（604）说：据《隋书·突厥传》记载，“仁寿元年（601）……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即达头可汗）寻亦大乱。奚、霫五部内迁，步迦亡奔吐谷浑”。《资治通鉴》将达头奔吐谷浑事件系于隋仁寿三年（603）。如果此说不误，公元601—603年，泥利可汗尚在人世。另一方面，史书最早提到处罗可汗是在605年。《册府元龟》卷九九五说：“炀帝大业元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据此，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薛宗正先生力主泥利可汗卒于仁寿四年。<sup>[45]</sup>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据上述史料，泥利可汗的卒年只能推定在公元601—604年。

小洪那海碑第15行提到泥利可汗的卒年，西姆斯·威廉姆斯教授读作mws（鼠年）。如果这个读法正确，很可能采用中原历法（参见表1）。那么泥利可汗卒于隋仁寿四年（604），岁在甲子（鼠年）。我们感到困惑的是，粟特语mws（鼠年）、mkr'（猴年）两字非常相似，不仅都是三个字母，而且皆以m起首。我们拍摄的小洪那

海碑铭照片，经赵德荣先生摹写，不知道摹写得是否正确。因此，这个纪年也许是“猴年”。如果是“猴年”，泥利可汗卒于开皇二十年（600），岁在庚申。这个疑问恐怕只有等待拍摄更为清晰的照片，才能最后定论。

总之，小洪那海粟特语碑铭立石年代尚不能最后定论，目前只能置于隋开皇二十年至仁寿四年之间，岁在庚申或甲子，相当于公元600年或604年。



## 注释:

〔1〕西北文化局新疆省文物调查工作组:《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第16-23页;王子云:《新疆的石刻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第11-15页。

〔2〕张玉忠:《伊犁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0年第2期,第42页和第83页。

〔3〕张玉忠,前揭文,第36页、第42页和第63页。

〔4〕王博:《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

〔5〕黄文弼:《新疆考古发现——伊犁的调查》,《考古》1960年第2期,第8-14页;黄文弼:《新疆考古记(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0-22页。

〔6〕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第23页。

〔7〕承蒙李遇春先生提供上述情况,谨致谢忱。

〔8〕S.G. Kljastornyj/ V.A. Livišc, "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T. XXVI-1, 1972, pp.69-102; 林梅村:《布古特出土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第64-71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44-358页。

〔9〕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图版13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页和第199页彩版第286。

〔10〕俄国学者关于小洪那海石人的报道,参见R.F.Its, "O Kamennyx izvajanijax v Sin' czjane," *Sovetskaja etnografija*, Nr. 2, 1958, str. 100-103. 这个资料来自尤素甫伯克(Yusuf Beg),后者于60年代从伊犁移民俄罗斯。

〔11〕L.V. Clark, "Two Stone Sculptures of the 'Old Turkic' Type from Sinking," *Ural-Altische Jahrb cher* 50, 1978, pp.42-48.

〔12〕吉田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出ソグド语资料》,《内陆アツア言语の研究》VI(1990), 1991, 第57-83页。

〔13〕西姆斯·威廉斯教授在1992年11月12日给笔者的信中,已读出泥利可汗。大泽孝著、于志勇译:《新疆伊犁河流域的粟特文题名石人》,《新疆文物》2001年第1-2期,第95-123页(译自大泽孝《新疆イリ河流域のソグド铭文石人について——突厥初世の王统に関する一资料》,《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别册第20号,1999年9月,第327-328页)。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帮我查到原文出处,谨致谢忱。

〔14〕1996年7月,吉田丰和森安孝夫在伊犁博物馆王英梅陪同下,实地考察了小洪那海石人(王英梅:《小洪那海石人》,《新疆文物》1997年第2期,第22页;吉田丰:《ソグド语资料から見たソグド人の活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1《中央アジアの统

合9-16世纪》，东京，1997年，第227-248页。

〔15〕王诤：《阿波可汗是西突厥的创始者——兼论突厥汗国的分裂与西突厥汗国的形成》，《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17-36页；段连勤：《关于西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兼与王诤同志商榷》，《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95-111转21页；薛宗正：《西突厥开国史考辨——兼评沙畹说和王诤说》，《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81-97页；林幹：《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30-356页；吴玉贵：《西突厥新考》，《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111-130页；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年；薛宗正：《西突厥开国史续辨——兼与吴玉贵同志切磋论难》，《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205-223转4页；吴玉贵：《高昌供食文物中的突厥》，《西北民族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46-66页。

〔16〕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3-48页。

〔17〕《隋书·西突厥传》。

〔18〕《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典》北狄条。

〔19〕关于日本学者对小洪那海石人的调查，参见大泽孝，前掲文，2000年，第95-123页。

〔20〕《旧唐书·突厥传上》。

〔21〕《册府元龟》卷一二五。

〔2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掲书，1985年，第15页。

〔23〕王博，前掲书，1996年，第47页和第106页。

〔24〕林俊雄：《突厥の石人に見らおるソグドの影響》，《创价大学人文论集》第5号，1993年，第27-44页；林俊雄：《新疆アルタト地区の遗迹》，《草原考古通信》1993年第2期，第2-5页。

〔25〕林梅村：《西突厥汗庭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第82-83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59-370页。

〔26〕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第55-65页；收入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7-177页。

〔27〕1994年1月28日给笔者的信。本文所引小洪那海粟特碑文，根据此信，恕不一一出注。

〔28〕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队昭苏陶器收集品标签，这里再次表示我们由衷的感谢。

〔29〕孙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0-263页。

〔30〕王宇球溪：《瓦当的使用功能》，《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第136-137页。

〔3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隋唐东都洛阳城外郭城砖瓦窑遗址1992年清理简报》，《考古》1999年第3期，第16-22页。

〔32〕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

〔33〕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1期，第153-

155 页。

[34] 《周书·异域传·突厥》。

[35] 《隋书·高祖本纪上》。

[36] Paul Pelliot,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e Asie centrale," *T'oung Pao*, vol.26, Leiden, 1929, p.208.

[37] 林梅村:《布古特出土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4年,第64-71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51页。

[38] 不空金刚、杨景风共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第2卷,《大正藏》第21卷,第394页。

[39] Paul Pelliot,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e Asie centrale," *T'oung Pao*, vol.26, Leiden, 1929, pp.204-205; 路易·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62-163页(译自 Liouis Bazin, *Les Systemes chronologiques dans Le Monde Turc ancien*, Paris/ Budapest, 1991)。

[40] F.W.K. Müller, "Die 'Persiche' Kalenderausdrucke im Chinesischen Tripitaka," *SPAW*, hist. phil. kl., 1907, s. pp.458-465.

[41] 关于中原干支纪年在西域的传播,参见林梅村:《十二生肖源流考》,《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11-119页。

[42] 吉田丰,前掲文,1997年,第227-248页;西姆斯·威廉斯1994年1月28日给笔者的信。

[43] 《隋书》,第6册,第1876页。

[44] 《通典》(第5册,第5453页)略同。其中,“生达漫而”与“泥利卒”之间有缺文,故《资治通鉴》记此事时,删去“生达漫而泥利卒”一句。

[45]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

[46] 承蒙西姆斯·威廉斯教授提出修改意见,对第四节作了较大修改,谨致谢忱。

## 一 毗伽可汗宝藏的发现

6世纪中叶，柔然汗国原来的“锻奴”——突厥人从阿尔泰山南下，546年灭高车，552年破柔然，成为蒙古草原的新主人。567年突厥人与萨珊波斯共灭哒哒，以阿姆河为界，瓜分哒哒故地。于是，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突厥汗国在中国北方迅速崛起，所辖疆域东起辽河上游，西至阿姆河，南达鄂尔多斯，北抵贝加尔湖。此后，突厥人相继建立两大王朝，史称“第一突厥汗国”和“第二突厥汗国”，后者亦称“东突厥”或“蓝突厥”。734年毗伽可汗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部下毒死，突厥人从此陷入长期内战。在经历了几个短命的可汗之后，九姓回纥与拔悉密、葛逻禄联兵，最终在745年推翻不可一世的突厥汗国。<sup>[1]</sup> 本文讨论的考古新发现，就是734年被毒死的突厥第二汗国毗伽可汗的宝藏。

早在19世纪末，俄国考古学家就在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以西450公里的鄂尔浑河畔发现突厥可汗的陵园（插图1），但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一直在可汗陵园内的突厥文碑铭，更能说明突厥文化的可汗陵园本身却很少有人关心。这个僵局终于在2001年8月被打破，一个由土耳其和蒙古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毗伽可汗陵园内发掘出毗伽可汗珍藏的数以千计的金银珠宝，今称Treasure of Bilge Khagan（毗伽可汗宝藏）。这个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我们开始进入突厥考古的一个新时代。

2001年8月，土耳其和英国路透社记者相继发布消息：据说由土耳其和蒙古学者组成的“突厥碑铭研究计划”（MOTAP）联合考察队，在鄂尔浑河畔突厥可汗陵园内发现了一个中世纪宝藏，他们认定这个宝藏属于第二突厥汗国毗伽可汗（716—734年在位）私人所有。

受蒙古高原气候条件的限制，土耳其和蒙古联合考察队只能选择7—8月份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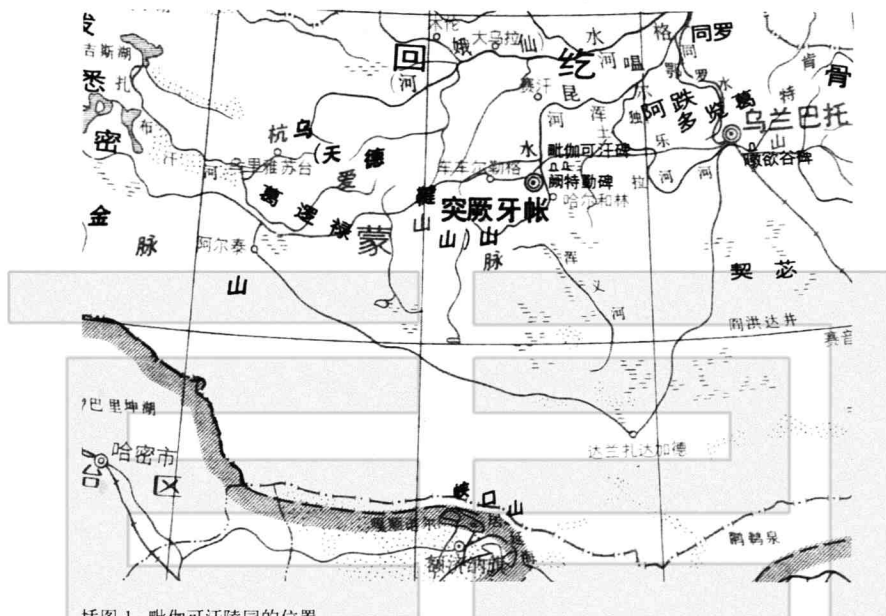


插图 1 毗伽可汗陵园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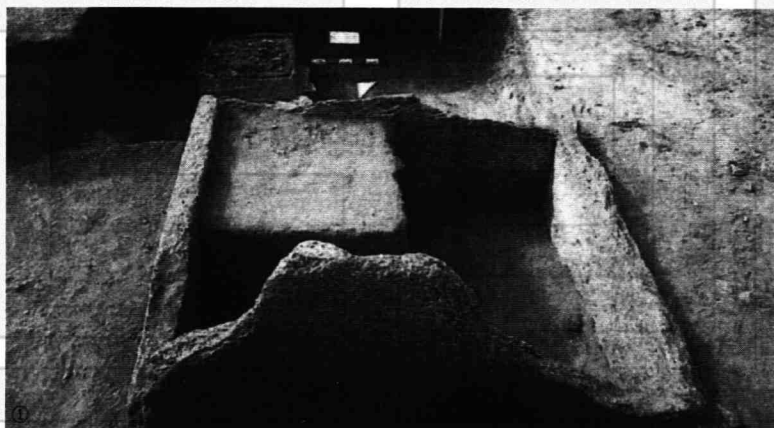


插图 2 毗伽可汗陵园内祀庙基址发掘现场



行野外作业。据他们初步调查，毗伽可汗和阙特勤陵园内至少分布着九座陵墓，而乌兰巴托东南60公里巴彦楚克图的突厥老臣噶欲谷陵园内只有一座陵墓。考察队2001年的工作重点是发掘毗伽可汗陵园，他们还计划对阙特勤和噶欲谷陵园进行考古发掘。<sup>[2]</sup>

联合考察队于2001年8月1日进入毗伽可汗陵园，陵园内最显著的地面建筑是毗伽可汗巨大的墓碑(插图2·2-3)。突厥汗国灭亡后，此碑遭到仇敌严重破坏，打成许多碎块。考察队首先将墓碑的三个主要碎块进行拼合，然后开挖陵园内各类遗存，结果取得重要发现。发掘工作尚未结束，就发现2800件金银珠宝，出土遗物可分金器、银器、铁器、铜器、宝石、纺织品六大类。据说整个发掘工作结束后，出土文物总数预计可达四千多件。

安卡拉大学的突厥学家高美茨(S. Gomec)参加了可汗陵园的整个考古发掘过程，他向路透社记者披露了更多的内幕。据说这批金银珠宝是在毗伽可汗陵园内一个宗庙的基址下发现的，数千件宝物皆出自宗庙下埋藏的一个百宝箱(插图2-1)。据统计，百宝箱外装饰的各类银花达1850片，箱内则满载各种金银器皿、金腰带、金冠、金牌饰、金耳环等。此外，出土遗物还有许多名贵的宝石、纺织物残片、铜钉、铁饰件残片等。金器类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带神鸟浮雕的黄金王冠，上面镶嵌了一颗象征王权的名贵宝石(彩版11)。金腰带亦为突厥可汗王权的象征，与陵园内毗伽可汗石像上雕刻的腰带(插图2-2)几乎完全相同。金冠和金腰带的发现，使发掘者确信这个宝藏属于毗伽可汗私人所有。无论如何，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因为这毕竟是历史上首次开挖突厥可汗陵园。发掘工作结束后，出土文物已全部移交给蒙古政府，目前保存在乌兰巴托国家历史博物馆。<sup>[3]</sup>

关于毗伽可汗之死，《旧唐书·突厥下》说：“毗伽可汗以开元四年(716)即位，本蕃号为小杀……二十年，小杀为其大臣梅录啜所毒，药发，未死，先讨斩梅录啜，尽灭其党。既卒，国人立其子为伊然可汗。诏宗正卿李佺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为立碑庙。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为其碑文。无几，伊然病卒，又立其弟为登利可汗。”看来，毗伽可汗是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手下毒杀。国人先立伊然可汗，但新汗国祚不长，就暴病而亡，突厥人不得不改立毗伽可汗另一个儿子登利可汗。<sup>[4]</sup>《资治通鉴·唐纪》将毗伽可汗之死系于唐开元二十二年(734)，那么唐朝使臣李佺为毗伽可汗建碑立庙应在公元734年。

毗伽可汗的墓碑用花岗岩制成(插图2-3)，与阙特勤碑相距1公里。两碑同在

蒙古国后杭爱省和硕柴达木盆地鄂尔浑河畔，故称“鄂尔浑碑”。和阙特勤碑一样，毗伽可汗碑用突厥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刻写。汉文部分由唐朝史官李融书写，今已漫漶不清，仅存“登利可汗虔奉先训……因使（李）佺立于庙，纪功〔于〕石，以昭示子孙”寥寥数语。<sup>[5]</sup> 突厥文部分由毗伽可汗的外甥夜落纥特勤所书，保存较好，凡80行，主要记述毗伽可汗生前的文治武功。<sup>[6]</sup> 土耳其和蒙古联合考察队在毗伽可汗陵园内发掘的祀庙，正是李佺为毗伽可汗所立“碑庙”。既然如此，祀庙下埋藏的金银珠宝属于毗伽可汗所有，埋藏年代则在公元734年李佺立庙之时。

早在2001年8月，路透社和土耳其《每日新闻》就开始对这个重要考古新发现进行报道，但是国内新闻界反应相当迟钝，2003年始有十分简略的报道。<sup>[7]</sup> 这个宝藏的正式考古报告目前尚未发表，海内外的新闻报道也只有文字资料。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讨论这个考古新发现，要特别感谢日本广播放送协会（NHK）的后藤先生。2004年夏，他专程到乌兰巴托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考察毗伽可汗宝藏，并给我们带回一些现场发掘照片和出土文物照片。从照片看，毗伽可汗宝藏主要为金银宝钿，可分突厥式和粟特式两大门类。例如：黄金腰带、神鸟金冠、鎏金银鹿雕像、单把鼓腹金壶、鼓腹银罐和金盘碟等，属于突厥艺术；而金银细颈胡瓶、单把杯、金银花和金耳环等，则属于粟特艺术。本文拟分四节（一、鎏金银鹿与突厥人的“苍狼白鹿”创世说；二、突厥可汗的海东青王冠；三、突厥式金银器；四、粟特式金银器），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如有不当，还望海内外研究者予以指正。



插图3 毗伽可汗宝藏的鎏金银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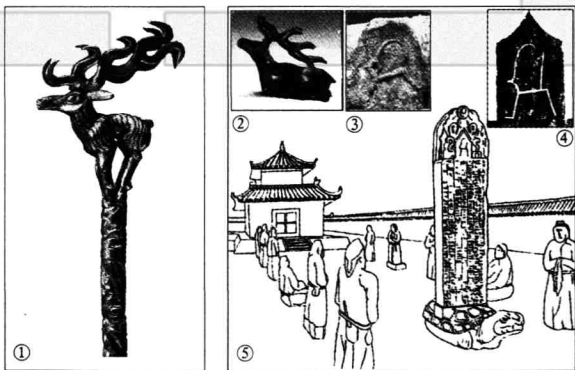


插图4 古代草原艺术所见各种“白鹿”

## 二 鎏金银鹿与突厥人“苍狼白鹿”创世说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两个鎏金银鹿（插图3）相当引人注目，堪称中世纪草原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就目前所知，草原工匠制作金鹿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2000年，俄罗斯图瓦共和国阿尔赞附近山谷发现一座巨大的古代游牧人陵墓，为了和阿尔赞以前发现的游牧人古墓相区别，今称“阿尔赞2号墓”。德国考古队从中发掘出数以千计的黄金艺术品、铁器、青铜器和古代纺织品。单是黄金艺术品，就达4700多件，包括一个制作精美的金鹿权杖（插图4-1），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sup>[8]</sup>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也流行立鹿和卧鹿青铜像（插图4-2），时代在战国晚期（公元前4—前3世纪）。<sup>[9]</sup>

突厥人全面继承了蒙古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化遗产，毗伽可汗为亡弟所立阙特勤碑的碑额上，就刻有族徽或图腾性质的立鹿符号（插图4-5）。显然，这个习俗源于突厥人古老的“苍狼白鹿”创世说。据《周书·异域传下·突厥传》记载，突厥祖先“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在狼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



插图5  
毗伽可汗的海东青王冠

故知突厥人把苍狼当作自己的祖先，第一突厥汗国即以苍狼为图腾。例如：蒙古国呼尼河畔布古特碑额的狼雕，就根据这个古老的传说而雕琢。<sup>〔10〕</sup>

突厥人还把白鹿当作自己的祖先，《酉阳杂俎·境异》说：“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女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往来，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入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呵嚩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人祭天。’即取呵嚩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常取呵嚩部落用之。射摩既斩呵嚩，至暮还，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突厥古代传说中的“呵嚩”，指铁勒呵咄部，因嚩、咄二字形近而讹。因此，第二突厥汗国把金角白鹿当作族徽或图腾，阙特勤碑等突厥碑铭或龟趺上往往雕刻白鹿符号（插图4-3、4-4、4-5），与突厥第一汗国的苍狼图腾形成鲜明对照。因此，我们认为毗伽可汗宝藏中的两个鍍金银鹿，实际上表示突厥人古老创世说中的金角白鹿，而非土耳其学者推测的，两者分别作为突厥可汗和可敦的化身。《蒙古秘史》开篇说，蒙古人始祖亦为“苍狼”（孛儿帖·赤那）和“白鹿”（豁埃·马阑勒），所有蒙古人都是他们繁衍生殖的后代。<sup>〔11〕</sup>看来，突厥人古老的创世说源远流长，后来又为成吉思汗的子孙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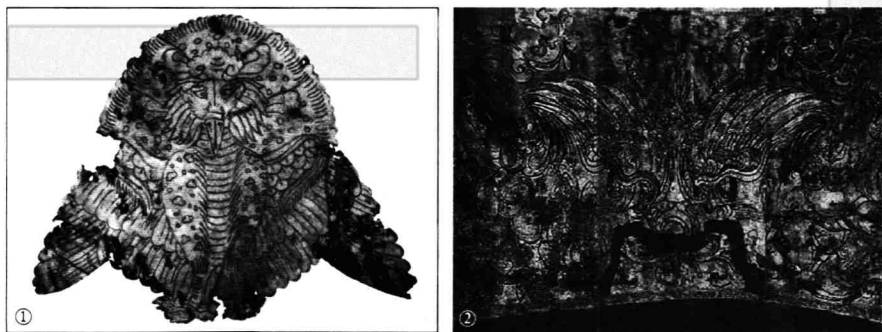


插图6 契丹人与柔然人的海东青艺术

### 三 突厥可汗的海东青王冠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海东青王冠，堪称突厥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插图5）。这顶象征突厥可汗王权的金冠上的神鸟，实际上是一只猎鹰，也即辽代所谓“海东青”。自古以来，北方草原的游牧人就酷爱猎鹰。辽代的契丹人尤爱辽东出产的白雕，时称“海东青”。这种猎鹰今称“白尾海雕”（学名 *Haliaeetus Albicilla*），亦名“白尾雕”或“芝麻雕”，属于鹰科隼形目。主要繁衍于东北三江平原至长江下游一带，在黄河以南地区越冬。《文献通考》说：“海东青者，小而健，能擒天鹅，爪白者尤为异……契丹酷爱之，然不能致。”明初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说：海东青“善捕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能得头鹅者”。辽代皇帝每年都派人到女真部落捕捉或索要海东青，用于春捺钵捕天鹅。捺钵是契丹语，意为“皇帝离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海东青捕天鹅成了契丹贵族最为流行的一种时尚，并对辽金艺术产生巨大影响。

1992年，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发现一件海东青鎏金铜饰件，高24.3厘米，宽30.5厘米，现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插图6-1）。耶律羽之葬于辽会同四年（941），这个海东青金饰件大概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辽代海东青艺术品。<sup>〔2〕</sup> 公元5—6世纪，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人也把海东青当作王权的象征，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上就绘有一幅海东青壁画（插图6-2）。

从毗伽可汗的兄弟阙特勤石像上，可知突厥王公贵族头戴海东青王冠（插图5）。



插图7  
匈奴和突厥的海东青王冠

海东青艺术形象在草原艺术中源远流长，至少在公元前3—前4世纪，鄂尔多斯游牧酋长已把海东青当作王权的象征，并精心制作了一项猎鹰金冠（插图7），<sup>[13]</sup>制作工艺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 四 突厥式金银器

突厥人本为柔然汗国的“锻奴”，擅长金属，尤其是锻铁工艺。吐鲁番出土文书多次提到“阿博珂寒铁师”，就指突厥铁匠。突厥人崛起于盛产黄金的阿尔泰山南麓，自然也精通黄金加工技术。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提到的“珂寒金师莫畔陁”，则是一位在吐鲁番施展才艺的突厥金匠。<sup>[14]</sup>

据东罗马史料，突厥可汗非常喜欢金银艺术品。东罗马使臣出访天山北麓西突厥可汗王庭时，突厥“可汗他日接见罗马使臣之二室。其一中有肖像，可汗卧于金床，室设金瓶、金针、金瓮。其一室有饰金木柱，有一金床，四金孔雀负之。门首有车，满载银盘及银制动物肖像”。<sup>[15]</sup>然而，突厥工匠制作的金银器究竟什么样子，却无人知晓。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孙机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1996年，他根据突厥古墓出土金银器，从近年内蒙古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分辨出一批突厥或突厥式金银器。<sup>[16]</sup>他归入突厥金银器的单耳鼓腹罐（插图8-2）和无耳鼓腹罐（插图8-5），在毗伽可汗宝藏中大量出现（插图8-1和8-4），再次证明这两类器皿属于突厥金银器。其中，单耳鼓腹罐起源甚早，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东汉匈奴墓发现过一件单耳鼓腹鎏金银壶（插图8-3）。<sup>[17]</sup>韩伟和法国学者戴迪野（Christian Daydier）认为产于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叙利亚，孙机则认为产于新疆吐鲁番。<sup>[18]</sup>其实，这件鎏金银壶属于匈奴人创造的草原艺术，制作工艺亦为草原帝国历代工匠所传承。1997年，在新疆伊犁昭苏县发现一个古代游牧人宝藏，其中也有类似的鎏金银壶。从共同出土的丝绸残片看，这个宝藏的埋葬年代约在公元5—6世纪。当时，乌孙王尚在伊犁河一带游牧，所以这个宝藏也许是乌孙王生前的财宝。<sup>[19]</sup>此外，毗伽可汗宝藏中还有一种金碟（插图8-6），以前见于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插图8-7）。在新疆伊犁乌孙土墩墓中，发现过类型完全相同的陶碟。<sup>[20]</sup>所以这类金银碟也许属于草原艺术。

总之，毗伽可汗宝藏的草原风格的金银器系突厥本土工匠所为，充分展示了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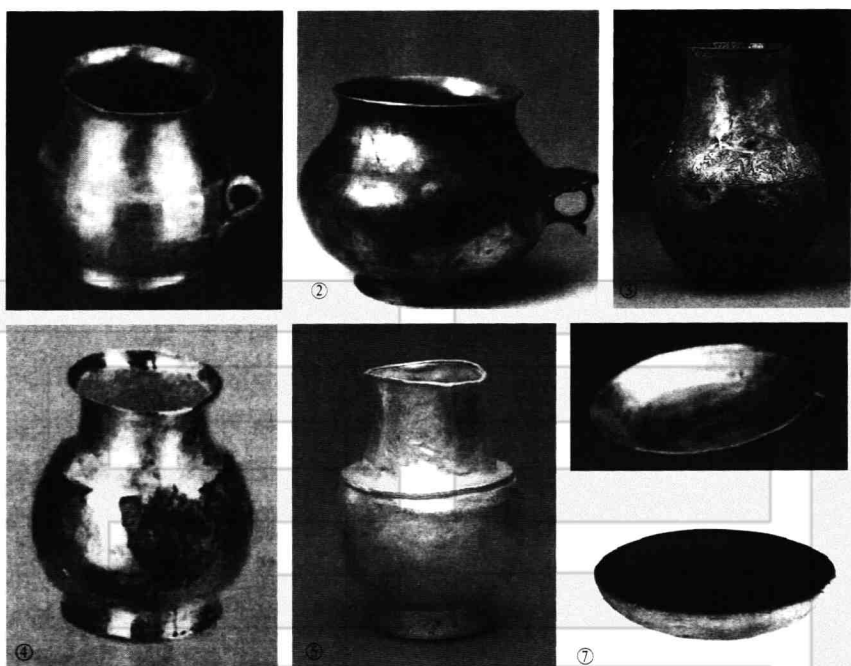


插图 8 突厥式金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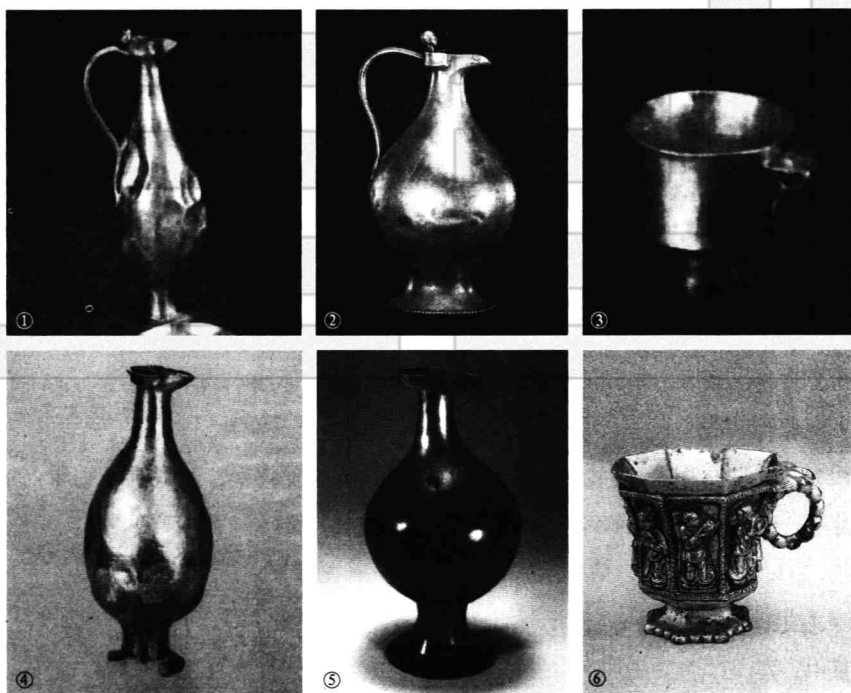


插图 9 粟特式金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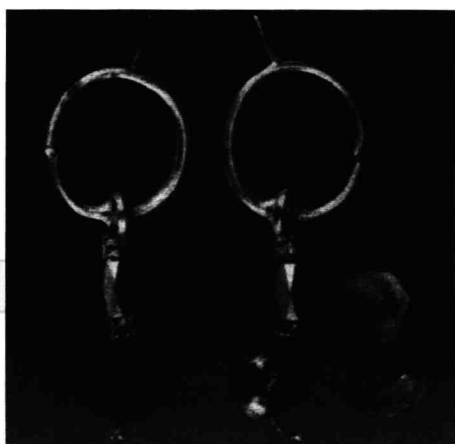


插图 10 中亚粟特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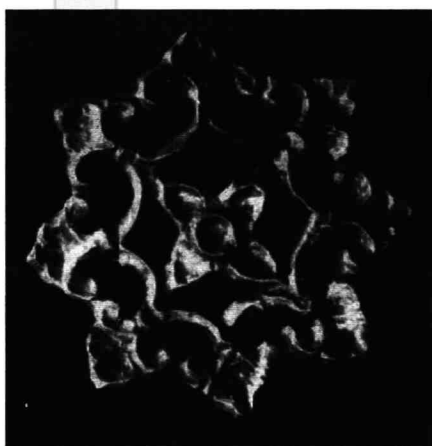


插图 11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粟特宝钿

厥人对匈奴、乌孙等草原民族的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 五 粟特式金银器

粟特人是中世纪著名商业民族，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一直在他们的操纵之下。在唐代史书中，粟特人常按他们在中亚所居城市而称为“昭武九姓”，包括康（撒马尔干）、安（布哈拉）、石（塔什干）等十余个姓氏，九姓之“九”乃言其多，并非只有九个姓氏。

公元6世纪中叶，粟特使团在突厥、波斯、东罗马和中国之间频繁进行穿梭外交活动。其中，一个粟特使团的头目名叫Maniah（摩尼亚赫）。据俄国学者皮古列夫斯基分析，语尾-ah系叙利亚语“兄弟”，这位粟特头面人物的名字意为“摩尼兄弟”。<sup>[21]</sup>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许多粟特人为突厥人撰写文书和契约，时称“译语人”。在突厥派往中原王朝的外交使团中，许多使者并非突厥人。从姓氏看，当系“昭武九姓”胡人。

另一方面，许多粟特人从中亚移居突厥汗国。第一突厥汗国灭亡后，一些人南下黄河流域，在今天宁夏、陕西和内蒙古交界地带定居，史称“六胡州”。研究者发现，从突厥汗国流亡六胡州的根本不是突厥部落，而是流寓突厥汗国的粟特移民。

在文化方面，粟特人对突厥人影响相当大。突厥人本来无文字，突厥第一汗国时期，突厥可汗以粟特文为官方文字。突厥第二汗国时期，突厥人开始创立自己的文字——突厥文，但是文字体系仍然采用粟特文。

粟特对突厥的影响还充分表现在金银器制作工艺方面。毗伽可汗宝藏中的许多金银器皿与粟特金银器一脉相承。例如：单把细颈金瓶（插图8-1和8-4），完全模仿粟特金银器的胡瓶，也就是西方艺术史家所谓Ewer（水罐）。类似的粟特胡瓶以前在内蒙古东部敖汉旗李家营子1号唐墓（插图9-2）以及河北宽城金银器窖藏内（插图9-5）发现过，并被研究者定为粟特金银器。<sup>[22]</sup>又如：单把金杯（插图9-3），亦模仿粟特金银器中的单把杯，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内就有这类单把金杯（插图9-6）。类似金杯在粟特壁画上多次出现，俄国的中亚艺术史家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博士将其归入粟特流派的银器。<sup>[23]</sup>

尽管毗伽可汗宝藏中许多金银器明显带有粟特艺术风格，但是制作工艺相当

粗糙，大概是突厥本地工匠模仿粟特金银器制作的，本文姑且称它们为“粟特式金银器”。

此外，毗伽可汗宝藏中的镶嵌宝石的金耳环（插图10左），似乎也属于粟特艺术品，因为中亚粟特壁画上的粟特女供养人就佩戴这种耳环（插图10右）。这幅画绘于公元7—8世纪，现藏杜尚别塔吉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sup>[24]</sup>

毗伽可汗宝藏中还有一种透雕金花（插图11左），俄国考古学家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贝希姆古城发现过类似的金花（插图11右），只是制作工艺更为精细，年代约在公元7—8世纪。阿克贝希姆古城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这座古城本为中亚粟特人的聚居地，并入唐朝版图后，成为安西四镇之一。碎叶城出土透雕金花精美之极，显然是粟特工匠所为。相比之下，毗伽可汗宝藏的透雕金花显得比较粗糙，估计也是突厥本地工匠仿照粟特艺术品而制作的。

据统计，毗伽可汗宝藏中的各类宝物多达四千多件，我们如今只见到其中一小部分金银艺术品，不足以深入了解突厥文化的许多实质性问题。尽管如此，这些新发现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突厥文化以及中世纪草原艺术的认识。

（原载《上海文博》2005年第1期）

## 注释:

[1] 格鲁塞(法)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133页。

[2] 突厥人是土耳其人的祖先,公元11世纪从中亚移民到今天的土耳其。因此,土耳其人把突厥文化遗物视为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据报道,“突厥碑铭研究计划”是1995年土耳其前总统苏莱曼·德米热尔访问蒙古时启动的,旨在研究和保护蒙古高原的古代突厥文化遗产。土耳其和蒙古考察队近年不断开展突厥可汗陵园的考古工作,一个由46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具体执行研究计划,包括35名土耳其科学家和11名蒙古科学家,据说总投资多达35万美元(约合290万元人民币)。

[3] 本文所引,主要根据土耳其阿纳多卢新闻社2001年8月14日在安卡拉发布的消息(<http://www.hri.org/news/turkey/anadolu/2001/01-08-14.anadolu.html>)以及同年8月19日路透社记者在乌兰巴托发布的消息(<http://www.dawn.com/2001/08/19/int9.html>)。

[4] 《新唐书·突厥下》所述略同。文中说:“毘伽可汗默棘连,本谓‘小杀’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己功,让于阙特勒,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实开元四年。……默棘连请昏既勤,帝许可,于是遣哥解栗必来谢,请昏期。俄为梅录啜所毒,忍死杀梅录啜,夷其种,乃卒。帝为发哀,诏宗正卿李佺吊祭,因立庙,诏史官李融文其碑。国人共立其子为伊然可汗。”

[5] 李文田撰、罗振玉校订:《和林金

石录》,灵鹫阁丛书第四集,长沙石印,约清末(无确切出版社和年月)。

[6] 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69, 1968;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63-269页。

[7] 国内的新闻报道,参见中央电视台网站(<http://CCTV.com>)2003年9月10日消息《蒙古土耳其合作发掘毗伽可汗神庙遗址》(<http://sti.jzkjw.com.cn/shijiekej/sj0211/sj89.html>)。

[8] 德国考古队将这处古墓的年代定在公元前6-前5世纪(M. Edwards, “Siberia’s Scythians: Master of Gold,” *National Geographic*, No.6, 2003, pp.112-129)。据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马健研究,年代应在公元前7世纪(马健:《公元前8-前3世纪的萨彦-阿尔泰——中亚东部草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交流》,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抽印本)。

[9] 田广金等编:《鄂尔多斯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61页,彩版XII。

[10] 林梅村:《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见《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第67-74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44-358页。

[11]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12] 中国历史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编:《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

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13〕田广金等编：《鄂尔多斯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43页和彩版I。

〔14〕关于吐鲁番文书中的突厥铁匠和金匠，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91-92页。

〔15〕沙畹(法)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170页。

〔16〕孙机：《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0-277页。

〔17〕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上孙家寨汉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及封面彩色照片。

〔18〕Han Wei and Christian Daydier, *Ancient Chinese Gold*, Les Editions d' Art et de Histoire, ARHIS, 2001, p. 109, fig. 266; 孙机：《大通银壶考》，见《中国历史

文物》2003年第3期，第35-40页。

〔19〕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文物》，见《文物》1999年第9期，第4-15页和彩版II。

〔20〕岳峰等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图版1080。

〔21〕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第9页。

〔22〕宽城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见《考古》1985年第9期；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器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收入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1-332页。

〔23〕Boris Marshak, *Soghdian Silver*, Moscow, 1971, T.25 and T.45.

〔24〕田边胜美、前田耕作(日)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アジア卷》，东京，小学馆，1999年，图版223。

蒙古草原最初流行摩尼教。唐开成五年（840），在北方黠戛斯人打击下，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西迁中亚，摩尼教亦随之而去。由于外来宗教在中国肆意泛滥，僧尼遍布天下，无人生产，造成唐王朝经济严重衰退。为此，唐武宗采纳道士赵归真的建议，罢黜佛教，同时禁断摩尼、大秦、火袄三夷教，史称“会昌灭佛”。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诏灭佛，同时“勒大秦（景教）、穆护（摩尼教）、袄（火袄教）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sup>[1]</sup> 景教在中原禁断后，一部分教徒从中原亡命漠北，蒙古草原摩尼教离去而留下的信仰空白随即被景教填补。<sup>[2]</sup> 景教主要流行于蒙古草原的突厥诸部落，诸如土拉河流域的突厥浑部和克烈部。

公元10世纪初，蒙古乞颜部从呼伦贝尔草原西迁三河（鄂嫩河、土拉河和克鲁伦河）之源不儿罕山（今蒙古国大肯特山），从而迫使游牧于土拉河流域的信仰景教的突厥浑部四散而逃，一支西迁中亚，一支南下河西走廊。塞尔柱王朝木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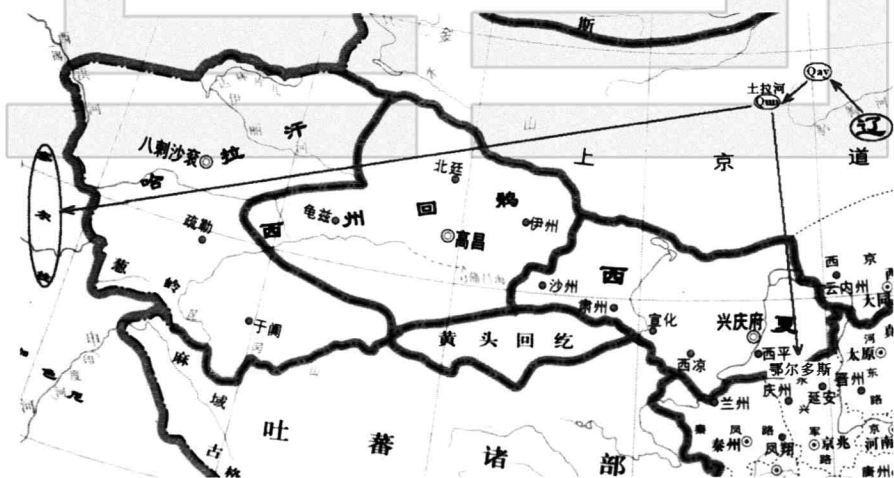


插图1 公元10世纪初中亚民族大迁徙

作家马卫集 (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i, 1046 – 1120) 撰写的《动物之自然属性》一书, 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景教史。该书第9章讲述了10世纪初中亚草原发生的一次民族迁徙 (插图1)。据说“浑人 (Qun) 属于他们 (指突厥人), 这些人因害怕契丹汗而从契丹(Qitan)之地来。他们是景教徒, 因草场的压力, 从他们的故乡迁徙过来。火赤哈儿之子也斤赤花刺子模沙就出自他们。追踪着浑人的是一支称为奚人 (Qay) 的部族。他们的人数众多, 力量强大都比他们众多和强大, 将他们从这些草原驱逐出去。他们于是迁移到萨利 (Shari) 人之地, 而萨利人则迁入突厥蛮之地, 突厥蛮则依次进入虎思 (Ghuzz) 国的东部。虎思突厥人于是迁移到比干, 靠近亚美尼亚”。

马卫集所谓“Qun”就是《隋书·铁勒传》记载的“浑人”, 本为铁勒诸部之一。<sup>[3]</sup> 唐太宗在漠北设羁縻府州时, 在浑人居地设皋兰州(今蒙古国土拉河流域)。东突厥默啜可汗夺铁勒故地, 浑与回纥及铁勒诸部一度迁往河西走廊, 不久返回漠北, 依附于回鹘。回鹘汗国崩溃后, 浑、思结等突厥部族并没有全部随回鹘人远走中亚, 一部分南下河西走廊。巴黎藏敦煌于阗语写本 (P. 2471) 提到五代甘州 (今河西走廊) 有“浑人” (Hūna) 和“浑人居地” (Hunvasta), 也就是从漠北南下的突厥浑部 (Qun), 原为漠北回鹘十五部之一。<sup>[4]</sup>

在以往的研究中, Qay (乞亚人) 往往释作“奚人”, 主要根据两者读音相近。其实, 奚人乃“库莫奚” (Qumas, 亦称“胡母斯”) 的省称。伊儿汗国史官拉施特《史集》为胡母斯和乞亚人分别立传, 可见二者并非同一部族。我们在近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 乞亚实乃蒙古皇族“乞颜”一词的单数形式。据美国突厥学家鲍培 (N. Poppe) 研究, 古阿尔泰语词汇常带有一个不稳定的尾音 /n/。这个尾音有时可以解释为复数语尾, 相当于突厥语复数语尾 -lar 或蒙古语复数语尾 -ut。<sup>[5]</sup> 例如: 蒙古语 mori (马), 复数作 morin (马群);<sup>[6]</sup> 突厥语 bod (部落), 复数为 bodun (诸部落), 蒙古语 qitāy (乞台), 复数作 qitan (契丹)。<sup>[7]</sup> 同理, qāy (乞亚) 的复数形式可以是 qāyan (乞颜), 也即《史集》所谓 kīān (乞颜)。如果换上蒙古语复数语尾 ut, 则是《史集》对“乞颜”的另一称谓 qiāt (乞牙惕)。<sup>[8]</sup> 据拉施特解释, “乞颜在蒙古语中, 意谓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所以人们以这个词谓他们的名字。乞牙惕谓乞颜的复数; 在这个氏族中, 近于始初的那些人们在古代被称为乞牙惕。”由此可知, 乞亚人实乃成吉思汗所出氏族——蒙古乞颜部。<sup>[9]</sup>

辽代亲征突厥诸部的皇帝只有太祖阿保机, 所以马卫集的“契丹汗”必指耶律



阿保机无疑，浑人西迁中亚则发生在公元916—924年间。神策元年（916）秋七月，阿保机“亲征突厥、党项、吐谷浑、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继而，挥戈南下，连克朔、蔚等六州，于是“自代北至河曲（鄂尔多斯），逾阴山，尽有其地”。神策五年（920）冬，阿保机亲统大军，破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尽徙其民于阴山（今大青山）以南，并渡黄河，攻掠河南（今鄂尔多斯）突厥诸部。天赞三年（924）10月，阿保机再次“遣兵逾流沙（巴丹吉林沙漠），拔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尽取西鄙诸部”。〔10〕

突厥浑部并未全部西迁中亚，《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提到“同光三年（925），浑解楼来”，就是来自鄂尔多斯的浑人。〔11〕成吉思汗崛起后，在蒙古部落打击下，漠北突厥诸部纷纷亡命中原，金朝编为“忠孝军”。正大四年（1227），由完颜陈和尚任忠孝军提控，而“忠孝一军，皆回纥、乃蛮、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鸷狠凌突，号难制。陈和尚御之有方，坐作进退皆中程式，所过州邑常料所给外秋毫无犯，街曲间不复喧杂，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诸军倚以为重”。〔12〕由此可知，辽金时代景教仍在滞留家乡的浑人余部当中传播。

考古发现进一步披露了这段封尘已久的景教史。自20世纪初以来，鄂尔多斯南部不断出土透雕铜十字架。这类十字架往往装饰莲花和卍字符号等，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称为“卍字铜十字架”。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James M. Mennies）整理了鄂尔多斯九百多枚铜十字架，刊于《齐大季刊》1934年第35期青铜十字专号。其中八百多枚是北平邮务长尼克松在包头等地的收集品，现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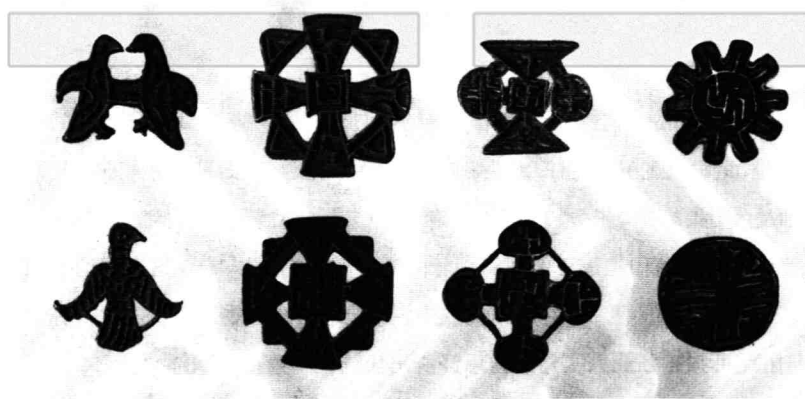


插图2 鄂尔多斯出土景教透雕铜十字架，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藏品

物馆（插图2）。<sup>[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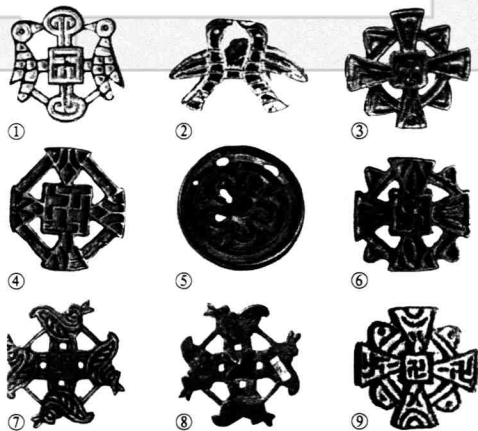
据明义士调查，这些“铜十字之出处为鄂尔多斯沙漠，即河套地区，北界包头及黄河，南界波罗波勒格孙（今称巴彦布格勒）及长城，面积五百里见方”。美国医师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在华工作期间，也收集了一些鄂尔多斯铜十字架，现藏华盛顿特区的赛克勒博物馆（插图3）。<sup>[14]</sup>

据西北大学周伟洲近年调查，这类铜十字架在陕北亦有发现，绥德采集到6枚，靖边县统万城采集到2枚。这类铜十字架千差万别，几乎没有一件是完全相同的式样，有些采用飞鸟构图，另一些甚至只有卍而无十字架。<sup>[15]</sup>

蒙元时代汪古部以信仰景教而闻名于世。在以往的研究中，鄂尔多斯铜十字架往往和汪古部景教相联系。<sup>[16]</sup> 关于它们的性质，有护身符、花押、肖形印等各种不同解释。作为肖形印，又往往收入中国印谱。例如：王翰章编《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王长启编《陕西出土历代玺印续编》，温廷宽编《中国肖形印大全》和孙慰祖编《可斋论印新稿》，收录了数以百计的鄂尔多斯铜十字架。<sup>[17]</sup> 关于景教徒佩戴十字架之事，13世纪出访蒙古汗庭的法国使者卢布鲁克说：“景教徒和亚美尼亚人都不在他们的十字架上制作基督的形象。他们若不是不思念基督受难的痛苦，便是以此为耻。”鄂尔多斯出土铜十字架皆无耶稣像，必为景教十字架无疑。

1975年，内蒙古克什腾克旗一座辽墓出土了七个带卍字符的小铜铃，说明用卍字符作纹饰至少始于辽代。1995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鄂尔多斯东南部发现一座古代游牧人古墓，从中发掘出一套卍字符透雕铜牌，一共十件（插图4）。

插图3 鄂尔多斯的景教透雕铜十字架，华盛顿特区赛克勒博物馆藏品



从出土情况看，这套卍字透雕铜牌是游牧人蹀躞带的饰件。关于十字架的用途，元代梁相的《大兴国寺记》介绍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sup>[18]</sup> 既然十字架可用作冠饰或胸佩，那么游牧人也许用作蹀躞带的装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卍字透雕铜牌出自西夏古墓，下葬年代在1004—1227年。

汪古部当时尚在金界壕以北戍边，元代初年才从阴山以北南下鄂尔多斯。<sup>[19]</sup> 所以鄂尔多斯铜十字架必与汪古部无关。

辽王朝西境在东胜州河清军（今内蒙古东胜）。北宋淳化五年（994），宋太宗为了不使鄂尔多斯南部成为党项进攻宋朝的据点，下诏毁废夏州城（今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尽徙其民于绥（陕西绥德）、银（陕西米脂）二州（《宋会要辑稿·方域》）。不久，鄂尔多斯南部与陕西北部相继落入西夏党项人之手。<sup>[20]</sup> 西夏党项人以佛教立国，西夏北境出土的铜十字架究竟是什么人留下来的遗物呢？从塞尔柱王朝作家马卫集的相关记载看，鄂尔多斯的铜十字架似与信仰景教的突厥浑部有关。公元916年，辽太祖阿保机“亲征突厥、党项”之役就发生在鄂尔多斯。《辽史·太祖本纪》所言“突厥”指突厥浑部，而“党项”则为建立西夏王朝的唐古特人。

公元13世纪初，景教僧拉班扫马和马可从大都（今北京）出访耶路撒冷城，途经西夏城镇。“当居民们听到神父拉班扫马和马可，赴耶路撒冷经过其城时，男女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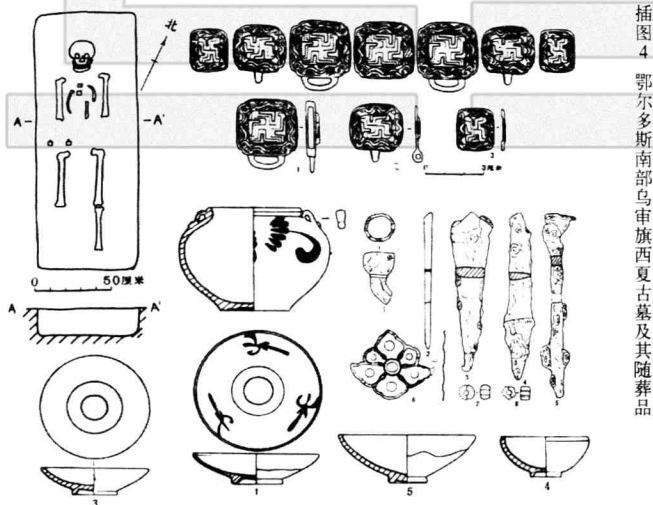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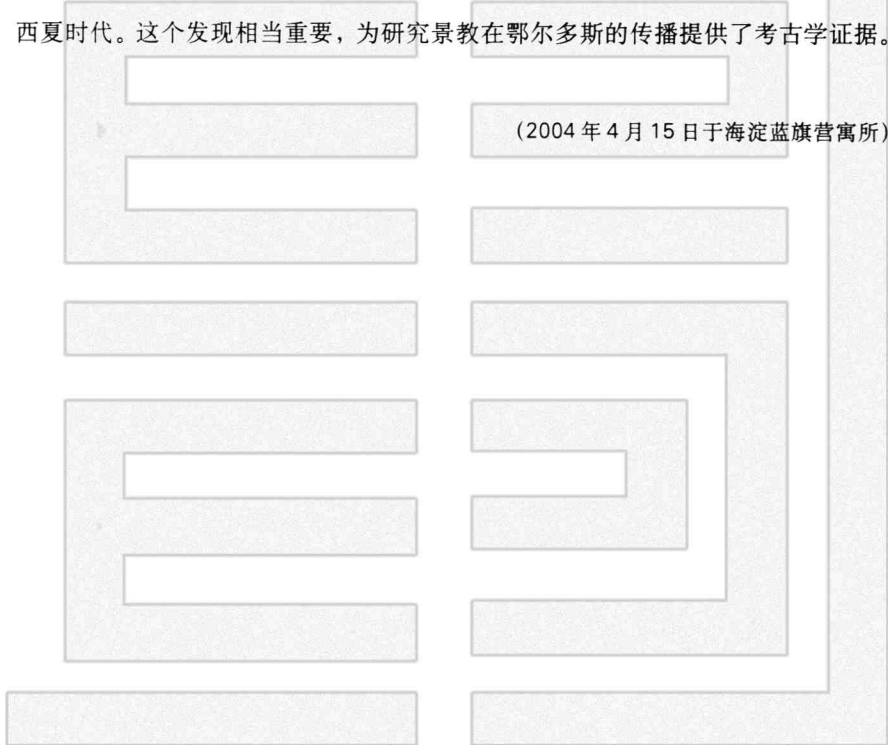


插图4 鄂尔多斯南部乌审旗西夏古墓及其随葬品

少纷纷出来迎接，因为唐古特人的信仰至为坚定，其心至为纯洁。”<sup>[21]</sup> 这些西夏景教徒中应有定居西夏的突厥浑部景教徒。直到至元年间（1335—1340），仍有浑族人居住在西夏地区。时任西夏中兴等路安抚副使的袁裕向朝廷汇报说：“西夏羌、浑杂居，驱良莫辨”。<sup>[22]</sup>

元代初年，汪古部才从阴山以北地区南下鄂尔多斯。而鄂尔多斯铜十字架大约产生于宋辽西夏时代，绝非时下所言元代汪古部景教徒遗物。我们的调查表明，鄂尔多斯景教铜十字架应该是游牧于鄂尔多斯的突厥浑部景教徒遗物，年代约在辽金西夏时代。这个发现相当重要，为研究景教在鄂尔多斯的传播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2004年4月15日于海淀蓝旗营寓所)



## 注释:

- [1] 《旧唐书·武宗本纪》。
- [2] 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06页。
- [3] 刘迎胜:《九—十二世纪民族迁徙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90年第12-13期,第80-106页。
- [4] H.W. Bailey, "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sou," *Asia Major*, vol. 1-1, 1949, p.48.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哈密顿著、耿昇等译:《五代回鹘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 [5] 鲍培(N. Poppe)著、黄建华、曜堂译:《阿尔泰语和乌拉尔语复数语尾研究》,收入李祥瑞、牛汝极:《阿尔泰学论丛》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5-142页。
- [6] Juhan Janhunen, "The Horse in East Asia: Reviewing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in Victor H. Mair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1,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1998, p.417.
- [7] 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p.317.
- [8] 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0-252页。
- [9] 林梅村:《松漠之间——从额尔古纳河山林到吉思汗的崛起》,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4-135页。
- [10] 《辽史·太祖本纪》。
- [11] 《册府元龟·外臣·朝贡》。
- [12] 《金史·完颜陈和尚传》。
- [13] 2003年在香港工作期间,曾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观看实物。本文插图2引自冯平山博物馆简介《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中“元代景教十字架图”。
- [14] Trudy S. Kawami, "Compartmented Stamp Seals," E.C. Bunker et al.,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the A.S. Foundation, 1997, pp.344-345.
- [15] 周伟洲:《鄂尔多斯发现之元押式十字铜牌考》,《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8-456页。
- [16] 穆尔著、郝镇华译:《150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5-106页。
- [17] 王翰章:《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王长启:《陕西出土历代玺印续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温廷宽:《中国肖形印大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孙慰祖编:《可斋论印新稿》,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75-276页。
- [18] 其书早佚,但是在《至顺镇江志》卷9保存了详细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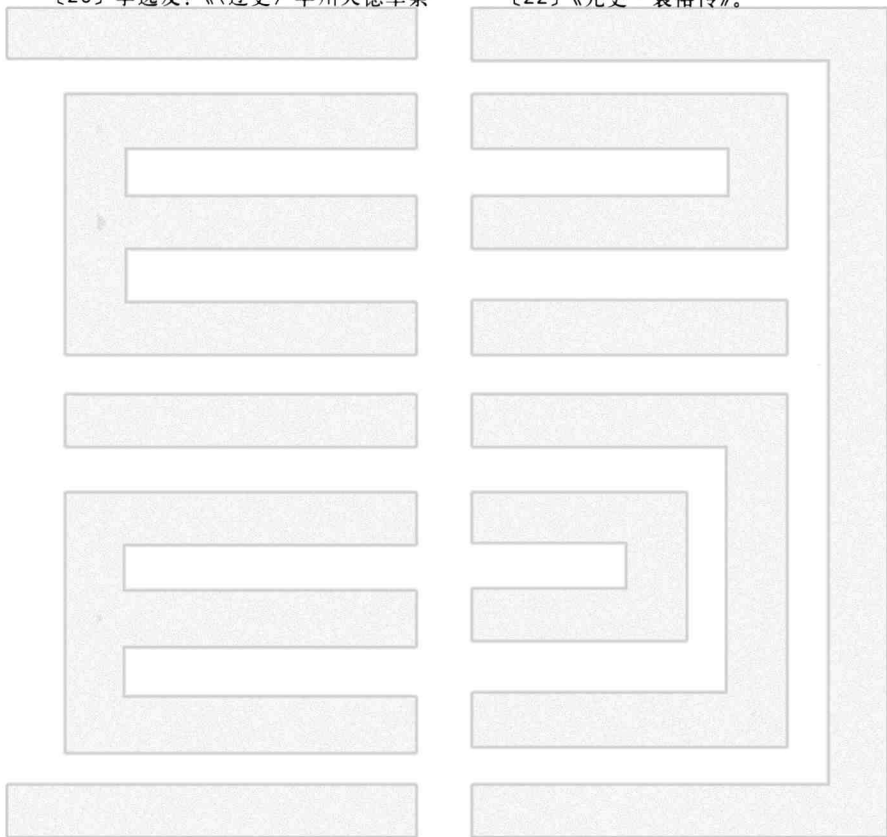
〔19〕周清澍：《汪古部统治家族——汪古部事辑之一》，见《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8-89页(原载《文史》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0〕李逸友：《〈辽史〉丰州天德军条

证误》，见《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第1-2期合刊，第37-40页。

〔21〕关于元代西夏景教徒，参见克里木凯特著、林悟殊译：《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台北，1995年，第132页。

〔22〕《元史·袁裕传》。



## 从额尔古纳松林 到成吉思汗的崛起

13世纪初，蒙古人在漠北突然崛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的蒙古铁骑几乎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在世界史上开创了一个蒙古时代。一个偏处大兴安岭一隅的弱小部落，何以在13世纪初一跃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这个问题一直是中亚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主要依据《蒙古秘史》、《史集》、《圣武亲征录》等草原史官的传著，并结合史书来探讨这个问题。草原史官传著的主要根据是蒙古老人口述传说和历史掌故，由于年代久远，难免有记忆上的差池。尽管成吉思汗所出部落以及蒙古种族起源的大致轮廓和早期历史已在学界初步达成共识。<sup>[1]</sup>但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前蒙古人“既无书册，亦无文字”，<sup>[2]</sup>我们所掌握的蒙古史前史的知识实际上相当贫乏。

19世纪末，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突厥碑铭为探讨蒙古人起源提供了重要史料，可惜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考古发现，尤其是近年来一系列新发现，为研究蒙古人在松漠之间的崛起提供了一批实物数据。早在20世纪50年代，俄国学者奥克拉朵尼科夫（A.P. Okladnikov）就尝试利用考古材料探讨蒙古史，近年日本和中国学者也开始从事这项研究，但是目前仍限于个别问题的讨论，缺乏全面系统分析。

蒙古民族是以大兴安岭森林部落和呼伦贝尔草原部落两大原蒙古人集团为核心，后来融合蒙古高原的突厥游牧部落以及一部分流亡漠北的契丹、女真乃至汉族农牧民，最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可谓起于松漠之间。考古发现表明，蒙古人的兴起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一、额尔古纳河山林；二、腾汲思海；三、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四、成吉思汗的崛起。真正的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出现的，13世纪初以前蒙古先民尚处于原蒙古人（Proto-Mongolian）时代，并非现代民族学意义上的蒙古人。<sup>[3]</sup>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索蒙古民族的兴起。按照上述四个时期梳理考古材料，解读蒙古历史传说、突厥碑铭和正史。或有不当之处，还望研究者批评指正。



## 一 额尔古纳河古民族的变迁

自《魏书》以来，正史往往把北方草原和大兴安岭的契丹、库莫奚、室韦都视为独立民族，并指出它们源出东胡系鲜卑族。契丹人雄踞辽河上游草原地带（今辽宁、吉林与内蒙古相邻地区）；库莫奚游牧于契丹南面和西面山脉（今河北和山西北部）；室韦人在契丹之北大兴安岭西麓（今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地带）。史家认定契丹和库莫奚源于宇文鲜卑（鲜卑和匈奴混血民族），而室韦人指滞留原始故乡大兴安岭的鲜卑人。

据现代史家分析，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王朝后，受中原文明濡染，将原始故乡的鲜卑人视为“夷狄”，不愿再和他们合用一个族名。于是北魏史官偷梁换柱，将他们改名“失韦”，隋唐以来称“室韦”。这样说是有语言学根据的，中外研究者都注意到，室韦、鲜卑实际上是同一族名serbi（亦作sirbi或sirvi）的不同音译。<sup>[4]</sup>蒙古人就大兴安岭西麓的室韦人分化发展而来。

北朝至隋代，室韦一直生活在长安东北七千里外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sup>[5]</sup>隋代“室韦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坦室韦、太室韦。并无君长，人民贫弱，突厥常以三吐屯总领之”。<sup>[6]</sup>

室韦人在唐代有了长足发展，分化出30余部，突厥人称其为“三十姓靺鞨”，分布地域“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今贝加尔湖）”。<sup>[7]</sup>唐史所见室韦部落不过20余部，主要活动于今天内蒙古呼伦湖和额尔古纳河流域。<sup>[8]</sup>其余部落则借第一突厥汗国崩溃之机，趁乱西迁蒙古高原，故不为唐史所载。室韦人西迁部落屡见于突厥碑铭。毗伽可汗碑提到蓝突厥人曾经讨伐色楞格河流域的九姓靺鞨。一般认为，他们就是西迁漠北的九个室韦部落。<sup>[9]</sup>

室韦人向蒙古高原的迁徙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在漠北重建突厥汗国的蓝突厥人发生激烈冲突。毗伽可汗碑说“在北方……黠戛斯人、骨利干人、三十姓靺鞨、契丹、奚等全都与我们为敌，我父可汗（骨咄祿可汗）[征讨]所有这些[民族]”（见碑文东面第15行）。<sup>[10]</sup>

蒙古先民之所以亡命额尔古纳山林，是因为突厥人对他们的一场大屠杀。据伊儿汗国史官拉施特记述，“他们的全部禹儿惕（游牧营地），在现今称为蒙古斯坦的地区，从畏兀儿国边境起一直延伸到乞台（按指契丹）和女真边界。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

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尔古涅一昆。‘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尔古涅’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人的名字为：捏古思和乞颜。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长时期留居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sup>[11]</sup>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拉施特在《史集》另一处说：“[前述蒙古]各部族起源于遁入额尔古涅一昆的两个人；由于生息繁衍，其氏族人数渐众，蒙古一词成了他们氏族的名称。”<sup>[12]</sup>

研究者对蒙古历史传说中的“突厥”有不同解释，我们认为当指重建突厥汗国（682 - 745年）的蓝突厥人，那么这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拉施特14世纪笔录的“距今两千年前”。

蓝突厥前三代可汗多次兴兵讨伐大兴安岭的室韦人。阙特勤碑（插图1）追述突厥先王的文治武功说：“天下四方之人均对他们怀有敌意。他们率军远征，讨伐了天下四方的所有民族，从而征服之。他们使高傲的敌人俯首，强大的敌人屈膝。他们令突厥人向东移居到卡迪尔汗山林（qadirqan yiš），向西则远至铁门关（见碑文东面第2行）。默啜可汗时代，蓝突厥人再次大举东征，“向东远至卡迪尔汗山以外，我们居住下来，并组织其民众”（见碑文东面第21行）。

关于“卡迪尔汗山林”一词，俄国学者拉德洛夫解释为“长有森林的山脉”，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认为是个地名，相当于兴安岭或其中一部分。研究者多从之，有学者径直译为“兴安岭”。就语音而言，这个地名与兴安岭毫无关系。为了慎重起见，有的学者音译为“卡迪尔汗山林”。<sup>[13]</sup> 其实，这个突厥语地名就是蒙古传说中的“额尔古涅一昆”，指大兴安岭西麓山林。首先，卡迪尔汗山林的“汗”（qan），亦作kan、khan（kh=x）或kha'an，意为“可汗”，<sup>[14]</sup> 相当于蒙古语qa'an（合罕）。这个词有两层含义，本义是“王”，或引申为“大”。例如：khan-balik（汗八里），意为“大都”（今北京）；khan-khentai（汗肯特山），意为“大肯特山”（不儿罕山）。第二，“卡迪尔汗山林”的原文qadirqan yiš应读作qadir qan-yiš。前成分qadir意为“极度的、严酷的”，相当于蒙古语arkūneh（额尔古涅、险峻的）；后成分qan-yiš意为“大山”，相当于蒙古语qūn（昆、山岭）。<sup>[15]</sup> 所以阙特勤碑所谓“卡迪尔汗山林”必指蒙古传说中的“额尔古涅一昆”无疑。

早在第一突厥汗国时代，突厥人就开始向大兴安岭移民。蓝突厥人重建突厥汗国后，继续向这里移民。毗伽可汗碑铭追述这位可汗生前战绩说：“当我34岁时（718）……地豆于人（tatabi）归降了汉人可汗。由于他们的使臣、他们的好消息以及他们的祝福不再送来，我便在夏天讨伐之。我将他们击败，（并掳获了）其马匹（与财物）。他们的军队集结起来，前来迎战。卡迪尔汗山林……他们居住在其故土”（见碑文东面第39-40行）。毗伽可汗碑与阙特勤碑许多内容重复，字句相同，本文所引最后一段漫漶不清的碑文或相当于阙特勤碑（见碑文东面第21行）的“向东最远至卡迪尔汗山以外，我们居住下来，并组织其民众”。

723年，蓝突厥人再次兴兵征讨地豆于。毗伽可汗碑说：“（当我39岁时），我在夏天征讨地豆于人……我歼灭了……（并掳获了）他们的儿童、妇女及其马匹和财产……我杀死其（儿童与）妇女”（见碑文南面第2-4行）。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应和蓝突厥人上次讨伐地豆于人一样，纵深卡迪尔汗山林。可惜碑文漫漶不清，只剩下“……我杀死其（儿童与）妇女……我前赴……”寥寥数语。有学者将突厥语 tatabi 释为“奚人”，并无真凭实据。正如白鸟库吉指出的，其名当即《魏书》提到的“地豆于”。<sup>[16]</sup> 奚人是库莫奚的简称，加上蒙古语复数语尾 -ut，就是《史集》所谓 kumusaut（胡母斯惕）以及辽史提到的鄂尔浑河流域的“胡母斯人”。<sup>[17]</sup> 《魏书》为库莫奚和地豆于分别立传，可见二者不属于同一部族。

蓝突厥时代，室韦与突厥在俱伦泊（今呼伦湖）交界，湖西为突厥领土，湖东是西室韦居地。地豆于是毗伽可汗东征对象，自然不是突厥人，而是《旧唐书·北

插图1  
阙特勤碑



狄传》说的“西室韦”。蓝突厥征服地豆于之后仍在继续的战争，显然发生在呼伦湖以东额尔古纳河。这次东征，毗伽可汗没像上次那样派人在卡迪尔汗山林“居住下来，并组织其民众”，而是残忍地“杀死其（儿童与）妇女”。

蓝突厥与唐朝对室韦诸部的激烈争夺，在正史中亦有反映。《新唐书·北狄传》记载：室韦人于“长寿二年叛，将军李多祚击定之，景龙初，复朝献，请助讨突厥。开元、天宝间，凡十朝献”。《资治通鉴》天宝元年（742）记十节度之设，由“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故知开元年间，唐朝已在室韦、靺鞨设置了羁縻督府州。《资治通鉴》记开元十四年（726），“黑水靺鞨遣使人见，上以其国为黑水州，仍为置长（御）史以镇之”，而以前黑水靺鞨往往“请吐屯于突厥”。<sup>[18]</sup>黑水靺鞨请唐朝设黑水州，说明他们与蓝突厥人关系恶化，而毗伽可汗东征原因就在于“当我34岁时（718）……地豆于人归降了汉人可汗”。唐朝在室韦设置都督府疑是在是年，结果招致蓝突厥人大举攻伐。从蓝突厥人两次东征的具体史实看，那场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可能发生在蓝突厥人第二次东征，也即唐开元十一年（723）。

有唐一代，大兴安岭古民族迁徙频繁。蒙古祖先在这个时期从室韦诸部脱颖而出，以“蒙兀”之名进入历史舞台。《旧唐书·北狄传》记载：“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游）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坦）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今嫩江）、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今黑龙江下游）靺鞨之北，北（经）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今渤海）。”

在蓝突厥人打击下，地豆于人从漠北退缩到呼伦湖以东地区——额尔古纳河上游，唐史称为“西室韦”。回鹘汗国时代，西室韦部落重返漠北，新移民乌素固迁入西室韦故地。<sup>[19]</sup>公元10世纪80年代初，北宋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途经鄂尔浑河流域。据当地居民介绍，“旧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靺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靺遂各争长攻战]。”<sup>[20]</sup>为回鹘牧牛的“达靺”部落当即重返鄂尔浑河的西室韦。他们多次进出蒙古高原，不断受到草原文明的洗礼，是室韦人中文明程度较高的部落。

大室韦是额尔古纳河流域最古老的部族之一，原来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下游，隋代称“太室韦”。《隋书·北狄传》说太室韦“径路险阻，语言不通，尤多貂皮及青鼠”，表明大室韦的族属、语言与其他室韦人有所不同。

关于唐代大兴安岭西麓的民族分布，敦煌古藏语文献（P.T. 1283）有一条重

要记载，据说契丹“其东，为地豆于人（dad-pyi）部落，在最北境，为黑于厥里（ga-ra-byi-ger）部落，山岩峻峭，地势险恶，其家畜唯猪豕而已”。<sup>[21]</sup>如前所述，地豆于即唐史的“西室韦”，那么黑于厥里相当于唐史的“大室韦”。大室韦南迁额尔古纳河中游的森林草原之后，生活环境略有改观，至少可以养点家畜。比起大室韦故地“尤多貂皮及青鼠”的额尔古纳河下游原始森林来，可谓天壤之别。

在正史中，“黑于厥里”没有完全相应的译名，一个比较接近的译名是“黑鞑”。其名前一成分 gara-，相当于书面蒙古语 qar-a 或突厥语 qara，意为“黑色的”；后一成分 -byi-ger，相当于书面蒙古语 üker、土族语 fugor、保安语 fgor，意为“犏牛”。这些词以及书面蒙古语 buqa（公牛）都是从原始蒙古语 \*hüke-r < \*pöke-r 演变而来。<sup>[22]</sup>后者屡见于宋辽文献，《契丹国志》卷22作“于厥”或“于厥里”，《辽史·地理志》作“羽厥”，《辽史·太祖纪》作“于骨里”，《陷虏记》作“姬厥律”。

史载柔然王姓“郁久闾”，这个族名与“于厥里”在语音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北齐天保五年（554），高洋从晋阳（山西太原）率兵千余骑，至恒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讨伐柔然，俘获柔然可汗“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最后在金川（今内蒙古正蓝旗金莲川）击溃柔然残部，“蠕蠕（柔然）闻而远遁”。<sup>[23]</sup>柔然残部“闻而远遁”的理想之地，当在原始故乡——大兴安岭。北魏永平年间，有个柔然可汗名叫“丑奴”，其名来自蒙古语 chino（狼），《蒙古秘史》译作“赤那”，故知柔然人讲蒙古语某种方言。<sup>[24]</sup>不过，柔然统治漠北时吸收了许多突厥文化，柔然语被大大突厥化。种种迹象表明，大室韦的黑于厥里人很可能是遁入大兴安岭的柔然遗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隋书》说大室韦人与其他室韦人“语言不通”。另一方面，大室韦人的语言和民族特征显然和室韦人最接近，否则，中原史官不会给他们冠以“室韦”之名，并归入五部室韦之一。

大室韦在唐代移居额尔古纳河中游以后，新移民落坦室韦部落来到额尔古纳河下游北岸。这个部落在正史中颇多异名，一般以《通典·边防典》的“骆驼室韦”为正音。<sup>[25]</sup>大兴安岭不产骆驼，骆驼室韦似与柔然人或蒙兀人命运相同，在突厥人向东扩张活动的逼迫下，从漠北亡命大兴安岭山林。值得注意的是，“骆驼”一词在突厥语中作 hingan（母骆驼）。<sup>[26]</sup>不知大兴安岭之名是否源于这个突厥语地名，本指骆驼室韦所居山岭。

大室韦南迁后，另一支新移民蒙兀人来到额尔古纳河下游南岸，与骆驼室韦隔河相望。这里地处室韦人分布区最北端，在今额尔古纳河东南与黑龙江上游以南原

始森林地带。<sup>[27]</sup>难怪蒙古传说将祖先居地称作“险峻的山岭”（额尔古涅一昆）。蒙兀人不仅是室韦诸部中生存环境最恶劣的部落，恐怕也是文明程度最低的室韦人。

关于蒙兀人的族源，研究者众说纷纭。鉴于骆驼部和蒙兀部都是大室韦南迁之后出现在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室韦部落，不能排除它们是滞留故乡的大室韦残部。<sup>[28]</sup>据蒙古传说，蒙古部落只有两男两女免遭突厥人屠戮，最后遁入额尔古纳山林。绝大多数蒙兀人恐怕是滞留大室韦故地的黑于厥里人。如前所述，于厥里人当系柔然遗民，柔然语吸收了大量突厥语词汇，所以《隋书》说大室韦与其他室韦人“语言不通”。而蒙古语正是室韦语突厥化的产物，大室韦的黑于厥里人与后来的蒙古人最为接近。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契丹国志》卷22说“于厥里凡事皆同蒙古里”。

## 二 蒙古史前遗迹的发现

如前所述，蒙古祖先起源于今天内蒙古、黑龙江两省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交界地带。这个地方的考古文化序列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俄考古学家共同努力，逐步建立起来的。

20世纪50年代，俄国考古学家在鄂嫩河与石勒喀河流域发现一种新型考古文化，奥克拉德尼科夫后来命名为“布尔霍图伊文化”。这个文化采用竖穴土坑墓，无葬具（个别用石棺），侧身屈肢葬，头向西或西北。随葬器物为附加堆纹和刻划纹平底陶器、桦树皮器皿、柄端带圆环的铁刀、骨弓弭、骨镞等，不随葬家畜。尽管布尔霍图伊文化的分布范围覆盖了蒙古人起源地，但其年代不晚于公元8世纪，自然不会和蒙古祖先有什么联系。<sup>[29]</sup>据唐史所述额尔古纳河民族分布，布尔霍图伊文化大概是骆驼室韦的考古文化。

80年代末，俄国考古学家终于在中俄境界河——额尔古纳河北岸发现了与蒙古族源相关的考古资料，今称“达不孙文化”（Dabsun Culture）。据俄国学者基里洛夫研究：

在额尔古纳河还有一些墓葬，其形式是于覆盖的大石板下深约3.0—3.5米处，即为狭窄的墓穴，死者的头朝向西北，安葬在独木棺类型的棺材里。这种墓葬目前还是一个谜。尽管随葬品的整体组合与中世纪的游牧民族相一致，

但在墓葬中发现的一件陶器却与我们已知的不同，它的表面亮泽、灰色、小口，器身匀称而细长。这一现象使额尔古纳河流域遗存的研究，呈现出一幅比贝加尔其他地区更加扑朔迷离的画面……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新的文化类型，起源于铁器时代早期，但是在布尔霍图伊文化时期的综合体内得以延续并有所变化，按我们的观点，它们同蒙古族，更确切些说是同蒙古语族的民族起源相关。

随着研究的深入，能够从布尔霍图伊文化本身的构成成分中区分出独立的区域性的文化类型，因为在随葬品中带有明显的突厥成分并与布尔霍图伊的埋葬仪式（头向东，侧身屈肢）有着原则的差异。我们提议，以这一文化类型最先发现的地方——达不孙——而命名为“达不孙文化”，在时间上，我们将其确定为公元6—9世纪。<sup>[30]</sup>

达不孙文化与布尔霍图伊文化分布在同一地区，据考古学原则，两种文化不可能在同一地区长期共存。众所周知，文化的消亡往往和王朝更迭紧密联系在一起。蒙古高原的政治格局恰恰在公元8世纪中叶发生重大变化，蓝突厥人退出历史舞台，回鹘人在漠北兴起。看来，布尔霍图伊文化随蓝突厥人一朝覆亡而消亡，那么达不孙文化的兴起当在公元8世纪中叶蓝突厥灭亡之后。既然公元8世纪以前布尔霍图伊文化仍在额尔古纳河北岸流行，那么达不孙文化的年代不会是公元6—9世纪，而是公元8—9世纪，相当于回鹘汗国时代或晚唐时期。

达不孙人使用的“独木棺”，就是把整根原木一剖两半，中间凿空制成的葬具。尽管基里洛夫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但是他将独木棺定为蒙古祖先遗迹，的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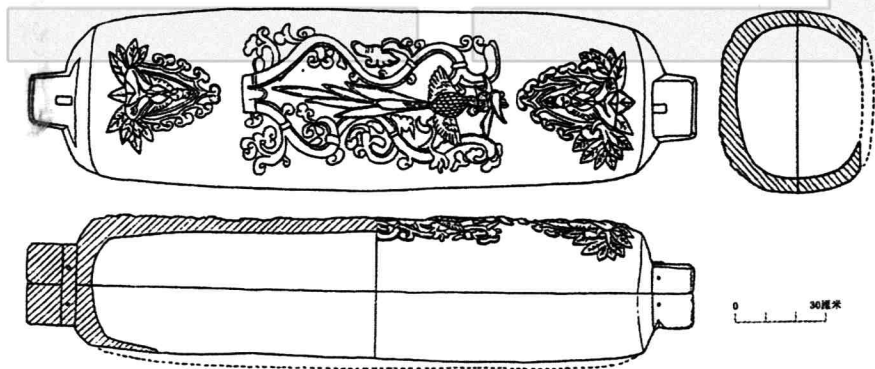


插图2 敖汉旗出土雕花独木棺



有先见之明。据《元史·祭祀志》，蒙古皇族以独木棺为葬具，“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剝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明人叶子奇也说：“元朝官（棺）裹，用椁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sup>[31]</sup> 由于蒙元皇帝秘葬大肯特山的起辇谷，蒙古贵族使用什么样的葬具，无人知晓。近年内蒙古敖汉旗和河北涿源两个考古新发现，终于让人们认识了蒙古贵族葬具的“庐山真面目”。

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近年征集到一个雕花独木棺，由于年代久远，棺底已经腐烂殆尽，但是棺顶和四边都保存完好。棺顶中部主题花纹是凤纹，两侧配有卷蔓灵芝纹，主题花纹两边各雕有一个道教始祖天尊像（插图2）。研究者把独木棺上的纹饰和图像与辽代陈国公主墓随葬品的凤纹和道教始祖天尊像进行比较，以为是辽代蒙兀室韦之物。<sup>[32]</sup> 这两个雕像是否为道教始祖天尊像并不十分确定，从构图看，更像是佛像或菩萨像。众所周知，蒙古人信仰道教和佛教是从成吉思汗时代才开始的，那么这个独木棺不会早于13世纪初。另一方面，这口大棺材长达2.66米，宽0.7米，一定相当重。发现者不得不就近处理，出土地点不会离收购地点敖汉旗太远。

据《圣武亲征录》，成吉思汗夺取金中都（今北京）以北地区后，分封给了札剌亦儿、忙兀、兀鲁兀、亦乞列思、弘吉剌五部，时称“五投下”。蒙古贵族在敖汉旗一带营造墓地当在1211年成吉思汗设“五投下”以后。独木棺的纹饰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11世纪末至13世纪初凤纹刺绣相似，年代可晚至13世纪初。这时，弘吉剌部已从呼伦贝尔草原南下，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和河北北境一带游牧。敖汉旗属于弘吉剌部封地，这个雕花独木棺可能属于弘吉剌部。

敖汉旗独木棺毕竟不是发掘品，用来解释蒙古贵族的葬俗尚不足以服人。无独有偶，河北涿源县近年还发现一个蒙古贵族的独木棺，这次却是正式考古发掘所得。我们将在第五节详细讨论。总之，蒙元时代独木棺的发现，可与文献相互印证，说明额尔古纳河北岸达不孙文化的独木棺应是蒙古族葬具的祖型。这种独特的葬俗和室韦人“尸则置于林树之上”的传统葬俗既有联系，又有显著区别，说明早在额尔古纳河时代，蒙兀人就从大兴安岭室韦诸部脱颖而出，初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征的丧葬礼俗。<sup>[33]</sup>

据俄罗斯考古学家调查，达不孙文化“分布范围同外贝加尔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联系在一起，大体上在赤塔州和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南部地区，在公元9世纪以后，该文化的遗存在这一地区再没有发现”。这个发现相当重要，首次揭示额

尔古涅一昆的蒙兀人迅速复兴，大约公元8—9世纪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森林草原，并在这个地方开始游牧化，所以达不孙文化“随葬品的整体组合与中世纪的游牧民族相一致”。<sup>[34]</sup>

在草原史官的记述中，有一个重要细节往往为研究者忽略。《蒙古秘史》开篇说，成吉思汗的祖先“渡过腾汲思海而来，来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合勒敦山扎营住下”。<sup>[35]</sup> 腾汲思海即呼伦湖，那么蒙古先民离开额尔古纳山林后，并没有直接迁往蒙古高原，而是南下呼伦湖东岸。他们在呼伦湖以东草原休养生息了相当一段时间，然后渡腾汲思海，西迁不儿罕山，以至于数百年后蒙古历史传说仍对腾汲思海记忆犹新。据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考证，成吉思汗一名来自“腾汲思”，这个词借自突厥语 *tengiz*（大海），那么“成吉思汗”一词意为“大海汗”。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大汗仍以“大海汗”为称号，只是改成了蒙古语 *dalan-in qaan*（达赖汗）。<sup>[36]</sup> 成吉思汗用“腾汲思”作为大汗称号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

1252年《蒙古秘史》草成于克鲁伦河畔曲雕阿兰，草原史官未及详述成吉思汗祖先定居腾汲思海的历史。直到14世纪，拉施特才根据另一个蒙古传说讲述了这段历史。他在《史集》中这样写道：“当这个民族（指成吉思汗的祖先）在这些山和森林里生息繁衍，[他们所占的]地域显得日益狭窄不够时，他们就互相商量，有什么好办法和不难[做到]的办法，可使他们走出这个严寒的峡谷和狭窄的山道。于是，他们找到了一处从前经常在那里熔铁的铁产地。他们全体聚集在一起，在森林中整堆整堆地准备了许多木柴和煤，宰杀了七十头牛马，从它们身上剥下整张皮，[用那些皮]作成了风箱。[然后]在那山坡脚下堆起木柴和煤，安置就绪，使这七十个风箱一齐煽起[木柴和煤下面的火焰]，直到[山]壁熔化。[结果]，从那里获得无数的铁，[同时]，通道也被开辟出来了。他们全体一起迁徙，从那个山隘里走到原野上。”

蒙古先民下山后来到的“原野”似在腾汲思海以东草原。据《蒙古秘史》记载，率领蒙古先民下山的首领名叫“朵奔伯颜”，他的妻子名叫“阿阑—豁阿”。<sup>[37]</sup> 这个传说的主人公是历史真实人物，据法国学者格鲁塞考证，两人的第六代孙就是大名鼎鼎的合不勒汗，《元史》称“葛不勒汗”。他在1147年大败金军，迫使金朝“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处团寨与之，岁遗牛羊豆，且册立其长熬罗孛极烈为蒙辅国王”。<sup>[38]</sup> 古人常以30年为一世，那么朵奔伯颜率部下山时间当在967年（= 1147 - 30 × 6）

左右，相当于辽代初年。

考古发现进一步揭示了成吉思汗祖先移居腾汲思海的历史。1985年，呼伦湖（即腾汲思海）东北65公里西乌珠尔草原发现一处独木棺墓地。这个地方今属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墓地位于海拉尔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建在一个2公里长的流动沙丘之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里不断有零星文物出土，可惜大部分墓葬已遭到破坏，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清理了三座墓，皆以独木棺为葬具，仰身屈肢葬，头向北偏东。随葬品包括小口残陶罐、桦树皮弓囊（内装木弓）、骨弓弭、木马鞍、铁刀、铁箭头、蹀躞带铜牌饰、铜带扣。此外，发掘者还在地表采集到铁马镫、银耳环、陶罐、陶壶等文物。尽管独木棺的碳14年代数据在680年左右，但是随葬品如小口陶壶、铁镞、蹀躞带的铜牌饰、铜节约等，皆为辽初常见之物（表1和插图3上），故发掘者将其定为辽代早期契丹墓。<sup>[39]</sup>

1995年，在这三座独木棺墓南侧又发现三座古墓，全面揭开了西乌珠尔墓地的文化内涵。和上次发现的不太一样，其中两座墓以桦木板棺为葬具，另一座以桦树皮棺为葬具。除此之外，无论葬俗还是随葬品，皆与上次发现的独木棺墓相同（表1和插图3下）。只有2号墓（95CXM2号）保存较好，墓主人仰身屈肢，头向北偏西30度，头上盖有两片麻布。随葬品主要为陶罐、陶壶、木马鞍、牛皮弓囊、桦木弓、桦树皮箭囊（内装铁镞桦木杆箭）、陶器、铜牌饰、玛瑙和玻璃珠饰、铁马镫残片，显示了浓郁的游牧文化特征。这次发掘还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可以确定1988年在这个墓地采集的陶器和铁马镫出自桦木板棺或桦树皮棺。发掘者把这三座墓也定在辽代早期，认为“这次清理的三座墓葬应属于已往清理的西乌珠尔古墓群的一个组成部分”。<sup>[40]</sup>

1993年召开的内蒙古东部文物工作会议上，有学者根据叶子奇《草木子》，提出西乌珠尔独木棺墓属于蒙兀室韦遗迹。这个说法现在已为学界普遍接受。<sup>[41]</sup>然而，研究者都没有注意到西乌珠尔墓地与额尔古纳河北岸达不孙文化的联系，两者葬具都采用单片形式的独木棺，并随葬小口陶壶等，无疑属于同一文化。耐人寻味的是，两者年代相互衔接，达不孙文化年代较早，不晚于公元9世纪，西乌珠尔墓地年代稍晚，不早于公元10世纪初。由此可知，蒙兀人约在公元8世纪中叶从额尔古纳河上游原始森林南迁额尔古纳河北岸森林草原，形成达不孙文化，然后于公元9世纪末从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达不孙南迁呼伦湖东岸的西乌珠尔草原。蒙兀人在腾汲思海以东草原休养生息了一段时间，留下西乌珠尔墓地。蒙古乞

颜部显然就从西乌珠尔草原启程，渡腾汲思海西迁，最后于公元10世纪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建立新的家园。

据蒙古历史传说，蒙古部落最初只有乞颜和捏古思两个氏族，朵奔伯颜率乞颜部从大兴安岭下山后不久去世，他的妻子阿阑—豁阿在丈夫死后与神灵交往，生下不少儿子。后者的子孙之间形成内部禁婚集团，或称“尼鲁温”；而同样源出大兴安岭，与乞颜部实行族外婚的部落则称“迭列列斤”，最早的“迭列列斤”是捏古

表1 额尔古纳河上流蒙兀人墓葬

编号	葬具	葬式	头向	随葬品
达不孙	独木棺	不详	不详	表面亮泽、身体细长的小口灰陶壶
西乌珠尔 88M1	单片式独木棺	仰身屈肢	北偏东 10 度(无头骨)	裹尸麻布和毡子各 1 条、钱纹小口陶壶 1 个
西乌珠尔 88M2	单片式独木棺	仰身屈肢	北偏东 20 度(老年男性)	桦树皮弓囊(内装一木弓)2 件、骨弓、珥 1 件、木马鞍 1 个、骨饰片 1 件
西乌珠尔 88M3	单片式独木棺	仰身屈肢	北偏东 5 度(无头骨)	铜器 14 件，皆为马具或蹀躞带饰物(扁圆形带扣)、残铁刀 2 件
西乌珠尔 95CXM1	桦木板棺残迹	不详	不详	完全被破坏，地表采集残陶片
西乌珠尔 95CXM2	桦木板棺	仰身屈肢	北偏西 30 度(老年男性)	覆面麻布 2 块，残陶器 1 个(内有谷物)、陶壶 1 个、牛皮弓囊 1 件(内装木弓 1 件)、桦树皮箭囊 1 件(内装鸣镝铁镞桦木杆箭 12 支)、残木马鞍 1 件、残铁马镫 1 件
西乌珠尔 95CXM3	桦树皮棺残迹	仰身葬 (盗扰)	头向正北(老年男性)	陶罐 2 个、铜牌饰 1 件、玛瑙和玻璃珠饰 6 颗、桦树皮小袋 1 件(内装小铁刀 1 件)

思部。<sup>[42]</sup> 关于这两个蒙古氏族，亦邻真分析说：“尼鲁温可能是指住在山岭上的蒙古人，而迭列列斤可能指居住在山岭下的蒙古人。尼鲁温和迭列列斤之间可以互通婚姻，这种外婚制关系似乎是从远古传说中人格化的两个氏族乞颜和捏古思延续下来的。据《史集》，尼鲁温蒙古中有乞颜氏族，迭列列斤蒙古中有捏古思氏族。”<sup>[43]</sup>

我们在西乌珠尔墓地见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场景。独木棺是从大兴安岭下山的乞颜部的古墓，桦木板棺或桦树皮棺则为与乞颜人通婚的某个“迭列列斤”部落，而西乌珠尔墓地是这两个互为婚娅的原蒙古人的公共墓地。西乌珠尔墓地的不同葬具或许代表了原蒙古人的不同氏族，独木棺墓与《元史·祭祀志》所记蒙古皇族葬具相同，属于成吉思汗所源出的乞颜部，而使用桦木板棺墓和桦树皮棺的则为与乞颜部互为婚娅的“迭列列斤”部落。

### 三 公元 10 世纪初欧亚草原的民族迁徙

公元916年，辽太祖阿保机在中国北方建立契丹王朝，926年改国号为“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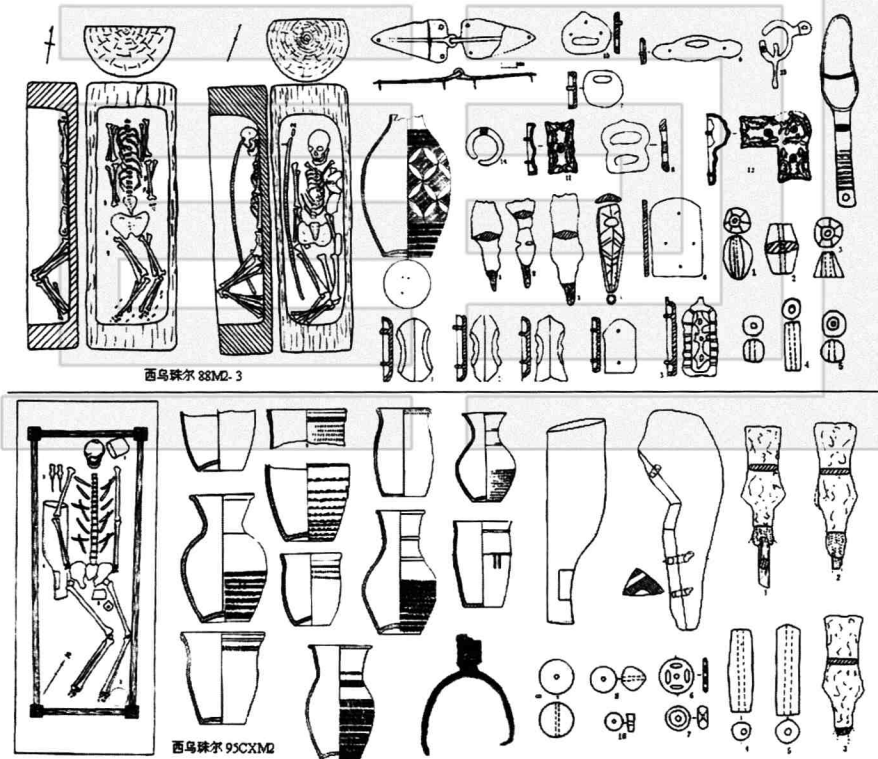


插图 3 西乌珠尔草原蒙兀人古墓

辽朝疆域“迨于五代（907—960），辟地东西三千里……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胘胸河（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易县拒马河），幅员万里”。契丹北境的主要部族，是时称“阻卜”或“靺鞨”的室韦人，分布范围“北至胘胸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sup>[44]</sup> 辽太祖阿保机将这些部落一一征服。史书记载：“太祖并诸番三十六国，室韦在其中”，“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皆服属之”，并“以室韦户置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sup>[45]</sup> 室韦人时叛时服，例如：辽朝两大强敌——乌古部和迪烈部经常南下劫掠。乌古部乃于厥里之别称，主要游牧于腾汲思海至海勒水（今海拉尔）一带。《契丹国志》卷22说于厥里“凡事皆与蒙古里同”，所以成吉思汗祖先所源出的乞颜部属于乌古部。敌烈部，亦称迪烈、迪烈得、迪烈德、迭烈德等，史称“敌烈八部”，主要游牧于乌古部之西胘胸河（今克鲁伦河）下游。神册三年（919），辽太祖阿保机征服乌古部，其子耶律德光继而在神册四年征服迪烈部。然后，辽王朝又在“沙漠之北置西北路都招讨府奥隗乌隗部族衙、卢沟河统军司倒塌岭衙，镇慑靺鞨、蒙骨、迪烈诸军”。<sup>[46]</sup> 正如王国维所考，蒙骨即蒙兀人。公元10世纪初，蒙兀人已经西迁呼伦湖以东草原，而辽王朝曾在蒙兀部落中设军镇进行管理。

为了稳固边疆，阿保机采取“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的政策，把乌古部原来的游牧之地——额尔古纳河和海拉尔河流域变成了辽王朝直接统辖的新移民区，并向这里迁移了三个契丹部落。<sup>[47]</sup> 后来，辽王朝继续向这个地区移民，从三个部落发展成“契丹二十部族放牧地”。辽泰州德昌军和静边城就是在“契丹二十部族放牧地”的基础上建立的。<sup>[48]</sup> 与此同时，辽朝还在呼伦贝尔西部修建了一条边壕，以防御叛服无常的羽厥、室韦、北阻卜等北方游牧人。<sup>[49]</sup>

天赞三年（925），乌古部再次叛乱。这年六月，契丹可汗阿保机及大元帅耶律德光北征阻卜（靺鞨）诸部。九月，至鄂尔浑河流域回鹘故都（哈刺巴刺哈孙）刻石记功。十月，越流沙，拔浮图城（新疆吉木萨尔附近北庭故城）。一路上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便“尽取西鄙诸部”，沿途阻卜诸部纷纷归降。<sup>[50]</sup> 在契丹人对北方游牧人无情打击下，蒙古乞颜部大概在天赞三年离开海拉尔河北岸西乌珠尔草原，渡腾汲思海而西迁，最后来到三河（土拉河、克鲁伦河、鄂嫩河）之源不儿罕山。

乞颜部的迁徙又迫使土拉河流域突厥浑部西迁中亚，从而在欧亚草原引发了一场自东而西的民族迁徙浪潮。波斯木鹿城作家马卫集（Sharaf al-Zamān Tahir al-Marwāzī）所著《动物的自然性质》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该书第9章谈到

公元10世纪中亚草原发生的一次民族迁徙。文中说：

浑人(qun)[也]属于他们(按指突厥),这些人因害怕契丹汗而从契丹之地来。他们是聂思脱里教徒,因草场的压力,从他们的故乡迁移过来。火赤哈儿之子也斤赤花刺子模沙就出自他们。追踪着浑人的是一支称为乞亚(qāy)的人。他们的人数以及力量都比他们众多和强大,将他们从这些草原驱逐出去。他们于是移到萨利(shāri)人之地,而萨利人则迁入突厥蛮之地,突厥蛮则依次进入虎思(ghuzz)国的东部。虎思突厥人于是迁移到比干(bajānak),靠近亚美尼亚海岸。<sup>[51]</sup>

马卫集的“qun”就是《隋书·铁勒传》提到的“浑”人,本为铁勒诸部之一,后来依附突厥。<sup>[52]</sup>唐太宗在今土拉河畔铁勒浑部设皋兰州。蓝突厥默吸可汗夺突厥故地,浑人等突厥遗民与回纥诸部一度迁往河西走廊。敦煌于阕文写本(P. 2471)提到五代甘州地区有“浑人居地”(hunvasta),就是唐代南下河西的浑人后裔。<sup>[53]</sup>不久,浑人主要部落返回漠北,一度依附于在漠北建立王朝的回鹘人。回鹘汗国崩溃以后,浑人等突厥部落没有随回鹘远走中亚,而是留在了故乡土拉河流域。那么公元10世纪初欧亚草原民族大迁徙的始作俑者,是地理位置最靠东方的乞亚人,其次是土拉河流域的浑人。

在以往的研究中,乞亚人往往被释作“奚人”,主要根据两者读音相近。正如前文讨论的,奚人乃“库莫奚”的省称,复数形式为qumasaut(胡母斯惕)。拉施特在《史集》中为胡母斯惕人和乞亚人分别立传,可见二者不属于同一部族。我们



插图4 蒙古人西迁路线图



认为乞亚实乃“乞颜”一词的单数形式。据美国突厥学家鲍培 (N. Poppe) 研究, 古阿尔泰语词汇常带有一个不稳定的尾音 /n/。这个尾音有时可以解释为复数语尾, 相当于突厥语复数语尾 -lar 或蒙古语复数语尾 -ut。<sup>[54]</sup> 例如: 蒙古语 mori(马), 复数作 morin (马群);<sup>[55]</sup> 突厥语 bod (部落), 复数为 bodun (诸部落), 蒙古语 qitay (乞台), 复数作 qitan (契丹)。<sup>[56]</sup> 同理, qāy(乞亚)的复数形式可以是 qāyan (乞颜), 《史集》采用蒙古语形式, 写作 kian (乞颜)。如果换上蒙古语复数语尾 ut, 则是《史集》对乞颜的另一称谓 qiat (乞牙惕)。<sup>[57]</sup> 据拉施特解释, “乞颜在蒙古语中, 意谓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所以人们以这个词谓他们的名字。乞牙惕谓乞颜的复数; 在这个氏族中, 近于始初的那些人们在古代被称为乞牙惕。”所以我认为乞亚人就是乞颜人。

关于乞亚人在蒙古高原的行踪, 11 世纪中叶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大辞典》卷 1 说: “从最靠拂林 (rum, 东罗马) 的开始列举, 首先是比干 (bajanak), 然后是钦察 (qifchaq), 然后是乌古思 (oghuz), 然后是寄蔑 (yemek)、然后是巴只吉惕 (bashghirt), 然后是拔悉密 (y[bl]asmil), 然后是乞亚 (qāy), 然后是阻卜 (yabāq), 然后是达怛 (tatar), 然后是黠戛斯 (qirqiz), 后者距秦 (sin, 指中国) 最近。……在游牧民中, 有处密 (chömül) ——他们有一种他们自己的急促不清的语音, 但他们也懂突厥语; 乞亚、阻卜 (yabāq)、达怛和拔悉密, 他们每一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乞亚人的邻居 yabāq 一般译为“叶护部”。据刘迎胜考证, 其实乃辽史所谓“阻卜”。<sup>[58]</sup>

穆斯林地理学家比鲁尼 (T. Biruni) 的《地理志》也提到“乞亚人”。据说“第六地带始于东突厥人的地区, 诸如乞亚 (qāy)、[豁里(qry)]、黠戛斯 (qirqiz)、寄蔑 (kimak) 和九姓古思 (toghuzghuz)”。我们在方括号内补入的 qry, 原文作 qun, 显然是手书之误。比鲁尼的《地理志》成书于 1023 年, 浑人早就西迁中亚, 不可能与黠戛斯人为邻。英国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发现这段文献的 qun 字在一份古老的波斯文译本中写作 qry(豁里), 以为指蒙古豁里部 (qori), 唐代称“骨利干”。<sup>[59]</sup> 多数学者认定公元 10 世纪以后, 豁里人已迁往黠戛斯人以东安卡拉河流域。所以《地理志》波斯文译本说黠戛斯与豁里部相邻显然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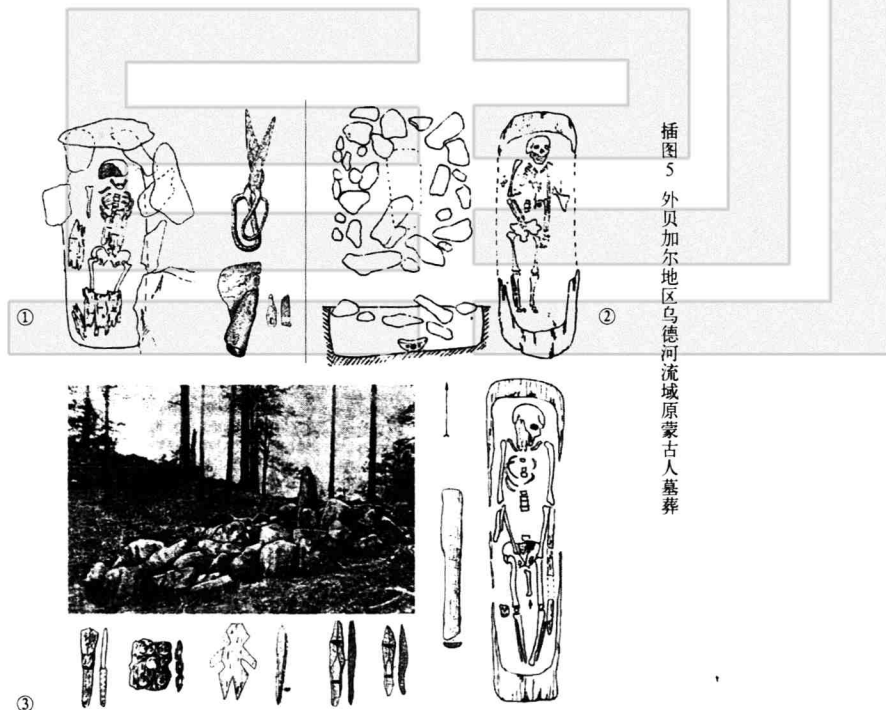
公元 1004 - 1014 年, 辽军在鄂尔浑河和克鲁伦河一线建镇、防、维等边防城镇, “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 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 凡有征伐, 不得抽移。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 分居镇、防、维三州”。<sup>[60]</sup> 1957 年, 蒙古

考古学家佩尔列确认镇州城就是布尔根省达申其勒镇附近青陶勒盖古城。该城东西各有一辽城，即防州和维州二城故址。<sup>[61]</sup> 辽史所言镇州以北“室韦”，似即《契丹国志》的“蒙古里”，因为辽人往往把早年西迁漠北的室韦人称作“阻卜”。《契丹国志》卷22说辽国“正北至蒙古里国……东南至上京四千余里”；“于厥……东南至上京五千余里”。《辽史·地理志》则说“镇州……东南至上京三千余里”。凡此表明，蒙古里、于厥里等部这时已活跃于镇州以北 1000 - 2000 余里之地。

据以上讨论，蒙古乞颜部在 925 年从西乌珠尔草原启程，“渡腾汲思海而来，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而乞颜部的迁徙，迫使土拉河流域的突厥浑部西迁中亚，从而引发了欧亚草原“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迁徙。

## 四 鄂嫩河流域蒙古祖先遗迹

乞颜部西迁漠北后，主要活动于鄂嫩河、克鲁伦河与土拉河源头之间——今俄



蒙交界地带。目前只有俄罗斯境内鄂嫩河流域作过一些考古调查，并发现一些公元11—12世纪初的石堆墓。<sup>[62]</sup> 这些古墓和随葬品与西乌珠尔墓地蒙古祖先墓葬非常相似，使用独木棺、木板棺或桦树皮葬具。墓上石堆不十分密实、层数不多，一般就用两层石头，上层用大、中型岩石块，下层用较小的岩石块，石堆中心高度不过0.5—0.6米，并以大量小石块填充墓穴，经常直达基底，与公元10世纪以前厚重多层的石封堆墓形成鲜明对照。例如：1974年在外贝加尔地区赤塔州以西120公里温都贡湖畔发现一批石封堆墓。每一座墓都有近似“楼船形”（椭圆形）石头堆积，墓内人骨架安葬在独木舟状木棺里。随葬品有狩猎用具、装饰品，包括耳坠、制作精美的各种骨垂饰以及马衔、马镫、马鞍上的骨镶饰等马具。

1957年，外贝加尔地区鄂嫩河北岸布杜兰村发现一批中世纪的石封堆墓，一共12座墓。可惜大部分遭到破坏。墓穴呈椭圆形，地表有石封堆，墓向沿河流方向——东北至西南向，死者仰身直肢。其中2号墓出土铁马镫属于蒙元时代（插图5-1）。相比之下，1965—1966年在鄂嫩河左岸钦丹特镇附近发现的一批中世纪石封堆墓保存较好，一共有14座墓。其中，独木棺墓4座（第4、6、10号墓）、木棺墓4座、石棺墓1座，其余5座皆无葬具。只有1号墓地4号墓保存较好，地表有圆形石封堆，直径3—3.2米，高0.25—0.30米。封堆下0.55—0.66米处是墓穴，内置长方形独木棺，长2.3米，西南端宽0.45米，棺内尺寸为0.35×0.45×1.65米。这座古墓和《草木子》说“元朝官（棺）裹，用椁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完全相符。死者仰身直肢，头向东北，人骨架左边是桦树皮箭囊和铁马镫，右边是马衔，西南是铁带扣和火镰。

钦丹特1号墓地6号墓遭到严重破坏，封堆直径大约4.5—5米，墓中埋有大型独木棺，用六个铁扒铜固定。墓中随葬金代带柄人物故事镜、提梁尖底锅、铁马镫、灰色陶器口沿残片和桦树皮制顾姑冠残片，后者残高7.5厘米（插图5-2）。<sup>[63]</sup>

钦丹特1号墓地11号墓也发现一面金代带柄人物铜镜，其形制和黑龙江阿城出土金代带柄人物故事镜相同。从这两面金代铜镜看，钦丹特1号墓地似不晚于公元13世纪。尽管11号墓使用木板棺，但是死者仰身直肢，头向北方，皆与独木棺葬俗相同（插图5-3）。

早在腾汲思海时代，蒙古人就开始用桦木板棺，所以这座墓亦为蒙古祖先遗迹。外贝加尔地区蒙元墓葬既有木板棺，亦有桦树皮葬具，但是两者从来不同时使用，凡以桦树皮为葬具的墓葬均无木板棺，反之亦然。除了古老的单片独木棺外，

表2 鄂嫩河流域中世纪蒙古族墓葬

地点	编号	封丘形式和尺寸	葬具	葬式	头向	随葬品	编号 为注 62的 页码
鄂嫩河流域 温杜贡湖墓 地, 赤塔市 西 120 公里 (13-14 世 纪)	无	椭圆形(原作 “楼船形”)石 封堆	单片式(原 作“独木舟 式”)独木棺			狩猎用具, 装饰品(耳坠、骨垂 饰)和马具(马衔、马镫、马鞍 上的骨镶饰)	87
鄂嫩河上流 钦丹特 I 号 墓地(12-13 世纪)	4	石封堆 3 × 3.2 米	单片式独木 棺, 上盖松 木板	扰乱	东北	桦树皮箭囊, 铁马衔, 铁带卡, 火镰, 铁马镫(带长方穿, 踏板 相当宽)	110
	6	5 × 4.5 米	双片式独 木棺	部分骨骼	东北	火烧痕迹, 铁扒钩 6 个, 羊骨 1 个, 铁带卡 1 件, 火石, 马镫, 金代带柄铜镜 1 面(柄被折断), 灰色陶片 1 面, 桦树皮顾姑冠残 迹(有缝纫痕迹, 放在下颞骨附 近), 尖底提梁铁锅	111, 156, 111, 156
	7	石封堆 4 × 4 米	木棺	仰身直肢	东北	桦树皮顾姑冠残迹(胸腔附近, 有缝纫痕迹), 圆柱形绿松石胸 针	
	10	石封堆 4.2 × 4.5 米	单片式独 木棺, 上盖 松木板	骨架扰乱	东北	火烧痕迹, 马具铁带卡和用途不 明的铁器残余物, 羊骨 1 件, 桦 树皮残迹, 铁马衔和铁环 1 件, 桦 树皮箭囊(内装两枚鍍木杆箭和 1 件用途不明的铁器残块)	111
	11	石封堆 高 0.3 米	木板棺, 上 盖石板	仰身 直肢	北	羊骨 1 件(封堆内石板上), 青铜 串珠 1 件, 青铜耳坠 1 件, 金代 带柄铜镜 1 面(柄被折断), 残木 梳 1 件, 木鞘小铁刀 1 套, 铁剪 刀 1 件, 圆柱形绿松石胸针 1 件, 木柄小铁斧 1 把, 铁锥头 1 把(原 文作铁箭头), 桦树皮顾姑冠 1 件(有镶边痕迹, 头部左面), 木 针盒 1 件, 小铁棍 2 件, 黄色丝 绸裹尸布 1 件	112
	12	石封堆 尺寸不详	双片式 独木棺	人骨残骸	不详	钉棺用铁扒钩, 其余盗掘一空	12-13

插图 6 鄂嫩河上游蒙元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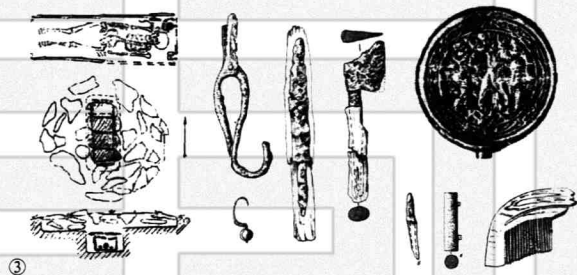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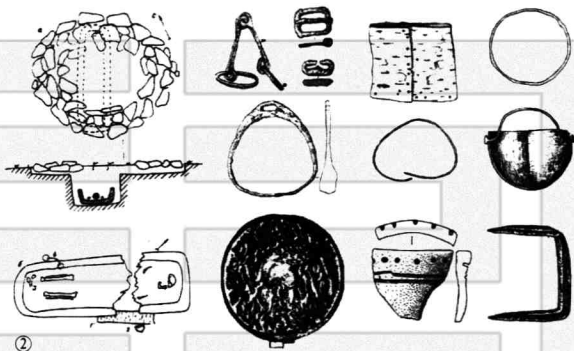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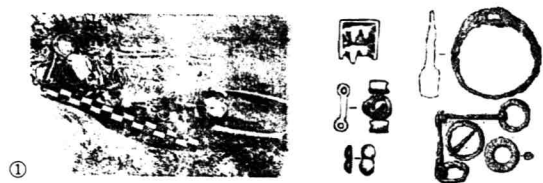


插图 7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朝皇后御容缂丝



鄂嫩河流行的蒙古人墓葬开始出现双片独木棺（参见表2），与《元史·祭祀志》所言蒙古皇族独木棺的形制更为接近。

我们对色楞格河至鄂嫩河上游的蒙古人墓葬的认识基于两个标准。其一，以独木棺为葬具；其二，随葬桦树皮顾姑冠。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朝皇后御容缣丝》，生动地再现了这种蒙古族妇女特有的头饰（插图7和彩版5）。<sup>[64]</sup>

俄国考古学家显然没意识到这些墓中有顾姑冠。他们在报告中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陶器放置在死者的头部，或者在颅骨左侧，或者在其右侧。在这些地方还有桦树皮器皿和木制器皿的残骸。在6座墓（干谷1号墓、布尔霍图伊1号墓、鄂嫩斯克II-5号墓、新谢利哈7号墓、库恩加15号墓、色楞格桥附近3号墓）中都发现了这类物品。”此外，在舒布贡墓地14号独木棺墓内头骨附近也发现桦树皮残迹。其实，这些头骨附近的桦树皮器皿就是顾姑冠遗迹。在内蒙古镶黄旗乌兰沟蒙古贵族墓中发现过桦树皮顾姑冠残片，这些残片呈弧形，内侧缝了一层薄绢，上有清晰的针眼。正如发掘者正确指出的，这些桦树皮残片可能是墓主人下葬时戴的顾姑冠。<sup>[65]</sup>

## 五 蒙古皇族阿难答陵墓的发现

1307年2月10日，元成宗暴病身亡。据《元史·秃剌传》记载，“秃剌，太祖次子察合台四世孙也，少以勇力闻。大德十一年（1307）春，成宗崩，左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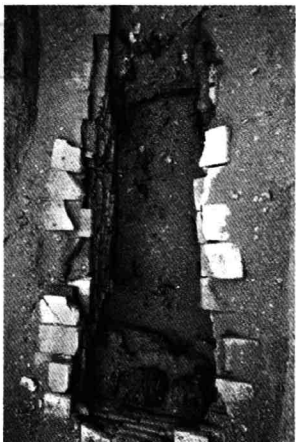


插图8  
河北沽源县元贵族大墓

阿忽台等潜谋立安西王阿难答，而推皇后伯岳吾氏称制，中外汹汹。仁宗归自怀孟，引秃剌入内，缚阿忽台等以出，诛之，大事遂定。武宗即位，第功，封越王，锡金印，以绍兴路为其分地。”如果安西王阿难答政变成功，登上皇帝宝座，中国必将全面伊斯兰化，那么中国以后的历史将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元成宗的两个侄子皆掌兵权。一个是海山汗，镇守阿尔泰山北部；另一个是爱育黎拔力八达，驻戍怀孟（今河南境内）。成宗死后，爱育黎拔力八达赶至大都，自称监国。他们迎立海山汗为帝，是为元武宗（1308—1311）。伯岳吾皇后卜鲁罕、阿难答和明里铁木儿等人和顺帝一样被簇拥到大都（今北京），刚称摄政，还没有当成皇帝，就双双被擒。后来，阿难答从大都押解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斩首。伯岳吾皇后在政变失败后，亦被处死。

2000年，河北考古工作者对涪源县所谓“萧太后梳妆楼”进行考古发掘，不料在楼内中央发现一座元代贵族墓（插图8），“墓内分为左中右三室，中室是一男性尸骨，棺木奇特，在一段完整红松木上挖出一道凹槽，死者恰置其中。左右两室为两具女性尸骨，专家认为生前是男性死者的妻和妾。三个棺材中均出土珍贵衣物，如具有元代蒙古服饰特色的质孙服和织金锦等，在男性棺木中出有龙纹鎏金银带饰，证实其主人生前为元代蒙古贵族”。<sup>[66]</sup>涪源蒙元大墓附近还发现一块汉白玉石碑，刻有阔里吉思的字样。有学者认为此人就是墓主人。阔里吉思是汪古部之主，娶忽必烈之女为妻，封为赵王云云。然而，汪古部属于突厥系民族，信仰景教，不太可能葬在涪源并采用蒙古葬俗。

据我们考证，这座与众不同的古墓实际上是元朝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阿难答之墓。他在上都被斩首之后，按照穆斯林礼仪，葬在元上都附近察罕脑儿阿难答行宫。我们认定这座古墓属于阿难答有两个重要证据：其一，木棺采用蒙古皇族才能使用的独木棺；其二，墓上地面建筑采用伊斯兰风格的建筑——拱北（上圆下方的西亚建筑）。阿难答的父亲是忙哥歹，一般作“蒙哥刺”，封为安西王。安西王在今天河北涪源的“察罕脑儿”有封地。<sup>[67]</sup>由于察罕脑儿是安西王蒙哥刺在上都附近的封地，所以阿难答死后安葬在这里。

关于阿难答的宗教信仰，《多桑蒙古史》卷上说：“阿难答幼受一回教徒之抚养，信之颇笃，因传布回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阿难答熟知《可兰经》，善写阿刺壁文字。其臣某诉之于皇帝铁木儿，言宗王阿难答终日在礼拜寺中诵《可兰经》，命蒙古儿童行割礼，宣回教于军中。铁木



儿遣使者二人往说其皈依佛教，阿难答不从。帝召之至，面谕之，亦无效，乃拘禁之。其后未久，太后阔阔真以为阿难答在唐兀之地颇得人心，辄之恐致民怨，言于帝，释之还镇。”<sup>[68]</sup>阿难答死后，其子纠集伊斯兰教徒反叛，皆被元朝政府派兵镇压。他们最后躲避到偏僻闭塞的东乡地区，与当地汉族、藏族等共同生活，互为婚娅，最终融合成为以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为主体的东乡族。

据《元史·祭祀志》，蒙古皇族以独木棺为葬具，“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剝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明人叶子奇也说：“元朝官（棺）裹，用椁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显然，萧太后梳妆楼内的独木棺就是史书中说的蒙古皇族葬具，而蒙古皇族中信仰伊斯兰教者只有阿难答一人。<sup>[69]</sup>

北京大学地理系王北辰教授最先注意到，萧太后的梳妆楼实际上为伊斯兰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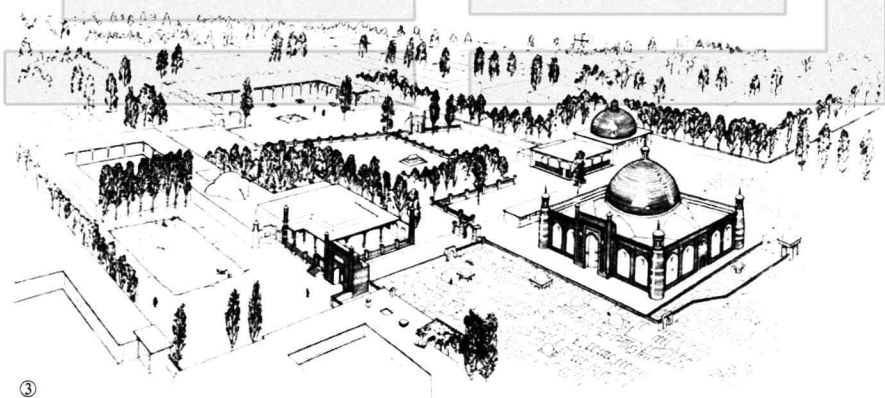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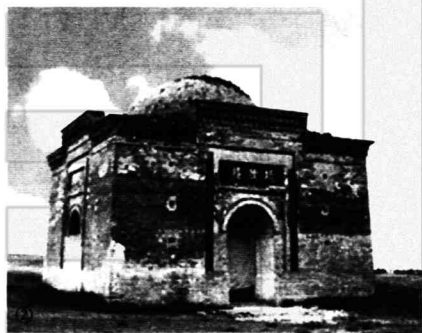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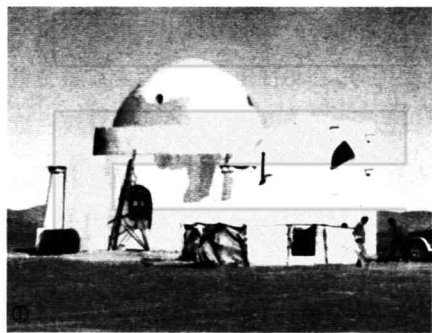


插图9 中国境内伊斯兰建筑

(插图 9-2)。<sup>[70]</sup> 这种上圆下方的拱北式建筑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 2 世纪的帕提亚王宫就采用这种形式。萨珊波斯王宫仍采用上圆下方的建筑形式。例如：萨珊波斯王朝的萨尔维斯坦 (Sarvestan) 王宫遗址。伊斯兰文化在建筑形式上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清真寺往往采用这种建筑形式。20 世纪初，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等人在元代亦集乃路的治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一座 14 世纪的拱北式伊斯兰建筑(插图 9-1)以及波斯文残碑，建筑形式与阿难答墓上建筑一脉相承。从新疆喀什香妃墓所在伊斯兰建筑群看(插图 9-3)，阿难答墓只是穆斯林陵园中一个地面建筑。阿难答死于至大元年(1308)，其墓上拱北建筑很可能是中国境内目前所见最早的伊斯兰建筑。

## 六 蒙古贵族墓与成吉思汗陵

蒙元时代，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他们从欧亚各国掠夺了无数珍宝，逐渐使蒙古人成为世界首富。尽管如此，蒙古皇族仍念念不忘“国俗旧礼”。这一点在蒙古皇族的丧葬制度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蒙古皇族仍在使用的额尔古纳河山林时代的独木棺葬具。

1959年，苏联考古学家在外贝加尔地区黑尔黑尔河畔移相哥城郊外熬卡什卡山发现一处蒙古贵族墓地。移相哥是成吉思汗二弟合撒儿之子，移相哥城郊外的蒙古贵族墓地被认为属于移相哥家族。这个墓地自北而南，排列了四座大墓。其中 1—3 号墓早就被盗掘一空，墓中劫后之余尚有丝绸残片、漆器、象牙雕刻，看来三位墓主人的身份都是蒙古贵族，很可能是移相哥的近亲。值得庆幸的是，4 号墓完整地保存下来。木棺上缚有铁圈，随葬品包括带骨制马镫的马鞍，带铁嚼子的马勒，装箭的桦树皮箭囊。墓主人是一个 6 岁小男孩，头戴绸缎帽，身穿绸布衣、衬裤和缎子里皮袄，脚穿皮靴。皮袄上系着一个内装银牌、火镰、火绒的小袋。他的右胸上有一个带喇嘛教梵文符号的银杯。<sup>[71]</sup> 叶子奇《草木子》说黄金家族成员的独木棺外面“以黄金为圈，三圈乃定”，移相哥家族的木棺外面用铁圈固定，属于蒙古“国俗旧礼”，只是级别比黄金家族成员以黄金为圈的独木棺略低。

为使本文不致遗漏过多，我们还应提到内蒙古镶黄旗乌兰沟和兴和县发现的两座元代蒙古人墓葬。兴和元墓为竖穴土坑，地表无封土，以木板棺为葬具。出土遗

物有浓郁的蒙古文化特征，无疑属于蒙古人墓葬（插图10）。乌兰沟元代贵族墓规格较高，身着丝绸衣，头戴“顾姑冠”，随葬制作精美的鍍金银马鞍、金杯、金手镯、金耳坠、元代铜镜和瓷器等。<sup>[72]</sup>

成吉思汗以来，历代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死后全要归葬故土，《元史》称作“起辇谷”。尽管《元史》没说蒙哥汗和元朝末代皇帝元惠宗是否也葬在起辇谷，但是《史集》提到蒙哥汗葬在成吉思汗和拖雷的陵墓旁。元朝末帝元惠宗1370年死在应昌（今内蒙古赤峰），《元史·顺帝本纪》说：“帝（指元惠帝）因痢疾殁于应昌，寿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故知蒙哥汗和元惠宗也葬在起辇谷。换言之，蒙古四大汗（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和元朝十帝（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尔、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明宗阿速吉八、文宗图帖睦尔、宁宗懿璘质班和惠宗妥欢帖睦尔）无一例外，全部归葬漠北起辇谷。

关于起辇谷的位置，研究者有三种不同解释。《黑鞑事略》提到成吉思汗陵在克鲁伦河之侧，所以俄国学者鲍乃迪、清末名儒沈增植、日本学者箭内互和驹井义明等都将起辇谷的“谷”解释为河谷，以为是怯绿涟河谷（今克鲁伦河）的别译。法国学者伯希和另辟新说，认为“起辇谷”一词来自汉语，指山谷而言，该地名意为“乘辇起程的山谷”。为了自圆其说，甚至提出“起辇谷只是忽必烈及其后裔的陵墓，而中国史书却把它说成是成吉思汗和拖雷的墓地，从而犯了一个永恒的错误”。<sup>[7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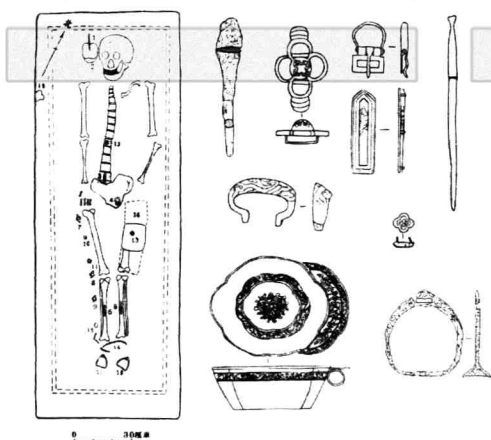


插图10 内蒙古草原兴和元墓

内蒙古大学教授亦邻真先生力排众议，首次提出起辇谷源于蒙语，相当于《蒙古秘史》所说蒙古祖先发迹之地“古连勒古”，蒙古语原文可拟作 Koiralko 或 K relg 。他还根据蒙古学者佩尔列对《蒙古秘史》的地理考证，进而指出起辇谷在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 (Tsenkhormondal) 一带。<sup>[74]</sup> 关于古连勒古的位置，蒙古学者佩尔列说“古连勒古……东经 109 度，北纬 48 度。《秘史》有一处提到这个地方在不儿合罕勒敦之阳，又三次提到桑沽儿河在古连勒古之中。现在学界公认桑沽儿就是今天的曾克儿河。可见古连勒古在不儿合罕勒敦之南（阳），桑沽儿河源在古连勒古。古连勒古当是指曾克尔河上游的一片相当大的地段，曾克尔河发源于波罗胡尔嘎温泉以西的山中”。<sup>[75]</sup>

佩尔列界定的古连勒古地区尚未发现蒙元时代的重要古迹，但是在古连勒古之北约 110 公里的岱盛山 (Daichin) 有个重要遗迹。1926 年，俄国学者康德拉提耶夫 (S. Kondratiev) 在岱盛山顶发现一座圆形石围墙遗址。这个地方在今肯特省巴特希雷特镇 (Batshireet) 附近鄂嫩河上游山林中，地处肯特山南麓支脉宾代尔山北麓 (插图 11)。

岱盛山风景秀丽，峰峦叠翠，今属大肯特山自然保护区。石围墙遗址一面依山，另外三面由红色石墙环绕，俗称施舍者墙 (蒙语 Ogloch Kerem)、成吉思汗墙或红石岩。石墙高度不一，一般高约 2.7 - 3.6 米，绵延 3.2 公里。康德拉提耶夫以为元代 (13 - 14 世纪) 古城，奇怪的是，石围墙内地表不见任何遗迹。<sup>[76]</sup>

20 世纪 60 年代初，蒙古考古学家佩尔列来此调查，根据这里的陶器残片，以

插图 11  
岱盛山蒙古祖先墓地



为是辽代（10—12世纪）古城。<sup>[77]</sup> 1992年，加藤真二、三宅俊彦等日本学者为寻找成吉思汗陵来这里调查，但是工作重点放在鄂嫩河中游的匈奴墓地，只在宾代尔镇附近鄂嫩河与巴彦河交汇地之南24公里包尔布拉格匈奴墓地附近调查了9座蒙元墓葬，但是他们没有对岱盛山石围墙作深入调查。<sup>[78]</sup>

近年美国——蒙古成吉思汗陵联合考古队对这个遗址发生浓厚兴趣，他们从美国带来先进的探地雷达，据说可探测地下11米。借助于这套探测仪，他们在石围墙范围内探测出六十余座墓。大约20座墓分布在陵区上方高地上，其间有一条通道通往这片高地，陵区下方地势较低的地方探测到40座规格较低的墓。墓室呈长方形，用石块砌筑。上述60座墓中，至少三十余座完好无损。从地表散落的陶器碎片看，墓地的建立至少要追溯到成吉思汗诞生时期。美国人相信这个地方就是成吉思汗陵园所在地，也即蒙元时代著名的“大禁地”。他们对其中一处祭祀遗址进行发掘，在石板砌筑的遗址下发现弯曲通道，大部分弯向西方。从中挖出一个1米宽、1.5米长的石雕狼头以及一个20岁少女的头骨。在一大堆肢骨和臂骨的下面，还挖出一个用朱砂染红的石头。据《蒙古秘史》，蒙古人的始祖是“苍狼”和“白鹿”，所有蒙古人都是他们繁衍生殖的后代。看来，此处遗址可能是蒙元统治者祭祖之地。在距石围墙50公里处，考察队还发现另一处蒙元墓地。据说这个墓地可能埋葬着八百多名为成吉思汗送葬而被杀人灭口的蒙古士兵。<sup>[79]</sup>

岱盛山遗址建有石砌围墙，这是辽代以来北方游牧人墓地共有的特点。例如：近年在内蒙古发现的耶律羽之墓就有类似的围墙。这类围墙亦见于弘吉刺墓地。弘吉刺部与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后，弘吉刺部原来的牧地（额尔古纳河一带）封给了成吉思汗的兄弟拙赤合撒儿，而弘吉刺部的首领按陈那颜分封至答儿脑儿（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达赉诺尔湖）为中心的漠南地区，大致在今天内蒙古东部草原以及河北北境部分地区。元初弘吉刺部首领封为鲁王，封地划归应昌路。据调查，鲁王城（今克什克腾旗达尔罕乡达赉诺尔湖西岸）东北2公里的一座小山脚下有一处弘吉刺部墓地。这个墓地周围也发现石砌围墙。<sup>[80]</sup> 蒙古人以游牧为生，他们在墓地周围建石砌围墙的目的，是要防范牲畜踏踏墓地。另一方面，蒙元时代蒙古葬俗有相当大的改变，采用秘葬，地表不留封土堆。“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黑鞑事略》）；其棺槨“送至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草木子》）；“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次埋之，其有剩土，则远置

他所”。<sup>[81]</sup> 岱盛山石围墙内地表无封土，这些古墓完全可能属于蒙元时代。

然而，蒙古学者佩尔列界定的古连勒古位于北纬48度和东经109度，岱盛山位于北纬48度24.857分和东经110度11.588分。尽管纬度大致相同，但是两者经度却相差2度。岱盛山位于克鲁伦河、曾克尔河与鄂嫩河之间，<sup>[82]</sup> 南距佩尔列界定的“古连勒古”大约110公里。如果佩尔列的说法是正确的，美国人调查的“成吉思汗陵”也许只是成吉思汗祖先的墓地，而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子孙墓地则在岱盛山之南110公里处（彩版1）。

亦邻真首揭“起辇谷”之名来自蒙古语“古连勒古”，但是他没有深究这个地名的词源。法国学者格鲁塞讨论了“古连勒古”的词源。他在《蒙古帝国史》一书中写道：“古连勒古（gurelgu）从词源说，指一种“大蛇”。而只鲁格（djirüge）此言“心”（海涅士，《Wörterb.》，53和91）。原文说：“他们寻找新驻帐地方于古连勒古山里面，这座山是位于不儿罕山前，在阔阔淖儿，小山合刺只鲁格之上，桑沽儿河的沿岸”（G..B.译本），换一句话说，他们的驻帐地是靠近阔阔淖儿，这个地方，在合刺只鲁格山，位于桑沽儿河岸。“哈刺只鲁格（Qara-djirugen，逐字译为“黑心”），所以就是一座在古连勒古山地区（“大蛇山”）的小山，这座山矗立于不儿罕山前。所有这些地点无可考。只有说到不儿罕山使我们联想这山在三河之源，在现今肯特山区。<sup>[83]</sup>”格鲁塞对古连勒古词源的讨论相当重要。如果这个解释不误，“古连勒古”意为“蛇山”或“大蛇山”。随着蒙古中世纪考古的深入，我们相信揭开成吉思汗与蒙元帝陵之谜的时间将为期不远。

（原载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2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 注释:

[1] 傅海波、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82-398页。

[2] 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0页。

[3]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源》，《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4-582页（原刊《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第1-23页）。

[4] 此说最早为沈曾植(1850-1922)倡导，参见沈曾植：《鲜卑语与蒙古语》，收入《海日楼札丛》卷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伯希和后来从语言学角度作了更为翔实的考证，参见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第79页（原文见P. Pelliot, "Tokharien et koutcheen," JA 224, 1934, pp.23-106）。

[5] 《魏书·失韦传》说失韦“去洛六千里”；《新唐书·北狄传》说室韦“直长安东北七千里”。

[6] 《隋书·北狄传》。

[7] 《旧唐书·北狄传》。

[8] 《新唐书·北狄传》说室韦“分部凡二十余”。

[9] 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6-157页。不过，作者认为九姓鞑靼的后裔北阻卜即克烈部，不一定正确。克烈部是信仰景教的突厥人，据《金史·完颜安国传》记载，克烈部首领王罕曾帮助金军围剿北阻卜，这

两个部落很可能不属于同一民族。

[10]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1-222页。本文所引突厥碑铭均据此书，恕不一一出注。

[11] 拉施特，前揭书，第251页。

[12] 拉施特，前揭书，第127-128页。

[13] 关于这个词的讨论，详见芮传明，前揭书，第244-245页。

[14] A. von Gabain, *Altü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4, p.23, 354; 陈宗振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80-81页。

[15] 突厥语参见A. von Gabain, *Altü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4, pp.354-355; 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593 and p.603; 蒙古语参见拉施特，前揭书，第128页。

[16] 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白鸟库吉把地豆于人和契丹北方的靺鞨人相联系，不一定正确。

[17] 刘迎胜：《辽与漠北诸部》，《欧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0-216页。

[18] 《资治通鉴》卷213胡三省注：“‘长史’恐当作‘长吏’。”其说不尽然。《太平广记》卷250《诙谐六·侍御史》说：“突



厥号御史为吐屯”，故知此长史当作“御史”。

〔19〕《旧唐书·北狄传》。

〔20〕《宋史·高昌传》所引王延德《西州使程记》。方括号内的文字为《宋史》所无，王国维据南宋王明清《挥麈录》的录文补入，参见王国维：《王延德使高昌记》，《古行记校录》。

〔21〕王尧：《敦煌吐蕃文献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62-163页。原译文把地豆于译为“奚”，把“黑于厥里”译作“哈喇毗伽尔”，本文引用时予以订正。

〔22〕阿拉腾奥其尔：《突厥语和蒙古语“马”、“牛”名称研究》，李祥瑞、牛汝极主编：《阿尔泰学论丛》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5页、第60-62页。

〔23〕《北史·蠕蠕传》。

〔24〕刘迎胜：《蒙古的兴起与西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4页。

〔25〕其名亦见《旧唐书·北狄传》。

〔26〕陈宗振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74-375页。

〔27〕据张久和博士研究，蒙兀人分布范围“北界黑龙江上游，东抵额木尔山，西邻大室韦，南至大兴安岭山脉北端”。参见张久和，前揭书，第78页。

〔28〕韩儒林先生早就注意到蒙兀室韦似为大室韦的分部，说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页。

〔29〕阿谢耶夫、基里洛夫、科维切夫著、王德厚、高秀云译：《中世纪时代外贝加尔的游牧民族》，收入《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1996年，第86页和第145页。

〔30〕阿谢耶夫等，前揭书，第72-73页。

〔31〕叶子奇：《草木子》卷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页。

〔32〕劭国田：《辽代木器小议》，《内蒙古文物与考古》2001年第2期，第15-21页。

〔33〕关于室韦葬俗，参见《北史·室韦传》和两唐书《北狄传》。

〔34〕阿谢耶夫等，前揭书，第72-73页。

〔35〕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36〕余大钧，前揭书，第4页。

〔37〕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2页。

〔38〕《续资治通鉴纲目》卷14宋绍兴十七年。法国东方学家格鲁塞根据这条史料，认为熬罗孛极烈即拉施特《史集》记载的合不勒汗。参见格鲁塞著、龚铨译：《蒙古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4-36页。

〔39〕白颈松：《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第144-151页。

〔40〕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陈巴尔虎西乌珠尔古墓葬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与考古》1997年第2期，第75-79页。

[41] 赵越:《论呼伦贝尔发现的室韦遗迹》,《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598-600页;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9页;盖山林:《蒙古族文物与考古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419-421页。

[42] 拉施特,前揭书,第252-253页。

[43] 亦邻真,前揭文,第572-573页。

[44] 参见《辽代·地理志序》和《辽史·萧韩家奴传》。

[45] 参见《契丹国志》卷26、《五代史记·四夷附录·奚传》、《辽史·地理志》和《辽史·百官志》。

[46] 《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史愿《亡辽录》。

[47] 《辽史·萧韩家奴传》。

[48] 《辽史·地理志》记载:“静边城,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邻羽厥,北入为寇。建城,置兵千余骑防之,东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下文又载:“泰州德昌军,节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

[49]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孙秀仁:《黑龙江历史考古述论(上)》,《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景爱:《关于呼伦贝尔古边壕的时代》,《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50] 《辽史·太宗本纪》。

[51] 这个写本的汉文翻译,参见刘迎胜:《九-十二世纪民族迁徙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90

年12-13期,第81页。除乞亚、比千、萨利和亚美尼亚等族名外,其它族名皆从刘译。

[52] 刘迎胜,前揭文,第80-106页。

[53] H.W. Bailey, "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sou," *AM*, 1949, pp.91-92.

[54] 鲍培(N. Poppe)著、黄建华、曜堂译:《阿尔泰语和乌拉尔语复数语尾研究》,收入李祥瑞、牛汝极:《阿尔泰学论丛》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5-142页。

[55] Juhan Janhunen, "The Horse in East Asia: Reviewing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in Victor H. Mair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1,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1998, p.417.

[56] 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p.317.

[57] 拉施特,前揭书,第250-252页。

[58] Mahmud al-Kashgh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ed. and trans. by Robert Dankoff, in collaboration with James Kelly), vol.1, Harvard, 1982, pp.82-83. 除比千和乞亚外,译名据刘迎胜,前揭文,第212-213页。

[59]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Tahir Marvazi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London, 1942, p.96.

[60] 《辽史·地理志》。

[61] 佩尔列著、陈弘法译:《蒙古人民

共和国境内的契丹古城古村遗址》，《文物考古参考数据》1979年第1期，第16-17页。

[62] 阿谢耶夫、基里洛夫、科维切夫著、王德厚、高秀云译：《中世纪时代外贝加尔的游牧民族》，收入《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1996年，第87-93页。

[63] 类似的铁锅和马镫亦见于内蒙古包头元代窖藏，参见张海斌：《石拐窖藏铜铁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第124-128页。

[64] James C. Watt and Anne 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7, p.140.

[65] 苏俊、安丽：《镶黄旗乌兰沟出土一批蒙元时期金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605-609页。

[66] 李俊义、赵永春：《萧太后“梳妆楼”的真实主人》，参见央视《国家地理》电子版 07.02 09:13(<http://www.cctv.com/geography/news/20020702/4.html>)。

[67] 《元史·顺帝纪》记载：“察罕脑儿之地，在世祖时隶忙哥歹太子四千户”。

[68] 此据波斯史家拉施德《史集·铁木耳本纪》。

[69] 温玉成：《元安西王与宗教》，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第95-97页。

[70] 王北辰：《河北省沽源县古建筑梳妆楼研究》，见《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421-

436页。

[71] 吉谢列夫：《外贝加尔地区黑尔黑尔河畔的蒙古移相哥城堡》，见《苏联考古学》1961年第4期。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盖山林：《蒙古族文物与考古研究》，沈阳，辽宁出版社，1999年，第421页。

[72] 苏俊、安丽：《镶黄旗乌兰沟出土一批蒙元时期金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605-609页。夏荷秀、赵丰：《镶黄旗哈沙图古墓出土的丝织物》，见《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6-7期合刊。

[73] P. Pelliot, *Note on Marco Polo*, vol.1, Paris, 1963, p.349.

[74] 亦邻真：《起辇谷与古连勒古》，原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第89-91页，收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7-753页。

[75] 佩尔列：《〈秘史〉某些地名的考辨》，乌兰巴托，第8页(新蒙文，转引自亦邻真，前揭文，第752页)。

[76] J. Bolortuya, "Historical Wonders of Khentii Aimag," An online manuscript of *Virtual Mongolia* (<http://ubpost.mongolnews.mn/virtualmongolia/mongoliatraveler/khentii.html>).

[77] 佩尔列著、陈弘法译：《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契丹古城古村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文物考古参考数据》1979年第1期，第20页。

[78] 三宅俊彦、加藤真二：《关于蒙古国鄂嫩河中游地区的匈奴墓地调查》，《内蒙

古文物考古》1996年第1-2期合刊,第140-145页。

[79] 参见“More Chinggis Puzzle Pieces Uncovered,” Issue of August 14, 2001 of *The Mongol Messenger* ([http://www.samarmagictours.com/en\\_expeditiontomb.html](http://www.samarmagictours.com/en_expeditiontomb.html)); 任毓骏:《美国考古队缘何停止探寻成吉思汗》, 人民网华盛顿8月24日电 ([http://news.163.com/editor/020825/020825\\_504081.html](http://news.163.com/editor/020825/020825_504081.html))。

[80] 刘志一:《元应昌路遗址》,《内蒙

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3期,第117页。

[81] 《元史·祭祀志》。

[82] J. Bolortuya, “Historical Wonders of Khentii Aimag,” An online manuscript of *Virtual Mongolia* (<http://ubpost.mongolnews.mn/virtualmongolia/mongoliatraveler/khentii.html>).

[83] 格鲁塞著、龚铎译:《蒙古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41页。

## 第七章

## 《元经世大典图》考

## 序说

## 一 失而复得的西域古地图

《元经世大典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西域地图之一，亦称《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或《元经世大典地理图》（以下简称《大典图》）。此图最早刊于元至顺二年（1331）虞集等人编《经世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下。明初宋濂等人编修《元史·地理志》时，只抄录了图中文字部分，名为《西北地附录》，地图本身则作为《经世大典》附图编入《永乐大典》（彩版2）。此后，原书单行本不复流传。

嘉靖年间，《永乐大典》重录过一个副本，收藏在北京皇史宬。南京文渊阁所藏正本，在明代中期毁于大火。不过，近年有学者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随葬在嘉靖皇帝永陵玄宫。<sup>[1]</sup>另一方面，皇史宬藏副本亦逐渐散佚，尤其是八国联军进京时（1900），该书大部分毁于战火。《经世大典》亦随《永乐大典》正、副两本的焚毁和散佚而失传，原书不可复得，仅个别卷帙，散见于《永乐大典》残本。

1841年，清儒张穆（1805—1849）利用在国史馆工作的机会，从《永乐大典》残本抄绘出《大典图》，这幅珍贵的古地图由此失而复得。张穆，字石州，号斋，祖籍平定上城，六艺百家、训诂史策，无书不读，尤以撰写《蒙古游牧记》而闻名。除《大典图》外，张穆还从《永乐大典》残本抄出《元朝秘史》和《长春真人西游记》诸书，后来刊于他与杨文校主编的《连筠簃丛书》之中。<sup>[2]</sup>

《大典图》所叙西域地理，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大同小异，故张穆将其定名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精通蒙元史地的一代宗师，并未深究此图，而是信手转赠给好友魏源（字默深）。张穆在《殷斋签记》

写道：“俄罗斯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阿罗斯。潜邱亦未考得也。穆于辛丑（1841）七月，从《永乐大典》画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以贻魏君默深，刻入所辑《海国图志》中。”（插图 1）

由张穆摹绘、魏源稍作修改的《大典图》，起初刊于道光甲辰年（1844）版《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活字版第二卷。道光丁未年（1847）版《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仍有此图，版式纵 20.1 厘米，横 32.2 厘米。自西而东，叙述西域地理。关于此图来源，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元代疆域图叙》说：“又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并附其后。”<sup>[3]</sup> 该书六十卷本说：此图“得自《永乐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未附《西北地名》二页”。<sup>[4]</sup>

《大典图》本注“不赛因所封地”下文，有“即驸马赛马尔罕之祖”数字。这位驸马爷就是明初声震西域的撒马尔罕国大汗帖木儿（Timur, 1336 - 1405）。正如洪钧指出的，这行文字本非原图所有，殆为明初编入《永乐大典》时增添的。魏源也对《大典图》作过修改，据称“去其三横画，而加葱岭斜亘之画，绕络其间。且增天竺、土伯特、于阗、沙州四名于其东南，以醒阅者目”。<sup>[5]</sup> 魏源说的“去其三横画”表示什么含义，迄今无解。不过另一处修改“葱岭斜亘之画”，从刻本尚可以看出，就是指图中表示葱岭的南北方向的那条长虚线，而虚线两侧所标“葱岭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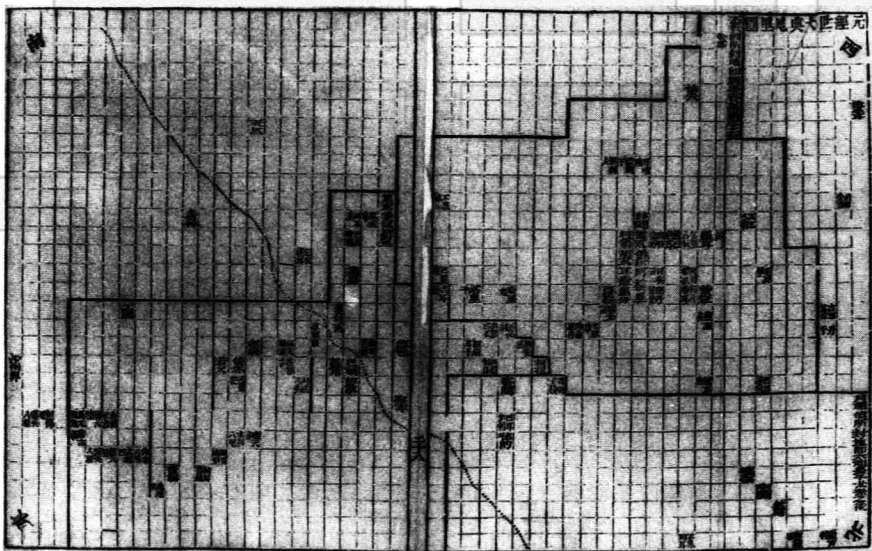


插图 1 《元经世大典图》刻本

和“葱岭西”六字，当系魏源增添的文字。如果加上“天竺、土伯特、于阗、沙州”四个地名，魏源在张穆摹本上至少增添了十五个字。<sup>[6]</sup>清儒对葱岭的知识十分有限，因此，魏源把葱岭的范围画得过大。<sup>[7]</sup>此外，魏源只提到该图得自《永乐大典》，但是从未说明摹绘者究竟是谁。

洪钧终于揭穿了这个秘密，他说“魏氏是图，即张穆所贻”，并批评他随意在古地图上添加地名。所增地名“于阗”，《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忽炭”，而《大典图》本有这个地名，写作“忽炭”。魏源此举可谓画蛇添足。<sup>[8]</sup>由于受到洪钧的强烈批评，魏源只好自绘一幅《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编入道光壬子年（1852）版《海国图志》百卷本，用来替代《大典图》作为元代历史地理沿革图。魏源不仅在百卷本删去此图，而且试图删去所有相关文字。由于删除工作不彻底，目前流行的百卷本《海国图志》仍可见到《大典图》的痕迹。<sup>[9]</sup>

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感谢魏源。正由于《海国图志》的旧版两次刊刻这幅古地图，我们能够看到这幅展示察合台汗国（笃来帖木儿所封地）、伊儿汗国（不赛因所封地）和钦察汗国（月祖伯所封地）元代西域三大汗国的元代地图。<sup>[10]</sup>

1901年，俄国学者布莱脱胥乃德(Emile V. Bretschneider)首次将《大典图》介绍到西方。<sup>[11]</sup>洪钧著《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主要基于布氏的研究。<sup>[12]</sup>洪钧的研究在北京发表后，李文田、徐松、沈曾植、屠奇、丁谦等清末名儒，立即投入对《大典图》的研究，<sup>[13]</sup>晚清的西北史地之学由此勃然兴起。

中国学者对《大典图》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诸如丁谦、王庸、冯承钧、朱杰勤、胡逢祥、刘迎胜、曹婉如、纽钟勋等众多近现代学人，纷纷撰文参与讨论。<sup>[14]</sup>另一方面，《大典图》的问世，在国际学术界亦产生巨大反响，俄国学者布莱脱胥乃德、日本学者青山定雄、森鹿三、松田寿男、英国学者李约瑟纷纷著书立说，探讨《大典图》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sup>[15]</sup>

## 二 扑朔迷离的地图方向

《大典图》与众不同的制图方式，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广泛兴趣，一致认为是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1887年，沈曾植率先提出《大典图》受到穆斯林地理学的影响。他在《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书后》一文指出：“元代地图多出西域……《大



典》之图，北不及海都所封，东尽沙洲，西北月祖伯封地（钦察汗国）阔略，而独详于回回故地笃来帖木儿、不赛因二人所封（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其必为回回人所绘无疑也。”〔16〕

元代虞集等编纂《经世大典》前夕，元文宗曾派使团出访蒙古三大汗国。史载至顺元年（1330）三月“癸亥，遣诸王桑哥班、撒忒迷失、买哥分使西北诸王燕只吉台、不赛因、月即别等所”。至顺二年八月，“西域诸王答儿麻[失里]袭朵列帖木儿（即《大典图》的“笃来帖木儿”）之位，遣诸王孛儿只吉台等来朝贡。”〔17〕由此可见，直到14世纪初，元朝与蒙古其他汗国仍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大典图》将蒙古三大汗国标作“笃来帖木儿所封地”（察合台汗国）、“不赛因所封地”（伊儿汗国）和“月祖伯所封地”（钦察汗国），说明元朝以宗主国自居，而其他蒙古汗国被视为其藩属国。所以洪钧认为，“《元史》之西北地、《经世大典》之地图，必系此次行人驰驱咨度，登进朝端。元代三蕃史录存梗概，赖有此耳。”〔18〕

沈曾植注意到《大典图》绘制方法相当特殊，不是正南北方向，而是采用45度斜角方向。他认为，这是因为西域回回人制图法与中国传统方法不同之故，原本可能与清初西方来华教士协助绘制的《皇舆全图》相似，绘有南北向“天度斜线”。传入中原后，“摹者不解其意，留直而去斜，不解南北易向之由，仍存其四隅之旧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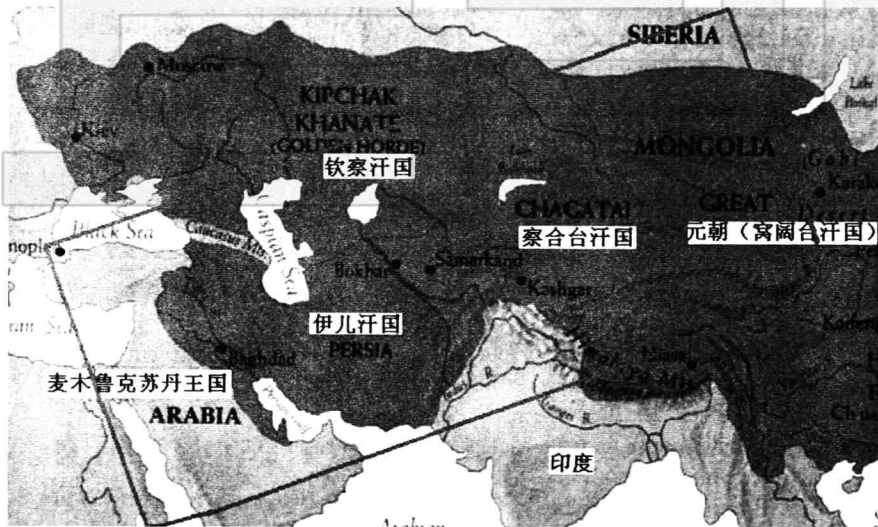


插图2 《大典图》所述地理范围

据直格以观斜线之向，又不能得斜线之中线果在何方，则其回易迷索，端绪不可寻，固所宜矣”。<sup>[19]</sup> 1986年，胡逢详旧事重提，亦主张“《大典图》底本源出西域的回回人”并提出此图“可能为至元（1341—1368）中修《大元大一统志》时伊儿汗国所进《回回图子》，只是收入《经世大典》时稍加修饰润色罢了”。<sup>[20]</sup>

我们的看法与上述学者不同，《大典图》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受阿拉伯地图的影响，但图向显然与西方地图“天度斜线”无关。《大典图》旨在介绍元朝与阿拉伯世界的交通，如果采用正南北方向，这张图就得画得非常大，包括许多无关区域。如果采用45度斜角方向，则可大大节省空间，一张小图足以表示中国与阿拉伯之间全部交通路线（插图2）。我们认为，这才是《大典图》采用45度斜角方向的真正原因。

## 《元经世大典图》与《元史·西北地附录》校勘记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对原图网格线做了编号，30条横线从0编至30，52条纵线从0编至52。编号原则先纵后横。例如：迷思尔（6-1）表示，“迷思尔”位于横线第6行、纵线第1行。叙图次序按照原图，自南而北，自西而东。凡是《大典图》中出现的地名，皆用符号●表示。此外，《西北地附录》尚有一些地名，不见于《大典图》，本文用符号▲表示。

### 一 蒙古宗藩以西地区

《大典图》所记蒙古宗藩以西为叙利亚和埃及，当时在麦木鲁克苏丹王国（Mamluk Sultanate, 1250—1517）统治之下。元史称“米西儿”，其名来自该王国首府名称 Misr（今埃及开罗）。所谓“麦木鲁克人”指各族奴隶出身的军人。麦木鲁克王朝苏丹，既有父子相承者，亦有军人篡权者，军人皆为奴隶出身，先入禁军，后为将军，最终得以擅朝政。这种事在中世纪阿拉伯各国普遍发生。1517年1月，奥斯曼帝国军队南下开罗，屠杀城内所有麦木鲁克俘虏，末代君主突曼贝苏丹亦死于战火，麦木鲁克王朝一朝覆亡。不知道为什么，《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没有《大典图》提到的两个麦木鲁克王国地名。

● 迷思尔(6-1)：《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麦木鲁克苏丹王国 (Mamluk Sultanate, 1250 – 1517) 首府名称，来自阿拉伯语 Misr。《诸蕃志》作“密徐篱”，刘郁《西使记》作“密乞儿”，《元史·顺帝本纪》作“米西儿”，《明史·西域传》作“米昔儿”。《西域土地人物略》记载：“天方国西行十五程，为迷即力城 (Misr)：<sup>[21]</sup>有缠头回回，种田。”故址在今埃及首都开罗城。

● 的迷失吉(11-2)：《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Damascus) 的别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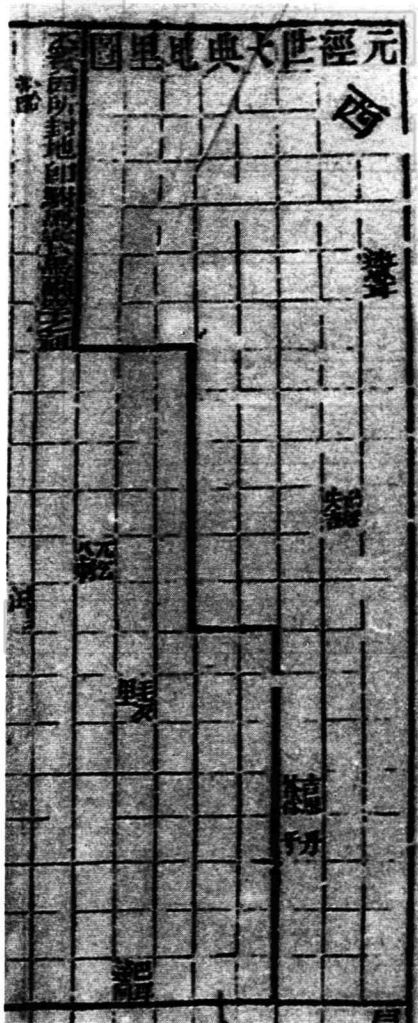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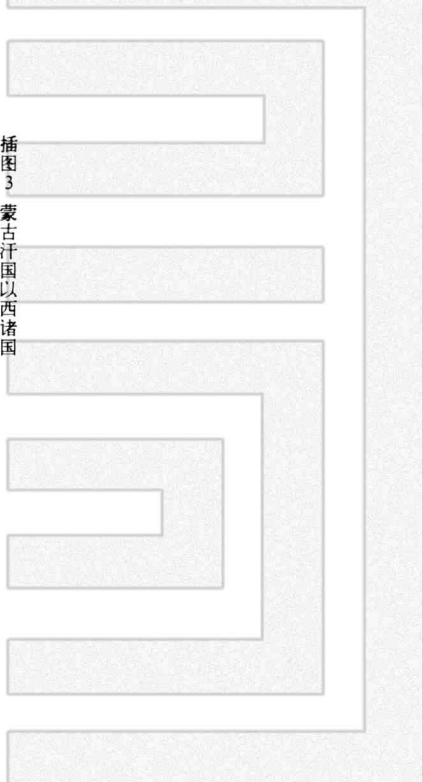


插图 3  
蒙古汗国以西诸国



● 吉思答你(17-3)：《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乔治亚共和国基斯塔纳伊(Kistannai)。

● 丹牙(18-3)：《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今地不详。

## 二 钦察汗国（月祖伯所封地）

钦察汗国(Qibcaq, 1243 – 1502)，为成吉思汗长子封地，元朝西北宗藩，亦称“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1225年，成吉思汗为四子划分封地，长子术赤封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以西、花刺子模以北，直到蒙古军马蹄所到之处。术赤在世时，实际领地在乌拉尔河以东钦察草原东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两河下游的花刺子模。

1236 – 1240年，术赤第二子拔都征服了乌拉尔河以西伏尔加河流域钦察、不里阿耳诸部族，迫使斡罗思各公国称藩纳贡。1241年蒙古军在大将速不台指挥下，发起了瓦尔施泰特战役，此役蒙古军的对手就有十字军的精锐部队——条顿骑士团。蒙古军在此战役中大获全胜，随后进入匈牙利和德意志的萨克森，直抵多瑙河。1243年，拔都结束西征回到伏尔加河流域，建立钦察汗国。所辖区域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达北极圈附近，建都伏尔加河下游拔都萨莱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

钦察汗国在俄罗斯草原，《大典图》称“月祖伯所封地”，但有两处失误：其一“木思阿尔”（30-12），当从《西北地附录》作“不里阿耳”，也即Bulgar（保加利亚）；其二“巴耳赤利”（23-23），当从《西北地附录》作“巴耳赤邗”，也即Barkhalighkend（《元史》作“八儿真”）。魏源对张穆摹本这部分地图作过修改，据称“去其三横画，而加葱岭斜亘之画，绕络其间。且增天竺、土伯特、于阗、沙州四名于其东南，以醒阅者目”。<sup>[22]</sup>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月祖伯所封地东境的长虚线即为魏源所增添。<sup>[23]</sup>

● 月祖伯(21-1)：《西北地附录》亦作“月祖伯”，来自1312-1342年钦察汗国大汗之名，指钦察汗国。

● 撒吉刺(30-3)：《西北地附录》亦作“撒吉刺”，或以为指克里米亚首府Solgat（索勒嘎特）。

● 阿罗思(30-5)：《西北地附录》亦作“阿罗思”，来自蒙古语Oros(俄罗斯)。

1223年，蒙古大军首次西征俄罗斯。1242年，拔都率蒙古骑兵从匈牙利回师，在伏尔加河下游建钦察汗国，开始了蒙古人对俄罗斯长达200年的统治。蒙古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至今尚存，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克里姆”，就来自蒙古语Kerem（城墙）。

● 钦察(28-6)：《西北地附录》亦作“钦察”（Kipchak）。文中说：“太宗甲午年，命诸王拔都征西域钦叉、阿速、斡罗思等国。岁乙未，亦命宪宗往焉。岁丁酉，师至宽田吉思海傍，钦叉酋长八赤蛮逃避海岛中，适值大风，吹海水去而干，生禽八赤蛮，遂与诸王拔都征斡罗思，至也列赞城，七日破之。岁丁巳，出师南征，以驸马刺真之子乞歹为达鲁花赤，镇守斡罗思、阿思。岁癸丑，括斡罗思、阿思户口。”钦察人起源于额尔齐斯河，属于突厥部落。11世纪，举家迁往西方，最后占据里海、黑海北岸，主要游牧于南俄罗斯的钦察草原。蒙古西征后，钦察草原封给成吉思汗长子术赤，《西游录》称“可弗叉”，《元史》作“钦察”，《元秘史》作“乞卜察克”，彭大雅《黑鞑事略》作“克鼻稍”。

● 阿兰阿思(27-7)：《西北地附录》亦作“阿兰阿思”，汉代称“奄蔡”。《魏略·西戎传》说：“奄蔡，一名阿兰。”蒙古西征后，这里成为拔都的藩属，《元史》称“阿兰阿思”，明代被俄罗斯兼并。

● 撒耳柯思(26-8)：《西北地附录》亦作“撒耳柯思”（Circassians），《元史》作“薛儿客速”，《蒙古游牧记》作“色耳克斯”，在今俄罗斯高加索山之西。

● 木思(里)阿尔(30-12)：其名有误，当从《西北地附录》作“不里阿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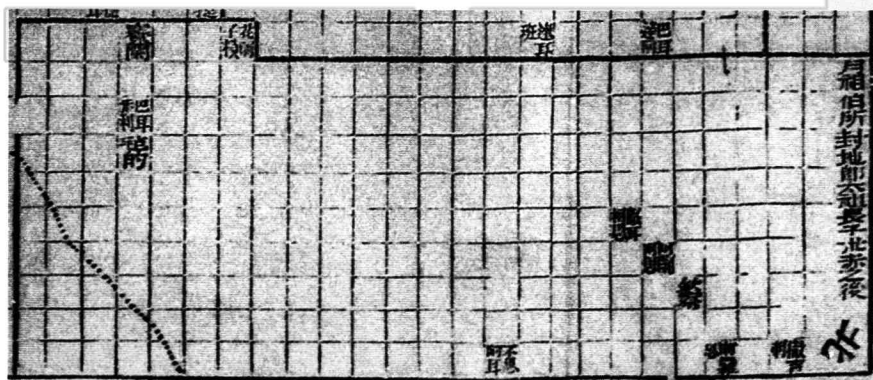


插图4 钦察汗国

(Bulgar)。1223年，蒙古骑兵在速不台指挥下入侵伏尔加河东岸的不里阿耳城，此后该国从未独立，但仍是学术和贸易中心。钦察汗国大汗常驻守此城，在今俄罗斯喀山境内。

● 花刺子模(21-20)：《西北地附录》亦作“花刺子模”，来自东伊朗语Khorazm(低地)，指阿姆河下游。希罗多德的《历史》称“花刺子模”，唐代称“货利习弥”或“火寻”《大唐西域记》作“货利习弥迦”，《蒙古秘史》作“兀笼格赤”。据《元史·太祖本纪》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摧毁花刺子模首府玉龙杰赤，《西游录》称“玉里捷陀”。此城重建不久，又遭帖木儿大肆破坏。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国奇姆肯特市之东。

● 赛兰(20-23)：《西北地附录》亦作“赛兰”，波斯阿拉伯语作Sairam(塞里木)，布莱脱胥乃德(E. Bretschneider)、巴托尔德(V.V. Barthold)等学者皆对该城有详细考证。唐代称“白水城”，相当于波斯阿拉伯语Isfijab(白水)，位于锡尔河中游河畔。刘郁《西使记》、《长春真人游记》和陈诚《西域番国志》皆称“塞兰”，元代称“麦赤干”。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Chimkend)东约13公里的赛拉姆村。

● 巴耳赤利(23-23)：其名有误，当从《西北地附录》作“巴耳赤那”，位于锡尔河畔。其名来自东伊朗语Barkhlyghkend，《元史》作“八儿真”。蒙古西征后，成为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所封地。

● 氈的(24-23)：《西北地附录》作“氈的”(Djend)，位于锡尔河畔。蒙古西征后，成为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所封地。今哈萨克斯坦克孜尔奥尔达尔东南杜马库尔附近。

### 三 伊儿汗国(不赛因所封地)

13世纪中叶，蒙古大汗蒙哥派旭烈兀率军远征西亚地区。1255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彻底摧毁阿拔斯王朝残余势力。以后，旭烈兀进军叙利亚，1260年占领大马士革。旭烈兀正准备继续西进，征服埃及时，收到了蒙哥大汗的死讯。蒙古诸王公为争夺汗位而内讧。旭烈兀不得不停止前进，回师阿塞拜疆。忽必烈继任大汗后，封旭烈兀为伊儿汗，统治其所征服的地区，伊儿汗国(1258—1388)由此

建立，以大不里士为首都，领土包括伊朗、两河流域、阿富汗和阿姆河以南广大区域。14 世纪末，为崛起的帖木儿帝国所灭。

《大典图》所谓“不赛因所封地”，即指伊儿汗国而言。其中有两处失误：其一“乞里沙杭”(13-12)，当从《西北地附录》作“乞里茫沙杭”，来自伊朗语Kirmanshah(今伊朗克尔曼)；其二“胡瓦”(14-16)，当从《西北地附录》作“胡瓦耳”。

● 毛夕里(15-7)：《西北地附录》亦作“毛夕里”，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城(Mosul)，位于底格里斯河畔。1262 年，毁于蒙古西征，今城系后来重建。

● 巴耳达阿(21-7)：《西北地附录》作“巴耳打阿”，来自波斯语 Barda。波斯王科巴达(491 - 531)在库尔河与阿拉斯河之间建城，中世纪成为波斯景教的一个传播中心。

● 兀乞八刺(12-8)：《西北地附录》亦作“兀乞八刺”，来自阿拉伯语 Okba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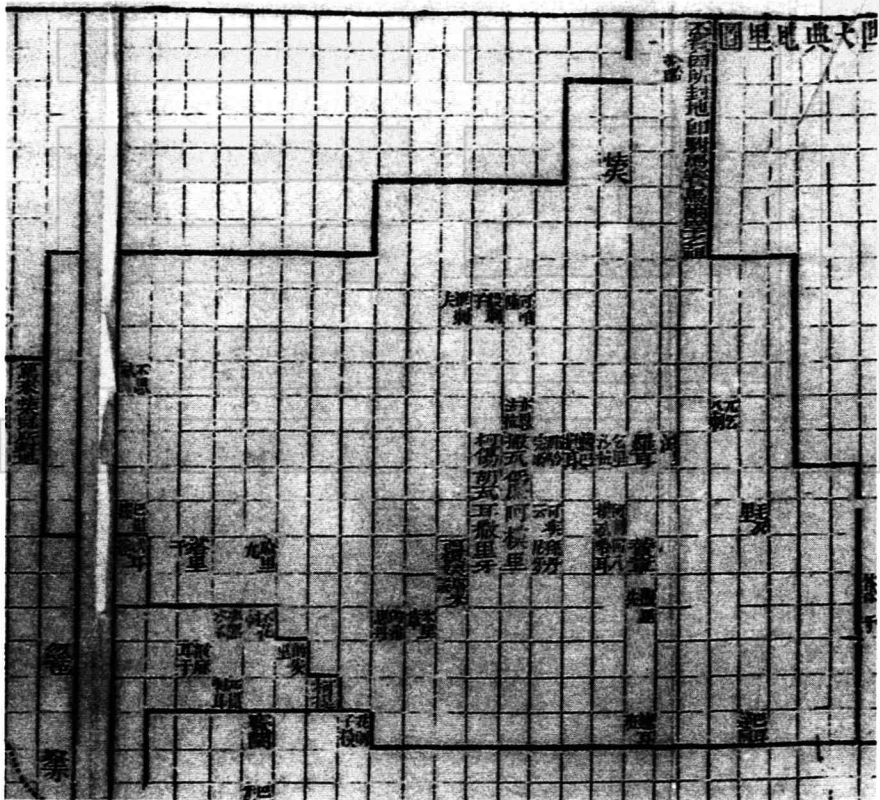


插图 5 伊儿汗国



在今伊拉克摩苏尔（Mosul）东南底格里斯河东岸。

● 不赛因(2-9)：《西北地附录》亦作“不赛因”。《大典图》原注说：“不赛因所封地即驸马赛马尔罕之祖。”正如洪钧正确指出的，这行字并非原图所有，当系明初编入《永乐大典》时增添的文字。

● 八哈刺因(2-10)：《西北地附录》亦作“八哈刺因”，来自阿拉伯语Baharain，《诸蕃志》作“白莲”，贾耽《皇华四达记》作“拔离河难磨国”，在今波斯湾西岸巴林岛麦纳麦港（Manama），以盛产珍珠而闻名于世。<sup>[24]</sup>

● 设里汪(13-10)：《西北地附录》亦作“设里汪”，伊朗语作Shirvan，位于外高加索东部地区。13世纪蒙古西征前，属于俄罗斯一个省份。

● 罗耳(13-11)：《西北地附录》亦作“罗耳”，在今伊朗卢里斯坦（Luristan）。

● 赞章(16-11)：《西北地附录》亦作“赞章”（Zendjian），位于德黑兰到大不里士大道旁，也即阿塞拜疆边界附近。1221年，蒙古大将速不台一度占领该城。

● 撒里失(18-11)：其名有误，当从《西北地附录》作“撒里牙”。波斯语作Sariya，《新唐书·西域传》作“娑里”，乃伊朗马三德兰省重镇。早在公元1世纪，就闻名于世。公元8世纪，陀拔斯单国建都于此。

● 打耳班(21-11)：《西北地附录》亦作“打耳班”。波斯语作Derpend，萨珊波斯王（531—579）在高加索山与里海之间所建城镇，居高临下，故称“铁门”。

● 怯失(5-12)：《西北地附录》亦作“怯失”，《诸蕃志》作“记施”，今波斯湾卡伊斯岛（Qais Is.）。12世纪中叶，泄刺失港（Shiraz）衰败后，该岛成为波斯湾最重要的贸易中心。霍尔木兹港继之兴起，怯失岛北部港口逐渐衰亡。<sup>[25]</sup>

● 乞里沙杭(13-12)：其名有误，当从《西北地附录》作“乞里茫沙杭”。波斯语作Kirmanshah，在今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大道旁，始建于公元4世纪，后来成为波斯历代王朝克尔曼沙省首府。1258年，旭烈兀率蒙古大军西征，从哈马丹进军，攻破乞里茫沙杭城。

● 阿刺模忒(15-12)：《西北地附录》亦作“阿刺模忒”（Alamut），乃可疾云城东北阿刺夷山顶城堡名称，1256年为蒙古大汗旭烈兀所攻占。

● 兰巴撒耳(13-13)：《西北地附录》亦作“兰巴撒耳”，波斯语作Lembassear，在今伊朗迪拉姆。

● 那哈完的(13-14)：《西北地附录》亦作“那哈完的”，波斯语作Nahavand，在今伊朗哈马丹之南以及乞里茫沙杭之东南。642年，阿拉伯军队大败萨珊波斯末

代君主耶兹迪德泽二世于此城。

● 可疾云(15-14)：《西北地附录》亦作“可疾云”(Kasvin)，在今阿勒布兹山南麓，德黑兰到大不里士大道旁。萨珊波斯王建于公元4世纪，1221年被蒙古大将速不台攻占。

● 孙丹尼牙(16-14)：《西北地附录》亦作“孙丹尼牙”。《克拉维约东使记》作“苏丹尼叶”，《西域土地人物略》作“琐力旦”。蒙古西征后，伊儿汗国建都于此，称“算端城”。在今伊朗西北阿塞拜疆省苏丹尼耶(Sultanieh)，也即德黑兰与大不里士之间。

● 可咱隆(9-15)：《西北地附录》亦作“可咱隆”。波斯语作Kazrun，今伊朗法尔斯省重镇，地近波斯湾。1300年蒙古西征，洗劫了该城。

● 亦思法杭(12-15)：《西北地附录》亦作“亦思法杭”，塞尔柱突厥(11—12世纪)建都于此。《元史》作“伊思八刺纳”，《明史》作“亦思弗罕”，两者皆来自伊朗语Isfahan，在今伊朗首都德黑兰之南500公里伊斯法罕城。

● 撒瓦(13-15)：《西北地附录》亦作“撒瓦”(Sava)，里海西南岸古城，位于可疾云与伊斯法罕之间，距德黑兰西南25公里。1224年，一度为蒙古军队占领。

● 低廉(14-15)：《西北地附录》亦作“低廉”(Dilam)，位于伊朗吉兰之南阿勒布兹山区。公元10世纪曾为独立王国，征服波斯许多地方。

● 阿模里(15-15)：《西北地附录》亦作“阿模里”，伊朗语作Amol或Amul，今伊朗马三德兰西部古城。唐代曾为陀拔斯单首府，是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ordādhbeh)、古达玛(Qudamah)等阿拉伯地理学家详细记述了这条交通路线的走向，从谋夫至阿穆勒(Amul)有36法尔萨赫路程(1法尔萨赫约合6.24公里)，渡过乌浒水(阿姆河)，到布哈拉。至于阿穆勒到布哈拉里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有19法尔萨赫，而古达玛称有22.5法尔萨赫。

● 设刺子(9-16)：《西北地附录》亦作“设刺子”。波斯语作Shulistan，位于泄刺失和可咱隆之间。设刺人是波斯境内的小民族，初居卢里斯坦，后来在设刺子定居，成为波斯历代王朝下属小邦国。

● 柯伤(13-16)：《西北地附录》亦作“柯伤”。

● 胡瓦(14-16)：其名有误，当从《西北地附录》作“胡瓦耳”(Khuvar)，位于德黑兰东南娑里城之南。

▲ 耳撒(15-16)：《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

▲ 里牙(16-16)：《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

● 泄刺失(9-17)：《西北地附录》亦作“泄刺失”，波斯语作 Shiraz。其名始见于元代，《元史·郭侃传》作“石罗子”，《明史》作“失刺思”，今伊朗法尔斯省会设刺子。故址在伊斯塔卡尔(Istakhar)。

● 西模娘(16-17)：《西北地附录》亦作“西模娘”(Simnan)，位于呼罗珊至德黑兰大道旁，伊朗达曼干的西南。

● 塔米设(17-17)：《西北地附录》亦作“塔米设”(Thamiseh)，陀拔斯单国重镇之一，里海东南岸古城。

● 术里章(18-18)：其名有误，疑为“朱里章”之误，相当于《西北地附录》的“硃里章”。波斯语作 Djurdjan。波斯中世纪名城，位于注入里海的古伦河流域。

● 的希思丹(18-19)：《西北地附录》作“的希思丹”，地处里海东南岸，今土库曼斯坦阿特拉克(Atrek)河流域。波斯语作 Dihistan，本为城市名，后来扩展到整个地区。

● 麻里兀(18-19)：《西北地附录》亦作“麻里兀”，波斯语作 Merv，波斯呼罗珊省四大名城之一。唐代称“木鹿”，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里城。

● 麻里兀(16-23)：《西北地附录》亦作“麻里兀”。

● 塔里干(16-25)：《西北地附录》亦作“塔里干”，波斯语作 Taligan，《新唐书》作“多勒建”，《大唐西域记》作“咀刺健”，《元史》作“塔里寒”或“塔里堪”。不过，西亚许多地方都叫塔里干。元代位于东西交通大道旁的塔里干似指阿富汗迈马纳之西的卡腊塔纳，属于花刺子模国，1221年毁于成吉思汗西征。

● 不思忒(11-27)：《西北地附录》亦作“不思忒”，波斯语作 Bost 或 bostan(绿洲)，《西域土地人物略》亦称“孛思旦城”，《圣武亲征录》作“不昔思丹”。今伊朗东南塞斯坦省的巴姆城(Bam)。

● 巴里黑(15-27)：《西北地附录》亦作“巴里黑”，来自梵语 Bahlika。《汉书·西域传》称“大夏”，《大唐西域记》作“缚喝”。《长春真人西游记》称“班里城”，《明史·西域传》作“把力黑部”，来自阿拉伯语 Balkh(巴里黑)。故址在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

▲ 八吉打：《大典图》无此地名，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城。《新唐书·西域传》作“缚答城”，刘郁《西使记》作“报达”，《蒙古秘史》作“巴黑塔”，《西域土地人物略》作“把黑旦城”。公元762年，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尔曼苏

尔建于底格里斯河北岸。1258年旭烈兀率蒙古大军攻占此城，《元史·宪宗本纪》作“八哈塔”。

▲ 忽里模子：《大典图》无此地名，今伊朗霍尔木兹（Hormuz）。北宋太宗至道三年（977），波斯湾古港口——尸罗夫（Siraf）毁于大地震。波斯湾国际贸易港此后迁到吉什姆岛（Kishma）。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泉州到波斯，就在该岛登陆。公元1100年，阿拉伯酋长穆罕默德提哈库伯率军攻占此地，建立霍尔木兹王朝，其王系一直维持到16世纪。1301年，霍尔木兹遭帖木儿入侵，国民离开大陆，迁到距伊朗海岸线20公里的哲朗岛（Jaroun Is.），建立新霍尔木兹国。古港口位于该岛北部，今称“阿拔斯港”。此后，霍尔木兹成为波斯湾最重要的贸易站和国际贸易中转站，通行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两种语言。不仅控制着临近的伊朗海岸，而且控制着巴林、阿曼和朱尔法。

▲ 苦法：《大典图》无此地名，波斯语作Kufa，汉代称“于罗”。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这里成为伊斯兰教的学术中心之一。1258年蒙古西征时，一度攻占该城。后来又被阿拉伯人收复，今伊拉克库法市，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

▲ 瓦夕的：《大典图》无此地名，来自阿拉伯语Wassit（中间），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位于伊拉克库法与巴士拉两市之间。

▲ 阿八哈耳：《大典图》无此地名，波斯语作Abhar，是可疾宁与赞章之间波斯古城，从德黑兰到大不列颠必经之地，在可疾宁西南。

▲ 撒里茫：《大典图》无此地名，或以为是赞章城西面的Takt i Solejmann古城。

▲ 巴某：《大典图》无此地名，今伊朗东南塞斯坦省的巴姆城（Bam）。

▲ 塔八辛：《大典图》无此地名，伊朗胡齐斯坦省Thabassan古城。

▲ 法因：《大典图》无此地名，或许指伊朗胡齐斯坦山城Kain。

▲ 乃沙不耳：《大典图》无此地名，波斯语作Nishapur，呼罗珊故都，《元史》称“匿察不儿”或“你沙不儿”。

▲ 撒刺哈歹：《大典图》无此地名，波斯语作Sarakh，波斯呼罗珊重镇之一，在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里城西南。

▲ 巴瓦儿的：《大典图》无此地名，波斯语作Bavard，在撒刺哈歹与马鲁之间，波斯呼罗珊省重镇之一。

## 四 察合台汗国（笃来帖木儿所封地）

察合台汗国位于河中地区 and 新疆广大地区，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所封地，横跨天山南北。1318 - 1321年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察合台占据中国新疆一带，西察合台则拥有河中地区。东察合台汗国以阿力麻里为中心，包括喀什、吐鲁番一带今新疆绝大部分地区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下。直到1514年，东察合台汗国被叶尔羌汗国所取代，总计立国166年。西察合台汗国则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统治河中地区。14世纪末，为新崛起的帖木儿帝国所灭。故《大典图》注把察合台汗国称作“笃来帖木儿封地”。

● 柯提(20-21)：《西北地附录》亦作“柯提”(Kath)，唐代称“火寻”或“货利习弥”，唐末为花刺子模都城。成吉思汗派术赤和察哈台征服花刺子模后，此地归察哈台汗国。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乌尔根奇之北。

● 的安里(19-22)：其名当从《西北地附录》作“的里安”(Daran或Darghan)。花刺子模国最南端城市，阿姆河左岸重镇之一。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尔坚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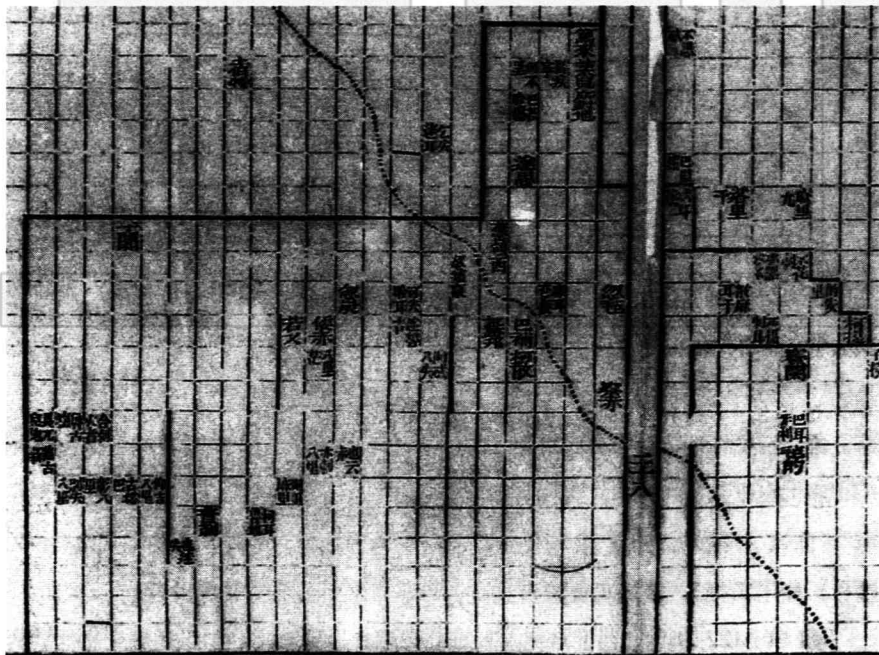


插图6 察合台汗国

东南的达尔甘纳塔。<sup>[26]</sup>

● 不花刺(18-23)：《西北地附录》作“不花刺”，《西域土地人物图》作“卜哈刺城”，《克拉维约东使记》作Buhara（布哈拉），唐代昭武九姓之安国，《大唐西域记》作“捕喝”。《经世大典图》作“不花刺”。《明史·西域传》作“不花儿”。布哈拉旧城，《新唐书·西域传》作“阿滥谧”（Ramithan）。公元8世纪被大食征服，公元13世纪毁于成吉思汗西征。关于元代以后所建新城，陈诚《西域番国志》说：“不花儿在撒马尔罕之西七百余里，城居平川，周十余里。”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市。

● 那黑沙不(18-24)：《西北地附录》作“那黑沙不”（Nekhsheb），《魏书·西域传》作“那色波国”，《新唐书地理志》作“那色波”，一名“小史”，乃吐火罗故地。地理方位大致在撒马尔干西南和布哈拉东南。成吉思汗西征后，在此地大造宫殿，谓之Karshi（宫殿）。所以，此地于13世纪后易名卡尔施，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卡尔施。

● 兀提刺耳(20-24)：《西北地附录》亦作“兀提刺耳”（Otrar），锡尔河北岸重镇。公元1219年蒙古骑兵从此地出发征服西亚。《西游录》作“讹塔刺”、《蒙古秘史》作“兀答刺儿”。撒马尔罕国大汗帖木儿出征明朝，中途病死在讹塔刺。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的土尔克斯坦南面的提木尔。

● 撒麻耳干(19-25)：《西北地附录》亦作“撒麻耳干”（Samarkand）。汉代康居，隋唐时代昭武九姓的康国，毁于成吉思汗西征。元明的撒马尔干城在古城南郊，也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干城。

● 忒耳迷(16-27)：《西北地附录》亦作“忒耳迷”，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Edrisi，约12世纪)的世界地图作Tarmedh，亦作Termidh或Tirmiz。《西域土地人物略》作“铁门关”，《大唐西域记》作“坦密国”，陈诚《西域番国志》称“迭里迷”，今塔吉克斯坦阿姆河支流苏尔汉河口捷尔梅兹（Termiz）。

● 忽氈(19-28)：《西北地附录》亦作“忽氈”，阿拉伯地理学家古达玛(Qudāmāh)作Khujandah。《新唐书》作“俱战提”，《西域土地人物略》作“虎帖城”，陈诚《西域使程记》作“火占”，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苦盏”，《元史·伯颜传》作“忽禅”。故址在今塔吉克斯坦苦盏市，原列宁纳巴德。

● 察赤(22-28)：《西北地附录》亦作“察赤”（Chach）。汉代属于康居，唐代为昭武九姓“石国”，《新唐书·西域传》作“柘支”，《大唐西域记》作“赭时”

(Chaj),《元史》作“塔史”,《西域土地人物略》作“他失干城”,陈诚《西域番国志》作“达失干”。清代称“塔什罕”。赭时国大致范围在锡尔河支流乞儿乞克河(Chirchik)流域,古称 Barak 或 Parak 河;古赭时城在今乞儿乞克河附近宾肯特(Binkath)废城。周连宽把古赭时国都定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塔什干以西约 50 公里处的旧石城。

● 笃来帖木儿所封地(14-29):《西北地附录》作“笃来帖木儿”,此非原图所有,编《永乐大典》时纂入。

● 哥疾宁(12-30):《西北地附录》亦作“哥疾宁”(Ghazni),《大唐西域记》作“漕矩吒”(Jagada),《新唐书·地理志》作“谢旭”。故址在今阿富汗的巴克山西南的伽兹尼,1222 年毁于蒙古入侵。

● 麻耳亦囊(19-30):《西北地附录》亦作“麻耳亦囊”(Margelan),张雨《边政考》作“马儿黑纳”,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那盆地马尔吉纳(Margian)。

● 可不里(12-31):《西北地附录》亦作“可不里”(Kabul),汉代称“高附”,《新唐书·大勃律传》作“迦布罗”,来自波斯语 Kaboura,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 巴达哈伤(13-31):《西北地附录》亦作“巴达哈伤”(Badakshan),《大唐西域记》作“钵钵创那”,《明史西域传》作“八答黑商”。今阿富汗巴克山,乌浒河发源于此山。

● 途思(15-31):《西北地附录》作“途思”(Tus),《元史·太祖本纪》作“徒思”。波斯呼罗珊省最大的城市之一,在今伊朗迈谢德(Meshed)西北。

● 巴补(20-31):《西北地附录》亦作“巴补”(Bāb),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写作 Madinatu Bāb,意为“门”城,15 世纪末《苏丹巴倍尔回忆录》作 Pap,<sup>[27]</sup>《西游录》作“八普”,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那盆地,阿克西(Akhsy)之西 16 俄里处。<sup>[28]</sup>

● 柯散(21-31):《西北地附录》亦作“柯散”,《新唐书西域传》作“渴塞”,《西游录》作“可伞”,唐代属于拔汗那六城之一,唐代在此城建休循州。公元 8 世纪,大食名将屈底波于攻陷该城。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那盆地北部。

▲ 葱岭西(18-32):魏源序跋称,他在张穆图上“去其三横画,而加葱岭斜亘之画,绕络其间”。故知此三字乃魏源所增,《西北地附录》亦无此地名。

● 讹述邗(20-32):《西北地附录》亦作“讹述邗”,《元史·也罕的斤传》作“瓦斯坚”,阿拉伯地理学家伊第利斯(Edrisi,约 12 世纪)地图作 Aderkend,亦称



Urkend。中亚浩罕(Khokand)东部名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乌支根(Uzgend)。<sup>[29]</sup>

▲ 葱岭东(19-33)：《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魏源序跋称，他在张穆图上“去其三横画，而加葱岭斜亘之画，绕络其间”。故知此三字乃魏源所增。

● 阿忒八失(21-34)：《西北地附录》亦作“阿忒八失”，《元史·耶律希亮传》作“阿体八升”。据阿拉伯地理学家古达玛记述，艾特巴什城(Atbāsh)位于吐蕃和拔汗那之间帕米尔高原(葱岭)的山道旁，从这儿走六天不见人烟的山路，到上努舍疆(上拔塞干)。从上努舍疆至“土胡兹胡尔”(al-Tughuzghur)，又称托古兹古思，即九姓乌古斯(回鹘人的一支)可汗地界有六天行程。艾特巴什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卡拉科英河西岸。<sup>[30]</sup>其名保存至今，今译“阿特巴希”。

● 可失哈耳(19-35)：《西北地附录》亦作“可失哈耳”。公元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文书始见其名Kasgari，《马可波罗游记》作Cascar(可失哈儿)，《西域番国志》作“哈失哈”，《明史》作“哈实哈儿”。今新疆西境疏附县为喀什噶尔旧城所在地。<sup>[31]</sup>

● 途鲁吉(20-35)：《西北地附录》亦作“途鲁吉”，元代对突厥(Turk)的称谓，指西突厥故地，今吉尔吉斯斯坦纳林河流域。

● 忽炭(19-37)：《西北地附录》亦作“忽炭”，汉唐史籍称“于阗”。于阗还有许多别称，《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说：“瞿萨旦那国，唐言地乳。即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汉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sup>[32]</sup>匈奴语“于遁”(Udun)，《蒙古秘史》作“兀丹”、《元史·太祖本纪》作“斡端”、《西游录》作“五端”。元代在于阗设斡端宣慰使元帅府。明代有两个称谓，一为《明史·西域传》的“于阗”，指伊斯兰化的新疆和田。另一为《明实录》的“阿端”，指坚持佛教信仰而东迁的于阗部落，明初成为撒里畏兀儿四部之一。1374年(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儿从西域迁入新疆东境和青海西部，分阿端、阿真、苦先和帖里四部。次年(1375)，在青海西部设安定和阿端两卫。正德九年(1514)，在西方吐鲁番和北方蒙古双重打击下，两卫被迫内迁肃州。<sup>[33]</sup>

● 也云赤(24-37)：《西北地附录》亦作“也云赤”，《世界征服者史》作Yafinch(亦运赤)。亦运河畔有城，西辽派官员进行监管，《突厥语大词典》却把它当作伊犁河附近的城市。<sup>[34]</sup>《突厥语大辞典》说：也云赤(Yafinch或Yafinq)是“伊犁附近的一个城镇，也是一条河名”，并提到双河(突厥语Iki-Okuz)城位于“伊犁河与也云赤河之间”；“双河城附近有一个叫做铁林库尔(Terinkol)的湖泊(今中亚巴尔

喀什湖)。”该书“圆形地图”注记说,突厥人所谓“双河”指中亚伊犁河与也云赤河。据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考证,亦运河就是流入巴尔喀什湖的哈刺塔尔河。《西域土地人物略》误作“民运”,当为刘郁《西使记》所谓“亦运河”。刘郁说:“盖契丹故居也。计其地,去和林万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运,流汹汹东注,土人云,此黄河也。”契丹故居指西辽首都,故址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畔巴刺沙衮城。<sup>[35]</sup>

● 倭赤(20-38):《西北地附录》亦作“倭赤”(Och),蒙古语作Utc,《西域图志》称“鄂什”。徐松《西域水道记》说:“乌什城据珊赤山东南面,山系小石山,高耸孤立,回语谓山石突出为乌赤,即乌什。”故址在今新疆乌什县。

● 八里茫(21-38):《西北地附录》亦作“八里茫”。据安部建夫考证,即今阿克苏近郊的伴尔满。

● 亦刺八里(24-38):《西北地附录》亦作“亦刺八里”,突厥语Ili-balik,《明史·西域传》作“亦力把力”。亦刺,《汉书·陈汤传》作“伊列河”,陈诚《西域番国志》作“衣烈河”,今新疆伊宁市附近伊犁河。

● 苦叉(20-39):《西北地附录》亦作“苦叉”。《汉书·西域传》作“龟兹国”,《突厥语大词典》作Kusan,《元史》作“苦先”。《西域土地人物图》作“苦先旧城”或“土力苦先城”,指新疆库车旧城。故址在今新疆龟兹县皮朗古城。

● 阿里麻里(25-39):《西北地附录》亦作“阿里麻里”。《西北地附录》曰:“诸王海都行营于阿力麻里等处,盖其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回鹘五城,唐号北庭,置都护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至元五年,海都叛,举兵南来,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以皇子北平王统诸军于阿力麻里以镇之,命丞相安童往辅之。”《西域地图人物略》作“阿亦地里城”,陈诚《西域使程记》作“阿力马力”,《元史》作“阿力麻里”,来自突厥语Almalik(苹果园)。察合台汗国最后定都阿里麻里,故址在今新疆霍城县东13公里。

● 柯耳鲁地(26-40):《西北地附录》仅作“柯耳鲁”,唐代称“葛逻禄”(Karluk),宋代作“割禄”,元代作“哈刺鲁”,《大典图》标在今新疆伊犁阿里麻里城西北。

● 普刺(26-42):《西北地附录》亦作“普刺”,《新唐书·地理志》作“不刺”。《明史·坤城传》作“拍刺”。<sup>[36]</sup>今新疆博尔县西五公里博尔塔刺河北岸古城。

● 也迷失(27-43):《西北地附录》亦作“也迷失”(Emil)。刘郁《西使记》

作“叶瞞河”、《元史》作“也迷里”、“叶密立”、“叶密里”。窝阔台始封地在也迷失，今新疆额敏河流域。

● 仰吉八里(25-44)：《西北地附录》亦作“仰吉八里”。徐松《西域水道记》作“阳巴勒噶逊”(Yangi-balgasan)，意为“新城”。在今新疆呼图壁县西北玛纳斯河东岸。

▲ 于阗(17-45)：魏源序跋称“且增天竺、土伯特、于阗、沙州四名于其东南，以醒阅者目”。<sup>[37]</sup>故知其名系魏源所增添，其实《大典图》上有和田，时称“忽炭”。

● 古塔巴(25-45)：《西北地附录》亦作“古塔巴”，来自蒙古语Khutukbai(吉祥)。《西域土地人物略》作“苦他巴城儿”。《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七年作“可脱乱”，《西域水道记》作“呼图克拜”，今称“呼图壁”。蒙古征服中亚后，中亚呼罗珊亦出现Khutbah(呼图壁)等地名，当来自蒙古语。<sup>[38]</sup>故址在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呼图壁县。

● 合刺火者(23-46)：《西北地附录》亦作“合刺火者”(Karahoja)。汉唐称“高昌”，《辽史·兵卫志》作“和州回鹘”，《西游录》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作“和州”，《西域土地人物略》作“哈刺火者”，明清称“火州”。故址在今吐鲁番市三堡的高昌古城。

● 彰八里(23-46)：《西北地附录》亦作“彰八里”(Janbaligh)。《西北地附录》原注：“至元十五年，授朵鲁知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新唐书·地理志》作“张堡城手捉”，《突厥语大词典》作Qangbalik，《西游录》作“昌八刺”，《元史·耶律希亮传》作“昌八里”，《元史·李进传》作“掺八里”。故址在新疆昌吉自治州呼图壁县与吉木萨尔北庭古城之间。

● 鲁古尘(23-47)：《西北地附录》亦作“鲁古尘”。《后汉书·西域传》作“柳中”，唐代柳中县，属于高昌。宋代称“六种”，《明史》作“柳城”，亦名鲁城或柳陈城。《辛卯侍行记》作“鲁克沁”，今称“鲁克沁”。故址在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古城东南45公里处。

● 别失八里(23-47)：《西北地附录》亦作“别失八里”。其文曰：“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别失八里畏兀城子里军站事。十七年，以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十八年，从诸王阿只吉请，自大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十年，立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二十一年，阿只吉使来言：‘元隶只必帖木儿二十四城之中，有察带二城置达鲁花赤，就付阔端，遂不隶省。’至是奉旨：‘诚如所言，其

还正之。’二十三年，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十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以总之。”汉代车师后王庭，唐代庭州金满县，北庭都护的治所。元代在别什八里设北庭都元帅府。故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破城子。

● 畏兀儿地(23-48)：《西北地附录》亦作“畏兀儿地”。《西北地附录》原注：“至元二十年(1283)，立畏兀儿四处站及交钞库。”唐代称“回纥”或“回鹘”，元明改称“畏兀儿”，指840年从蒙古高原西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的维吾尔人。据阿拉伯地理学家古达玛记述，“土胡兹胡尔”(Al-Tughuzghur)，或译“托古兹古思”，也即九姓乌古斯(回鹘人的一支)可汗地界。国中有城，城有12座铁门，许多人信奉袄教。该城左边(即北方)是开义玛克王国。

● 他古新(24-47)：《西北地附录》亦作“他古新”。《梁书·高昌传》作“笃进”，陈诚《西域行程记》作“托逊”，今新疆托克逊县。

## 五 元朝(窝阔台汗国)与蒙古宗藩交界地带

公元1271年，窝阔台汗国继承者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西北地附录》提到元朝西北边境七个地名，大多不见于《大典图》，后者只罗列三个地名。需要注意的是，魏源在这个区域肆意增添地名，本文用符号▲表示。他在《元代西北疆沿革图附〈元经世大典图〉并序》这样说：“且增天竺、土伯特、于阗、沙州四名于其东南，以醒阅者目”。<sup>[39]</sup>其中“于阗”增添在察合台汗国部分，参见上节的讨论。最后五个地名属于元朝岭北行省，在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谦河流域。<sup>[40]</sup>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主要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恕不一一出注。<sup>[41]</sup>

▲ 天竺(7-37)：魏源所增地名，指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

▲ 土伯特(11-41)：魏源所增地名，指今西藏，《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

● 乞失迷耳(14-34)：《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刘郁《西使记》作“乞失迷西”，今克什米尔。其中“西”字疑与“耳”字形近而讹。

● 柯模里(24-47)：《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汉代伊吾庐地，《西域土地人物略》作“哈密”，今新疆哈密市。有学者认为，来自乌孙语“昆莫勒”(Qum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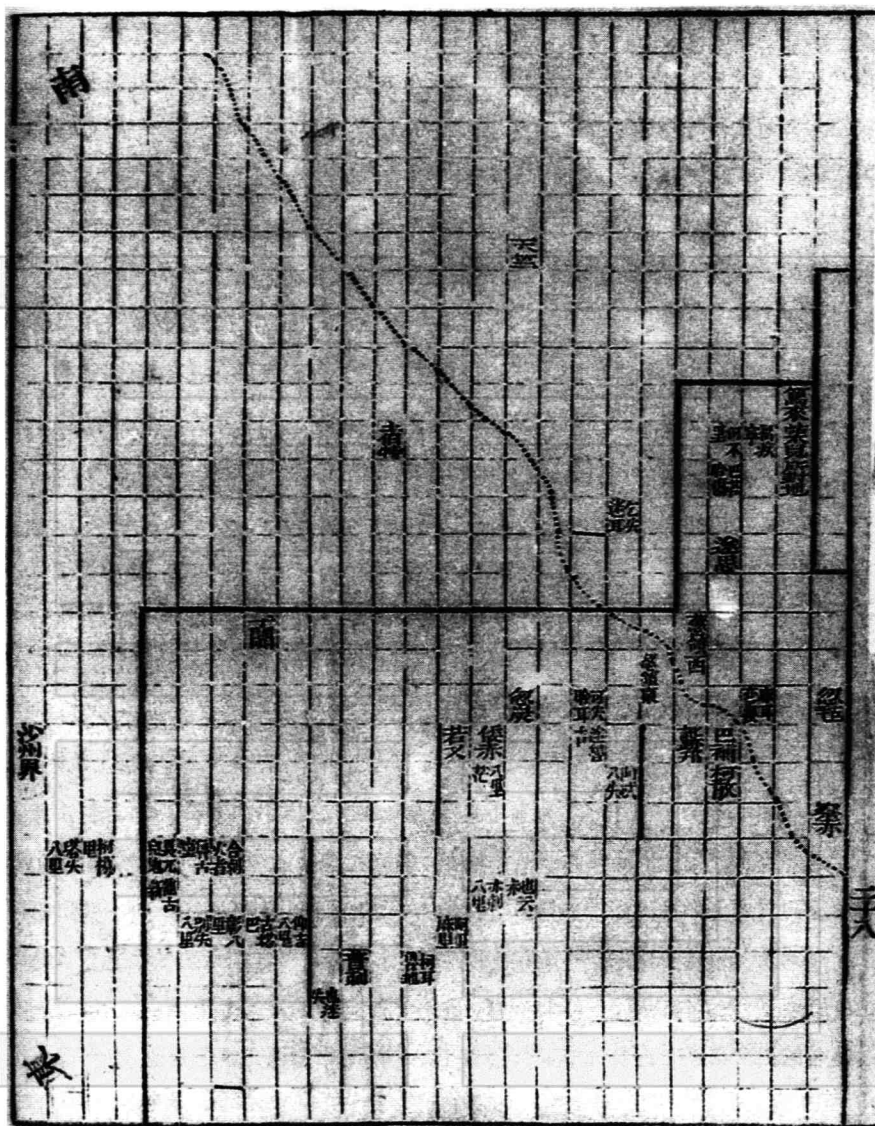


插图 7 元朝与蒙古宗藩交界地带

相当于敦煌回鹘文献 Khamil，《元史》作哈密力、哈里梅或哈迷立。

● 塔失八里(24-47)：《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来自突厥—蒙古语“石城”，《后汉书·西域传》作“疏勒城”，故址在今新疆奇台县石城子遗址。

▲ 沙州界(24-47)：魏源所增地名，今甘肃敦煌，《西北地附录》无此地名。

▲ 吉利吉思：《大典图》无此地名，唐代称“黠戛斯”，今称“柯尔克孜”或

“吉尔吉斯”。《西北地附录》原注：“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南去大都万有余里。相传乃满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为九千户。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乌须，皆巨浸也，会于谦，而注于昂可刺河，北入于海。俗与诸国异。其语言则与畏吾儿同。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颇知田作，遇雪则跨木马逐猎。土产名马、白黑海东青。”

▲ 昂可刺：《大典图》无此地名，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支流安卡拉河流域。《西北地附录》曰：“昂可刺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其语言与吉利吉思特异。昼长夜短，日没时炙羊肋熟，东方已曙矣，即《唐史》所载骨利鞞国也。”

▲ 乌斯：《大典图》无此地名，在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谦河流域，乌斯为谦河一条支流。《西北地附录》曰：“乌斯亦因水为名，在吉利吉思东，谦河之北。其俗每岁六月上旬，刑白马牛羊，洒马潼，咸就乌斯沐漣以祭河神，谓其始祖所从出故也。撼合纳犹言布囊也，盖口小腹巨，地形类此，因以为名。在乌斯东，谦河之源所从出也。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险阻为甚，野兽多而畜字少。贫民无恒产者，皆以桦皮作庐帐，以白鹿负其行装，取鹿乳，采松实，及斲山丹、芍药等根为食。冬月亦乘木马出猎。”

▲ 谦州：《大典图》无此地名，在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谦河流域故名，汉代称“剑河”，元代在此地置谦州，今属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西北地附录》曰：“谦州亦以河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麓岭之北，居民数千家，悉蒙古、回纥人。有工匠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种秋成，不烦耘耔。或云汪罕始居此地。”

▲ 益兰：《大典图》无此地名，故地在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首府克孜尔。《西北地附录》曰：“益兰者，蛇之称也。初，州境山中居人，见一巨蛇，长数十步，从穴中出饮河水，腥闻数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1270），诏遣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即于此州修库廩，置传舍，以为治所。先是，数部民俗，皆以杞柳为杯皿，剝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好礼闻诸朝，乃遣工匠，教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

## 注释:

[1] 栾贵明:《〈永乐大典〉之谜——关于〈永乐大典〉正本殉葬的推想》,见《寻根》1999年第4期。此说并非定论,亦有学者质疑此说(王春瑜:《〈永乐大典〉正本殉葬说质疑》,见《寻根》1999年第4期)。

[2] 杨文校、张穆主编《连筠簃丛书》,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中华书局,1982年重印)。

[3] 魏源:《海国图志》第二卷,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五十卷本。同书百卷本删去《大典图》,但是书中《元代疆域图叙》仍保留了相关文字,见魏源著、陈华等校注:《海国图志》上卷,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65页。

[4] 魏源:《海国图志》道光丁未年六十卷本。

[5] 魏源:《元代西北疆沿革图附〈元经世大典图〉并序》,《海国图志》(道光丁未年六十卷本)第二卷。

[6] 关于葱岭的范围问题,魏源还写过一篇文章《葱岭三千考》(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7] 纽仲勋:《有关经世大典地理图的几个问题》,收入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8] 洪钧:《元经世大典图跋》,见《同声》3卷2期。

[9] 该书《元代西北疆域图叙》曰:“又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并附其后”。收入魏源著、陈华等校注:《海国图志》上卷,长沙,岳麓书社,1998

年(校注底本,据道光乙未本及光绪年间甘肃平庆泾固道署重刊百卷本),第65页。魏源自绘《元代西北疆域图》,在同书第66-67页。

[10] 魏源在《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中仍收录有《经世大典图》一幅。参见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11] Emile V.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vol.1-2, 1910, London, reprinted in 1967(汉译本见唐长孺译:《经世大典图释》,《国学论衡》第六期); Emile V. Bretschneider, "Notices of the Mediav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6.

[12]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光绪二十三年元和陆氏刊本;广雅书局刊本;藩属舆地丛书本)。

[13]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科学院图书馆藏稿本;徐松:《元史西北地理考》4卷;沈曾植:《〈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书后》,《海日楼文集》两卷,孙隘堪校勘本卷上;洪钧:《元经世大典图跋》,见《同声》3卷2期;丁谦:《〈经世大典图〉地理考证》,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2集(收入《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正中书局,1962年重印本);丁谦:《元史地理志西北地》1卷,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2集;又见《二十五史三编》第9册,第139-150页。



[14] 丁谦:《元经世大典图地理考证》,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2集;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地学第1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朱杰勤:《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名考释》,见暨南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史论文集》,1982年;冯承钧:《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胡逢祥:《经世大典地图探源》,见《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第35-37页;组仲勋:《经世大典地理图的几个问题》,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代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6-97页;刘迎胜:《察合台汗国疆域与历史沿革研究》,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第30-44页。

[15] Emile V.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vol.1-2, 1910, 见 London, reprinted in 1967(汉译本见唐长孺译:《经世大典图释》,《国学论衡》第六期);青山定雄:《元代の地图について》,《东方学报》第8卷,东京,1938年,第103-152页;松田寿男和森鹿三:《元经世大典(大典原图)》,《アツア历史地图》,东京,平凡社,第99页;(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第5卷,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

[16] 沈曾植:《〈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书后》,《海日楼文集》(孙隘堪校勘本)卷上,收入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一)》《文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期,第177-178页。

[17] 《元史·文宗本纪》。

[18] 洪钧:《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

地》,《元史译文证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本。

[19] 沈曾植:《〈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书后》,《海日楼文集》(孙隘堪校勘本)卷上,收入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一)》,《文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期,第177-178页。

[20] 胡逢祥:《〈元经世大典图〉探源》,《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第35-37页。

[21] 原本脱“天方国”三字,据《秦边纪略》补入。迷即力,《秦边纪略》作“迷约力城”。

[22] 魏源:《元代西北疆沿革图附〈元经世大典图〉并序》,《海国图志》(道光丁未年六十卷本)第二卷。

[23] 组仲勋:《有关经世大典地理图的几个问题》,收入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96-97页。

[24] 陈佳荣等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05页。

[25] 陈佳荣等编,前揭书,第970页。

[26] 朱杰勤:《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名考释》,暨南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史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5页。

[27] Emile V.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vol.2, 1910, London, reprinted in 1967, p. 53.

[28] 朱杰勤:《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名考释》,暨南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史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9页。

[29] 朱杰勤,前揭书,第269页。

〔30〕朱杰勤，前掲书，第270-271页。

〔31〕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488页。

〔32〕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02-1003页。

〔33〕邓锐龄：《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卫杂考》，《历史地理》1982年第2辑，第58-65页。

〔34〕刘迎胜：《都哇家族对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西域史论丛》第三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4页。

〔35〕张广达：《十一世纪的圆形地图》，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代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1页；努尔兰·肯加合买提：《不刺、双河两城考辨》，《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第55-60页。

〔36〕努尔兰·肯加合买提：《不刺、双河两城考辨》，《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第55-60页。

〔37〕魏源：《元代西北疆沿革图附〈元经世大典图〉并序》，《海国图志》（道光丁未年六十卷本）第二卷。

〔38〕任荣康：《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中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9页。

〔39〕参见魏源：《海国图志》（道光丁未年六十卷本）第二卷。

〔40〕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下），《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12-13合刊，第15页。

〔41〕谭其骧主编：《岭北行省》，《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北京，地图出版社，1978年。

## 第八章 | 蒙古山水地图

——在日本新发现的一幅中世纪“丝绸之路地图”

### 一 缘起

我们今天介绍一幅在日本新发现的16世纪山水地图，重点讨论这个发现对明代地理学和艺术史研究的科学意义。2002年，北京一家国际拍卖公司出巨资，从日本京都购回一幅山水画形式的中国古地图（插图1）。大约20世纪30年代流散海外，一直秘藏于日本著名私家博物馆——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 Yurinkan, Kyoto）。这家博物馆由藤井善助于1926年10月创立，位于日本京都市

插图1 《蒙古山水地图》铁门关图



左京区，亦名“藤井斋成会有邻馆”。藤井先生早年游学上海，因经营纺织和棉花贸易而发家致富，跻身于日本关西财阀。藤井酷爱中国文化，经商从政之余，在京都学派汉学家的指导下，大肆收集中国古物，从商周青铜器到明清字画，无所不收，尤以收藏玺印著称。<sup>〔1〕</sup>

这幅地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方式——手卷式，幅宽0.59米，长达30.12米，绘于缣帛之上。藤井有邻馆一直把它当作清代山水画收藏，秘不示人（插图1）。

这幅地图右下角磨损严重，但是首尾却相当整齐，显然被人刻意剪裁，并重新装裱过。古画作伪者常剪裁古画引首（画心起始部分）、隔水（画心外至画轴部分）或卷末题款上的画名，用来装裱伪作。这幅地图的名称可能在佚失的卷末题款上，也可能在重新装裱时裁掉的引首处或隔水处。《蒙古山水地图》之名，来自此画背面“尚友堂”标签，千字文编号“宙XX二”（插图2）。

尚友堂系明清时代著名书坊，以刊刻明代小说家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而闻名于世。清光绪年间，尚友堂书坊来北京发展，在琉璃厂刊刻过汉文和满文书籍。民国初年，在近代印刷业打击下，尚友堂从书坊改为书肆。琉璃厂书肆不单卖古旧书，亦兼营古旧字画。尚友堂题签上的楷书为清末民初流行的写法，《蒙古山水地图》似在这时流入尚友堂书肆，并被题签和编号。从题签看，藤井善助大概在北京琉璃厂尚友堂书肆买到这幅古地图。



插图2  
尚友堂标签

标签上所谓“蒙古”，指称雄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汗国后续王朝。例如：蒙古和撒里维吾尔部落，本属窝阔台汗国；亦力把里国，本为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汗国兴起于西察合台汗国，东征西略，兼并了伊儿汗国和金帐汗国许多领地。《蒙古山水地图》之名可谓“恰如其分”，我们以为当系原名，因为无论古董商还是收藏者，恐怕都没这个水平，能给它起如此儒雅而贴切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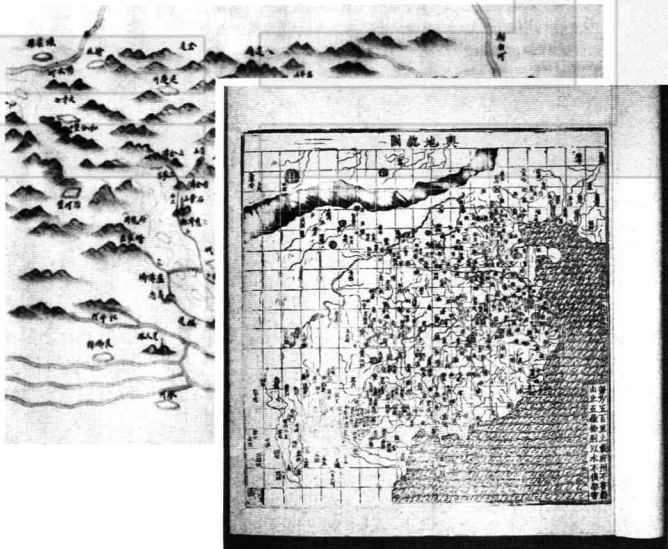
这家拍卖公司去藤井有邻馆，本来是买米芾的《研山铭》。<sup>[2]</sup> 买完画还剩不少钱，就问对方还有什么要卖。对方说还有一幅清代山水画，他们就顺便把它也买了回来。《研山铭》后来在北京拍卖了2999万元，同时买回的清代山水画至今尚未拍卖，因为他们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家公司呈请清华大学傅熹年教授作了初步鉴定，发现恐非清代之物。从艺术风格看，至少应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sup>[3]</sup>

承蒙这家公司负责人易苏昊先生委托，我们于2004年2月着手研究这幅古地图。在这家公司的傅金凯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蒙古山水地图》地名录和全套分幅拍摄的26张照片以及精心制作的手卷式地图复印件之后，我们对《蒙古山水地图》的研究正式开始。<sup>[4]</sup>

2004年初访问日本时，我们咨询过许多日本学者，但是谁都不知道藤井有邻馆收藏了这么一幅山水地图。我们大概是第一批研究这幅古地图的学者。

中国古地图采用三种方式绘制：第一种为东晋裴秀倡导的“计里画方”形式，

插图3  
中国古地图的三种形式



如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明代罗洪先的《广輿图》(插图3-1);第二种为山水画形式,如清代中期所绘《京杭运河全图》(插图3-3)。第三种为风俗人物画形式,也即中国历代王朝为海外使节定期绘制的《职贡图》,如梁武帝萧绎的《职贡图》(插图3-2)。《蒙古山水地图》采用后者,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甘肃酒泉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凡211个西域地名。尽管图上所有地名都是方块汉字,但绝大多数地名不是汉语,而是蒙古语、回鹘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或拉丁语名称。如果不熟悉西域地理,简直不知所云。

明代初年,中国西部疆界在今天新疆塔里木河和中部天山一线。这幅地图以嘉峪关为起点,年代必在嘉靖三年(1524)明军从西域退守嘉峪关后。据明代张雨《边政考》和清修《肃州新志》,嘉靖十八年明军在嘉峪关西面的讨来河畔建“永兴后墩”等长城烽火台。《蒙古山水地图》嘉峪关以西不见“永兴后墩”(今称长城第一墩),年代必早于嘉靖十八年。

## 二 嘉靖刻本的发现

明太祖很注意收集海外地图,凡对朝廷俯首称臣的藩国、西方使臣和商人,必须进贡该国地图,以使“其国境内山川,悉归职方”,以示归顺大明王朝。明朝对



插图4 《陝西通志》卷十之《西域土地人物图》

海内外地图的征集工作一直持续到明孝宗年间，“命各布政使司上地里图”。<sup>[5]</sup>

太祖派人到吐蕃、朝鲜、暹罗、安南、西洋和西域收集过地图，这些地图由兵部职方司统一管理。例如：“洪武、宣德间，增设武选司主事三人，职方司主事四人。职方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sup>[6]</sup>“凡武官诰敕、俸粮、水陆步骑操练、官舍旗役并试、军情声息、军伍勾补、边腹地图、文册、屯种、器械、舟车、薪苇之事，并移所司而综理之”。<sup>[7]</sup>

明清地图一般用山水画或“计里画方”方式绘制成手卷，有些后来刊入刻本。正如向达先生指出的，《郑和航海图》“原来当是手卷式，收入《武备志》后改成本书式，自右至左（自东而西）。”<sup>[8]</sup>《蒙古山水地图》就是手卷式，自右至左（自东而西）绘制。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很快从明代刻本中找出《蒙古山水地图》的两个嘉靖刻本。

第一个刻本为《西域土地人物图》（插图4），收入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代表人物马理等人纂《陕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行（插图5）。在刻本中，《蒙古山水地图》分为连续十幅，而且图文并茂，文字部分称《西域土地人物略》。

从宁波天一阁散出的明代地方志中有《陕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刻本，始见于1808年旧目，散出后一度为扬州吴氏侧海楼收藏。1930年复归前北平图书馆，“二战”前夕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归还给台北中央图书馆。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

插图5 《西域图略》





的古书全被制成缩微胶卷，出售给世界各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买了这套缩微卷。从缩微卷可知，天一阁所藏《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并不太好，许多地方模糊不清。<sup>[9]</sup>据顾廷龙调查，国内收藏此书单位还有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馆（残本）三家。<sup>[10]</sup>1983年，陕西三原县图书馆发现了《陕西通志》的第五个藏本（插图5）。<sup>[11]</sup>目前所见传本分属两个系统，最早刊刻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sup>[12]</sup>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最好，我们的研究就基于这个刻本的高清晰数码照片。<sup>[13]</sup>

《西域土地人物略》常见人引用，但不是根据《陕西通志》，而是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或从清初梁份《秦边纪略》传抄的。19世纪末，俄国学者布萊脱胥乃德（Emile V. Bretschneider）将顾氏抄本译成英文，所以《西域土地人物略》备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sup>[14]</sup>不知为什么，顾炎武和梁份两人只抄录了文字部分，都没有收图，所以《西域土地人物图》罕为人知。尽管晚清西北史地之学勃兴，可是无论徐松还是沈曾植，甚至王国维，都不知世间还有这样一幅西域古地图。

第二个刻本为《西域图略》（插图5），收入明代无名氏编《陕西四镇图说》卷末，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行。与《西域土地人物图》大同小异，但是把原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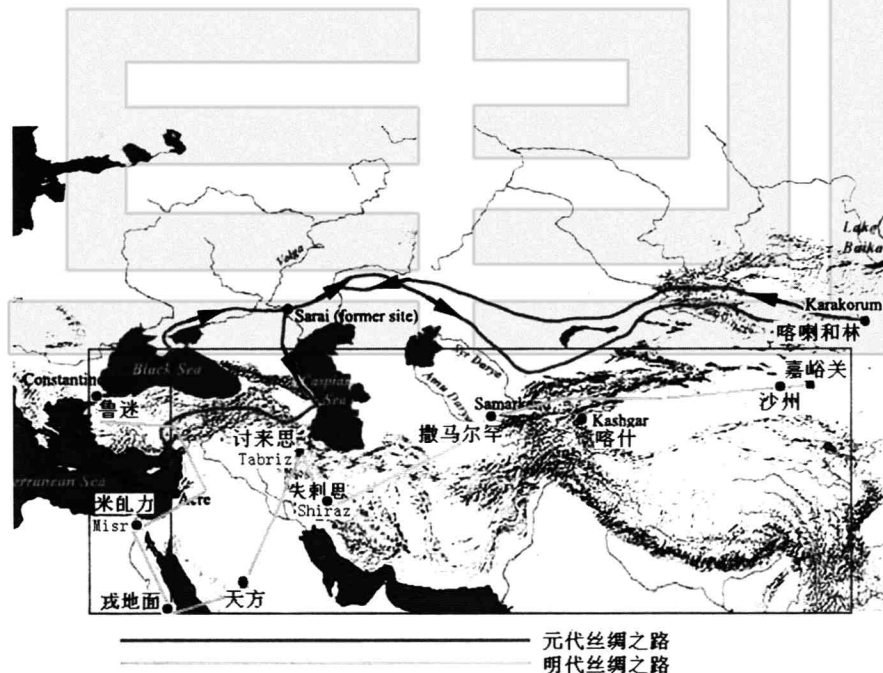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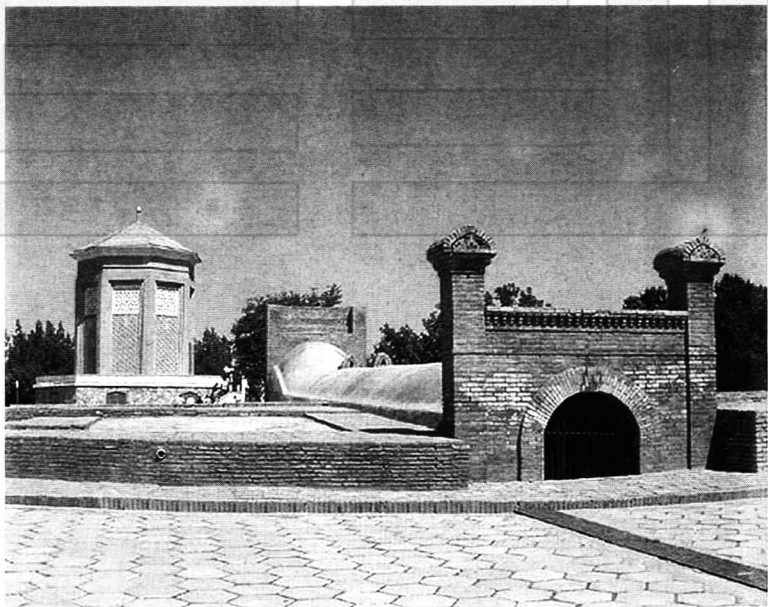


插图6 元明时代的丝绸之路

分为连续十幅的地图缩成连续五幅图（插图6）。图文并茂，文字部分亦为《西域土地人物略》。《陕西四镇图说》在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但是只有日本东洋文库藏有全本，有这幅西域古地图。上海图书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品都是残本，没有这套地图。因此，王庸先生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只提到《陕西四镇图说》一个残本，也不知此书卷末有西域古地图。2004年，我的一个学生正在东京大学留学，她在东洋文库找到这本书，请日方帮助复制。东洋文库很快把复印件寄到北京，我们的研究就基于这个复印件。

由于有“近水楼台”之便，榎一雄、海野一隆和堀直等日本学者相继撰文讨论《西域图略》，尤其以海野一隆的考证最为翔实。据他研究，《西域图略》绘于嘉靖三或五年（1524或1526），可能参考了伊斯兰地图，并推测它与《西域土地人物图》可能是姊妹关系。<sup>[15]</sup> 不过，我们找到一些证据，说明《陕西四镇图说》的编者应是隆庆初年兵部侍郎王崇古。王崇古当时的身份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崇古奏给四镇旗牌，抚臣得用军法督战，又指画地图，分授诸大将赵崧、雷龙等”。<sup>[16]</sup> 王崇古在隆庆初年“指画”、“分授”的陕西四镇和西北边疆地图，当即后来在万历年间刊行的《陕西四镇图说》。该书卷末

插图7  
兀鲁伯天文台遗址



《西域图略》则从《西域土地人物图》缩编而成，因名《西域图略》。因此，这幅地图的年代当在隆庆（1567 - 1572）初年，而非海野一隆推测的嘉靖三或五年。

《蒙古山水地图》颇具明代中叶吴门画派艺术风格，而吴门画派传承元代文人画的传统。题款一般比较简单，有些写作双行，一行书写画名，另一行写本人名款和日期。个别作品无款，但是至少要钤印记。明代中期，自沈周、仇英等人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兴起以后，文人书画蓬勃发展，除了继承和发扬元代文人书画的习尚外，他们大开风气之先，开始将诗文、书法、绘画三者融为一体。在作品的本幅上，除了作者名款外，大多写有诗文题记，文字或长或短，书画配合，部位协调，相得益彰。除了个别不善书法者外，吴门画派代表人物如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等人的作品，无论是轴、卷、册页，莫不是诗、书、画三位一体。收藏家也要题款，并且盖上各种收藏章。令人不解的是，《蒙古山水地图》既无题款，也没有收藏章。

明代刻本的发现相当重要，再次证明《蒙古山水地图》已被人剪裁为两半。如今我们只见到原图的四分之三，而另外四分之一下落不明。无论如何，这幅古地图的原来的地理范围应和嘉靖刻本一样，从嘉峪关直迄东罗马首都鲁迷（今土耳其西境伊斯坦布尔城），长达40米。这种撕毁古画的愚蠢行为，是古董商的惯用手法，以便一幅画可以卖两幅画的钱。

从嘉峪关到鲁迷的丝绸之路，元明两代略有不同。插图6中的深色线为法国使臣鲁布鲁克（Rubruck, 1253 - 1255）从欧洲到蒙古汗国首都——哈喇和林的路线；图中浅色线为《蒙古山水地图》原图从东罗马首都鲁迷到嘉峪关的路线。明代中国人的地理学知识之所以如此发达，显然与成吉思汗建立的世界帝国——蒙元汗国有关。

洪武元年（1368），“徐达入元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遣将巡古北口诸隘”。<sup>[17]</sup>明初鸿胪寺画师很快根据元朝档案绘出世界地图，所以洪武三年宫廷乐章称：“东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图中”；“承平日，华夷万里，地图归一”。<sup>[18]</sup>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实际上从蒙元时代就开始了。

### 三 撒马尔干的“望星楼”

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际，帖木儿帝国在中亚兴起，定都撒马尔干，《明史》称“撒马尔罕国”。创始人帖木儿（1336 - 1405）为元朝驸马，本为中

亚渴石（今乌兹别克斯坦国的夏儿萨泼兹）出生的突厥人，早年在结伙抢劫中右足受伤，被戏称为“跛子帖木儿”。帖木儿以成吉思汗继承者自居，几乎征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不仅如此，他还野心勃勃地打算向明王朝和西藏发动圣战。永乐二年（1404），帖木儿亲统二十万大军东征，假道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向中国西大门嘉峪关进发。由于路途遥远，帖木儿远征军无法解决后勤补给，大批战马死亡。1405年，帖木儿本人也在东征途中暴病身亡，死在中亚讹答刺城（今哈萨克斯坦Otrar）。《蒙古山水地图》在天山北麓绘有许多无名城堡，很可能是帖木儿为东征明王朝而修筑的。

撒马尔干有着悠久的天文学传统，中世纪成为最大的天文学中心之一。耶律楚材和丘处机随成吉思汗西征，先后于1220年和1221年访问此城，与当地穆斯林谈天说地。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Ulugh Beg）酷爱天文学，对战争毫无兴趣。1420年（永乐十八年），他继承汗位后，在撒马尔干北郊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天文台，今称“兀鲁伯天文台”（插图7）。他还亲自主其事，通过观测，计算出著名的《兀鲁伯天文表》。

兀鲁伯被谋杀后，这个天文台遭到宗教极端分子的严重破坏。1908年俄国考古学家维亚特金（Vyatkin）根据原始文献重新发现，但是地面建筑在1966年大地震中遭到进一步破坏，如今仅存放置六分仪的大理石墙象限仪，长达46米，斜躺在11米深的地下（插图8）。据《巴布尔回忆录》（*Babur-Nama*），兀鲁伯天文台是个圆形建筑。地表原来有三层，如今只有地基和大理石制作的墙象限仪保存下来。后者用来观测月亮、太阳或天体中其它五大行星的运动。

插图8  
兀鲁伯天文台大理石墙象限仪



《蒙古山水地图》有个“望星楼”，当即兀鲁伯天文台，但是错标在撒马尔罕南郊。可见《蒙古山水地图》的绘制参照了伊斯兰地图。为了把圣地麦加放在世界中心，伊斯兰地图往往采用上南下北方向。12世纪中叶伊斯兰地图——伊第利斯世界地图，就采用上南下北方向。

由于不明图向，《蒙古山水地图》的作者画错了“望星楼”的方位。这个错误在《西域土地人物图》中得以订正。正如《西域土地人物略》所说，撒马尔罕城“其



插图9 青海玉皇阁、登封天文台



插图10 清乾隆九年和五十二年登封测景台

北有阿力城，有望日楼”。所谓“望日楼”，就是《蒙古山水地图》的“望星楼”。陈诚《西域行程记·记程诗》有“金壁瓮高台”的诗句，就指撒马尔罕城北郊的兀鲁伯天文台。

正如中世纪西方地图把中国建筑画得像西方建筑一样，《蒙古山水地图》的撒马尔干城，画得像明代县城，城墙上建有楼阁，和山西平遥明清县城相同。我们怀疑撒马尔干城外的“望星楼”模仿明代观星台，那么目前对河南登封古观星台地面建筑的复原不一定正确。

河南登封观星台位于登封市周公庙遗址北面，始建于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派郭守敬督建。据清顺治年间修《登封县志》，观星台位置在五渡水西北，今河南登封县东。文中说：“观星台在测景台（梅村按：即河南登封县城东告成镇周公测景台）北，高五丈，阔二丈，砖瓷尚完，想亦唐所建也。台北面凹入数尺，悬直而下，相传为滴漏之所，莫晓其制。下有平石数十方。向北接连一路，阔一尺，高二尺，约长十丈。石面有通池二条，其宽如指，至北尽头处，合而为一，此必古人用以置水而取平也。”嘉靖元年（1522），巡按何天衡言：“登封旧有测景、观星二台，周公遗迹也，土圭表漏俱存。乞勒钦天监委官，考证制度，刻之史册，从之论文。”

登封观星台只有地基是元代的，现在复原成一个高台建筑，高台上有小屋两间，分别安装计时仪器漏壶、观测仪器简仪等。台高9.64米（约四丈），师圭长达31.19米（约十二丈）。从《蒙古山水地图》的望星楼看，明代观星台与青海贵德县明代玉皇阁最为相似，登封古观星台恐怕要按照清乾隆九年《登封县志》的模式复原。

从清修《登封县志》看，乾隆九年至五十二年间作了较大改变（插图10）。

## 四 艺术流源

青绿山水画至少起源隋代，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开青绿山水画之先河。以李思训为代表的唐代画师的青绿山水进一步推动这种画法，并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插图11）。明代中期吴门画派传承元代文人画，尤其是青绿山水的艺术风格。《蒙古山水地图》表现山脉的手法，就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无名氏《渔庄秋色图》、

明沈周的《落花图》的构图和绘画技法非常相似。我们还发现吴门画派另一位大师仇英的《归汾图》，与《蒙古山水地图》卷首的“嘉峪关图”非常相似，两山夹一楼，左边山脚下有河流环绕，河上架小桥（插图 11 和彩版 12）。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往往以“粉本”为依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对此有明确记载。苏东坡《阎立本职责图》有诗曰：“粉本遗墨开明窗”。王十朋集注：“唐明皇令吴道子往视嘉陵江水。回奏云：‘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德国海德堡大学雷德侯 (Lothar Lederos) 教授甚至认为中国传统书画都是根据各种“粉本”拼凑的，缺乏创造力。

我们自然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他说的现象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确实存在。《蒙古山水地图》的作者与仇英显然根据了同一粉本，所以把两者画得如此相像。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单国强先生考证，仇英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所以《蒙古山水地图》的年代必在明嘉靖年间。

《蒙古山水地图》向人们展示了明代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学知识，这幅地图足以和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京都



插图 11 仇英的《归汾图》与《蒙古山水地图》卷首的《嘉峪关图》



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Kangnido, 1402)、15世纪意大利传教士毛罗所绘世界地图以及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藏欧洲中世纪《伽泰罗尼地图集》(Catalan Atlas, 1375)相媲美,说明16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洪武三年(1370)制定宴飨乐章,其一名为《喜升平》,明确提到明初绘有世界地图。文中说:“华夷万里,地图归一。”<sup>[19]</sup>不过,明初绘制的世界地图只有一幅流传下来,这就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北京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收藏的《大明混一图》。此图现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据考证,成图年代大约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彩绘绢本,尺寸为3.86米×4.56米(插图12)。<sup>[20]</sup>

中国本来称世界地图为“华夷图”,元代改称“混一图”。此外,《大明混一图》的许多地名乃采用元代旧称,可知它的绘制根据元朝档案。《蒙古山水地图》长30.15米,若加上裁去的四分之一,原图长达40米。如此气势恢弘的地图,必为明王朝国家所有。谈迁《国榷》卷64引李维桢之言说,明世宗(1522-1566)“斋居数十年,图廻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嘉靖皇帝手中的海外地图,当指

插图12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大明混一图》



《大明混一图》、《蒙古山水地图》之类的世界地图。

早些时候，朝鲜画师根据元代地图绘制过一幅世界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从此图跋文可知，建文元年（1399），明惠帝登基，朝鲜李朝遣明使金士衡、李茂一行来南京朝贺。他们大概在南京城的文渊阁见到吴门画师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并将复本携回本国。李朝太宗二年（1402），经金士衡和李茂初步考订，由李荃详细校对，由权近补充朝鲜和日本部分，最后合成一幅新地图，绘制成宽四尺（1.30米），长五尺（1.6米）的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此图原本早已不存。日本贵族大谷家族有一个传世摹本，年代在15世纪末，现藏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西方学者简称 *Kangnido*（《疆理图》）。<sup>[21]</sup> 1978年，日本九州岛原市本妙寺发现另一个明代摹本，比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本还大两号（插图13和彩版4）。据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考证，这个摹本成图于永乐十五年（1417）。<sup>[22]</sup>

《声教广被图》的作者李泽民是元代苏州画师，明代地理学家罗洪先《跋九边图跋》提到此人，有所谓“元朱思本、李泽民《舆地图》”云云。<sup>[23]</sup> 既然罗洪先绘制《广舆图》时代（1551），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仍流传于世。<sup>[24]</sup> 而明代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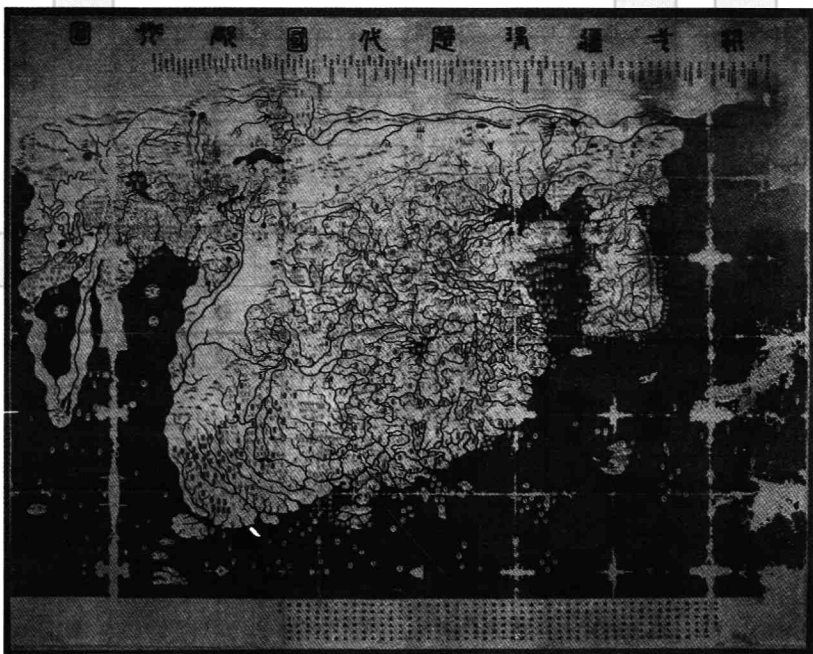


插图13 日本九州岛原市本妙寺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域地理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元代地理学，那么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无疑是《蒙古山水地图》重要图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大明混一图》和《疆理图》皆采用青绿山水画方式，内容大同小异，两者与苏州画师李泽民《声教广被图》一脉相承。《蒙古山水地图》颇具吴门画派艺术风格，亦出自吴门画师之手。看来，苏州吴门在元明时代是用青绿山水画绘制世界地图的重要中心之一。

插图14 法兰西国家图书馆藏《伽泰罗尼地图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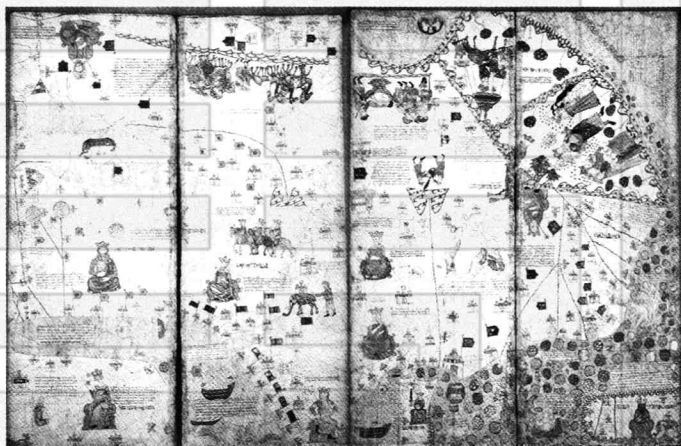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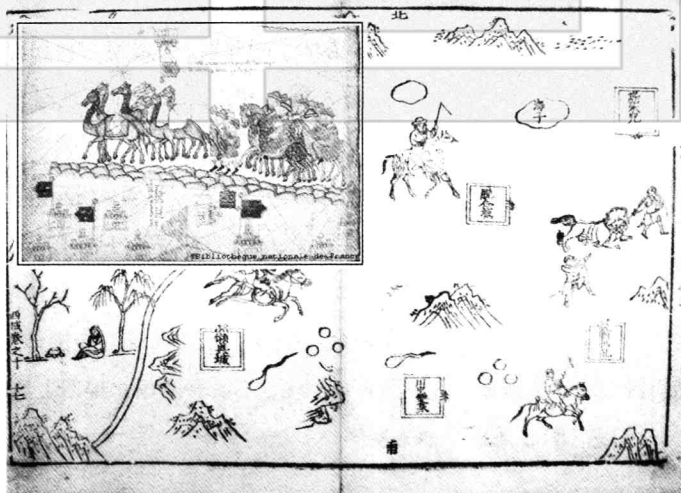


插图15 《西域土地人物图》与《伽泰罗尼地图集》



## 五 明朝与西方的地理学交流

公元14—15世纪，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方地图也开始从神学地图向实用型地图转变，相继产生了《伽泰罗尼地图集》、《毛罗世界地图》等一批中世纪晚期地图佳作。

1375年(洪武八年)，受阿拉贡国王彼得的委托，马卡略岛(今西班牙伽泰罗尼)犹太画师克里斯奎(Abraham, Cresques)为法兰西王查尔斯五世(Charles V)绘制的世界地图，今称*Catalan Atlas*(《伽泰罗尼地图集》)，现藏巴黎法兰西国立图书馆(插图14)。<sup>[25]</sup>其中，亚洲和中国地理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但是许多内容是想象的。原件收藏在巴黎法兰西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从1457年起，受葡萄牙王阿丰索五世(Alfonso V)委托，意大利教士毛罗(Fra Mauro)着手绘制世界地图。由葡王负担费用，并提供葡萄牙海外航行最新数据。绘图工作历时2年，1459年(明天顺三年)完成。同年4月24日，正本由威尼斯贵族特雷维萨诺(Stefano Trevisano)送往里斯本，不久佚失。不过，毛罗同时为威尼斯大公制作了一件副本，这件副本一直保存在圣米格尔修道院，后来移存威尼斯大公宫廷。1822年至今，度藏于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中国部分画得像欧洲城镇，显然是想象的。此外，图中非洲的好望角方向向东，而《大明混一图》早就正确地把这个方向朝向南方。

古代东西方绘制地图的方法截然不同，除了专画外国人物和动物的《职贡图》外，中国古地图从来不画人物和动物。《蒙古山水地图》仍然保持着这个古老的传统。耐人寻味的是，这幅古地图的两个明刻本，皆画有人物和动物。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以来，西方地图就绘制人物或动物，《伽泰罗尼地图集》就绘有人物和动物，利马窦《坤輿万国图》也采用这种方法绘制。

明太祖朱元璋很注意收集海内外地图。明初，凡对朝廷俯首称臣的藩国、西方使臣和商人，都得贡献其国山川图形，以使“其国境内山川，悉归职方”，以示归顺臣服于大明王朝。例如：洪武年间，“仍命各国图其山川及摹录其碑碣、图籍，付使者还”。<sup>[26]</sup>如此多的外国地图集中到明朝宫廷，不可能对中国传统制图学毫无影响。《西域土地人物图》一改中国传统制图法，首开在山水地图上绘制人物和动物之先风(插图15)，无疑受西方制图学方法的影响。

## 六 时代背景

许多朋友是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了解明代中国的，但是万历十五年（1587）以前的中国与黄先生笔下的那个没落的中国截然不同。明代前期，尤其在永乐年间，中国人创造许多中国乃至世界之最，人称“大明帝国的奇迹”。

北京西郊大钟寺的永乐大钟建于明代永乐年间，高6.75米，重46.5吨，上面铸有23万字（汉文22万字，梵文4245字），号称“世界钟王”。

中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永乐四年（1407）。朱棣非法夺得皇位后，大肆屠杀建文帝旧臣。姚广孝劝他千万别杀方孝孺，否则将断了中国的文脉。《释鉴稽古录续集》引道衍和尚姚广孝对燕王朱棣之言说：“南有方孝孺，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好学者绝矣”。<sup>〔27〕</sup>果然，方孝孺坚决不合作，最后惨死在朱棣刀下。为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明成祖决定编修《永乐大典》。

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中，诸如北京故宫、万里长城、十三陵、北京天坛、湖北武当山道观等，几乎一半是明代建筑。

即便在万历年间，中国士大夫仍取得极其辉煌的文学成就，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还魂记》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白先勇先生的《姹紫嫣红牡丹亭》，再现了这场416年前的游园惊梦。“姹紫嫣红”出自《牡丹亭·游园》曲牌《皂罗袍》，原曲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

插图16 《郑和航海图》卷首



颀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2001年5月，昆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共十九个项目之首。

明成祖还创造了另一壮举，派大宦官郑和率领27000多人、百余艘战船七下西洋，历时28年，航程万余里。在中东方向，最远航行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在非洲方向，最远航行到比刺（今东非莫桑比克），史称“郑和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一大奇迹。

郑和七下西洋，为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铺平了道路。由于欧洲与中国在海上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人类文明发源地，开始从文明的中心沦落为文明的边缘，古老的丝绸之路彻底走向衰落。如果说《蒙古山水地图》表现的是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那么《郑和航海图》（插图16）则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海上交通。

自1934年以来，学界一直把《坤輿万国全图》当作中国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以为世界地理知识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带给中国人的福音。<sup>[28]</sup>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当利玛窦抵达北京后，献给明神宗《万国图志》一册。这幅地图以西洋流行的世界地图为蓝本，为了讨好皇帝，他把中国画在地图中央，中国后来绘制世界地图大都沿用这个模式。利玛窦对明代世界地理知识显然缺乏了解，他在《中国札记》中写道：“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构成的说法。”<sup>[29]</sup>如果这位意大利传教士见到《蒙古山水地图》，大概不会这样乱发议论。

《蒙古山水地图》的问世再次以实物资料证明，中国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并非来自利玛窦传来的福音。具有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明代前期进入颠峰时代，气势恢弘的《蒙古山水地图》正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产物。

注释：

〔1〕藤井有邻馆学艺部编：《有邻馆精华》，京都，藤井斋成会，1985年。

〔2〕参见米芾：《研山铭卷》，见《古代书画精品录(贰)》，北京，长城出版社，2002年，第8-49页。

〔3〕承蒙易苏昊先生告知此事，谨致谢忱。

〔4〕据地图照片纸袋记事，傅金凯先生在2004年2月12日将全部资料亲自送到北京大学。

〔5〕《明史·孝宗本纪》。

〔6〕《明史·职官志一》。

〔7〕《明史·职官志五·五军都督府条》。

〔8〕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重印版，第4页。

〔9〕骆兆平编：《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目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167页；《北平图书馆图书展览会目录》，见《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1931年；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台北，1967年增订本。

〔10〕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34页。

〔11〕王桂娥：《马理与〈陕西通志〉》，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三原文史资料》第四辑，1987年，第117-127页。

〔12〕北京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藏《陕西通志》嘉靖刻本的缩微胶卷，图版模糊不清，但字迹勉强可识。北京国家图书馆本部

藏《陕西通志》嘉靖刻本的缩微卷，图版稍好，但是字迹不清。后者被编入《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参见邵国秀编：《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中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古籍，1997年)。

〔13〕这里首先要感谢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他委托华东师大图书馆老馆长陈子善教授联系拍摄这个明刻本照片事宜。此外，我们还要感谢华东师大图书馆善本部的吴平先生帮助拍摄原本照片，并感谢该校博士研究生许全胜先生具体操办此事。

〔14〕Emile V. Bretschneider, "A Chinese Itinerary of the Ming Period from North-western Frontier to the Mediterranean Sea," *China Review*, vol.5, 1876, pp. 227-241.

〔15〕海野一隆：《明清におけるマテオ・リッチ系世界图——主として新史料の检讨》，载《新发现中国科学史资料の研究(论考篇)》，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年；海野一隆：《关于〈陕西四镇图说〉所载的〈西域图略〉》，《东西地图文化交涉史研究》，大阪，清文堂出版社，2003年。

〔16〕《明史·王崇古传》。

〔17〕《明史·太祖本纪》。

〔18〕《明史·乐志三·乐章二》。

〔19〕《明史·乐志三·乐章二》。

〔20〕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收入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北京，文物出



版社，1994年，第51-55页。

[21] 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有龙谷大学藏1500年摹本的一个摄复印件，未注比例，分两幅拍摄(参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28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页)。这两幅照片十分模糊，只能勉强看清部分元代州名。此外，照片上只有下端题款，缺上端题款和图名。这个摄复印件也许来自织田武雄、室贺信夫和海野一隆编：《日本古地图大成·世界图编》，东京，讲谈社，昭和五十年(1975)。此书有《疆理图》的黑白图版，地名仍不十分清楚，但是题款文字尚可辨读。

[22] 杉山正明：《东西方地图所示蒙古时代的世界形象》，2004年5月14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讲座演说稿(杉山正明：《东西の地图が示すモンゴル时代の世界像》，《ニューズレター》第3号，2002年，参见<http://www.hmn.bun.kyoto-u.ac.jp/ezuchizu/newsletter.html>)。

[23] (明)罗洪先：《跋九边图》，《石莲洞

罗先生文集》卷十五《说辨解铭赞跋》，明万历(丙辰)四十四年陈于廷文江刊二十五卷本；并见《念庵集》卷十《说辨箴铭跋赞》，第205页。

[24] 关于罗洪先《跋九边图》的讨论，参见高桥正：《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再考》，《龙谷史坛》第56-57期合刊，昭和四十一年(1966)，第205页；任金城：《广舆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影响》，见曹婉如、黄盛璋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73-82页。

[25] 参见巴黎国立图书馆古地图网站(<http://www.bnf.fr/en/luminures/manuscripts/aman6.html>)。

[26] 《明太祖实录》卷48。

[27] 《大正藏》第49册，第2038页。

[28] 陈观胜：《论利玛窦之万国全图》，《禹贡》1934年第1卷第3期，第19-24页。

[29] 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二卷第六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第九章 | 郑和忌日及身后事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他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太监身份，1405年奉诏开洋，率领大明海军27000余人、百余艘战舰七下印度洋。在中东方向，最远航行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在非洲方向，最远航行到比刺（今莫桑比克的贝拉）。<sup>〔1〕</sup>历时28年，航程万余里，史称“郑和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一大奇迹。关于郑和其人其事，《明史·宦官·郑和传》记载：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赏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

（郑）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渤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拔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勃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刺、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貲。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郑）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由于文献语焉不详，我们至今不清楚郑和的生辰忌日和身后事。本文拟分四节，讨论于下。容有不当，还望海内外研究者予以批评指正。

# 一 《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之郑和遗嘱

1982年郑鹤声、郑一钧两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发现一份有关郑和卒年及身后事的重要文献，也即明天顺元年（1457）无名氏撰《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以下简称《圣像记》）。此文收在明万历年间落第文人二南里人（罗懋登）撰《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百回本第二十卷末附录（插图1）。<sup>[2]</sup> 1929年，北京大学向达教授曾向学界介绍这条郑和史料，可惜明代刻本不好找，他没有找到原文。<sup>[3]</sup>

所谓“非幻”是金陵碧峰寺一位住持的法号。这位法师圆寂后，安葬在碧峰寺一所庙宇内，后者因名“非幻庵”。宣德五年（1430），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夕留下遗言，打算把家中供奉的一批佛教造像和各种法器，在他死后全部捐给非幻庵。所谓“圣像”就是指郑和准备捐给非幻庵的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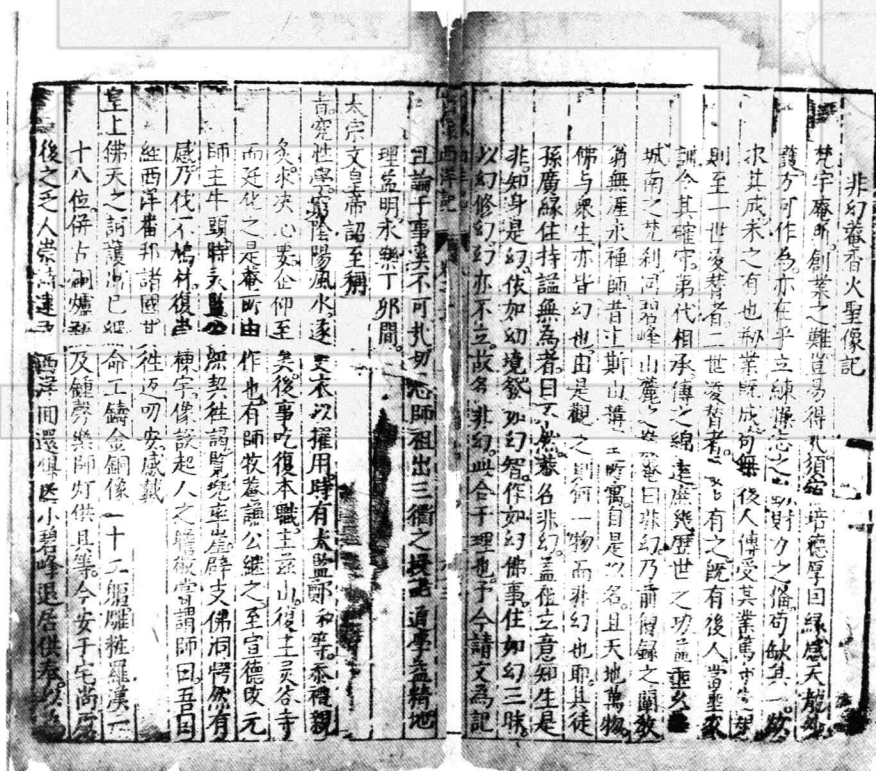


插图1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万历刻本

在道衍和尚(姚广孝)引导下,郑和皈依佛门,并于永乐元年(1403)受菩萨戒。<sup>[4]</sup>郑和奉佛以后,常到碧峰山走动,从事佛事活动,并与这所寺院的非幻禅师结为挚友。据《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百六十七卷《江宁府部纪事》记载:“碧峰寺非幻庵,有沉香罗汉一堂,乃非幻禅师下西洋取来者,像最奇古,香火异常。万历中有人盗其一,僧不得已,以他木雕成补之。后忽黑夜送回前像,罗汉之灵异可推矣!”<sup>[5]</sup>看来,非幻禅师早年随郑和下过西洋,当时南印度已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天下,非幻禅师的沉香木罗汉像可能来自佛国锡兰(今斯里兰卡)。

郑和守备南京时,<sup>[6]</sup>年界花甲,自知来日无多,便在牛首山佛窟寺住持宗谦法师和自家人面前立下遗嘱,打算把家中佛教造像和法器,在他死后捐给非幻庵。《圣像记》则是宗谦法师与郑和家人一道执行郑和遗嘱的记录。

碧峰寺位于南京城中华门外能仁里碧峰山,南与天界寺(金陵三大刹之一)隔道相望。本为西晋尼姑庵。宋元嘉时,因西域尼铁索罗登至建康城,故号铁索罗寺。齐时仍称铁索罗寺,梁以后改称翠灵寺或妙果寺。宋曰瑞相院,元代则称铁索寺,毁于元末战火。洪武初,太祖下诏,再造山门,以供禅师金碧峰居住,因名“碧峰寺”。据葛寅亮编《金陵梵刹志》,碧峰寺有金刚殿、天王殿、正佛殿、僧院、石塔等建筑。分布范围:东至安德街,西至朱家园,南至天界寺菜地,北至李府园,占地近百亩(彩版10)。该书还把金陵寺观分成大、中、小三类。碧峰寺并不算小,属于金陵中刹。<sup>[7]</sup>1946年毁寺建碧峰寺小学,今为南京雨花台区实验小学。昔日金陵名刹,如今只留下“断井颓垣”。据说尚存古井一口、假山一座和建筑木构件若干。<sup>[8]</sup>

郑鹤声、郑一钧两先生为《圣像记》作过录文(以下简称“旧录”),但是他们采用的三山道人刻本,字迹模糊,录文不无鲁鱼豕亥之讹。<sup>[9]</sup>今据北京国家图书馆柏林寺分馆藏本(彩版3)<sup>[10]</sup>与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刊万历丁酉刻本,<sup>[11]</sup>互校如下:

永乐丁卯间,<sup>[12]</sup>太宗文皇帝诏至称旨,究性学,穷阴阳风水,遂更衣以擢用。时有太监郑和等,忝礼亲炙;求决心要,企仰至矣。后事吃(乞)复本职,主兹山,复主灵谷寺而迁化之。是庵所由作也。<sup>[13]</sup>

有师牧庵谦公继之,至宣德改元,师主牛头。时太监公深契往谒,<sup>[14]</sup>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不(木)鸠材,<sup>[15]</sup>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sup>[16]</sup>尝谓师曰:“吾回经西洋番邦诸国,<sup>[17]</sup>其往返叨安。<sup>[18]</sup>感戴皇上、

佛天之河护，出已缙，命工铸金铜像一十二躯，雕妆罗汉一十八位，及古铜炉、<sup>[19]</sup> 瓶及钟磬、药师灯、供具等，今安于宅。尚虑后之乏人崇诗(侍)，逮下西洋回还，<sup>[20]</sup> 俱送小碧峰退居供奉，以为永远香火，<sup>[21]</sup> 旦夕焚修。及有暖床，<sup>[22]</sup> 送尔安寝。不至纤毫有失，及擅移他处。”所以言者，有深旨哉，盖其遗嘱。有本族户侯郑均曰义，<sup>[23]</sup> 有侄曰珩(下文称“珩德”)，皆目击耳闻乎。<sup>[24]</sup> 不期宣德庚戌(宣德五年/1430)，钦承上命，前往西洋，至癸丑岁(宣德八年/1433)，卒于古里国。

有师宗谦，感慕曩日惠，用以追悼。节次率领孙徒若干众，<sup>[25]</sup> 数诣宅建斋荐度。宣德乙卯(卯)(宣德十年/1435)，<sup>[26]</sup> 户侯曰义，侄曰珩德，<sup>[27]</sup> 与同先公太监公共下西洋：<sup>[28]</sup> 杨公惠泉，袁公普性，<sup>[29]</sup> 黄公宗深，<sup>[30]</sup> 杜公普明，<sup>[31]</sup> 高公定住，<sup>[32]</sup> 众同议，<sup>[33]</sup> 不违先太监公日前遗嘱之言。及将前项圣像，<sup>[34]</sup> 若炉、瓶、<sup>[35]</sup> 钟磬、<sup>[36]</sup> 灯、床，尽皆送付碧峰之退居供奉，以满足太监公生前之愿。端祈冥福，追悼神魂，超躋净界，次万福祉，<sup>[37]</sup> 荫庇生存。

大意为：永乐年间，明成祖颁发诏书圣旨，对碧峰寺大加赞赏。太监郑和也对碧峰寺发生兴趣，亲自造访，并帮助非幻法师谋得碧峰寺住持一职。他后来升任灵谷寺住持，最终在该寺圆寂。碧峰山的非幻庵就是为非幻法师建造的。负责非幻庵的一位法师，人称“谦公”(下文称“宗谦”)，继任碧峰寺住持；宣德元年(1426)，升任牛首山寺住持。这时，太监郑和到牛首山拜访他，游览了兜率崖的辟支佛窟，深受感动。于是，郑和捐资征集木材，在牛首山建寺立像，供人瞻仰。郑和生前曾对宗谦法师说：“多亏皇上和佛祖的保佑，使我每次下西洋都能平安往返。因此，我自己出钱让工匠铸造了十二尊金铜佛像，塑造了十八罗汉像，还收集了不少宣德仿古铜炉、仿古铜瓶、钟磬、药师灯和佛家供具等法器，现在全放在自家宅院中供奉。我担心后世子孙无人认真崇祀，等我下西洋归来，打算全部捐献给小碧峰寺。以便于永远焚香点火，日夜供奉。等我有了暖床，也送你一个好好享用。只有这样，才不会出丝毫差错，或被他人擅自挪用。”这段话有其深刻含义，算是郑和的遗嘱吧。

郑家有位头面人物，名叫郑均，字义。郑和还有个侄儿，名叫马珩(德)。二人均在现场耳闻目睹此事，可以出面作证。宣德五年(1430)，郑和奉明宣宗之命，再下西洋。不料，宣德八年(1433)，病逝于印度古里。宗谦法师有感于郑和昔日的恩惠，对郑和之死表示哀悼。多次率徒子徒孙，到郑宅追悼亡灵，为郑和超度。宣德十年(1435)，郑家人郑义、侄儿马珩德，与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杨惠泉、袁普

性、黄宗深、杜普明和高定住等人，共同商议。为了不违背郑和的遗愿，他们把前文罗列的佛教造像、宣德仿古铜炉、仿古铜瓶、钟磬、佛灯、暖床等，全部捐献给非幻庵，以满足太监郑和的遗愿……

这份史料的重要性，首先在于明确记载了郑和的卒年。由于文献语焉不详，这个问题以前一直不太清楚。例如：明抄本《郑和传》说：“宣德五年六月，天子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议复遣使颁诏行赏，仍命（郑）和偕王景弘往。（郑）和等仍复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照这么说，好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平安返回，而清代地方志却说郑和此行一去不返，卒于古里。例如：清康熙《江宁县志》记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入西洋，卒于古里，此则赐葬衣冠处也”。清同治三年《上江两县志·山考》牛首山条亦载：“太监郑和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卒于古里，赐葬山麓”。《圣像记》的发现，终于彻底了解了这段公案。

第二，这份史料提到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夕，把身后事托付给牛首山住持宗谦。我们认为此人正是明人李昭祥编《龙江船厂志》提到的“宋谦”。据该书《地课》记载，正统、天顺年间（1436—1464），“太监郑和子孙盗卖菜地一块”。弘治二年案发，告上“南京刑、工二部，会官勘问明白，查出退还田地，共肆顷伍拾捌亩伍分玖厘玖毫”。盗卖菜地者，名叫“郑灏招，系太监郑和子孙，伊祖在日，耕种提举司菜地一段，虽有眷黄给赐之文，查无文卷可照。太监已死，子孙陆续卖与江宁县已故民人宋谦。得银贰十两入己”。<sup>[38]</sup> 正统、天顺年间，郑和尸骨未寒，他的不孝子孙就开始卖房子卖地。

尽管郑和改奉佛教，但是他的家人仍信守伊斯兰教。郑和晚年为后代子孙不认真奉佛而忧心忡忡，所以立下遗嘱。据《圣像记》披露，郑和打算把家中佛像和法器，在他死后全部捐给非幻庵。从这件事的发展看，郑和的预感被不幸而言中。所谓“宋谦”之“宋”，殆与“宗”字形近而讹，此人就是《圣像记》说的牛首山住持宗谦法师。

第三，《龙江船厂志》还提到郑和有个孙子，名叫“郑灏招”，却始终没说郑和的儿子叫什么。无独有偶，《圣像记》明确记载郑和之子“名均，曰义”，那么郑均当即盗卖菜地者“郑灏招”的父亲。

永乐初大学士李至刚撰《故马公墓志铭》，对郑和身世有详细记载。据说郑和之父，“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

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给，未尝有倦容。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四人。和自幼有才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1382)

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铭曰：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仪之习。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永乐三年（1405）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碑背《郑和题记》又载：“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1411）十二月二十二日，到手祖家茔等祭扫追荐，至闰十二月十二日乃还记耳。”<sup>[39]</sup>

郑和是个太监，本无子嗣，郑均实乃郑和之养子。此人原系郑和兄长马文铭之子，过继给郑和后，改姓郑氏。《圣像记》提到郑和有个侄儿，名叫“珩德”。他没过继给郑和，应从本姓称“马珩德”。为便于今后的研究，我们将诸书所载郑和家谱列表如下：

辈份	马氏		郑氏	资料出处
祖辈	祖父，拜颜	祖母，马氏		《故马公墓志铭》
父辈	父亲，马哈只	母亲，温氏		《故马公墓志铭》
同辈	长子，马文铭； 次子 马和； 另有两姊妹， 不知姓名		永乐元年(1403)， 马和赐姓郑氏	《故马公墓志铭》
子辈	马文铭之子， 马珩德		郑均，字义 (马文铭之子)	《非幻庵香火圣像记》
孙辈			郑灏招(郑均之子)	《龙江船厂志·地课》

1936年，云南玉溪发现清末编《郑和家谱》。自这份家谱问世以来，它的真实性不断遭到置疑。中国家谱喜好攀龙附凤，《郑和家谱》未能脱俗，把郑和说成是元朝云南最高行政长官赛典赤的后代。郑和是太监，本无子嗣，这份家谱就说郑和“以其兄马文铭之子立嫡，名郑赐，字恩来，生二子，长万选，次廷选。万



选生一子，名宗阳，员生，初选楚雄府训导。万历四十三年，升岳池县知县……”故以郑和为始祖，以郑赐为二世祖，一直记到十六世郑兴富、郑兴旺和郑光贵三兄弟。<sup>[40]</sup>从《故马公墓志铭》看，马家只不过是随赛典赤入滇的普通穆斯林人家，没有任何数据能证明两家有什么血缘关系。<sup>[41]</sup>《圣像记》和《龙江船厂志》披露的郑和史迹，足以澄清郑和子孙的真名实姓，再次证明清末云南玉溪编造的《郑和家谱》不足为信。

## 二 宣德五年郑和所捐“古铜炉”和“钟磬”

明宣宗即位后，为满足自己玩赏香炉的嗜好，和宗庙祭奠之需，特别下令从暹罗国（今泰国）进口了一批红铜。据吕震等人撰《宣德鼎彝谱》记载，宣宗责成宫廷御匠吕震和工部侍郎吴邦佐，模仿皇府内藏的柴、汝、官、哥、均、定名窑瓷器的款式，并参照《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等史籍，设计和监制了一批香炉。为保证香炉质量，工艺师挑选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红铜一起经过十多次的

插图2 宣德六年造长乐郑和钟



精心铸炼。成品后的铜香炉色泽晶莹而温润，实乃中国五千年来铸铜艺术之巅峰。<sup>[42]</sup>宣德三年（1428），这批暹罗红铜开炉，一共铸造出三千座香炉，以后再未出品，成为千古绝唱。<sup>[43]</sup>宣德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至今还是一个谜。目前见到的各种宣德炉没有一件真品。

郑和身为内官监太监，负责“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并铜锡妆奁器皿暨冰窖诸事”。<sup>[44]</sup>同时，郑和本人还肩负着下西洋的外交事务。例如：永乐五年（1407）“十二月，复命郑和，立即与王景弘、侯显等率船队第二次下西洋，出使爪哇、古里、柯枝等国”；“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番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sup>[45]</sup>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中官郑和等使诸番国还。暹罗，苏门答腊，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sup>[46]</sup>宣德六年（1431）“二月，满刺加国头目巫宝赤纳等至京言，国王欲躬来朝贡，但为暹罗国王所阻。暹罗素欲侵害本国，欲奏无能书者。令王令臣三人潜伏苏门答腊贡使舟来京，乞朝廷遣人谕暹罗国王无肆侵袭，不胜感息之至。上命行在礼部赐巫宝赤纳等遣附太监郑和舟还国，令和赉敕谕暹罗国王。”<sup>[47]</sup>从暹罗进口铸造宣德炉的那批红铜，很可能是郑和一手操办的。宣德三年铸造的金铜香炉，自然在郑和典藏范围内。因此，宣德年间郑和打算捐给非幻庵的仿古铜炉中，自然包括大名鼎鼎的宣德炉。

宣德六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舰队在福建长乐等候季风。为保佑大明舰队一路平安，他们不仅在长乐南山寺勒碑《天妃之神灵应记》，同时还在南山寺铸造了一口大铜钟。此钟通高0.69米，重达77公斤，今称“郑和钟”。1982年，当地文物部门在福建南平市依朝村华光庙发现此钟，移入南平市文化馆保存，现存北京国家博物馆。钟铭曰：“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大明宣德六年（1431）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sup>[48]</sup>宣德五年（1430）郑和打算捐给非幻庵的“钟磬”，正是此类梵钟。不料，郑和一去不返，卒于印度古里，这口大铜钟未能保佑郑和平安返航。

### 三 随郑和下西洋的印度水手沙班

据《圣像记》记载，与牛首山住持宗谦共同执行郑和遗嘱的，还有“与同先公太监公共下西洋”的几位郑和生前好友，分别为“杨公惠泉，袁公普性，黄公宗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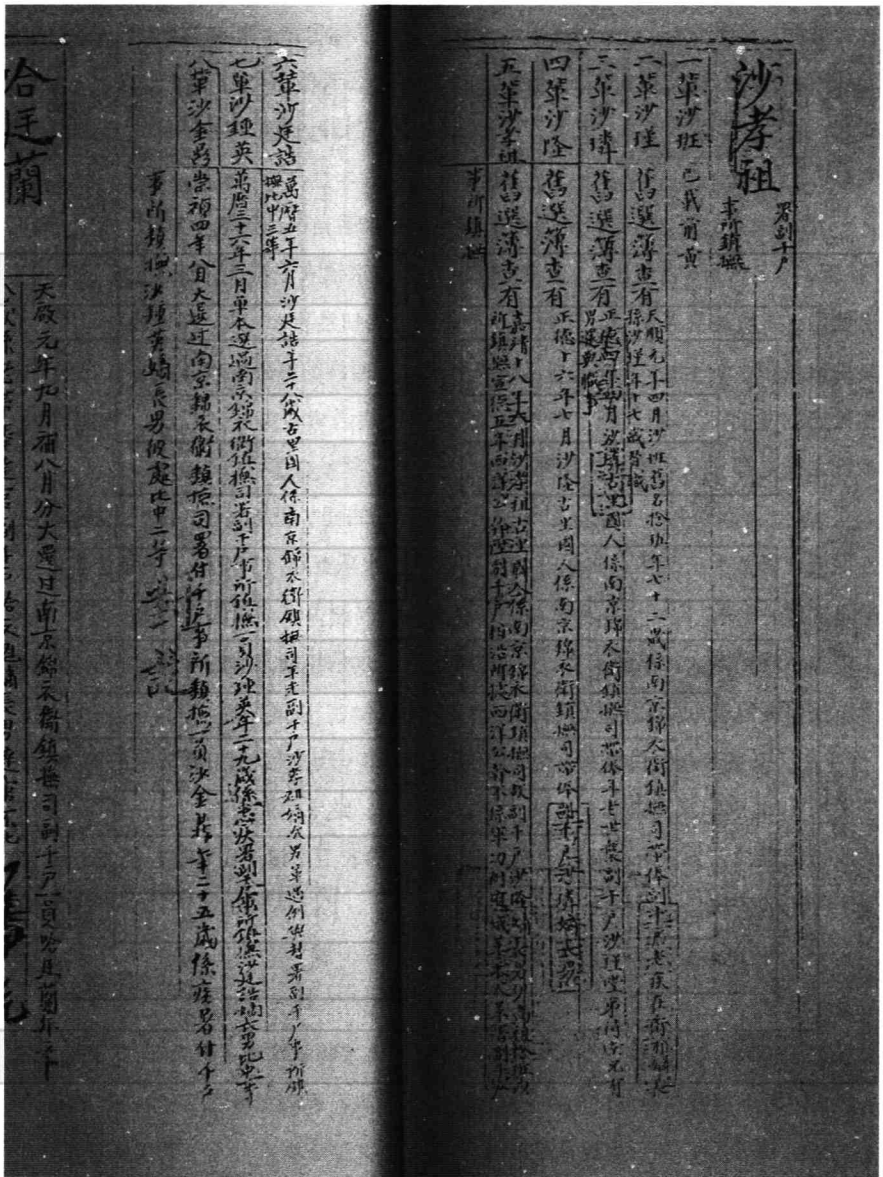


插图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古里人沙班家族档案

杜公普明，高公定住”。从明代碑刻，我们还可以知道随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另外几位幕僚，分别为正使太监“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长乐天妃灵应记》、南京太仓卫副千户周闻《周闻墓志》）。

值得注意的是，随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水手当中，还有一位印度人士，名叫“沙班，本名舍班，古里国人，慕德来归，授为南京锦衣卫镇抚。宣德五年（1430），出使西洋，宣德嘉其功劳，升为副千户，赐姓名曰沙班……”。古里即今印度西海岸港口城市卡利卡特（Calicut），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海外大本营就设在古里。据林松先生考证，“沙班”或“舍班”，来自阿拉伯语 sha` b n（八月）。从姓名看，沙班大概是郑和从印度古里招募的穆斯林水手。<sup>[49]</sup>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派中官尹庆出访古里，赐与彩币，古里王沙米的喜当即派使者随尹庆来华，永乐三年到达南京。永乐五年（1407），郑和首航古里，勒石立碑。永乐二十一年（1423），古里使者偕同忽鲁谟斯诸国使者凡一千二百多人来华，规模之大，前所未有。<sup>[50]</sup>沙班也许是永乐年间来华的印度水手，被大明海军招募，宣德五年随郑和下西洋。

为了核实这条明代档案，我让学生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北京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查找明代锦衣卫档案，结果他们发现了另一条有关沙班的明初档案，名为《南京见设卫所·亲军卫·锦衣卫·镇抚司官员》档案。<sup>[51]</sup>为便于今后的研究，录文于下：

沙孝祖，署副千户，事所镇抚。

一輩沙班，已载前黄（梅村按：疑指《南京锦衣卫选簿》）。

二輩沙瑾，《旧选簿》（梅村按：指《南京锦衣卫选簿》）查有：“天顺元年（1457）四月，沙班，旧名舍班，年七十二岁。系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带俸副千户，老疾，在卫。班嫡长孙沙瑾，年十七岁，替职。”

三輩沙璘，《旧选簿》查有：“正德四年四月，沙璘，古里国人也。系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带俸[副千户]，年老，世袭副千户，沙瑾堂弟。待堂兄有男，还与职事。”

四輩沙隆，《旧选簿》查有：“正德十六年七月，沙隆，古里国人也。系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带俸副千户，沙璘嫡长男。”

五輩沙孝祖，《旧选簿》查有：“嘉靖十八年六月，沙孝祖，古里国人。系

南京锦衣卫镇抚司故副千户，沙隆嫡长男。伊高祖舍班，以所镇抚，宣德五年（1430），西洋公干升副千户，相沿。所据西洋公干，不系军功，例应咸革，本人革，署副千户，事所镇抚。”

六辈沙廷浩，万历五年六月，沙廷浩，年二十八岁，古里国人。系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年老副千户，沙孝祖嫡次男，革遇例与替。署副千户，事所镇抚，比中三等。

七辈沙钟英，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单本选过南京锦衣卫镇抚司，署副千户，事所镇抚，一员。沙钟英，二十五岁，系患疾署副千户，事所镇抚。沙廷浩嫡长男，比中一等。

八辈沙金鼎，崇祯四年八月，大选过南京锦衣卫镇抚司。署副千户，事所镇抚，一员。沙金鼎，年二十五岁。系疾，署副千户。沙钟英嫡长男，彼处比中二等（对论）。

由此可知，古里水手沙班随郑和下西洋，升任南京锦衣卫副千户，子孙八代世袭，直至崇祯四年（1631）。印度人以忠诚而闻名，英国殖民印度时，多以印度人为卫兵。这个风俗对今天仍有影响，香港银行仍聘请印度保镖守卫，广东人戏称为“摩罗叉”。殊不知，这个习俗始于明初，南京锦衣卫早就开始聘请印度人当卫兵。

## 四 郑和的生辰忌日

关于郑和卒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 Giles）编《古今姓氏族谱》定在宣德六年（1431），西方学者多从之。<sup>[52]</sup> 1933年，伯希和（Paul Pelliot）著《郑和下西洋考》，逐条反驳其说，可是这位法国大汉学家亦未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圣像记》的发现，终于道破鸿蒙，人们始知郑和于宣德八年（1433）在印度西海岸古里仙逝。<sup>[53]</sup>

《圣像记》的郑和史料相当重要，我们可以由此推算出郑和的忌日。关于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航程，嘉靖四年（1525）祝允明撰《前闻记·下西洋》有详细记载。<sup>[54]</sup> 原文如下：

宣德五年（1430）闰十二月六日龙湾（南京明代港口）开舡，十日到徐山；二十日出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门（长江口刘家港）。<sup>[55]</sup>

六年（1431）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福建长乐），<sup>[56]</sup>十一月十二日到福斗山；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越南平定省首府归仁）。

七年（1432）正月十一日开舡，二月六日到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六月十六日开舡，二十七日到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七月一日开舡，八日到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八月八日开舡，十八日到苏门答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十月十日开舡，十一月六日到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十日开舡，十八日到古里国（今印度西海岸卡里卡特）；二十二日开船，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

八年（1433）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今印度西海岸卡里卡特）。二十日大船回洋，四月六日到苏门答刺（即苏门答刺）；十二日开船，二十日到满刺加；五月十日回到昆仑洋（越南后江省南海岸外昆仑岛海域），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开舡，三日到外罗山，九日见南澳山，十日晚望见望郎回山；六月十四日到头洋，十五日到碗碟屿，二十日过大小赤，二十一日进太仓（今江苏太仓）；七月六日到京，二十一日关赐奖衣宝钞。



插图4 郑和葬地——印度古里海滨

耐人寻味的是，大明舰队在宣德七年首航古里时，只在此地逗留四天，而宣德八年他们从波斯湾返航时，却异乎寻常地在此地停留了十天，大明舰队显然在古里遇到了什么大事。否则，怎么会无端停留那么长时间。最大的突发事件，莫过于大明海军统帅郑和在古里突然病故。这一点，现在完全可以从《圣像记》中得到证实。因此，郑鹤声和郑一钧的考证无疑是正确的，郑和忌日就在大明舰队返航古里之时——宣德癸丑岁（宣德八年）三月十一日至二十日，也即公元1433年3月31日至4月9日之间。<sup>[57]</sup>

关于郑和的生辰，史无明载。洪武十四年秋，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十二月攻克昆明，次年（1382）平定云南全境，摧毁前元残余梁王政权。据《故马公墓志铭》，郑和父亲马哈只卒于洪武壬戌（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初三日，恰逢明军克云南之时。显然，郑和之父死于这场战乱，而郑和本人则被明军掳入军中。明初边将经常劫掠边疆少数民族幼童，以充侍卫。例如：《明史·金英传》所记交趾人范弘、阮浪；叶盛《水东日记》所记交趾人陈芜。<sup>[58]</sup>另据明末查继佐《罪惟录》记载，“郑和初名三保，云南人，与西番人孟骧初名添儿，滇人李谦初名保儿，胡人云祥初名猛哥，田嘉禾初名哈喇帖木儿，而狗儿者为王彦，燕王时，皆以赐阉从起兵有功劳”。<sup>[59]</sup>尽管如此，除了皇上，恐怕无人有权阉割太监，时下盛言郑和阉于洪武十五年（1382），纯属无稽之谈。

关于郑和被阉割之事，谢方先生考证尤详。他认为“郑和应该是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以后，洪武十八年（1385）以前，即傅友德班师回到南京以后至太祖命冯胜、傅友德、蓝玉俱备边北平，郑和则作为小太监被送至北平燕王府中。由于受阉割的儿童年龄一般都在14岁以下，因此我们就暂定洪武十七年郑和受阉之年不超出14岁，大概是9—14岁之间”。他最后推算：洪武十七年（1384），郑和十岁。这年送至南京，随即惨遭阉割。因此，郑和的生辰最有可能在洪武八年（1375）。<sup>[60]</sup>如果此说不误，郑和在古里病逝时，享年59岁。

## 五 郑和的最后归宿

19世纪末，西方人开始撰文，表彰郑和七下西洋的丰功伟业，日本学者继之，而中国人迟至20世纪初才开始谈论郑和。1904年梁启超率先发文纪念郑和至今，



郑和研究在中国历经了一个世纪，世人甚至不知道郑和最后归宿究竟在什么地方。

清代地方志屡次提到南京牛首山有郑和墓。例如：清康熙《江宁县志》记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入西洋，卒于古里，此则赐葬衣冠处也”。清同治三年《上江两县志·山考》牛首山条亦载：“太监郑和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卒于古里，赐葬山麓。”1959年，李士厚在南京市江宁区牛首山西南麓周昉村找到一座郑和墓。据说，郑和兄长马文铭后裔郑流红20世纪50年代以前为郑和守墓，提供了这条重要线索。<sup>[61]</sup>

古代远洋航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在海上去世者，皆就地处理，以免疾病传播。所以郑和遗体未能运回国内，只将一束头发和若干衣物运回。郑和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后人依照穆斯林礼仪，在牛首山脚下为郑和建了一座伊斯兰风格的衣冠冢（插图5）。

众所周知，郑和早就改奉佛教。皈依佛门后，郑和积极参与各种佛事。例如：永乐、宣德间，“陆续成造大藏尊经计十一藏”，分别奉施给南京灵谷寺、天界寺、静海寺、鸡鸣寺、佛窟寺、北京皇后寺、镇江金山寺、福建南山三峰塔寺和云南五华寺等名山大刹。<sup>[62]</sup> 所以这座郑和墓的真实性令人生疑。



插图5 南京牛首山脚下郑和墓

永乐九年(1411),郑和衣锦还乡,他没为家乡的清真寺增添一砖一瓦;相反,却在永乐十八年(1420)为云南五华寺施印635卷本《大藏经》一部。云南省图书馆藏《五华寺大藏经发愿文》详载此事。<sup>[63]</sup>文中说:

大明国奉佛官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谨发诚心,施财命功,印造《大藏尊经》一藏,计六百三十五函,喜舍于云南五华寺,永远长生供养。以此殊勋,上祝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海宴河清,民康物阜。所冀福吉祥。凡奉命于四方,经涉海洋,常叨思于三宝,自他具利答报,四恩均资,三有法界,有情同缘种智者。永乐十八年(1420),岁次庚子,五月吉日,福吉祥谨题。

这就清楚地表明,郑和已从一个云南穆斯林小童,彻底演变为虔诚的佛门子弟。在明成祖大肆渲染佛教灵验的影响下,他身边的大小太监“益重佛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两京城内外云”。例如:太监刘瑞在鼓楼西北建普光庵;<sup>[64]</sup>御用监太监王瑾故宅,景泰年间改为承恩寺。<sup>[65]</sup>有明一代,太监往往以寺院为最后归宿。正如明太监刘若愚《酌中志》所言,“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郑和为明成祖身边最为亲信的太监之一,自然不会例外。郑和去世的消息传到京师后,明宣宗赐葬佛教名山——牛首山。郑和死后之所以赐葬佛教名山——牛首山,无疑遵从郑和生前遗愿。

牛首山俗称牛头山,海拔243米;双峰东西相对,因外形似牛头而得名。据明人葛寅亮《金陵梵刹志》记载,明初金陵有佛窟寺,位于南京城南中华门外10公里牛首山,距明聚宝门三十五里。正统年间(1436-1449),更名弘觉寺。另据唐许嵩编《建康实录》记载,佛窟寺始建于南朝梁武天监二年(503),经历代扩建改造,寺名迭更。唐朝贞观年间,法融禅师在此山创立牛头禅宗。南唐后主李煜改名弘觉寺,南宋易名崇教寺。经历代扩建改造,牛首山陆续建有普觉寺、宏觉寺塔、辟支洞、文殊洞、道人祠、罗汉泉和摩崖造像等梵刹,如今仅存弘觉寺塔一座(插图6)。<sup>[66]</sup>

郑和晚年多次到牛首山佛窟寺从事佛事活动,并向牛首山佛窟寺捐印《大藏经》。此事从《永乐北藏·优婆塞戒经》卷七之末《郑和题记》,可以略知一二。1947年春,燕京大学邓之诚教授在冀县人李杏南处见到这个题记。邓之诚录文如下:<sup>[67]</sup>

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监太监郑和,法名速南陀释,即福吉祥。切念生逢盛世,幸遇明时,谢天地覆载,日月照临,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成。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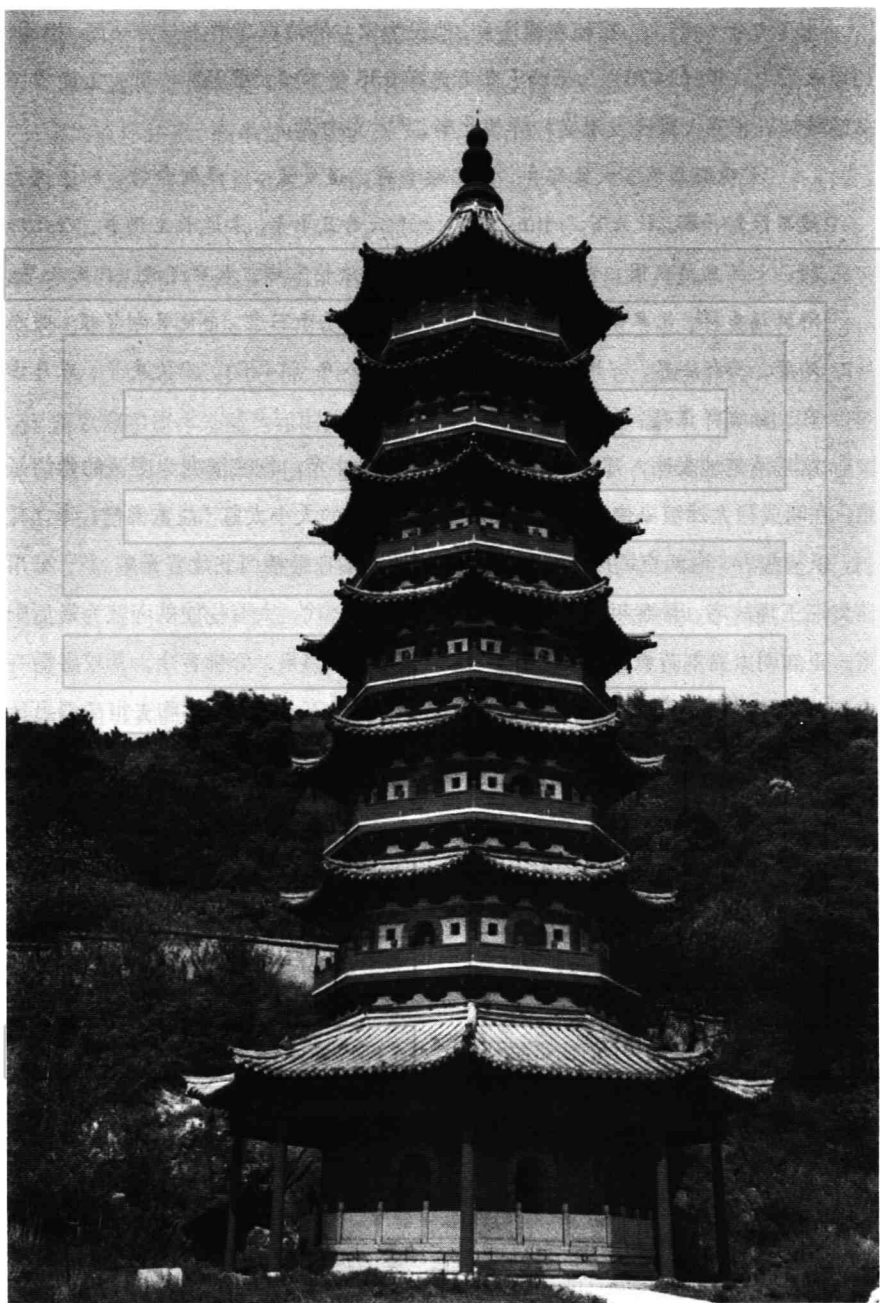


插图 6 南京牛首山明代弘觉寺塔

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颂读。伏愿皇图永久，帝道遐昌，凡奉命于四方，常叩恩于庇佑，次冀身心安乐，福广寿长，忤除曩却之行，永享现生之福。出入起居，吉祥如意。四恩等报。三有齐资，法界群生，同成善果。今开陆续成造《大藏尊经》，计一十藏。大明宣德四年（1429），岁次己酉，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牛首山佛窟禅寺，流通供养。<sup>[68]</sup>

如前所述，郑和还亲自到牛首山佛窟寺拜访宗谦法师，游览了牛首山东峰兜率崖辟支佛洞。此次牛首山之行，郑和颇受感动，于是捐资在兜率崖大造佛寺。郑和在牛首山建寺立像似在宣德元年（1426），这年“四月，命司礼监移文谕太监郑和毋妄请赏赐。先是遣工部郎中冯春往南京修理宫殿，工匠各给赏赐。至是春还奏南京国师等所造寺宇工匠，亦宜加赏。上谕司礼监官曰：佛寺僧所自造，何预朝廷事！春之奏，必（郑）和等所使，春不足责，其遣人谕和谨守礼法，毋窥视朝廷。一切非礼之事，不可妄有陈请。”<sup>[69]</sup>郑和动用国库修造佛寺的企图，遭到明宣宗严厉指责，所以他不得不自己捐资修造牛首山佛窟寺。

近年在牛首山东峰舍身台（即兜率崖）附近发现两块明代残碑，尚存近百字，现已移入崖下弘觉寺保存（插图6）。其中一碑提到“牛首山弘觉寺舍身崖兜率宫观音洞”，当即明朝后期再造山门的续宽法师所撰。<sup>[70]</sup>所谓“兜率宫”当即郑和当年捐资兴建的佛寺。

以寺庙为坟地之风起于西域。公元3世纪中叶，中原高僧朱士行在于阗病逝，“依西方法维之，薪尽火灭，尸犹能全……因敛骨起塔焉”（梁慧皎《高僧传·朱士行传》）。北魏高僧宋云西行求法，途经于阗。他在游记中写道：于阗人“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家纪》）。<sup>[71]</sup>在西域佛教文化影响下，自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往往以禅院为墓地。例如：山西夏县司马光家族墓地就建在禅院里。作为受过菩萨戒的佛门弟子，郑和理应以寺庙为最后归宿。正如郑一钧先生指出的，郑和晚年造访地势险峻的佛教名山——牛首山，无非是为自己寻找最后的归宿。<sup>[72]</sup>

无论如何，牛首山脚下伊斯兰式陵墓恐非郑和本意，他为自己安排的最后归宿，当在由他本人捐资建造的牛首山兜率崖附近佛窟。

## 注释：

[1] 金国平、吴志良(澳门)：《郑和航海之终极点——比刺及孙刺考》，原载《澳门研究》2002年；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136页。

[2]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7-155页。

[3] 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原载《小说月报》第一号(新年号)，1929年，第47-64页；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30页。

[4] 北京图书馆藏《佛说摩利支天经·道衍题记》永乐初刻本。录文见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序》，收入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图版见李致志：《古书版本概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图一一。

[5] 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原载《小说月报》第一号(新年号)，1929年，第47-64页；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6] 据明抄本《郑和传》，“洪熙元年(1425)二月，仁宗命(郑)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南京之设守备自(郑)和始也”。《明仁宗实录》卷九上也提到郑和守备南京之事：明仁宗洪熙元年“二月，命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南京，于内则与内官王景弘、朱卜花、唐观保协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驸马都尉沐昕商议的当，然后施行。”

[7] (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碧峰寺起止记略》，见《中国佛寺志》，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重印版；杨新华主编：《金陵佛寺大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539和第546页；何孝荣：《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见《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18-27页。

[8] 李冀：《碧峰寺“藏身”小学中昔日寺院如今仅存假山一块》，见《南京日报》2004年11月26日版。

[9]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7-155页。

[10] 此据我的学生马健在柏林寺分馆拍摄的高清晰数码照片，谨致谢忱。

[11] 此文作为附录刊于明二南里人(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百回本二十卷末，收入《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4：3)，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承蒙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博士研究生许晓东女士查找并惠寄此刻本照片；承蒙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研究生陈凌先生，与作者共同讨论这两个刻本，并为校订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一并在此表示我由衷的感谢。

[12] 丁卯：永乐无丁卯年，故旧录改作“辛卯”，也即永乐九年(1411)。据永乐纪年，正确纪年可能有四种：丁亥(永乐五年/1407)、辛卯(永乐九年/1411)、丁酉(永乐十五年/1417)或癸卯(永乐二十一年/1423)。文献语焉不详，无法确定。

[13] 作：旧录作“所”。

[14] 太：旧录作“灵”。

〔15〕木：旧录改作“木”。

〔16〕瞻：旧录作“嗽”。

〔17〕回：旧录作“因”。

〔18〕返：旧录未释。

〔19〕及：旧录作“并”。

〔20〕下：旧录作“侯”。

〔21〕以为：旧录作“似口”；远：三山道人刻本作“建”，旧录从之。

〔22〕及：旧录作“必”。床：旧录作“来”。

〔23〕均：旧录作“钧”。

〔24〕乎：旧录作“哉”。

〔25〕徒：旧录未释。

〔26〕乙公：旧录以为“乙”后漏“卯”字，把“公”从下文，不确。其实，这里“卯”与“公”字形近而讹。

〔27〕德：旧录未释。

〔28〕与：旧录未释。

〔29〕袁：旧录作“究”。

〔30〕深：旧录作“泽”。

〔31〕杜：旧录未释。普：旧录作“瞽”。

〔32〕定住：旧录未释。

〔33〕计：旧录作“商”。

〔34〕及：旧录作“反”。

〔35〕炉、瓶：旧录作“灵樞”。

〔36〕磬：旧录作“署”。

〔37〕万：旧录未释读。

〔38〕(明)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重印本，第109-110页。

〔39〕此墓志录文，收入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9-50页。

〔40〕1936年在云南玉溪发现，1937年云南大学教授李士厚编辑出版《玉溪郑和家谱考释》一书。由云南崇文印书馆印刷，

正中书局代售。这个家谱后来收入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家世资料》，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41〕马继祖：《关于郑和的家世》，收入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383-397页。

〔42〕此书收入《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一·器物之属。宣德年间，吕震早已不食人间烟火，此书作者当系托名。

〔43〕参见《明宣宗实录》宣德三年。

〔44〕《明史·职官志三》。

〔45〕《长乐天妃灵应碑记》；《明成祖实录》卷五十五。

〔46〕《明成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三。

〔47〕《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六。

〔48〕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史迹文物选》，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陈延杭、朱家骏：《郑和下西洋在福建的史迹调查》，见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下西洋论文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315-319页。

〔49〕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原载《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4-165页。

〔50〕《明史·外国传·古里》。

〔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南京见设卫所、亲军卫、锦衣卫·镇抚司官员》，《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七十三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75页。我的学生马健、盛洁和李高峰提供这条材料，谨致谢忱。

〔52〕Herbert A. Giles,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London: B.

Quaritch, 1898; Reprinted in 1968 by Paragon Book Gallery.

[53]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7-155页。

[54] 此文收入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5-57页。

[55] 宣德六年(1431)正月，郑和等人勒《通番事迹碑》于太仓浏家港天妃宫。

[56] 宣德六年(1431)十一月，郑和等人勒《天妃之神灵应碑》于福建长乐南山寺。

[57]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原载《中华文书论丛》1985年第3期；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下西洋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58] (清)沈振：《万历野获编补遗·阉童》。

[59] (明)查继佐：《罪惟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校点本。

[60] 谢方：《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原载《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收入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0-255页。

[61] 据李士厚先生调查，郑流红为郑和十八世孙，听他祖辈传说谓：郑和死在外国，埋在国外。一个黑脸亲属将他的发辫装进靴子里带回，埋在牛首山。这个调查记只有油印稿，参见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7页。

[62] 邓之诚抄南藏本《优婆塞戒经》卷

七《郑和题记》，收入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564-565页。

[63] 1951年，云南省图书馆整理古籍时，在《永乐北藏·沙弥尼离戒文》之末发现《五华寺大藏经发愿文》；录文见陈楠：《三宝太监郑和奉佛事迹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6期，第43页。

[64] (明)释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三，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蓝应裘等编：《上元县志》清乾隆抄本卷一二《寺观》。

[65] 何孝荣：《明代宦官与佛教》，见《南开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18-27页。

[66] 清同治三年《上江两县志·山考》牛首山条，第98-99页；杨新华主编：《金陵佛寺大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244-258页。

[67]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564-565页。《永乐北藏》近年重印，这段录文参见《永乐北藏》整理委员会：《永乐北藏》第7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824页。

[68]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564-565页。

[69] 《明宣宗实录》卷十六宣德元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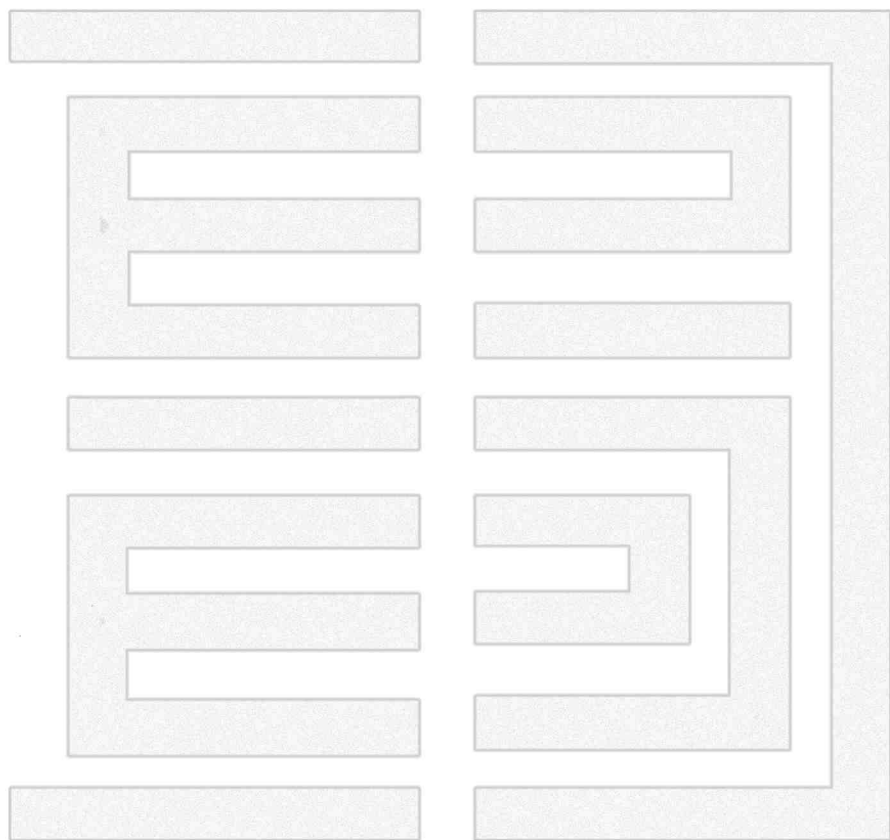
[70] 于峰：《郑和牛首山上曾建身后墓地》，《金陵晚报》2004年11月24日。

[71]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林梅村：《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墓表考证》，《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43-262页。

[72] 此说见注〔70〕记者对郑一钧的采访。



# 主题索引



## A

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 196、292

阿波系突厥 211

阿尔多克沙 061

阿尔赞 2 号墓 228

阿胡拉·马兹达 143、146

阿克贝希姆古城（碎叶城） 235

阿难答陵墓 266 - 269

阿斯塔那墓地 147、197

《阿维斯塔》 143、147

安归伽 143

安世高 111、112

奥杜威遗址 023

## B

巴罗 093、110、116、119、121

北元 042

白衣大食（伍麦叶王朝） 196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035

比干 260、261

碧峰寺 326 - 327

鲍培 169、261

波叶尔 110、116

伯格曼 034、059、078 - 079

伯希和 038、058、079、105、151、

155、217、255、270、274

布尔霍图伊文化 252

《步辇图》 039、192

## C

苍狼白鹿 227

《草木子》 230、256、263、272、275

察合台汗国 282、292

长安出土金铜佛像 056-057

长乐郑和钟 331

陈梦家 082、084、102、108

陈槃 084

陈直 083

赤井清美 083

仇英《归汾图》 315 - 316

处罗可汗 210、211、217

## D

达不孙文化 252 - 253

大谷考察队 057、197

《大明混一图》 316 - 317

大庭修 083

大夏 043、047、146、291

大英博物馆 022 - 030

大泽孝 211、214

岱盛山 271

黛砚 068

德洛娃斯帕女神 053

登封观星台 314 - 315

迪烈部 259

地豆于 249

东汉佉卢文井阑 050

东女国 189、192

东非人 023

都兰镀金银青铜凤纹透雕盒饰 202

都兰吐蕃墓 039、194、201

独木棺 253、258

笃来贴木儿 293

敦煌藏经洞 038、041

敦煌汉简 081、099、172

## E

额尔古纳河 246

额济纳 040、080、269

鄂尔浑河 224

## F

法门寺地宫 043、201

法显 047、111

《非幻庵香火圣像记》326

## G

噶尔家族 039、193

格伦威德尔 066、163

拱北 269

沽源“萧太后梳妆楼” 267

古里 328

古罗马文明 027

古希腊文明 026

顾姑冠 266

鬼子母 063

贵霜王朝 048

郭里木吐蕃大墓 190

## H

海东青王冠 230

《海国图志》280

诃利帝 063

赫拉克勒斯 061

黑石号沉船 203

黑水城（亦集乃城）040

黑水靺鞨 250

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196、292

黑于厥里 252

弘吉剌部 254

黄文弼 76、208

回鹘 35、167、209、250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318

## J

稽胡 166

吉田丰 209

爵宾 046

《伽泰罗尼地图集》320

迦膩色迦 049

健陀罗 028、046 - 051、111

颉利可汗 212

金帐汗国 285

井真成 044

精绝 060、091、142

景教 238、288

鸠摩罗什 037

居延汉简 041、078

居延新简 080

## K

喀什 042、067、293

康居 049、099、178、294

克烈部 238

克孜尔石窟 055、065、151

孔雀纹织锦 200

《坤舆万国全图》320

## L

拉普逊 110、137

蓝突厥 250

劳幹 082

勒柯克 150

骊靬 104 - 105

李朝瓷器 028

李希霍芬 032

《流沙坠简》075

鎏金银鹿 227

《龙江船厂志》329

楼兰 034、058、103

楼兰木雕门楣 058

禄东赞 039、188

罗塞塔石碑 024

## M

马伯乐 075

马尔沙克 068、198、234

马鸣 152

马神 053

马先醒 084

麦木鲁克 283

《毛罗世界地图》320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025

《蒙古山水地图》305

蒙兀室韦 250

米兰佛寺 067

米芾 044

摩尼教 238

莫贺延碛 174

墨离城 173

默啜可汗 172、239

木杆可汗 209

木来城 171

## N

纳骨器 178

男女合欢图 190

妮娃迦 146

尼雅汉简 082、090

尼雅犍陀罗残画 060

泥利可汗 210

捏古思 248

牛首山 338

## P

佩尔列 261、272

毗伽可汗宝藏 224

毗伽可汗碑 226、249

## Q

乞颜部 239、257

起辇谷 273

契丹 230、239、297

且末佐卢文书 137

钦察汗国 285

蜻蜓眼玻璃珠 025

邛竹 049

龟兹 037、065、150

曲雕阿兰 255

阙特勤碑 249

阙特勤陵园 224

## R

柔然 166、230、251

## S

萨曼王朝 196

塞尔柱王朝 238、290

塞人 053、167

三眼神 146

森安孝夫 210

森鹿三 083、281

森穆夫 205

僧伽罗刹 042

杀人石 213

沙班 332

沙畹 074、094

山普拉佐卢文绢片 063

鄯善 058、091、137

《声教广被图》318

尸罗夫 203、292

蚀花肉红石髓珠 054

史树青 082、091、209

室点密系突厥 213

室韦 247

疏勒 042、067、142

斯坦因 (M.A. Stein) 023、059、  
074、090

斯文赫定 034、058

四川早期佛像 055

苏毗人 039、188

粟特 039、044、055、167、178、  
224

粟特式金银器 234

碎叶城 (阿克贝希姆古城) 215、235

## T

塔克希拉 047

特克斯河 208

腾汲思海 255

铁勒 174、260

帖木儿帝国 288、293

透雕铜十字架 240 - 241

突厥 035、043、167、208、224、

239、246

突厥碑铭研究计划联合考察队 196

突厥式金银器 231

图木舒克 068

土垠遗址 078

吐谷浑 166、188

吐火罗语 112、151

吐鲁番 033、066、144、150、171、  
193、231、293

吐峪沟千佛洞 035

瞰欲谷陵园 226

## W

汪古部 241、267

王国维 075、259

望星楼 312

尉迟乙僧 038

尉纥骊城 170

《温室洗浴众僧经》110

文艺复兴 030

窝阔台汗国 299

乌古部 259

伍麦叶王朝 (白衣大食) 196

兀鲁伯天文台 313

## X

《西北地附录》 279

西姆斯·威廉斯 210

西乌珠尔墓地 256

《西域图略》 310

《西域土地人物图》 309

奚人 239、249

黠戛斯 167、247、300

下马崖 176

袄教 035、143、179、198、238

象棋 053

小河墓地 034

小洪那海石人 208

新月纹织锦 196

宣德炉 328

玄奘 038、215

悬泉汉简 104

血渭一号大墓 039

## Y

亚历山大灯塔 024

伊儿汗国 287

移相哥城 269

亦集乃城（黑水城） 041

亦邻真 273

鹰纹织锦 199

永田英正 083

《酉阳杂俎》 143、229

于阗 037、058、146、281

虞弘墓 166

《元经世大典图》 279

月氏 046、099、167

月祖伯 285

## Z

扎滚鲁克 1号墓 050

昭武九姓 234

正仓院 033

郑和 325

《郑和家谱》 330

织金锦 200

直体佉卢文 150



Copyright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 / 林梅村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9

ISBN 978-7-108-02622-4

I. 松… II. 林… III. ①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古代

②文化交流—中外关系—中世纪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1533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特约编辑 王 联

装帧设计 朱 铨

设计制作 王 楠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

字 数 360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